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

## 第八辑

(教文卫体人物专辑)

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 目 录

- 农业教育家杜尚礼先生……………星火(1)
- 回族教育家吴懋功先生……………阿沙(14)
- 教育界知名人士苗英先生……………郭宪清(27)
- 蒙古族教育家孟绍先生……………甄可君(39)
- 桃李芬芳九州间……………谢茂才(54)
- 民族幼儿教育家韩秀英……………同田(73)
- 满族教育家舒乐知生平事记……………富景华(80)
- 
- 我区民族文献馆藏的奠基者——王庆先生……………
- ……………娜仁杜桦(88)
- 回忆我的父亲——王裕民……………王丽云(97)
- 小记王静卿……………图强(108)
- 梨园全才“小梅梅”
- 记晋剧著名演员亢金锐……………巴·敖特根(115)
- 老树逢春绽新葩
- 记内蒙古文史馆员刘映元先生……………张尔杰(129)
- 张万仁传略……………忒莫勒(137)
- “吹塌天”和“拉塌地”
- 记著名二人台乐师张埃宾、周治家……………温万(145)
- 以翎子功梢子功见长的十七生陈宝山……………赵梁(152)
- 子材先生在起义过程中……………晋阳(156)

回忆我走过的路..... 韩燕如 (161)

著名中医邓子厚..... 春甫 (166)

著名助产士白本蓉..... 王希舜 (174)

著名蒙医教授白清云..... 刘春 (180)

朱静川大夫生平..... 朱国忠 (194)

归绥“共和医院”院长何秉如..... 希望 (200)

从事中医多半生的回顾..... 黄惠卿 (202)

人民医生的楷模

——记舒兆勋医生..... 晓理 (211)

体育界老前辈——孔博泉..... 焦基梅 (236)

从放牛娃到全国冠军

——记蒙古族长跑运动员伊套特格的一生

..... 张焕伦 (248)

体育之恋

——苗时雨传略..... 张新宇 穆岚 花玲 (254)

# 农业教育家杜尚礼先生

星 火

杜尚礼（字子通）先生一生从事农业教育工作34年。曾先后担任原“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该校系1924年成立的私立“西北实业学校”，《绥远通志稿》称“是为绥远省有职业教育之始”，现称“内蒙古农业学校”）校长11年，因此，他是原绥远省（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久负盛名的农业教育家。现将杜尚礼先生的生平作一梗概介绍。

—

杜尚礼先生1901年生于凉城县天成乡三十六号村的一个破产地主家庭。祖父原是有名的大地主，家有土地4顷多。父亲7岁那年，祖父病逝，家中土地由祖母料理。父亲人称七老财，从小娇生惯养，读过3年私塾，成年后代替祖母掌管了家务。但由于他生活浪荡，吸食鸦片，不善经营，家计债台高筑。1924年父亲突然病故，为了偿还债务，将土地出卖了大半，只留下一顷七八十亩，由母亲樊氏和兄弟杜尚志经理。其时军阀混战，地方秩序不安，其家时被抢劫，复加乡保衙吏勒索，家境日趋没落破产。父母所生四男三女，杜先生为大。1941年分家时，杜尚礼先生分得土地40亩。

1911年，杜先生9岁时，在家乡前清秀才杨维城老师的私塾坊读书。1915年于丰镇县立小学学习一年。1916年考入察哈尔第一中学（张家口第一中学）。1919年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

其父不供升学，自己主动和凉城县政府争取，才于1920年由凉城县政府保送入察哈尔地方自治讲习所公费学习半年。结业后，感到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不够，但其父仍不供给学费，而他本人则求学若渴，不顾父亲的阻拦，于1921年自己借资赴北京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求学。其父虽不同意，但亦无可奈何，只好供给其求学费用。1925年，北京大学有位同学动员他参加国民党，本人已同意，但未办理入党手续，没发党证。

## 二

1926年暑期，杜尚礼先生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经同学傅向玄介绍到了察哈尔实业中学（当时察哈尔系一个省级行政区，包括现乌兰察布盟的一部分地区和锡林郭勒盟、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大部，省会是张家口市）任农科教员一年半，教植物学和作物学（现称“作物栽培学”）。这是他从事农业教育工作的开端。1927年底，由于时局变动而被学校解聘。1928年7月，到察哈尔农林试验场服务半年。1929年春，应同学傅向玄之召，参加了陆军骑兵第二师张励生部担任经理处会计。这是旧社会的一个美差，他却以个性不适军队生活，不感兴趣为由，于年底离职返家。1930年春，到绥远中学任教，并在第一师范学校（现呼和浩特师范学校）兼课，均教生物学（包括动物学和植物学），也是和农业有关系的课程。1931年国民党在“绥远中学”办理党员登记时，他由当时该校体育教员吴桐介绍填过登记表，填表以后，一直没有下文，亦未领取党证。

1932年春因更换校长，转至“绥远省立职业学校”任教，教土壤学和作物学。1934年因学制改革，兼任教务主任。同年夏天，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绥远省立职业学校于1933年改为该名，简称“农职”）有部分学生不满意训育主任曹先生的工作作风，而曹则事先得知，报告给苗英校长。苗校长拟以学生鼓动风潮

为名开除王继曾、马玉麟二位学生，并和杜尚礼先生商量。杜先生只知道学生不满意曹主任，而对闹风潮的事丝毫不知，遂提议：若无确实证据开除学生，恐怕因此而将学生激发起来，不如将此事公布，看学生的态度如何？当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公开宣布。会上王继曾起立发言说，“我们只不满意曹主任，并向校长报告过，并没有闹风潮的意思”。于是一场风波从此平息，从而保护了学生。

当时绥远省政界有归绥的潘秀仁和赵允义组成的“潘赵派”，萨县的祁志厚和托县的焦守显组成的“祁焦派”（也叫“改组派”），以及后来形成的以张钦为首的“绥东派”三个派系。后来，“改组派”和“绥东派”都被阎锡山收买了，于是两派组成一个共同反潘的阵营，1933年鼓动学生把教育厅长潘秀仁赶下了台。时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为了缓和两派间的矛盾，遂把离省多年而在南京工作的托县人阎伟找回来担任教育厅长。因为赶潘秀仁时，“农职”的同学没有参加，有人认为苗校长是倾向“潘赵派”的，就在赶潘过程中，竟在大街上画了苗校长的画像，并附上“猫猫快来吃食”的注释。因此，苗校长于1935年大台什新校舍竣工，学校搬入新校址后，向教育厅递辞呈离校。阎伟让杜尚礼先生代理校长。在此期间，究竟让谁当校长，发生了争执。“绥东派”要让杜尚礼先生担任，教育厅长阎伟却说：“我不能被他们要挟，偏要叫田圃去干。”后来，由于事情发生的突然，再加上“绥东派”张钦（和杜尚礼先生是同乡）的支持，杜先生的朋友丁士濬的帮助，于1936年4月绥远省教育厅正式任命杜尚礼先生为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校长。

杜先生当校长后，由于是一位踏踏实实的研究学术的人，他想把“农职”办成一所名符其实的农牧学校。为此，他做了两件事。首先抓教师，除把苗校长任用的教职工全部留用外，还把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的佟树藩（满族、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畜

牧厅副厅长)聘来任牧科主任兼教师;聘请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毕业生杨景溟为农科教师,从而加强了专业师资力量。第二,抓教学质量。为了扭转过去学生把来“农职”上学当作住补习班或混文凭的状况,强调学生参加各种实验和实习,以达理论联系实际。他带头率领教师亲自下手种庄稼、饲养家畜。这样学校利用门前的70亩地修盖了温室、气象观测站;栽培了果树、花卉;开辟了各种试验田;建立了科学化的家畜、家禽厩舍。能够使学生进行各种实验实习,并把试验成功的作物优良品种和优良家畜、家禽品种进行推广。当时学校对附近农村的生产起到了示范作用。其时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到学校参观。短短的二年时间,就基本达到了他把“农职”办成名符其实的专业学校的目的。

1935年7月,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绥远成立了特务机关,为侵略绥远搜集情报。特务机关长羽山少佐侦得“农职”气象观测站有较先进的仪器水银气压计,遂对这个气象观测站非常重视,曾给主管气象观测站的教务主任田圃和管理员乌学智分别送礼,企图获取历年来的气象资料,并要每天给他们提供气象情报。田圃先生请示杜尚礼校长后,杜先生不做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遂向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汇报,商定抄给一些假数据应付之。

1936年冬天,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郑天翔同志回绥远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时,组成了“绥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由章叶频同志担任,负责宣传工作;武达平同志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农职”的学生侯福荣(后叫侯野烽,“文革”前任驻突尼斯大使,“文革”后任驻伊拉克大使)、屠忠顺(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小教司长)、刘映元、刘霭等均参加了这个党的外围组织,而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青年音乐家吕骥在绥组织业余歌咏队,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时，屠忠顺也参加了。杜校长从不制止，从而起到了支持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作用。

1937年秋，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绥远，使学校停办8年。

###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日寇侵占大同后，在绥远岌岌可危之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却以“弃绥保晋”为由，将驻绥陆军第三十五军傅作义部（其时傅作义兼任绥远省主席）及驻包头陆军第七十师王靖国部统统调回太原。代理傅作义主持绥远政务的绥远省民政厅长兼国民兵司令袁庆增也率领绥远省政府亲信和国民兵一部逃回山西。留在绥远的军政人员亦因群龙无首，机构涣散。值此，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亦奉令解散，杜尚礼校长亦由归绥西退，隐居包头市。包头的“中央军”和“自卫军”都成了武装逃难的集团，毫无战斗力，随之包头亦被日寇侵占。不久，杜校长被日寇侦知，扣押至日伪宪兵队将近一个月，身受毒刑，致使脊骨受伤，腰痛难忍。释放后派他回原校址当保管员约两个月时间，将校舍及财产移交给伪“蒙古学院”，他始得脱身回凉城县家乡。为了不当“亡国奴”，杜尚礼先生苦读祖国医学，以中医为业，糊口渡日，维持生活。

杜尚礼先生行医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收过什么诊断费、出诊费……。病人登门求医，他立即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病症，开处方；有人请他出诊，便随之到病人家中去看。有钱的病人给看，没钱的病人更给看。熟人给看，生人也给看。尤其是老朋友们来求，更为热情周到。由于他这种高尚的医德，虽然看病的病人很多，但收入却很微薄，生活十分清贫。

杜先生从1945年回到“农职”继续担任校长、以及解放后合并到内蒙古农牧学院之后，他都在利用业余时间给师生员工看

病，由于他擅长妇科，女教工、女学生找他看病的更多。有些老乡、朋友、亲戚，或师生员工的亲友，不论是谁，有求必应。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只要去找，决不拒绝，总是耐心细致地给看。找到家里，还给予端茶、点烟，热情招待。杜先生这种始终如一，为患者解除疾苦的精神，是他受到大家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

杜先生对病人认真负责，对医术精益求精，成为丰镇、凉城两县的名医，就是在归绥（现呼和浩特）也是驰名的。在抗战期间，凉城县的知名人士宋介之的孩子，二十多岁，得了个病，请了许多大夫，都说是绝症。后来听说杜子通（杜尚礼先生行医时用字杜子通）医道高明，请去给看。一号脉即说是结症（胆道梗阻），开了个药方，服后手到病除，经过一段时间，完全恢复了健康。1954年，范学仪老师的五岁小女，得病很严重，医院中医科诊断说：有虚有实，但实不能泻，虚不能补，毫无办法。后来把小孩抱到学校请杜先生给看，二方小药，药到病除。可见杜先生的医道名不虚传。解放前，范学仪老师在当时的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搞总务工作，经常外出办事，老师们教学任务重，工作忙，经常请他上街代抓药。他到旧城永合堂、永和堂、济仁堂、元聚堂等老药店抓药，凡是杜先生的药方，坐堂先生一看便知。再问这方子开得怎么样？便回答：杜子通开得药方与众不同，胜似京华名医。

#### 四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杜先生在绥远省临时政务委员会登记受训一周。10月，经刘汉介绍，政府派杜尚礼先生为恢复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的筹备员。当教育厅长潘秀仁从陕坝返回归绥后，由于他和杜先生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同住一个寝室将近2年，为了表示他是绥远地方人士的首领，故收买争取各方面的

人才，所以任命杜尚礼先生为校长。复校时先接收了日伪留下的“厚和农业中学”。“农职”原校址（现大台什“内蒙古棉纺织厂”）日伪时期被“蒙古学院”占用，“蒙古学院”解散后，作了伪蒙古军的营盘，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受到了很大损失，给复校后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复校不久，又赶上第一次解放绥远的战事发生，于是便奉命西迁伊盟东胜，于1946年2月才返回归绥，因伤病员占住校舍，而暂住新城苏虎街原“归绥师范附小”和原“厚和农业中学”的校址，直至5月初才返回大台什正式上课。1948年冬，第二次解放包头时，学校又由大台什搬到新城东落风街小学，学生们没带走的东西被偷抢一空。学校是这样的不安定，再加上时局动荡，造成教师不安心教书，学生也不安心读书，学校成了失业教师、失业青年和“流亡”学生的收容所。而国民党当局正忙于打内战，平绥铁路经常中断，造成既无经费购买仪器设备、图书，即使有钱也买不进来的局面。当时，学生上课连课本都没有。

就在这种情况下，杜先生还是在认真负责地抓教学。首先为使师生员工安定，先给解决生活问题，尽量设法解决师生员工生活所需柴、米、油、盐问题，当地不能解决的，到卓资山等地购买，从而保证了师生员工工作学习的起码生活条件。第二，为使学生学到知识，采取了一套助学金和考试成绩挂钩的办法：各门课程每月都要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公布于众，根据成绩的好坏分为公费（伙食费、每年棉衣一套、单衣一套，都由学校发给）、半公费（交费用的一半）、自费（全部由学生个人负担）。当时学生生活困难，为得到公费而努力学习，从而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农科第九班学生富象乾同学，当时家境贫寒，为得到公费待遇而刻苦学习，在班内考试始终名列前茅。他1948年7月毕业后，由校长、老师极力举荐留在了学校，坚持奋发学习，由一个初农毕业生成为我区植物分类学家、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

系教授。第三，创造实习条件，向后巧报村农民租赁一犍牛开展科学试验和教学实习。第四，没有课本，教师放慢讲课速度，要求学生做笔记。第五，东奔西跑为毕业生找出路。如：他利用和阎伟相识的关系，向阎伟主办的萨县机耕队推荐了毕业生7人。

1945年恢复建校时，除了晋临祥、佟树藩、李树茂等几位老师改行作了行政工作外，其余教职员工全部请回学校，就连打铃的老马——马良才都请了回来。特别是宗汉民老师，原在北京工作，“农职”复校后，退掉北京农业大学的讲师聘书才得返回学校。这也证明，当时学校的同仁对杜尚礼先生为人正直、与人为善的品格很敬重。杜先生在尊师爱生方面也很突出。1948年，牧一班李景明同学毕业时，由于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升学，教师王兆彭、陈枫夫妇主动提出用他们的薪水供李景明同学上高中，继续考大学。因此，他同时报考了“国立绥中”、“归绥中学”和“归绥师范”。与此同时，宋元明老师也帮助李景明同学在“公教医院”找工作。当“国立绥中”、“归绥中学”发榜兼中时，王兆彭老师和陈枫老师让他放弃“国立绥中”，因为“国立绥中”的高中是二年制，考取大学的可能性小，而“归绥中学”高中则是三年制，多修业一年，考取大学有把握，就去“归绥中学”报了到。当“归绥师范”发榜时，李景明同学也被录取。这时，杜校长找李景明同学谈话，劝他放弃“归绥中学”，而去“归绥师范”，因为师范是官费，杜校长考虑王、陈二位老师工资微薄，自己生活尚不富裕，供李念书确有困难，李景明同学欣然同意。杜校长亲自和当时“归中”校长刘佐儒协商同意其休学一年，而到“师范”报到。这时“公教医院”也叫李去报到，杜校长同意李去学医，又帮其和“师范”校长刘汉协商同意退学。李景明同学到“公教医院”后，上了该院的高级护校。1951年政府接管该院，并改为归绥市人民医院，后改为呼和浩特市医院。他历任护士长、外科医师、副院长等职。

杜校长不仅关心同学的生活、学习和前途，也很重视学生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民族歧视压迫的旧社会，“农职”有两名回族学生。后来一名同学离校，只留下麻希天同学一个人。他们从来没有感到在该校有民族歧视的压力，学校非常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回族有不吃猪肉的习俗，因此，每当节假日和平时改善伙食时，都给他们单独炒菜，以牛羊肉和鸡蛋代替之。麻希天同学是学畜牧的，养猪学是必修课，在课堂上和其他同学一块听讲，每当实习养猪时，就不让他接触猪，免于实习。但是，对他的成绩单独给予计算，把养猪实习的成绩不计，以其他几门课程的成绩决定他是公费或是半公费待遇。

当时有位教师，很有些来历，教语文课，由于本身程度很差，学生一致要求撤换。杜校长和他谈了，他却放风说：杜子通是什么东西，他敢撤我，马上就把他用绳子捆起来。而杜校长则不畏强暴，硬是把人撵走。

1948年，李承霖老师协助学生办墙报“鸡鸣周报”，当时同学们对国民党很不满，向往光明，因此常有一些稿件反映出这种思想。李承霖老师向杜校长请示，杜校长说：在这样的混乱情况下，同学们向往光明是可以的，但不要太露骨。这说明他是理解学生的。

1948年解放军第二次围攻包头时，“农职”在校生白云昭（现四川省长寿县老干部局）等同志参加革命随军南下。杜校长对此事虽有了解，但并不阻拦制止。

## 五

1949年9月19日，杜尚礼先生参加了绥远省的和平起义，参加了革命。他继续担任学校的校长。其时，教育厅新派政治教员王雨，除了讲课外，以联络员的身份参加学校工作，向教育厅反映学校的情况。1952年6月，教育厅调王鹤田同志（共产党员）担任校长，学校改为“归绥农业学校”。杜尚礼先生不做领导工作，

继续担任作物栽培学教员。1954年学校改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农牧学校”。

1958年12月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农牧学校和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合并，成为现在的内蒙古农牧学院。杜先生成为该院农学系作物栽培教研组教员，曾任作物栽培教研组副组长、农学系系务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农牧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

杜尚礼先生一生主要讲授生物学、植物学、土壤学和作物栽培学四门课程，而以作物栽培学最为擅长，造诣最深。他不但在原察哈尔实业中学、原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等农业中等专业学校教作物栽培学博得师生的好评。就是到了内蒙古农牧学院后，他教作物栽培学也是名列前茅的，比当时的某些副教授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呢？这是他严谨致教的结果。

杜先生备课认真，一丝不苟，几乎每天晚上都备课，家在新城住，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日下午到校，在农校如此，到了农牧学院仍然照旧。他备课逐字逐句地认真推敲，从不马虎从事。就是六十年代，他教作物栽培学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一般来说，不备课上讲台也是呱呱叫了，但他认为科学在进步，技术在革新，不备课就不能使学生了解新的东西，上课前总得认真备课。

杜先生讲课条理清楚，语句逻辑性、科学性很强，语言生动，深入浅出，能够使同学的思想跟上他的思维活动。板书整洁，把大小标题和重要内容，系统地写在黑板上，让同学看了板书，就能想起课堂讲授的全部内容，而且他写的粉笔行书字也很漂亮。因此，他讲课扣人心弦，受到学生的好评。有一位老师备好了课，并由作物栽培组的老师共同讨论了他的教案，可是这位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时，同学们意见很大。杜老师拿原讲稿，在课堂上用他的方法再讲，同学们则很称赞。

杜先生知识渊博，作物栽培课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根据每种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应用水、肥、土、种、密、保、管、工

等多种栽培措施，来满足作物的要求，使其生长发育良好，从而获得丰产。因而需要渊博的知识，才能讲好作物栽培课。另外，他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了群众的生产经验，长期进行科学试验，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特别是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生产经验更为熟悉。这些知识在作物栽培学教学中都可以用得到，因此，教学效果好。例如，别的老师讲内蒙西部地区春小麦播种期，只讲：从清明前十晌到清明后十晌。而杜先生则讲：群众经验是清明前十晌种小麦，先生根后发芽；清明后十晌种小麦先发芽后生根。并用植物生理学的知识加以解释。再如，他讲烟草尼古丁的危害，能把全班同学讲得都不吸烟。还有，他讲许多作物的经济价值时，都增加一条药用价值，讲小麦，加上麦芽具有消食和退乳作用；淘小麦搭出的浮小麦，具有止虚汗、退热作用。从而看出杜先生的知识是渊博的。

杜先生教学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科学试验、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到基层，到生产第一线，去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推广新技术。从而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生产技能，把课堂理论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同时也使学生受到了艰苦朴素、不怕脏、不怕累，认真负责工作作风的锻炼。另外也为实习所在地农民传播了技术，指导了生产，取得了效益。因此，实习场地和附近农民生产上有了问题，经常到学校和杜老师请教。就在带领学生实习和下放锻炼期间，杜先生撰写了《1960年临河春小麦大面积栽培经验调查研究总结》、《内蒙古农牧学院1960年春小麦大面积丰产经验总结》和1962年《内蒙古主要麦产区春小麦栽培经验调查研究总结》等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性文章。它对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作物栽培课的教学水平的提高，对指导内蒙古自治区春小麦的生产，都有一定的意义。

杜先生对科学研究也很重视。他根据内蒙古农业生产上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科研课题，为广大农民的利益着想，1962至1966

年，他搞了马铃薯幼令种薯及其生产上的利用课题，得到了播种幼令小种薯具有抗病、减轻退化、增产达30%左右的结果，只可惜当时没有鉴定和报奖。

杜先生培养年轻教师一丝不苟，身教重于言教，为人师表。他认真听年轻教师的课，发现问题及时指正，具体指导讲课艺术。例如，讲马铃薯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相关性，根据群众的经验讲：马铃薯开花时，地下才开始形成块茎。而杜老师根据多年观察发现马铃薯地上部分现蕾以前，地下已经开始形成块茎。莜麦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优势作物，杜先生对我区莜麦生产的研究具有很深的造诣。年轻教师郑克宽（1987年已评为副教授）在他的启蒙下，和内蒙古农科院孙泽民副研究员（杜先生的学生）共同主持了莜麦育种和水、旱地栽培技术研究，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于1989年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莜麦育种已育出蒙燕三号，正在鉴定、报奖之中。

杜尚礼先生一生平易近人，致学严谨。自1926年暑期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农业教育事业，在作物栽培学领域具有高深的造诣和丰富的生产实际经验。“九·一九”和平起义后，热心于党的教育事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教学科研和青年教师的培养认真负责，积极热情，业余时间还为师生员工看病，解除有病师生的痛苦。对内蒙古农业学校和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的建设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生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六

在“文革”中，杜尚礼先生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在审查中因进行批斗，使杜先生从凳子上摔下来，腰椎致残，不能行动，尿尿都得同室难友为其倒送。后经医治无效，于1970年3月1日不幸逝世，终年68岁。他的逝世是由于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所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杜先生落实政策，遂予平反昭雪。1979年11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由内蒙古农牧学院副院长郝崇相同志致了悼词。宣布“文革”中，强加给杜尚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杜尚礼先生留给其子杜建中同志的简历等有关材料，杜尚礼先生的档案，刘映元《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的发展变迁》。走访了杜尚礼先生的老同志李承霖、王兆彭、范学仪、张沛、杨敬厚、乌力更、王英佩等老师和麻希天、李景明、戈耀、李学渊、郑克宽等同志，得到了大力支持。写成之后，请刘映元、戈耀、麻希天、李景明、杜建中、乌学智等校友和李承霖、王兆彭、范学仪三位老师给予审查和润色文字，值此一并表示感谢！

# 回族教育家吴懋功先生

阿 沙

## 一

吴懋功，名吴耀成，字懋功，回族，1908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三）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

吴懋功祖籍河北省沧州孟村，吴氏家族为当地回族大户。其父吴德英（字俊杰），祖上即迁居包头，到吴德英辈，家境败落。年轻的吴德英曾在包头井子沟背炭，在回民饭馆做过拉风箱的伙计，也曾当过屠家的帮工。他武功精深，臂力过人，半扇牛肉，一人手提肉钩即可挂在肉架上。以后他自己卖过肉，上桥贩卖过牲口，也做过其它小买卖。1942年，吴德英去世，享年59岁。其母吴邓氏，山西大同人氏，为人温良贤慧，54岁时去世。

吴懋功姐弟三人，姐姐吴金花（乳名伴女），弟弟吴耀庭（字佑龙，建国后曾任包头市城建局局长，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兼任内蒙古政协委员，1980年在包因病去世。）本人排行老二。吴懋功少年就读于包头市清真小学，他的体育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培养起来的。当时家人都说他属猴，太“猴性”（即顽皮），常常带着弟弟，把学校的篮球“偷”出来玩。比同龄少年个头高出许多的吴懋功，玩球总比同学花样多。投篮，他进球最多；摘篮板球，谁也比不过他。中学，吴懋功就读于包头二中，1928年秋，他以优异成绩在该校高中毕业。

## 二

1929年秋天，吴懋功报考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当时他报考师范院校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爱当老师，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二是报考国立师范院校，可以领取绥远省政府的奖学津贴和学校的助学金。（当时绥远省规定，考取国立大学的学生，每年可领取省政府奖学津贴100元，县市政府津贴100元。吴懋功考取北师大后，包头回教俱进会又补贴60元。）这对于他这个家境并不宽裕的学生来说，比较适宜。在师大，他所以要学体育专业，除了他从小热爱体育，个头高，身体素质好以外，更主要的是，他对家乡体育事业的落后甚是忧虑。当年绥远省去北京的考生，连高低栏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打高尔夫、网球之类。所以吴懋功立志学体育专业，毕业后回家乡报效父老乡亲。

1929年，全国报考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学生不下千人。其中一部分考生只是为了考入北师大体育系后再转其它系，所以多为文弱书生。吴懋功凭着他1.89米的个头，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娴熟的体育技艺，顺利通过考试。这年北师大体育系只录取了四、五十名学生，新生考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四。

吴懋功在北师大体育系是高材生。他上学期间在我国体育专家袁敦礼、马约翰、董守义、徐英超、曾仲鲁等老师的亲自教授下刻苦学习、训练。袁敦礼先生曾留学美国，当时担任体育系主任兼授体育理论课，马约翰先生讲授田径、足球、游泳课，董守义先生讲授篮球课，曾仲鲁先生（留学日本）讲授体操课。

吴懋功的体育强项是“十项全能”。他所以要专攻“十项全能”，也是为将来当教员做准备。他深知，当老师必须是体育的全面手，所以他的体育技艺也必须全面发展。

当年吴懋功是北师大著名运动员，人称北师大的“五虎上将”。入校第一年，他就是学校篮球乙队的队长，很快就成为学

校篮球甲队的队长。当年，北师大篮球队闻名京师，常常是五大校（北大、北师大、清华，燕京、辅仁）篮球联赛的冠军。吴懋功还参加了学校的田径代表队，在北平市各类运动会上，他的跳高、跳远、撑杆跳、80米栏都曾取得过好成绩。当时北师大规定，连续三年参加校队者，奖给金牌一枚；一年参加学校三个代表队出赛者，奖给银质篮球小奖杯一个。吴懋功在校时，既是金牌得主，也是银质篮球小奖杯的得主。

1934年，吴懋功在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由于学习、训练、比赛刻苦，成绩突出，被授予体育硕士学位。

### 三

1934年吴懋功大学毕业后，北平的许多大中专院校都争相聘请他去当教员，就连当时驻守北平的孙连仲部都派专人请吴懋功去当军体部主任。然而吴懋功都一一谢绝了，他怀着一颗振兴绥远省教育落后的赤热之心，毅然回到了塞外小城包头市。

1934年秋至1935年5月，吴懋功先后在包头中学、绥远女子师范、包头清真学校任教。为了搞好教学工作，培养人材，吴懋功吃住在学校。他教体育，也兼教其他课程，无论教什么课，他都书写教案，认真备课。教体育，他必亲自做示范动作；教其他课，总是言传身教，到人人听懂为止。

1935年5月，吴懋功担任了绥远省公共体育场场长（原场址在现内蒙古第四毛纺织厂南）。他仅用前任留下的万余元经费，开始修葺这个破烂的体育场。该场地是一片下湿地，春夏泥泞，无法进行体育比赛，吴懋功就用石头打基础，上面垫土和炉碴，使场地很快就能使用。运动场还建起了主席台，使绥远省公共体育场很快成为有400米跑道的、较为标准的竞赛场地。

作为体育场的场长，吴懋功积极组织赛事，每年春夏，组织中小学学生运动会，同时还组织越野赛、自行车比赛、风筝比赛

等。大型运动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先生总要出席。傅作义先生的35军还经常请吴懋功做军队体育活动的教练。

#### 四

1937年10月14日夜，日军入侵归绥市（呼和浩特市），吴懋功的发展民族教育、振兴体育事业的拳拳之心终于被泯灭。他怅然由归绥市回到包头，在包头清真小学、包头女子小学教书。

吴懋功是回族，他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中国回回民族的教育更落后，所以他回到包头后，一心扑在回族教育事业上。旧中国回族经济、政治地位低下，一般家庭终日为生活奔忙，很少考虑子弟的上学，所以回族子弟多为少年文盲。小小年纪，就提篮叫卖，为养家糊口而走街串巷了。1938年至1942年，吴懋功任包头清真小学校长，他经常挨门逐户，说服回族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实在交不起学费书费的，他就自己解囊相助。他的热心致诚，常常感动了孩子的家长。就是这样，吴懋功靠很少的一点办学经费，维持着这所在包头唯一的回族小学校的生存。

日伪统治期间，绥远落后的教育受到更加严重的摧残。抗战胜利后，吴懋功决心为振兴回族教育创造一番事业。1947年，他和包头的另两位回族知识分子吴耀庭、王文彬开始鼎力筹办一所回民中学。

吴耀庭，字佑龙，是吴懋功的弟弟。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绥远地区早年少有的回族大学生之一。王文彬，字质武，是吴懋功的妻兄。这三位回族知识分子奔走呼号于四方，说服回族父老乡亲支持他们的事业。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在回族士绅和广大乡老的帮助下，绥远省的第一所回民中学于1948年春诞生了，校址在包头东河区，校名为“包头崇真中学”。当时吴懋功尚在包头中学任教（1947年任包头中学训育主任，1948年任教务主任），所以兼任了崇真中学校董和教导主任，吴耀庭出任

校长。后因吴耀庭社会工作繁忙，吴懋功又接任了崇真中学校长的职务。

“包头崇真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办学经费全靠个人筹备。学校诞生之初，只有经费几千元，而这区区小数，也是吴懋功等人四处奔走在回族群众中募集来的。建校后因财政无固定来源，学校经费经常断档，教学之余，募集款物，就成了吴懋功的经常性工作。他成年累月奔波于讲台和社会各界，办学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即使这样，学校也有难以维持的时候，吴懋功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解燃眉之急。他的致诚办学精神，感动了许多回族父老乡亲解囊相助，也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妻子王文秀，一位有知识的大家闺秀，她理解丈夫的事业心，于是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为丈夫排忧解难。

“包头崇真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教学设备较为完整，有教室、办公室、回民食堂及学生和教工宿舍。开办之初，只招收初一、初二各一个班。1951年教学班发展到五个，初一两个班，初二两个班，初三一个班。学校常年有住校生200多人。

崇真中学学风昂然，师生员工均有认真教学的态度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校长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感动了广大师生员工。广大师生员工把学校的前途命运，看成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因此艰苦创业的压力就变成了认真教学、刻苦学习的动力。崇真中学还有自己的校歌和校训（校歌、校训为本校教师刘玉恒创作。其内容积极向上。遗憾的是，截止撰写本文之前，作者一直未能搜集到该校校歌、校训的具体文字资料。仅据吴懋功先生回忆，校训中有“真善美”字样），每当校会，师生肃立诵唱，逢年过节，必书写于校墙之上。校歌和校训，激励着崇真中学的广大师生。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崇真中学师生在激动和兴奋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建国初期，吴懋功组织全校师生员

工，积极参加社会的各项政治活动，激发起师生对新中国的热爱。当时崇真中学坚持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竟引起仇视新中国的个别坏人的恫吓。他们在校门口贴出了反动传单，声言“再升国旗，就用炸弹炸师生的脑袋”。吴懋功不为威胁所动，他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号召师生员工敢于斗争，坚持教学。会后，他又带领学校有关人员走访学生家长，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把因恫吓而离校的学生，又一个个地动员回校。

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崇真中学为国分忧，从不向国家政府伸手要钱。1950年校舍要维修，吴懋功亲自带领学生，从20里外的“臭水井”用麻袋背回粘上，又亲自动手和泥抹墙。当时吴懋功已是40多岁的人了。但他坚持和青年学生干在一起。身教胜于言教，他一把泥一把汗的劳动，使全校师生员工劳动积极性倍增。经过一周的建校劳动，使崇真中学的校舍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干部极为缺乏，为配合政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需求，1951年春，崇真中学专门成立了一个回族青年学习班。该班招收了40余名回族青年学习文化和进行思想教育。吴懋功亲自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经常和这些青年人在一起，为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讲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内外形势。在他的关心之下，这40多位回族青年很快走上了工作岗位。回族青年走上工作岗位，不仅为新中国及时输送了工作人员，同时也改善了回族的职工结构。包头最早的回族女干部杨玉华、马英凤以及白吉祥就是这个班的学员。崇真中学从1947年到1951年共毕业了两届学生，加上回族青年学习班，崇真中学为包头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共培养了回族青少年学生、干部80多名，为发展回族教育事业立下了特殊功绩。吴懋功为教育的无私奉献，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赞誉，1951年他被推选为包头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由代表再推选为协商委员会委员。

## 五

1951年10月，绥远省政府决定，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所民族中学，将包头崇真中学与土默特中学合并，成立绥远省民族中学，学校地址在呼和浩特市（当时称归绥市）。

接到合并学校的通知以后，吴懋功激动不已，他深深感到了，党和政府对民族教育的重视。于是他亲自走访教职工和学生家长，动员大家克服困难随校迁往呼市。同时他在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迁校动员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省政府的决定。他首先表态拥护党和政府的决定，希望全体师生，为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克服困难放眼未来。在吴懋功的耐心动员下，大部分师生员工在他的带领下于1951年10月底来呼合校。来呼学生约100多人，其中回族学生约50多人。另有七八位回族教师也同时来到呼市。

新成立的绥远省民族中学，任命孟绍（蒙古族）为校长，吴懋功为副校长。这是一所以蒙古族、回族学生为主，兼收其他民族学生的学校。这所学校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民族团结的校风。在这里上学的蒙古、回、满各少数民族的学生，情如手足，亲密无间。作为校领导的吴懋功，除了抓教学工作外，更是以身作则，做民族团结的工作。他严格要求回族师生，要尊重和爱护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师生。这所学校有一个规定，不管哪一个民族的学生过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全校各民族的师生都要庆祝。回族学生过“尔代”的时候，就主动请其他民族的同学吃油香、麻花、馓子。学校食堂也向其他民族的学生供应油香。吴懋功这时总是把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领导、教工请到家中共庆佳节。

吴懋功同样也关心着其他民族学生的学习生活，当时他分管学生助学金，他总是想法多给从牧区和农村来的蒙古族学生一些补助，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生活、学习中的困难。他经常深入



各族学生的宿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发现困难及时解决，有时已是夜深人静了，他还在查铺，为学生掖被关灯……

绥远省民族中学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学校又更名为土默特中学。校长孟绍和副校长吴懋功，一位是蒙古族，一位是回族，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是民族团结的模范。在工作中，他们彼此尊重，有事共同商量。他们的榜样，带出了一个民族团结的领导班子，带出了一支民族团结的教师队伍，带出了一个民族团结的校风。民族团结的作风促进了学校的各项工作。遂使土默特中学成为自治区较有名气的学校。

土默特中学根据生源学习成绩参差不齐的状况，制定了“宽收严教”的教育方针。吴懋功为了使学生的学习质量尽快赶上去，经常深入教研组、班级抓教学管理。他对教师的教案每周都要检查，每周至少听四节课。他还经常检查学生的作业，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

吴懋功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一次，他发现一位老师备课不认真，于是就每天听这位老师一节课，并提出意见帮助他备好课、讲好课。经过一个时期的帮助，终于使这位老师提高了教学质量。

吴懋功对每年的毕业班尤为关注，为了使回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能更多地升入大学，他每天坚持跟班听课3—4节，以督促教师认真教学，学生刻苦学习。由于吴懋功毕业于大学体育系，所以在学校分管教学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体育专长，促进和发展了“土中”的体育运动和体育教学工作。吴懋功经常和体育老师一起备课，为体育老师做示范动作，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私地传给年轻一代。他还放弃星期天的休息，亲自抓“土中”足球队的训练，从思想到技术严格要求队员。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土中”的足球队迅速成长，多次获得呼市地区、内蒙古地区的冠军。当年学校足球队队长现内蒙古第三毛纺织厂厂

长、呼市足协主席荣文彬回忆当年吴懋功训练他们足球时，总是深情地说：“吴老师的技术和精神，给了我们成功的钥匙。”

## 六

1956年10月6日，呼和浩特回民中学成立。根据组织的意见，吴懋功率领“土中”的回族教师和回族学生于1961年9月并入呼市回民中学。在呼市回民中学，吴懋功先后任校长、副校长，积极配合书记、校长的工作，为办好自治区唯一的一所重点回民中学而辛勤工作。

吴懋功在回民中学分管教学和总务工作，当时他已经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为了抓好教学工作，他经常是上午在回中本校听课指导，下午又步行去分校（现33中）听课检查工作，晚上又深入教研组、教室督促学生的学习和老师的辅导。吴懋功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要求极严，他从教学常规的备、改、辅、批、考入手，经常检查教案，每天总要听课。对于教师教学中的问题及时给予指正，对于教师的有益经验和教学方法及时给予肯定推广。由于回中全校师生的努力，1962年高考，获全区第一名，1963、1964又连续两年获高考好成绩。196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接见了回中师生，勉励大家：“一定要把回民中学办好！”

吴懋功关心老师的教学，也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回族学生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希望自己民族的孩子能顺利完成学业，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祥同学（回族），当年因家境困难，父母几次让他退学去参加工作，李祥来找老校长，吴校长勉励李祥要坚定信心学下去。将来用知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为回族争光。吴懋功几次去李祥同学家家访，希望家长克服困难支持孩子读下去，并给李祥解决了住校和助学金问题。李祥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完成学业。

吴懋功尽管年纪大了，但他依然指导学校的体育队训练，经常利用休息天带队外出比赛。1964年，回中足球队代表呼市参加全国少年足球赛，获全国第四名。

“文革”十年，吴懋功与教育界的同志一样，受到了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回中”也改称“红旗中学”和“呼市二十五中”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1978年，吴懋功恢复了工作，仍回原校，担任副校长。当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经历了十多年的苦难折磨，吴懋功并没有消沉。他积极奔走呼吁，并几次去北京反映情况，终于在1978年又恢复了“呼和浩特回民中学”的原校名，同时确定为市重点中学。1980年10月，经自治区政府批准，

“回中”又被列为首批区重点中学。以后，吴懋功又接受了“回中”教学大楼的筹建工作。经四处奔走，筹款、备料、开工，1983年，一座7200平米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1984年，这位为民族教育奋斗了50年的老人退居二线。退居二线之后，吴懋功仍然为教育事业发挥着光和热。作为呼市政协的常委，他又和其他同志创办了呼市高考补习班，继续为求学的孩子们辛勤工作着。

## 七

吴懋功是早年绥远地区回族中少有的体育专门人才。他无论是早年担任教师、担任省体育场长，还是解放后担任中学校长，都曾竭尽全力为发展我区我市的体育事业而努力。在“土中”任教期间，吴懋功曾培养了白秉义（回族）、李耀忠（蒙古族）这样的体育积极分子，他们在呼市举办的体育运动会上，取得过内蒙80米跨栏和呼市80米跨栏第一的好成绩。六十年代，吴懋功培养的学生云国栋、赵桂茹、李喜莲等在全区田径赛上都曾取得过跨栏、五项全能的好名次。

1953年，我国华北地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吴懋功担任绥远

省体育代表队的总教练。体育代表队的运动员在呼市二中集训时，吴懋功担任我国五十年代著名短跑选手刘正的教练。刘正当时参加80米低栏赛，她在训练中，两栏之间的跨步是4步。经过吴懋功的科学指导和纠正，刘正改成3步跨栏。在华北运动会上她终于取得80米栏第一名的好成绩。

1954年至1955年，吴懋功曾任内蒙古师专体育系（后改为内蒙古师院体育系）兼职教师，为自治区的体育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师。现师大的几位体育专家，当年曾受教于吴懋功门下。吴懋功在“土中”和“回中”担任领导时，这两个学校的体育运动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无论是田径、篮球和足球都名列呼市地区中学前茅。

吴懋功是自治区最早的国家级田径裁判，在呼、包两地多次重大体育比赛中，他都参与了组织工作，很多裁判员得到他的培养，不少国家、自治区级专业体育工作者都是他的学生。

吴懋功一直关心着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他总是十分关注，经常通过电视观看比赛，找来体育报刊专心研读。他对当前我国的体育训练以及中学体育教育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中国的体育专项训练，近年只强调加大运动量，强化训练，他认为这种训练方法未必妥当。运动是应该讲适量，例如中国著名跳高运动员朱建华，身体素质一般，如果运动过量，消耗过大，比赛时很难发挥其最高水平。另外，中国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训练较差，重大比赛，输分时就急躁，使技术不能正常发挥出来。对于中学体育教育，吴懋功认为，目前体育教师专业素质较差，上体育课，不给学生做示范动作。光说不练的老师，是很难培养出优秀学生的。另外，中学对课外活动重视的不够，课外活动没器材，没目的，随意性很大。课外活动常常被搞卫生、劳动、集会挤占掉。他说，中国要真正成为体育强国，一定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一起抓，而群众体育主要要抓好学校体育。

## 八

吴懋功一生为教育事业奋斗，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人才。他为振兴中华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受到了社会 and 政府的赞誉和尊重。1989年元月，呼市教育局为孟绍、吴懋功、巴静山、韩秀英四位在教育战线辛勤工作了50年的少数民族教育家举行了恭贺会。四位老师的历届学生，从祖国四面八方为他们的老师祝福。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赵志宏、呼市市长贾才以及有关部门领导亲自到会祝贺，并为四位民族教育家颁发了荣誉证书。

作为回族教育专家吴懋功，他50年培养了近万名学生。这些学生遍布祖国各地，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上做着卓越的贡献。他的教育风范赢得了学生的敬仰，恭贺会上，故乡包头的弟子献上“师恩如山”的条幅，呼市地区的学生送上了“为人师表”的条幅和“民族教育家”的匾额。这字字千斤，表达了他的学生对老师的一片挚诚的爱戴。

吴懋功五十余年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评价。恭贺会上教育局长说：“吴懋功同志是执教五十年，德高望重成绩卓著的民族教育家……吴懋功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他艰苦创业，奋力开拓，终身奉献于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令人钦佩；他为内蒙古地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内蒙古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和内蒙古、呼市电台、电视台等宣传部门都以较长的篇幅介绍了吴懋功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上的事迹。

吴懋功不仅仅是民族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先后担任过包头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土默特旗政协副主席、呼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常委，内蒙古民进顾问。吴懋功用他的学识、他的影响，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

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吴懋功——他的名字永远记录在自治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史上，也将记录在自治区近代回族史上。

### 附记

当我刚刚为先生写完这篇传记，即将付梓之时，恶噩传来，先生竟于公元1991年3月31日病逝，享年83岁。先生作为我区我市知名的回族教育家，把毕生的精力和才智，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两袖清风而去，留下的只是那令人景仰的道德风范。

我作为先生的学生，承蒙先生生前多年教诲；先生归真，我唯有以先生品格为楷模，规范后生。这篇传记，不能尽书先生生平，挂一漏万，仅表学生一片心意。先生安息。

传记成文中，得到先生的儿子吴克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表诚挚的谢意。

# 教育界知名人士苗英先生

郭宪清

## 一、家庭与求学

苗英（字国华）先生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五月十四日生于山西省天镇县西区三十里铺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其时，他的祖父已经不再给别人扛长工了，伯父、父亲都很勤劳，祖母精打细算，节俭度日，所以每年可用余粮变价添购土地三五亩，有时甚至还能放些账。他的父亲苗臣雨，上过一年冬学，识字不多，自幼喜爱骡马，一生除赶车耕地推碾外，就是饲养母畜。家中所使用的好骡好马，多是其父亲手养殖的。他的叔父为人和善，是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读过四书五经，正打算去应考，恰好赶上义和团起义失败，清廷签订辱国条约，停止开科取士。这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因此，他坚决主张让下一代人念书，求取功名。

苗先生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周岁七岁时）被送入三十里铺村的私塾坊读书，读过五经四书，也读过些论语、孟子。1912年春，进入山西省天镇县小学的高小预备科读书，他学习刻苦，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有时把笔头都给薰黑了。他从小酷爱数学，算术、珠算学得特别好。1915年底高小毕业考中学时，恰逢山西省的中学春季不招生。当时绥远归绥中学有位亲友介绍，不经考试，插入二年级的班，同时这个班还是个工业班（后因设备问题，改为中学的第五班了）很合苗先生从

小酷爱工业的心意。于是便克服了当时京包铁路只通到丰镇的交通困难，从1916年春到1918年末来归绥上中学。他在中学时，学习认真，生活俭朴，学习用的本子都是正面写完反面写。

1919年春，由于大学都在暑期招生，还有半年时间，苗先生就担任了山西省天镇模范小学的校长兼劝学员。因其伯父、父亲和叔父，都害怕衙门汉，更怕官，他们认为凡是衙门里的差役下乡，都要糟害老百姓。所以，每逢见面，他们总要问苗先生：你下乡办公事，吃村里的饭，给钱没有？你千万不要吃饭不给钱，败坏咱们的门风。

1919年下半年，苗先生考取了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当时所谓国立八校之一）电器机械科。原计划是学习电机制造的，而实际所学的内容则是一般的电器应用。全校一百八十多名学生，由于课程负担太重，大多数同学的精力集中在死啃书本上了，平时很少参加社会活动。自“五四”运动后，才引起同学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苗先生由于好说话，爱发表意见，在校担任了四年班长、评论员和两届学联会代表。1920年春天，为反对学校当局一贯压迫和阻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发动了驱洪（洪榕是当时工专的校长）运动，他带头参加。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同学们获得了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

## 二、谋求出路

1923年大学毕业前，人们背上了个人出路问题的包袱，苗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做什么？向哪个方向去？走谁的门子？是他脑子里反复思考的问题。他决定不回山西。因为阎锡山不喜欢北京毕业的学生，认为北京毕业的学生都是过激派。还因为他曾代表旅京专门学校的同乡向阎锡山要求津贴，没得到阎的许可，反而引起了阎的代见人（督署某科长）的愤怒。去绥远吧！绥远有中学时的同学；绥远有开设发电厂和电话局的要求。因而毕业考



试后，就来绥远进行活动。不料绥远电灯公司已经筹备就绪，没有他的位置。包头电灯公司正在筹备中，他还帮了几天忙，可是资本家不给投资了，因而停止筹办。他不得已回到大同，托人介绍欲到电灯公司，等了三个月，最后还是没有结果。1923年12月间，他经某同乡的介绍，重返包头，在晋北包头盐务缉私分局，找了一个月薪十六元的稽查员工作。1924年春又兼任包头马王庙小学教员。从此自然地放弃了原来“用所学”的志愿，而开始了教育生活。

1924年7月间，苗先生被调任晋北盐务缉私归绥分局长，8月又兼任绥远归绥师范训育主任。1925年4月间，因国民军占领绥远的时局变动，两职先后都被解任。

1925年7月，苗先生和一位同学去河南开封。因为这位同学的舅舅是河南省督办岳维俊的老师，想借他的力量找工作。一天，在这位老先生那里遇到了“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弓富魁，言谈之后，弓要苗先生去帮忙，担任了该旅的军械处长和修械所长。苗先生在该旅只待了六个月，看到其内部松散腐败，遂于12月间不辞而别了。

1926年初，为生活计，苗先生不得不再来关系较多的绥远。经白映星的介绍，于4月到五族学院（中山学院的前身）担任训育主任，兼授两班数学课。苗先生是当时五族学院很受同学们尊敬的老师。他教书育人，身教言教合一，从感情入手教育学生，循循善诱。那个时候，杨植霖同志很调皮，一次打了上课铃，别人都上课了，杨还在玩篮球，苗先生劝说道：快去上课，误了课，以后后悔也晚了。批评了杨植霖同志，使杨植霖同志感到是在爱护自己。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以李大钊同志为领导的中共北方区，以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名义，派吉雅泰、任殿帮、路作霖等到绥远地区筹备成立“国民党绥远党部”。在巧尔气召西边的小院挂出了牌子，公开发展国民党员。我党就在这些

左派国民党员和进步青年中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发动学生运动，革命形势很好。当时路作霖同志利用讲工业革命课，给学生讲共产主义运动；苗先生利用讲数学课，给学生讲起了反对军阀混战。1931年春天，杨植霖、赵连璧、王建功同志被捕后，归绥的士绅们在一中开过会（至少是在议论）要求枪毙他们几个同志，而苗先生和李振业（字子绍，归绥县三区人）则反对，主张进行教育，从而起到了保护作用。1927年11月，苗先生从五族学院转入警备第一师担任副官主任。

### 三、投身教育

苗先生为实现“用所学”的愿望，从1923年大学毕业前就开始，一直到1928年3月，浪迹大同、归绥、包头、山东等地，经过从教、投军等途径，采取各种办法，均未达到目的，不得不再度从事教育工作。其时正是李培基率领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返回绥远。暂代教育厅长冯某委任苗先生为包头中学校长。与此同时，潘秀仁到中山学院担任院长。潘知道有些学生反对自己，而大多数学生和苗先生的感情很好，需要利用苗先生帮忙。所以潘邀请苗先生舍包中校长之职而允中山学院之训育主任。苗先生应之，于1928年5月就任。

1928年暑期，中山学院学生暗地里上呈教育厅，反对潘秀仁继续当院长。教育厅长祁志厚（是苗先生中学同学）批准了潘秀仁之自动辞职书后，欲请苗先生接任院长。苗先生考虑到：一方面领导机关的信任和多数同学的同情，这个院长是可以当的。另一方面，地方人士之封建小集团正在发生发展，苗先生拿定主意，不和地方人士争地位，也不加入任何小集团。况且，如果苗先生接任院长，潘秀仁一定会造谣说苗先生有预谋。因此，他婉辞了祁志厚的委任。与此同时，绥远区立职业学校的学生对校长张元文有意见，展开反张风潮，这次教育厅长祁志厚无论如何也

要派苗先生担任校长，他再无法推辞，就于1928年8月到校就任，并兼任了第一中学和女子师范的数学课。

这时的绥远区立职业学校，农科二班剩下八个学生，商科二班也只有十个学生，全校共有十八名学生，正是该校历史上最困难的“十八罗汉”时期。苗先生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30年春季招收了初中四年制农科第三班，从此学制均改为四年。同年秋季招收了商科第三班和农科第四班，从而结束了“十八罗汉”的局面。苗先生以培养人才之豪情壮志，为办好学校，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当时学校学生生活十分困难，正所谓“穷师范，饿老农，少爷公子住绥中”。学生的待遇很低，只是免收学费和灯油煤火费，基本上是完全自费，因此，学生中途退学者极多。苗先生到任后，为提倡职业教育，经和教育厅长交涉，除免收学费和灯油煤火费外，课本亦由学校发给，每年发给单制服一套，每月发给津贴费二元，基本得到半官费待遇。学生毕业后，除由学校直接介绍各处服务外，并呈请省府，择优录用。1930年省府议决：该校学生毕业考试的前两名，免考保送太原党政学院，修业期满回省由建设厅分配任用。每届学生毕业时，也能象“中山学院”、“归绥师范”、“归绥女师”那样，由政府拨给旅费到平（北京）津（天津）两市和定县参观。

第二，争取经费。1925年学校收归公办时，规定每年由财政厅拨给七千二百元，1927年增加补助费二千四百元，由教育厅支付，由财政厅增拨农商两科实习费六百元，总计为一万零二百元。经过苗先生的多方努力，尽力争取，截止1932年，学校每年经费为二万四千五百九十四元七角九分二厘，比原经费增加了近1.5倍。

第三，李培基于1929年10月继徐永昌任绥远省主席后，根据阎锡山的指示，以兴办教育和赈济灾荒为名，于1930年开放了绥

远的烟禁，从“烟亩罚款”中给各中等学校拨了一批修建经费，省立职业学校也分到了一部分。利用这些经费，苗先生盖起了一座上下两层十八间楼房。上面为图书馆和阅报室，下层为博物馆和实验室。

第四，苗先生接任校长后，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经费困难，经向教育厅请示，厅长祁志厚同意增拨经费，而财政厅长仇曾诒不予批准，问题得不到解决。教务主任田圃先生告诉苗先生：在国民军西退时，原校长靳和笙将学校的一千八百元基金带走。“奉军”的都统汲金纯对靳和笙下过纵款潜逃的通缉令，还请山东督军张宗昌派人到靳的家乡寻找靳和笙。其时靳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苗先生不畏权势，从教育厅的卷宗里找到通缉令的底稿，到南京找靳和笙，让他归还这笔基金，而靳矢口否认。苗先生返回归绥，要求教育厅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厅长祁志厚和张钦先后到南京开会时，都和靳见了面，靳无法否认事实，又用“把经费用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上”来抵赖，亦未得到解决。在小楼落成之后，苗先生为了充实图书馆、博物馆和实验室，继续设法向靳和笙追索带走的学校基金。苗先生写了一个警告靳和笙的启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给登载；向绥远高等法院起诉，当时任高等法院院长的张钦，知道靳是陈立夫跟前的红人，也不予受理，推到南京地方法院解决。靳反驳苗是无理讹诈，南京地方法院叫苗前往出庭对质。与此同时，靳为了躲避苗，跑到日本考察。苗先生在这个时期印制了《绥远省立职业学校基金汇编》二百本，向东京“中国留日学会”和全国各大学、各文化教育团体散发，弄得国内外舆论大哗。靳从日本回来，担任了江苏省政府秘书长，仍不想出这笔钱。因为时任归绥法院院长于存颢，在学校代过课，苗托于用律师的手笔向高等法院又写了一张诉状，这样民事庭推事宗玉璞不得不予受理，才通知靳和笙如不前来归绥归案，即按缺席进行裁

判。靳到了这个时候才就范，将欠款分期偿还。苗先生用这笔经费购回第一批仪器和《万有文库》，使实验室和图书馆得到充实。

第五，为了促进学生学习，学校从1930年开始，实行奖学金制度，每月评定一次，各班前五名，可发给奖学金，金额为二至五元。

第六，1934年蒋介石来绥远时，给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拨了六万块钱，三万元在灰腾梁建立“实习牧场”，由王焯勋担任场长。这个牧场名义上是“归绥农职”的实习牧场，并且由教务主任杜尚礼给协助建的场，可是实际上成了由省政府直接领导的牧场，学校既不能派学生前往实习，也不能介绍毕业生前往工作。剩下的三万元钱，在归绥市新城东南部的大台什村兴建了校舍，并且在喇嘛营购买了三顷农田作为实习农场。还派田圃先生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采购了图书和仪器设备，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购买了不少气象仪器，其中一台最贵重的气象仪器——水银气压计，是由田圃先生从南京一直抱回学校的。

苗先生在“农职”担任校长七年零二个月，教育厅长就经过四任：祁志厚、张钦、潘秀仁和阎伟。学校的名称就改了三次：接任时为“绥远区立职业学校”，1929年4月改为“绥远省立职业学校”，1933年又改为“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简称“农职”。苗先生治校有方，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既关心学生的智育，也关心德育，苦口婆心，以身作则，以慈母之心，感化学生。苗先生刚到校时，有的学生专门起哄，被苗先生一顿批评压住了阵脚。农科三班几个学生，性情粗暴，口出秽言，经常闹事，根据当时情况完全可以开除学籍，而苗先生竟然耐心教导，使本人感动，学生敬佩。另有一回族学生，其父去世留下不少财物，他却借此任性挥霍，虽无西装革履，但着绸缎长袍，呢帽皮鞋，俨然阔少，高级香烟不离嘴，正在得意忘形之际，被苗先生看见，当场斥责：“你正在求学，不思俭朴，竟然吸烟，

既犯校规，也犯教规（回族不准吸烟）。”他从此不再吸烟。1931年学校的二层楼落成之后，当时有的同学就在黑板上大书“楼房盖得好，符合先生的头脑”，哄动全校，苗先生全不介意。他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讲述建楼经过：“我何常不愿‘百年大计’，怎奈钢筋水泥都是进口货，一斤水泥超过几斤白面的价格，学校经费有限，不能全盖西式楼。再者，西式楼顶技术不过关，下层西式，上层中式，既坚固又省钱，我头脑虽然简单，也能认清这个道理。”写大字的同学很受感动，亲自向校长承认错误。1932年招收的农科第五班，有半数以上是山西雁北地区的学生，因为苗先生是山西天镇人，所以有的同学就在山西学生宿舍，贴上“晋北旅社”的白条，全校哗然。苗先生概不追究张贴人，只是把白条取下。这样处理，使同学们既受教育，又衷心敬佩苗先生的高尚。

苗先生对教师很尊重，每天他都很早到校，在办公室迎接教师，尤其是对兼课教师更为热情，专门派工友在校门口招待他们。苗先生见了教师总是问寒问暖，请到他办公室休息、喝茶，等到预备铃响后，才离开他的办公室。这样博得教师的信任和尊敬。

经过苗先生的努力，“农职”办得初具规模，有200余间新校舍，图书、仪器、测候仪器、新式农具、广大的农场和牧场，各种外国种畜、温室。在校生，农牧两科近达二百人。

苗先生办校有方，有人就嫉妒。1933年有人散发反对苗先生的匿名传单，主要内容是说学工的不应当办“农职”。1934年又有匿名信告他十大罪状，主要内容说：领下建筑费不盖房子，自己挪用做买卖；不聘本省人充任教员；尽招山西学生扩充封建势力；学生不守校规，终日耍钱。当苗先生得到这个消息后，分别去见省主席和教育厅长，请他们彻底查清，依法办理。而省主席只告诉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育厅长阎伟告诉他，没有

真正原告人，不作处理。其实，这完全是由于派系斗争所致。当时绥远有三派：一是归绥潘秀仁、赵允义的“潘赵派”；二是萨县的祁志厚和托县的焦守显的“祁焦派”；三是以张钦为首的“绥东派”。后来“祁焦派”和“绥东派”被阎锡山收买，于是两派组成一个一致反潘的阵营，鼓动学生于1933年把潘秀仁的教育厅长赶下了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了缓和两派的矛盾，遂把离省多年在南京工作的托县人阎伟找回来担任教育厅长。苗先生跟潘赵、祁焦都有“归绥中学”的同学关系，并且是个山西人，“农职”当时也不被地方人所重视，所以在前几次派系斗争中没有撤换他的职务。因为赶潘秀仁时，“农职”的学生没有参加，阎伟认为苗先生是倾向潘赵派。阎伟一上台，便把潘秀仁委派的“归绥女师”校长李桃园（山西阳高县人）撤换，让郭际枚（绥东丰镇人）担任校长。苗先生因为正在督工修建大台什的校舍，所以未更动“农职”的人事。1935年大台什的校舍竣工后，学校于暑假后迁至新址。这时的校舍不仅为全省之冠，图书、仪器也仅次于前清光绪年间成立的“归绥中学”，从而引起好多人的眼热。苗先生看出这种情况，认为再干下去，对学校、对个人都没好处。于是，迁入新校舍后，延请“四宝红”的山西梆子剧团唱了一台“开光戏”，招待大台什的老乡之后，即给教育厅长阎伟递上辞呈，于1935年10月底洒泪离开“农职”。

1935年“何梅协定”签定后，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撤消了华北五省的国民党部。绥远省党部那些吃党饭的人，必须离开当地，或者转入地下。他们所主办的私立“正风中学”究竟暂交给谁呢？潘秀仁认为必须交给一个在地方上各方面都有关系，政府也相当了解的人，苗先生完全符合这个条件，就请他担任校长。当时，苗先生正处在困境中，好容易有这个�会，就慨然应允。于1935年11月到1937年8月在私立“正风中学”担任了一年多的表面校长。

#### 四、重返教育

“七七”事变后，爆发了抗日战争。苗先生于1937年12月参加了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任副官处长。同时也接受了傅作义颁发的平绥路游击司令部（司令于存灏）的副官主任委任状，在大青山里转了不到二年的山头。

1939年后半年于存灏去了陕坝，苗先生代理司令一段时间。此后，苗先生因为胃病加剧，不适合在军队工作，遂于1940年11月转赴陕坝任绥远省教育厅二科科长。1941年10月潘秀仁兼任国立绥中校长时，同时让苗先生兼任国立绥中的总务主任，并带初、高中数学课。其时，潘秀仁除在节日、开学、放假或学校有特别事情出面以外，平常便不到校，由苗先生代潘处理日常事务。就这样一直待到1946年8月才离开。

#### 五、保护电面公司

1946年初冬，傅作义令苗先生前往集宁整理电灯公司，并尽快恢复送电。苗先生请求代传命令的省政府搞财务的陈炳谦借给四千元款，带了赵良功、刘三兴、刘斌、冯思恭四人去到集宁。因为没有机器检修工人，从归绥找了燕金刚，便开始点验公司财产，检修机器、整理线路，并派人从大同买煤，从天津买电灯泡、电线，从丰镇电灯公司借了两桶电机特种用油。在公司员工通力协作下于农历年底完工，正式送电。可是，只送电一个月，就把煤烧完，收不回电费，买不回煤而重新停产。

阎肃任绥远省电灯面粉公司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发现苗先生是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电械科的学生，是专门学电的，曾几次想要苗先生去公司工作，终因当权派的阻拦而未成功。1947年再次提名请调。同年4月，苗先生被委任为电面公司经理。当时经理是在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阎肃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虽然实现



了“用所学”的目的，但终因公司内部派系倾轧，苗先生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1948年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聘苗先生为农工运动委员会的委员。

1949年，绥远和平起义前，绥远省电面公司的处境十分艰难。解放区绥蒙政府杨植霖托人捎话，请苗先生保护电面公司，苗先生欣然接受。而阎肃则说：董其武叫咱们必要时西退，把机器尽可能拆卸带走。苗先生毅然回答：我们没有那么多力量，我们做不到。发电厂有国民党特务郑××及其爪牙，阴谋破坏。苗先生则带领他的中学时期的同学，大学电系毕业生电厂业务副厂长樊永明加强戒备，防范破坏，终于将电面公司完整无缺地保护下来。“九一九”和平起义后，受到党和政府领导杨植霖、苏谦益、李维中、靳崇智等同志的称赞和慰问。

## 六、党的温暖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了。苗先生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继续担任绥远省电面公司经理。当杨植霖同志家属进城时，由于当时政府住房困难，组织上征求杨植霖同志的意见，看什么地方住合适，杨植霖同志主动要求住在苗先生的院内。1950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署名的政内字第00189号任命通知书：“兹经政务院第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苗国华为绥远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虽然仅仅任职几个月，但他认为，也是非常光荣的事。

1950年3月到10月，苗先生担任发电厂厂长，因患胃溃疡，经常胃痛吐酸水，夜不能眠，屈膝而坐。组织上让他住在厂里养病，厂内党团组织、工会的同志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使他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真正体会到了党的温暖。

1950年10月7日，绥远省人民政府以主席董其武、副主席杨

植霖、奎璧、孙兰峰署名的人字第016号任命通知书：“兹任命苗国华为本府参事室参事。特此通知”。在此期间，组织上让他到北京治病。组织上还指示，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之前，可继续调养。

苗先生解放后一直疾病缠身。1960年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基本恢复了健康。他便积极要求工作，正好参事室办的机械厂职工业余文化班缺教员，他就重操旧业，给代数学课，积极性挺高，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胃病好了，又染上了肺结核，先后住了三次红山口结核病院，还未根除，时重时轻，重则大口吐血。因此，长期不能上班。“文革”期间，参事室办学习班，叫苗先生去参加，只好雇一辆三轮车，由他儿子苗又新护送前往。领导看到这种情形，准许他在家写交待材料，由他儿子誊清，送交参事室。

就在这病情相当严重，经常吐血之际，青海省来了一个军管人员和两个“造反派”，调查有关杨植霖同志的问题，他们竭尽逼供之能事，苗先生只给介绍杨植霖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进步青年。

苗英（字国华）先生终因肺结核病情恶化，于1970年12月逝世。

本文系根据苗英先生的自传，其子苗又新保存的简历和“文革”期间的交待材料，苗又新及其爱人介绍的有关情况，刘映元《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的发展变迁》，杨植霖、卢永祥同志介绍的有关情况编撰而成。成文后请苗又新、孙英年、卢永祥同志给予审查和润色文字，值此一并表示致谢！

# 蒙古族教育家孟绍先生

甄可君

## 一

孟绍，字耕宇，1920年4月4日（农历二月十六）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一个蒙古族家庭里。

孟绍的父亲孟学孔先生，是位读书人。早年就读于国立北京蒙藏学院（清朝，国立北京蒙藏学院隶属于清政府理藩院。民国，隶属于政府蒙藏委员会，改称国立北京蒙藏学校，主要招收蒙藏学生）。毕业后，回家乡呼和浩特市创办“土默特中学”，是土默特中学的首任校长。孟学孔先生一生敬学，为蒙古族教育奔走呼号，他是土默特旗著名的蒙古族知识分子。

孟绍的生母孟云氏夫人，为人贤良，一生操持家务。孟绍的嫡母千穆生（蒙古名）夫人，寡居，孟绍3岁时被其收为养子，以望传宗接代，撑垫门户。

孟绍兄弟姊妹3人，姐姐孟莲莲，长兄孟绩（北平大学毕业生，原呼和浩特市第四幼儿园工作），孟绍排行老三。

由于家庭文化的熏陶，孟绍读小学（土默特小学）时，就是位勤奋好学的学生，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

## 二

1935年，孟绍小学毕业。当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北京蒙藏学校。国立北京蒙藏学校是政府蒙藏委员会隶属的一所专

门培养蒙古族、藏族学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在这所学校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对来校读书的蒙古族青年给以极大的关怀和重视，他们经常向青年学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启发他们的觉悟。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前辈乌兰夫、多松年、李裕智等就是在这里学习，并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而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当时，孟绍的堂兄孟纯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兄长的带动下，孟绍积极靠近党组织，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

在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毕力格巴图的支持下，孟绍在学校秘密办起了一个“特声图书馆”。他用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买了不少进步书刊，他组织在校的蒙古族青年研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著作，使同学们很快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1939年，孟绍、巴静山（蒙古族，原呼市职业学校校长）、孙继祖（原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等人在北京西城区辟柴胡同创办了一所“私立正风女子高级职业学校”。为办起这所学校，孟绍把自己储存的作为学费和生活费的1200块银元献出来，作为学校的经费。当时孟绍兼任这所学校的事务主任。在这所学校里，孟绍既为党的地下工作出力，也为培养专门职业人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所学校，先后培养了数千名会计、文书、家政、打字等方面的学生，这也是青年孟绍初办教育的尝试和学习。

在蒙藏学校，孟绍不仅革命热情高涨，同时也认真学习文化课。他当年的同班同学韩强回忆说：“他学习成绩优秀，全班居第一位……”

### 三

1941年，孟绍在国立北京蒙藏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

学院攻读经济专业。北京大学是一所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我党曾领导该校爱国进步学生多次参加革命运动。孟绍在这所有革命群众基础的大学校园里，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同时刻苦学习，积累知识，准备力量，报效祖国。在大学期间，他学余兼做“正风女子高级职业学校”事务主任工作，他除了教书、育人为该校事务奔走外，同时帮助党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孟绍在北京与正在蒙藏学校读书的骆淑文女士结婚。骆淑文，蒙古族，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人，是1938年至1944年的蒙藏学校的学生。骆淑文为人贤淑文静，她和孟绍在一起，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他们相亲相爱，互勉互慰，全身心地投入各自的事业，又共同为民族的解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解放后，骆淑文在“回中”任数学教师。她工作勤奋，成绩卓然。但为了保证孟绍办好“土中”，她除了很好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外，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培养子女，照顾丈夫，是人人尊敬的贤妻良母。孟绍先生每当回顾自己的业绩时，总要以感激的心情谈到自己的夫人。他说：“我们是事业的挚友，是患难之交，在我的事业中，有着淑文不可磨灭的功劳！”

#### 四

1945年，孟绍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和建设。孟绍怀着报效家乡的满腔热情，回到呼和浩特，立即投身于教育事业。

回到呼市的孟绍，先在教会学校恒清中学任教，讲授数学，后转到土默特小学任训育主任兼授数学课。1946年孟绍筹备土默特中学复校工作，任该校训育主任。

土默特中学，创立于1926年，首任校长，是孟绍的父亲孟学孔先生。从1926年到1948年，该校一直附设在呼市旧城文庙街上。

默特小学院内。20多年，由于军阀混战，国难当头，天灾人祸，使学校几度停办。这样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实际办学时间累计约5年多，毕业初中学生第一期仅13名，第二期30多名。

抗战胜利后，经多方面努力，国民党南京政府拨款3000万元（法币），“土中”再度复校，并于1947年开始招生。复校后的土默特中学由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先生兼任校长，经天禄任代校长（荣祥先生多项公务在身，学校工作由经天禄代理），孙继祖任教务主任，孟绍任训育主任。

1948年，土默特中学迁校，新校址在呼市旧城兴隆巷内（现呼市第一职业高中校址）。这时，校内的几位领导相继离职他去，荣祥先生只挂名而已。孟绍一人兼管起教务、训育两部门，事实上全面负责起了土默特中学的工作。他克服各种困难，继续着“土中”的生命，全力经营，坚决不让“土中”再度停办、倒闭。他成功了，学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坚持了下来，到1949年，呼和浩特和平解放前夕，土默特中学已是初三年级一个班，初二年级一个班，初一年级两个班共192名学生的初具规模的初级中学了。

## 五

新中国的成立，使土默特中学获得了新生。1949年12月，孟绍随绥远省蒙古族参观团（郝秀山任团长，孟绍任秘书）去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张家口参观访问。（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5月1日，成立时，只管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五个盟。乌兰夫任主席，哈丰阿任副主席。政府所在地原在乌兰浩特，1949年迁到张家口。）乌兰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当乌兰夫同志得知孟绍在从事民族教育工作时，就鼓励孟绍一定要把“土中”办好，为国家建设多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乌兰夫同志说，如果旗里办学经费有困难，可以交给省里去办。乌兰

夫同志的鼓励使孟绍非常兴奋，当他在参观学习中又看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扭秧歌，演话剧，载歌载舞，热火朝天庆祝全国解放，准备欢度春节时，他激动不已。代表团一回到呼市（当时叫归绥市），孟绍马上从“土中”派吴均民等五人（同时土默特小学也派出五人）去张家口学演话剧和扭秧歌等街头文艺活动。1950年的春节，土默特中学热闹非凡，全校师生把“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小歌剧搬上了舞台。由师生组织的秧歌队，扭出了学校，扭上了大街。孟绍也全身心投入了这一庆祝活动，亲自担任了小歌剧的导演。

1949年年末，绥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接管了“土中”，正式命名为“绥远省立土默特中学”，孟绍被任命为校长。

1951年8月，绥远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包头市崇真中学（回民中学，由回族知识分子吴懋功等创办）迁往呼和浩特，与省立土默特中学合并，合并后改称“绥远民族中学”。省政府任命孟绍为校长，吴懋功为副校长。新学校面向全省招生，主要招收蒙古、回、满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

195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周年，乌兰夫回家乡时，还专程视察了这所民族中学。乌兰夫在对全校师生讲话时，提出了学校民族团结的十六字方针，即：“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在以后的岁月里，这所民族中学一直坚定地执行着乌兰夫同志的这一指示，把“土中”办成了一所各兄弟民族和睦团结的大学城。

民族团结的学校，首先必须有一个民族团结的领导班子。校长孟绍是蒙古族，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副校长吴懋功是回族，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这两位民族教育战线上，苦苦奔波了大半生的教育专家，深深懂得一校之长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他们在工作上互相尊重，真诚合作，无论是教学业务还是行政业务，他们都齐心协力，下大力气去学习、研究、实践、指导，在师生

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学校的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其它各项工作也逐年进步，把土默特中学办得有声有色，蒸蒸日上。

为了认真执行乌兰夫同志提出的学校民族团结的十六字方针，孟、吴两位校长决定，凡少数民族过自己的传统民族节日，全校各民族师生都要为之庆贺。例如，每年的“尔代”，回族师生在欢度自己的传统节日时，学校其他民族的师生都来庆贺，回族师生请其他民族的老师同学到家里、班里作客，而学校食堂制作回族传统食品——油香、麻花、馓子等，请全校师生分享。在欢庆民族传统节日的晚会上，蒙古族师生唱起了高昂的草原牧歌，朝鲜族师生跳起了欢快的长白山舞，满族师生会情不自禁地击拍起太平鼓……

为了办好这所民族学校，1953年，人民政府拨款28亿元（旧币），在呼市北郊兴建了一所新校舍（即现在海拉尔西路的呼市十三中校址）。当年秋季竣工，1953年国庆节后，学校由呼市旧城兴隆巷迁入新校址。

1954年，绥远省建制撤销，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呼和浩特市成为自治区首府。“绥远民族中学”遂成为自治区的一所民族中学。

1961年，“土中”由呼市北郊海拉尔西路（现十三中）校址，迁到海拉尔东路现校址。直到“文革”前，在历次的体制变革中，这所学校先后被称为“旗立土默特中学”、“绥远省立土默特中学”、“绥远民族中学”、“归绥市第三中学”、“呼和浩特市第三中学”、“内蒙古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土默特旗立第一中学”、“呼和浩特市土默特中学”、“乌兰察布盟土默特中学”、“呼和浩特第十五中学”。尽管学校十易校名，三迁校址，但学校民族教育的特色始终没变。而孟绍也一直担任着校长职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所历史悠久，民族教育成



就辉煌的学校，受到了彻底的破坏。学校教学设备被砸烂，各族优秀教师被游斗、遣送、调离、靠边站。一直担任校长的孟绍更是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被戴上了“乌兰夫黑帮”、“民族分裂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帽子，被轮番批斗，实行“专政”。由于受到百般摧残，致使孟绍双耳失聪，身体留下了残疾，精神和肉体受到了严重创伤。孟绍被迫“靠边站”，他无限悲愤地离开了几十年用心血建立起来的“土中”校园。

1976年，“四人帮”垮台，孟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尽管他这时已年近花甲，身体不好，但精神的大解放，使他恢复了青春。不顾病痛，为重新振兴“土中”而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文革”中，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土默特中学放弃了民族教育的宗旨，被改成呼市十五中。为恢复“土中”校名和一直坚持的正确的民族教育方向，孟绍各处奔走呼号，1979年，“土中”又恢复了原来的校名“土默特中学”，并被内蒙古、呼市定为区市两级重点民族学校。

复校以后，孟绍的工作更忙碌了。他为了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多方奔走，几年的时间，学校盖起了教工宿舍楼、学生宿舍楼、师生大餐厅。1986年，内蒙和呼市两级政府又拨款300万元，建起了宏伟的教学大楼，并配备现代化的电化教学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等。如今的“土中”已是一所设备完善、师资力量雄厚的现代化的完全中学了。目前，土中已拥有教学班24个，学生1200余人，教师160余人，成为一所蜚声区内外的民族中学了。

1984年，孟绍退居二线，担任“土中”名誉校长。他欣慰自己实现了毕生夙愿，把自己心爱的“土中”又送上一个新的里程。然而，他依然留恋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生，他依然漫步在校园操场，他依然出现在可爱的孩子们中间，他的生活注定永远要和“土中”连在一起。

## 六

民族教育家孟绍，积40多年的教育实践，对办好民族教育，研究总结出一整套办学经验。他的基本观点是：要想办好一所学校，首先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明确办学的指导思想，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办好民族教育还要坚持两条：一条是艰苦奋斗，一条是民族团结。

他的教育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要有“艰苦奋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细水长流”的创业精神。

“办学不易”，这是孟绍的肺腑之言。“土中”从1926年创立，解放前，经历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国民党统治几个时期，办学经常处在“无炊断米”之中。无论是当时的南京政府，绥远政府，还是旗政府，都很少拨款给这所学校。所以，学校几十年来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作风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延续到现在。尽管现在的办学条件好多了，但艰苦奋斗传统一直不变。1953年，国家拨款，学校第一次建起了新校舍，学校由旧城的兴隆巷，往北郊新校址（海拉尔西路，现十三中校址）搬迁时，除一辆马车搬运笨重物品外，其余的都是孟绍带领全校师生肩扛手抬搬过去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于校长的带头，全校师生干劲十足，虽然路途往返20余里，他们只用星期六一个下午就搬迁完毕。“土中”的师生都已养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习惯。1959年，呼市特大洪水，浸淹了学校，洪水过后，全校师生马上投入了重建校园的劳动。不久，水灾重创后的学校，修整得更加清洁美丽。1961年，“土中”搬迁到海拉尔东路现在的校址，孟绍就带领师生再次整修校园。他们栽花种草，美化环境，使“土中”校园绿树成荫、花香鸟语。“土中”一直保持着这种清洁爱美的习惯，1983年被评为“全市最美的校园”。

“土中”的学生尽管大部分来自农村、牧区，他们有劳动的习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孟绍对学生的劳动教育一直不放松。他说，这是防止学生蜕化变色的手段之一。社会上传说：“不怕苦，住老土。”这是“土中”艰苦奋斗校风的最好佐证。

第二，要办好民族教育，首先要加强民族团结。

加强民族团结，是搞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前提，也是搞好民族教育的永恒主题。

办好一所学校，首先是师资队伍。学校必须要有一批思想过硬，学识渊博，教学有方的骨干教师。孟绍在任用教师时始终坚持，只要具备上述条件，不分蒙、汉、回、满哪个民族，都充分信任，充分依靠。他常说，学校要“集四海同道之士，汇八方俊逸之才”才能办好，所以他“爱才”如命。学校有两位汉族教师叫梁宝珍（化学教师）和贾良智（物理教师），两次调离学校，又被他两次请了回来。特别是“文革”以后，许多原来在“土中”工作的老师已分散社会各处，然而他四处奔走，又一一把他们请回“土中”。他的至诚，感动了老师们。

孟绍早在1953年，就结合学校情况，写出《关于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情况和几点经验》的文章（该文收入《内蒙古民族教育文件汇编》第一辑），他提出，“凡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凡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把民族矛盾解决于萌芽之时。

每年新生入学，“土中”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有两条，一是各民族学生之间要团结友爱；二是要尊敬师长，特别是那些为民族教育事业辛勤工作的汉族教师。

孟绍常和回族学生共度“尔代”，和蒙古族学生驰马“那达慕”，他和满族、朝鲜族学生一起欢度元旦、春节……他至今津津乐道，和回族副校长吴懋功共同效力“土中”的岁月，他常常想起那些和他朝暮相处过的蒙古、回、汉、满、达斡尔、朝鲜族

的老师和学生。

“土中”是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1983年，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孟绍同志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第三，要“全面负责，兼顾两头，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这是孟绍为“土中”制定的十六字办学方针。

“全面负责”，一是要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负责，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负责；二是要对学生在校的集体生活负责。

“兼顾两头”，是指既要照顾城市学生在学习上“吃得好”，又要照顾农村牧区学生在学习上“吃得了”。“土中”曾一度为农村牧区来的学生办“预备班”、“补习班”，“吃偏饭”，使他们的功课尽快赶上来，尽快做到随班上课，随年级毕业。

“因材施教”，就是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重点培养，发挥其优势；对学习吃力的学生，学校配备专人辅导，“增加营养以补先天不足”。

“循序渐进”，是针对解放初农牧民子弟入学前文化程度低而采取的措施。孟绍提出了“宽收严教”的原则。招生时，放宽录取标准，入学后按不同层次分别编班，加强课堂教学，严格管理，到毕业时达到合格水平。

第四，要保证教学质量，把好“三关”。

“三关”是指升级关、毕业关、升学关。

升级关：各族学生在升级时，一律以学习成绩为标准，合格者升级，不合格者留级，一视同仁，不搞特殊，不留情面。

毕业关：在学生毕业之年要加强辅导，在文化知识上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在选择专业上帮助他们扬长避短。毕业考试不合格者，一律不准毕业。

升学关：对面临升学考试的学生，结合他们各自优势，帮助他们选择适当的报考专业。对落榜生要体贴安慰，可能的时候，设立补习班，帮助他们查漏补缺。

## 第五，树立良好的校风。

孟绍认为，学校必须树立良好的校风，以此来熏陶学生，促进他们进步。他要求“土中”的学生，必须是“艰苦朴素，勤学苦练，团结友爱，尊师爱校”的学生。

**艰苦朴素：**女生一律不准穿高跟鞋，衣服要大众化，男生不准留长发，不穿奇装异服。孟绍说：“某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对中小学生的穿着打扮都有严格的规定，难道我们这一点要求还算过份吗？”

**勤学苦练：**激励学生要有“悬梁刺股”的勤奋精神。“土中”从来以自习多著称，每天早自习一节，下午自习一节，晚自习两节。这是根据学生大部分住校的特点而安排的。自习，为学生创造了勤学苦练的有利环境。

**团结友爱：**师生之间，各族同学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尊师爱校：**学生必须尊敬师长，必须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

## 第六，提倡“教学五认真，班主任五深入”。

**教学五认真：**即要教师在备课、讲课、辅导、批改作业、考试五个环节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班主任五深入：**即要求班主任要经常深入宿舍、课堂、食堂、课外活动场所、学生家庭，全面掌握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问题。

对以上要求，孟绍作为校长，首先以身作则。他和学生一样，每天住校，到星期六晚上才回家。利用住校的机会，经常深入学生宿舍、教室、操场、食堂，也深入到教研组、教师宿舍，交流思想，商谈工作，了解师生生活学习情况。他和师生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老师和学生都把他看作朋友、师长、父亲。

## 第七，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建设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除了要求教师自身的思想业务素质

质要高外，学校领导还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

“土中”在解放初期，有较高水平的蒙文教师，却缺乏适当的蒙文教材。孟绍就组织教师自编蒙文教材，很快使教师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六十年代，“土中”政治教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为提高政治教学质量，孟绍就组织教师系统地学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并根据当时形势，组织教师轮流到农村锻炼。

孟绍还轮送有条件的教师去高等院校进修，并让教师参加高校函授学习。

孟绍认为，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是培养出来的，是建设起来的。如果对教师的思想业务放任自流，即使有好的素质，也会流失走样。

## 七

孟绍是一位把全部身心投入民族教育的职业教育工作者。他对教育充满了爱心和奉献。孟绍从教以来，培养的学生约一万名，他把心血倾注他们身上，而学生的可爱形象却永远留在这位老教育家的心间。1986年，“土默特中学”建校60周年校庆，全国各地几千名毕业生都回母校庆贺。学生们簇拥着老校长，嘘寒问暖，他突然在这成百成千的学生中，叫出某位学生的名字。尽管他的学生有的已经两鬓斑白，有的已经官就高位，可他们被老师这一声亲切的呼叫激动得流下了泪。他们知道，老师永远记着他们，而他们也永远怀念着老师。孟绍也许记不住昨日的饮食起居一类的近期事。他却能一眼认出他数十年前教过的学生，叫出他的名字，说出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趣闻轶事”，孟绍的学生经常惊讶老师的记忆力，谁知这记忆力，正是老师一片爱心的凝聚。

孟绍对学生的爱护胜过了自己的儿女。大约是1948年的秋天，

在“土中”上学的凉城汉族学生张瑾因宣传革命思想，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孟绍得知特务要逮捕他的消息后，立即通知张瑾同学赶快逃离学校。张瑾想投奔解放区，却身无分文，孟绍就从家里扛来一袋白面，让张瑾卖掉，做路费，投奔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曾任乌盟武川县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的张瑾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激动地说：“孟绍校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师。我永远忘不了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诲，对我在生死路口上的搭救！”

解放初期，一位和林格尔县的农民女孩子在“土中”上学，这年因家乡遭灾，全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她的父亲牵着毛驴来呼市要孩子退学回家。孟绍闻讯后，把学生的家长请进办公室，劝他克服困难，不要让孩子中途辍学，并当时就决定，免除这位学生的学费和增加助学金。家长被孟校长的一片至诚感动了，他拉着孟校长的手说：“孟校长这么关心学生，我再苦再累也要供她念书，这个学咱不退了！”后来，这位叫云彩凤的女学生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大学。至今她怀念起孟校长就说：“我的这点知识，是孟校长给的。要不，我早就回山沟沟当家庭妇女了……”

还有一位满族学生叫佟靖仁，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患了贫血症。他头晕目眩，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家长苦于无钱治病，就请求学校准予休学。孟绍得知情况后，就安慰家长和佟靖仁，他说，“满族孩子上学多不容易呀！要坚持下去！”于是他自己花钱给佟靖仁买了药，并亲自煎好给佟靖仁送去。他还指示老师，为佟靖仁补习功课，使他尽快恢复健康跟班上课，后来佟靖仁考入了大学。以后佟靖仁的父亲在病危向儿子安排后事时说：“孟校长对学生恩重如山，他没有民族偏见，他没有因为咱家是穷满洲而嫌弃咱。他对你的关心和培养超过了你的父母，我死后，你要象对待父亲一样地对待你的孟校长！”佟靖仁记住了父亲的遗训，

至今与孟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每逢过年，他总要把校长接到家中，一起欢度团圆年。

如今孟绍的学生遍布自治区内外，其中不少是党政军负责干部和著名专家学者。他欣慰自己为国家培养了这么多的栋梁之才。在他年老退休的时候，许多学生问他需要办什么个人的事，他们一定帮助解决。可孟绍从不为自己的私事去麻烦学生。

1986年，“土中”60年校庆，有关单位和学生个人先后向母校和孟校长本人捐赠物款10多万元，孟绍分文未取。在他的提议下，这笔款项做为“土中”奖励学业优胜学生的教育基金。学校为此成立了“孟绍教育基金会”，这是执教50余年的老校长留给学校的又一笔物质财富，他期望着“土中”的兴旺，民族教育的昌盛！

## 八

孟绍于八十年代兼任呼市教育局副局长，他现在是政协呼和浩特市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内蒙政协常委。

1989年元月，为了表彰他在民族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五十余年的卓越贡献，呼市教育局为他召开了恭贺大会。在会上，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赵志宏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孟老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实在难能可贵。他是深受各族学生爱戴的民族教育家。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庆贺他的功劳都不过分，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歌颂他的业绩都不夸张——因为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老师永远是伟大的！”

市教育局代表组织向孟校长献上的贺词中说：“孟绍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教育事业，几十年呕心沥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艰苦创业、奋力开拓，终身奉献于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以及为内蒙古地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将作为我们地区和民族的骄傲与财富永载史册。”



孟绍同志是教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他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中的一名标兵。他捧着一颗火热的心，将红烛一样的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他酷爱的教育事业！

# 桃李芬芳九州间

谢茂才

我是一个学习地理专业的人。我认为搞好中学地理教学工作，决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尽全力充分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

宁可在台下累死，千万不要在讲台上挂起。台下不难受，台上无享受。

——贾秉温自述

1989年7月11日，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革命公墓响起了阵阵哀乐。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悼念他们尊敬的师长，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一生的贾秉温老师。

悼念大厅摆满了花圈、挽幛，贾老师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遵照他的遗愿，在他的胸前端端正正戴上呼和浩特一中的红校徽；挂上每天上课离不开的怀表；在灵前放上了地理课本和地图，一盒粉笔。一个别开生面的、充满了人民教师自豪感的追悼会开始了。

治丧委员会主任由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呼市民进主委杨秉祺先生担任。内蒙古民进主委刘及时先生用深深的三鞠躬向自己的同事表示无限的敬意。

贾老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一片丹心和执著追求感动着到会的每一个人。大家噙着泪花，带着无限的深情，送别自己的老

师。

呼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阿荣同志致了悼词。悼词中说：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呼市一中知名的高级地理教师，呼和浩特市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呼和浩特市劳动模范，呼和浩特市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贾秉温先生因病于1989年7月5日5时35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贾秉温先生的一生，是勤奋工作的一生，为我国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市教育战线的一大损失。

“在将近50年的教学生涯中，贾先生所教的学生成千上万。有的已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的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教授、专家；他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他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贾秉温先生师德高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于律己，德高望重。是我们教育界的老前辈、老师长。他深受社会各界的尊敬，学生们的爱戴和景仰。

“他的一生，坎坷不平，历经磨难，但他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勇于进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三百多人伫立大厅，久久不愿离去。

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获此殊荣，受到社会各界如此的尊重，这在呼和浩特市是屈指可数的。

## 二

贾秉温先生1912年11月28日出生于呼和浩特市。是个地道的呼市人。父亲贾伟是个耶稣教徒，年轻的时候就在耶稣堂做事了。父亲对孩子们要求很严，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功课。要求每个人必须学会一些实际生活的本领。父亲的信条是“积银千两不如薄技在身”。在其影响下，二姐贾淑荣、小妹贾霄荣学了医，成了大夫；二弟贾秉良学了工，成了毛纺工程师。父亲本希望贾秉温学

兽医，但他对兽医一点不感兴趣，改学了地理。在兄弟姐妹中成了终生当教师的人。

母亲张茂祥没有文化，是一个热爱劳动、善于持家的好主妇。母亲有时也去耶稣堂礼拜，但她从来不信任何宗教。母亲脾气急躁，很有个性。这些特点对贾秉温的性格形成是有较大影响的。

7岁时，在父亲的要求下，贾秉温在耶稣堂的教会小学开始了读书生涯。以后，耶稣堂成立高小，他又在高小继续读书。在教会学校，德全、王文经是他很感激的两位启蒙老师。1926年到1927年，他转到归绥县立第一小学，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当时的校长是赵子珍，家住新城。是贾秉温的恩师。

1928年，他考入了归绥中学。当时的校长是赵允义（后到台湾），训育主任是潘秀仁（后到台湾）。同班同学有四五十人，编号为初中17班。

1930年北京香山慈幼院在归绥地区招收了一批学生，共有一百多人。这批人到北京后，因为程度不齐，有的分配到二院，有的分配到三院，也有的分配到四院。贾秉温被分配到第三院中学部。香山慈幼院，环境优美，教学要求很严，贾秉温在这里完成了初中的学业。毕业后考入了香山慈幼院第四院高中机械科。1932年1月，贾秉温因病休学回到归绥。否则，他可能早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了。当时香山慈幼院院长是熊希龄。

1932年春天，休养了一个时期以后，贾秉温在同班同学的介绍下，到毕克齐小学当了教师。第一次尝到了教书的苦和乐。

“教然后知困”。一个学期的教师生活，贾秉温深感自己应继续读书，否则很难适应工作。1932年8月，他又考入了归绥中学高中第6班。当时的校长是侯璠（后到台湾）。继任校长是于纯斋。

1934年5月，贾秉温还有两个月就要高中毕业了。为了刺激

学生好好学习，当时绥远省教育厅主办奖学金考试。但是，高中一、二、三年级的数学考题中却有错误。考试以后，贾秉温向教育厅长阎伟（后到台湾）提出了一个问题：“试题错了，成绩如何评定？”还有几个学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一举动使得阎厅长大为恼火，认为是这伙人故意为难，有意捣乱。阎厅长下令，由教育厅出面开除了7个学生。贾秉温被开除后由郭良田校长给了一张高中肄业证书离开了归绥中学。

被教育厅开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归绥的学校都不敢再接收。父亲责怪，有家也不能回。当时贾秉温的二姐贾淑荣正好由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留校当助教，为贾秉温第二次赴北京创造了条件。这样，他急急忙忙奔赴北京，考入了私立中华中学。1935年，贾秉温终于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时年22岁。

### 三

1935年贾秉温由北京中华中学毕业后，希望考入北师大地理系。当时北师大规定：每年都由各省教育厅在初试的基础上保送2人到北京参加复试。难题由此产生了，当时绥远教育厅长仍是阎伟。一个被他开除过的学生肯定是不受欢迎的。贾秉温想到了他小学时的校长赵子珍，当时正在绥远教育厅担任总务科长。在赵的帮助下，他回到了归绥参加了教育厅主办的保送生初试测验。参加考试的共8个人。考完后教育厅公布录取了3人到北京参加复试，贾秉温排列第三。到北京复试后，前两人中有一人被淘汰。这样，1935年9月贾秉温正式进入北师大地理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刘玉峰先生。

刚入北师大，兴奋的心情可以理解。除了每天学习之外，他常去的地方就是体育场。他喜好体育运动，水平还不低，这都得益于中学和大学时代。他是一名好运动员。

青年时代，贾秉温就高度近视，同学们戏称“瞎子”。中学

时，他特别爱好足球，每天一下课就到足球场玩球，跑得很快，动作很利索。

在中华中学读书时，为了准备升学考试，把一切体育活动都丢开了。这一段时期真把贾秉温憋坏了。考入师大后，功课负担相对轻些，师大的体育设备又比较完善，这为贾秉温每天下午参加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贾秉温对师大体育系的学生都很熟悉，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运动特长，比对地理系的学生还亲切。

由于这种关系，在贾秉温日后的生活中，体育系的同学对他有过不少帮助，解决了一些困难。

1936年暑假，由于时局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正由东北日益伸入内地。北京各大学的学生120余人赴南京参加了为时一个月的军训。这样，贾秉温便到了南京三牌楼紫竹林。每天上三次操场两次课堂。操场上学的是从徒手到持枪，由个别教练到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由筑城到野外实习、空弹打靶。两次课堂主要是“精神讲话”。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都到课堂讲过课。讲课最多的是张厉生，偶而胡梦华也作报告。

#### 四

1937年初，时局更加紧张。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指令，北京和天津的高中二年级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6月下旬一律集中到北京西苑受训，总负责是宋哲元，实际主持受训的是何其丰。“七七”事变那天，他们正在西苑受训。因为战争爆发，7月20日军训提前结束，所有学生返回原校。这时局势已变得十分严重，留在学校安心学习实际上已是梦想，学校往日的平静被彻底打破。很多同学离校返家，学校出现了混乱。不几日，京包铁路不通了，贾秉温想回家成了问题，不得不留在学校。日寇入北京后，经常到北京和平门外数理学院寻事挑衅。师大不得不把留校的学生搬到石驸驮街文学院暂住。9月初，他和几个同学决定，离开北京南

下。

1937年9月初，贾秉温 and 几位同学一道从北京到了天津，又由天津乘船到了烟台，然后去了济南。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在1937年9月20日到达南京，住在南京市立第二中学的礼堂内。地点在南京的八府塘，当时称为“平津流亡学生招待所”。

当时在南京马家街二号有一个院子，是绥远旅京同乡会租赁下的一个绥远会馆。暂时空着没人照看。经人介绍，贾秉温和另一同学成了会馆的临时管理人，伙食费每月8元，雇了一个做饭工，每月工资7元，这一切开支都由会馆的基金会负责。

1937年11月中旬，经人介绍，贾秉温离开南京到了开封，到城南门外的第十七营房伤兵休养院服务，成了第三中队第一分队的中尉分队长。以后伤兵休养院改名为荣誉团，贾又被任命为一营三连的连长。这位流亡学生一夜之间要去带兵，他感到很为难。

这时北师大、北平大学（包括工学院、医学院、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北洋工学院合并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凡这些学校的学生回到学校都可以领贷金，生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知道这一消息后，贾于12月下旬到了西安。

北师大地理系三年级原有20多人，当时回到西安临时大学的只有7人。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又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当时绥远教育厅厅长阎伟也到了西安，凡是绥远籍的学生都可以领到50元的救济费。尽管贾秉温被阎伟开除过，为了生活，只好去找阎，从厅长那里领到了50元的救济费，生活算是暂时有了保障。

由于战乱，每个学生都拉下了不少功课。上课以后，只得全力以赴赶补缺课。当时绥远籍同学在西安临时大学的有历史系的安吉人、物理系的刘佐儒、刘世藩。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使得西安的安全也受到威胁。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决定由西安迁到陕南。这样，贾秉

温和他的老师同学一道由西安乘火车到宝鸡，由宝鸡徒步到褒城。土木工程系、体育系、地理系三个系搬到汉中东南城固县境内的古路坝。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完成了大学本科的学业。

时年27岁。

## 五

经过艰苦的努力，贾秉温终于大学毕业了。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说：“四川重庆农本局向我要四个人，去参加农业经济地理的研究工作。我准备推荐吉作哲、焦福星、王成敬、贾秉温四个同学去重庆工作。农本局的局长何谦与我是老同学，你们到那里后要好好工作。”在老师的热情推荐下，除焦福星有家累不能前去，贾秉温等三人急急忙忙从城固出发，奔向天府之国的四川。

贾秉温到成都后，去四川大学找一个绥远同乡祁登文（后到台湾）。从与祁的谈话中知道陈国英（萨拉齐人，后到台湾）的爱人丁淑蓉在重庆私立友仁中学教书，有事可以去找她。

贾秉温到重庆后，农本局负责人说：“你们要先受两三个月的训，然后参加合作金库的工作。”贾等3人觉得与黄国璋主任的推荐有出入，于是另打主意，分头找工作去了。

贾秉温在重庆这个大城市举目无亲，只好到友仁中学找丁淑蓉。也算是巧合，友仁中学正缺一个史地教员。由丁淑蓉介绍，贾秉温离开了农本局正式到友仁中学教书，开始了他中学地理教员的教学生涯。

友仁中学在重庆浮图关附近，不久遭到日机轰炸，校舍被敌机炸毁。学校只好由重庆移到江津县的真武场。当时的校长是李尚仁，山西朔县人。抗战前在山西省担任过建设厅厅长、工业专科学校校长。贾秉温在友仁中学认真工作了3年，月薪由60元到154元，最后加到223元。每周授课20多课时。现在呼和浩特一中



的退休特级教师徐化民，当时正在友仁中学读高中。

战争时期，物价飞涨。在友仁中学虽然可以拿到二百多元，但生活仍感紧张。在北师大校友张家珍的介绍下，1942年贾秉温去了綦江县立中学，这里的待遇比友仁中学高。校长刘世铸也是北师大地理系的毕业生，关系比较好处一些。在綦江中学教了一年的书。有一天，从报上看到重庆南岸黄桷垭广益中学征聘教员，贾秉温考虑到綦江到重庆有88公里，不如到离重庆近一点的南岸去工作。于是去信联系，不想很快成功。这样，1943年8月贾秉温到了广益中学担任了地理教员。广益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校长叫杨芳龄，教务主任叫吴小林，训育主任叫杨伯庸。贾秉温在广益中学教了两年书，和校长杨芳龄的关系处得不好，心情不愉快，总想离开广益中学另找工作。

在友仁中学教书时，贾秉温与四川姑娘张凯健认识并结了婚。在綦江中学教书时，生下长女，取名贾蓁。在广益中学教书时，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取名贾渝。贾秉温一人教书，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生活是比较艰难的。有一段时间，张凯健还不得不回娘家居住，以减轻丈夫的负担。

## 六

1945年6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当时绥远省的很多要人纷纷由后套到了重庆。潘秀仁、张淑良、阎肃、白焕瑜、辛崇业等就是这时到达重庆的。这些要人到了重庆，在重庆的绥远同乡发起了一次公宴，招待这些要人。在这次宴会上，贾秉温又结识了很多绥远同乡，见到了潘秀仁。潘当时是绥远教育厅厅长兼国立绥远中学的校长。在谈话中潘知道贾秉温已在四川教了六年书了，希望他能回到绥远，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力。并慷慨答应旅费可以由学校补助13万元（法币）。贾秉温得到这一许诺，很是高兴。从7月份开始收拾好行装便开始等车。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重庆更是处处张灯结彩，欢庆胜利。8月20日车队由重庆出发。贾秉温带上爱人、孩子开始了长途跋涉，一路风风雨雨，起早贪黑，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两个月才回到后套梅林庙。据张凯健回忆，一路上坐汽车、坐马车，还坐皮筏在黄河里漂流。有几次夜间还露宿野外，一路上真苦啊！

1945年10月下旬，贾秉温正式到国立绥远中学（当时在后套）教课。当时的代理校长是贾武，总务主任是苗国华，训育主任金载民。当时国立绥中地理教员张鹏举接任陕坝师范学校校长，贾秉温到校后接任了张的地理课，并兼任高中第五班的导师。

1946年暑假，贾武、苗国华等一大批人回到归绥，再不愿回后套。暑假过后，学校迟迟不能开学。10月初，潘秀仁辞去了兼任的国立绥中校长职务，改由张淑良继任。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国立绥中接到一份电报，任命贾秉温为教务主任，段成梁为训育主任，王维新为总务主任，迅速筹备开学上课。这很可能是潘的主意。

1947年春，张淑良校长去了后套。根据抗战胜利后时局的发展以及广大师生的要求，他回到归绥后便与有关当局研究迁校问题。顺应形势的需要，1947年暑假国立绥中由后套迁回归绥（呼市）。秋季在现呼和浩特一中本部开始上课。1947年底，贾秉温辞去教务主任之职。从1946年秋到1947年底，贾一共担任了三个学期的教务行政工作。

1949年春，归绥中学的教务主任李成到了包头中学。校长刘佐儒约贾秉温担任教务主任。这样，从1949年春到1949年底，贾秉温又在归绥中学担任了两学期的教务主任。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贾秉温开始了新的生活。

## 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教育事业展现了光辉的前景。解

放后，绥远省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一派生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欢天喜地，感到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内心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

1950年1月，归绥各中等学校教职员集中到归绥中学参加寒假学习；各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集中在麻花板学习团学习。学完之后，贾秉温仍回原校工作。

1952年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紧接着开始肃反运动。通过这些运动，贾秉温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在总结这一段的收获时表示：“要尽心竭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老老实实，诚诚恳恳，无限忠诚，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

## 八

1957年，贾秉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行政上开除留用，考查三年。经济上工资由89.5元降到70元。据张凯健回忆：当时70元钱要维持一个9口之家真够苦的。每月发了工资，先把面买回，油打回，煤拉回，保证基本生活。其它的有就花点，没有就算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贾又成了“专政对象”，住进了“牛棚”。精神上、肉体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孩子们受到株连。升学没资格，就业不合格，生活又拮据，只好去做临时工。

从1957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止，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恶运降到了贾秉温的头上。正在年富力强时候的贾秉温不得不天天写检查、写交待；一双做学问的手却不得不拿起扫帚去扫院子、打扫厕所、拾大粪、推水车、种山药、起萝卜、盖房子。批判、斗争、抄家、低头、弯腰、“喷气式”、“唱牛鬼歌”、“剃阴阳头”，所有的风刀雨剑，也都朝着贾秉温砍杀过来。这一切的一切，贾秉温硬是挺过来了。

## 九

1978年底，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和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祖国的春天繁花似锦。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开足了马力，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大旗的指引下正在乘风破浪，扬帆奋进。

此时的贾秉温已是66岁的老人了。但他却满面红光，精力充沛，仍然战斗在地理教学的第一线上。一生的辛劳，几十年的教学积累，同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宝贵经验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赞扬与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称赞。

1979年，对贾秉温来说是一生中难忘的一年，多喜临门的一年。

1979年春，贾秉温迈着百感交集的步履，第一次跨进了呼和浩特市劳模大会的会场。他被评为1978年度呼和浩特市劳动模范。

1979年春末，经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有关部门核准并正式下达文件，为贾秉温推倒原划“右派”的错案，恢复他的政治名誉，调整了工资，经济上给予了补助。

1979年初夏，贾秉温被选为呼和浩特市地理学会理事长，并增补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地理学会理事。

1979年夏，来自各条战线的数十位五十年代的老校友，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庆贺贾秉温老师执教四十周年。

学生们为贾老师赠送了一块匾额，上书：

“茹苦含辛志弥坚，  
寒暑风雨只等闲。  
育英有方风人勤，  
治学无厌正己严。  
画形画态刻脑海，

绘声绘色扣心弦。  
日月耕耘四十秋，  
桃李芬芳九州间。”

这个匾悬挂在贾秉温老师的卧室。它高度评价了贾秉温四十年来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表达了深受贾老师教诲的数以万计的学生的爱戴之情；同时也表达了深为贾老师无数先进事迹所鼓舞的同事们的敬佩之心。

1979年冬，贾秉温被增补为呼和浩特市政协委员，他第一次走进了政协的会场，为教育呼吁，为教师呼吁。

从此，他更加努力工作，著书立说，培养青年教师，为渴望进高等学校深造的老三届生补课。在他的日程表里从来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他一年要工作三百六十四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年初一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从1939年毕业开始教师生涯，贾秉温已教了几十年的地理，在学术上造诣很深，有独特的见解。然而他从不满足于现有的成果。他始终把地理作为一门“多边缘性的学科”来研究。他深深知道，要教好地理，不懂得天文、地质、气象、气候、土壤、海洋、测量、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贸易、文化、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是根本不行的。

几十年来，他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每天天还没亮，就第一个赶到学校，扭亮电灯、擦好桌子、打好开水，然后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晚上，师生们都回家了，他还要读一段报刊杂志，或剪裁一点资料，或是改编一节教案，然后才离去。

几十年的教学，贾秉温老师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凡听过他讲课的人，都有共同的体会：“画形画态刻脑海，绘声绘色扣心弦”。他上课时边说边写，清晰流畅；他的话语，幽默风趣，厚实精彩；他的声音滔滔不绝，引人入胜，象一条色彩缤纷

的带着音色的溪流。听过他的课的人，都感慨地说：“真是艺术上的享受。”

为什么贾老师在教学上能如此吸引人，盛名于区内区外？这和他在教学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他的教学方法，简单地概括称为“六五四”教学法。

“六”就是“六个不行”：

没有课本不行——因为没有依据；

光有课本不行——因为课本有局限性；

离开课本不行——信口开河，达不到教学目的；

离不开课本不行——照本宣科，枯燥无味，学生不爱听；

多了不行——教学有大纲、计划的规定，每节课有规定任务。

少了也不行——光有骨头，无血无肉，便不会形象生动。

“五”就是“五变”：

把死的变活的；

把难的变成易的；

把抽象的变成具体的；

把复杂的变成简单的；

把枯燥无味的变成形象生动的。

“四”就是“四个具备”：

具备掌握、组织、选择、应用教材的能力。

这个“六五四”教学法真要用好，也够一个教师努力一辈子了！学无止境，教无止境。

“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要有一桶水”。教学不能有一点含糊，这是贾秉温老师多年的信条。试举一例：

讲到加拿大时，贾秉温从白求恩说到和平战士文幼章。讲到矿产，贾秉温说起加拿大的镍矿产量占到全世界的二分之一，

主要产在格雷文赫斯特附近的莎德佰利。镍的特点是：弹性限度高，扩张程度大，适用于耐磨机械、桥梁、钢绳及汽车零件。在炼钢时，如果含镍1.5—4.5%，即可制作钢绳和桥梁机械；如果含镍36%，叫做不复钢，无膨胀系数，适于制作仪器；如果含镍46%，叫做高镍钢，其效能可与铂，也就是白金相同。其间，有思想教育、知识传授，更有“文”到“理”的延伸。

再看一例：

讲到我国的四大水产——墨鱼、带鱼、大黄鱼、小黄鱼时，到底什么是大黄鱼，什么是小黄鱼，贾老师不耻下问了几十年。1975年在去上海的列车上和一个来自舟山群岛的同志相遇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是大的黄鱼叫大黄鱼，小的黄鱼叫小黄鱼，而是鳞与鳞之间空隙密，鱼鳞露得小的是大黄鱼；鳞与鳞之间空隙稀疏，鱼鳞露得大的是小黄鱼。如果把鱼鳞剥下来就更明白了：空隙密，实际是鱼鳞的片大，这是大黄鱼；空隙稀疏，实际是鱼鳞片小，这是小黄鱼。

由此可见，一个地理教师要遇到多少问题？你对贾老的治学态度能不从心里佩服吗！

培养接班人，精心扶植更多的园丁，被贾秉温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贾老培养徒弟“严字”当头。要求弟子做到准确精练，一丝不苟，决不能“大概”、“也许”、“或者”、“差不多”。甚至连板书如何写，粉笔怎样拿，图表怎样画，一块黑板如何合理利用等一些常被教师忽视的“小事”他都从不放过。

呼和浩特一中现任地理教员李凤芸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

武汉国营四七一厂子弟中学教师蔡金梅是他收的一个从来未见过面的徒弟，贾老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教学资料和自己的教案都寄给了这位年轻的地理教师。1979年，蔡金梅深情地给呼市教育局领导来信，列举了大量生动的事例之后说：“在贾老师身上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的优秀品质，他的崇高的思想犹如

金子般闪光。”“我怎样感谢贾老师对我的帮助呢？除了自己要加倍努力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并写上这一封发自内心的感谢和赞扬贾老师的信给教育局领导同志，请表彰这位不为名不为利，无限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模范老师。”

当时，贾秉温正带着七个“徒弟”。人们开玩笑说，他带着七个研究生。

贾秉温从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他把自己过去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抛到九霄云外，他永远向前看，充满朝气。他虽然不是是一名“特级教师”，但他却是一位备受赞颂、深受尊敬的“特别”教师！他虽然不是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却是一切共产党人乐于倾交，高尚崇贞的诤友。

1986年，在贾秉温74岁高龄时，离开了奋斗几十年的讲台，光荣退休了。

离开讲台前，贾秉温举行了一次告别式，深情地讲了最后一节课。他讲得很认真，很激动，眼睛里放着光彩，声音还是那样洪亮。

我坐在下面听课，心里很不平静。

铃声响了，全班学生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 十

人退休了，心却退不了。每天清晨天不亮，贾秉温仍然早早到校，一如既往。搞完卫生，沏好茶，就上咸菜吃焙子。教书一辈子，直到晚年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

回首往事，坎坷一生，道路崎岖。贾秉温在读书和教书过程中，曾先后四次填写过国民党员登记表，原因是他每到一处新的地方，人家就发给他一张登记表，他为了平平安安地呆下去就老实地填写一次。他无任何野心，也无任何罪恶活动。对此，在解放之后，贾秉温如实地向组织作了详细的说明和交待。对于贾



秉温的历史问题，在解放初期阶级斗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追一追、问一问、筛一筛，搞些内查外调，对此，贾秉温从没有背过包袱。在事业上他依然是奋力进取，从不间息！

1957年以后，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倏地立起了巍巍险关和重重障碍！从此，每次运动都得挨整一番，贾秉温自嘲道：“我成了一名老运动员了！”尽管如此，他始终严于律己，苛于治学，即使在“文革”住“牛棚”时候也没有悲观绝望。

1982年，在他70周岁时，他作为内蒙民进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1988年，中小学教师进行了职称评定。贾秉温被评为高级地理教师。

内蒙古自治区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对他作出了中肯的评议：

“贾秉温同志是内蒙地理学界的老前辈，他几十年如一日，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地理教育事业。他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授课语言生动形象，教学经验极为丰富。多次被评为市级劳模……”

## 十一

贾秉温的地理教学语言生动。他用顺口流讲述内蒙古的过去。他说：

“牧主张血口，奸商刮人油；  
狼跟羊群走，奴隶血泪流。”

这是当时牧区的情况。

“河套米粮川，年种年收没吃穿。”

“一门一窗，门口一只水缸，人起炕光。”

“少铺没盖，两条麻袋。”

这是当时后套农民生活的写照。

“无风遍地沙，有风埋人家。

只见春天下种籽，不见秋天收庄稼。”

这是伊盟的毛乌素沙漠。

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内蒙古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的生活大变样了。

“黑河水肥又肥，一滴水一粒米。

留下黑河水，米面成了堆。”

这是黑河流域的现状。

“东林西铁，南农北牧遍地宝”，这是他对内蒙古的高度概括。

贾秉温爱家乡，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什么是爱国主义？这就是爱国主义。

什么是教书育人？这就是教书育人。

贾秉温对教师工作充满了爱，他对自己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感到自豪。尽管他的同学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教授、专家。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也曾聘他任教，他都谢绝了。

他有一句名言：

“宁可在台下累死，千万不要在台上挂起。”

他说：

“教学工作无穷无尽，永无止境。我虽然从事中学地理教学四十多年，但还是有许许多多问题不明白，或者知道得很少很少。例如大黄鱼和小黄鱼的区别我原来就不了解。因此，当堂被问住，张口结舌、出尽洋相。后来向好多人请教，众说纷纭，答案都不能使人心服口服，每想到这里，总觉得如芒在背，如梗在喉。直到1975年因事去沪，在京沪列车上遇到一位舟山群岛的水产专家

才把这一问题解决了。”

“学生到校学习，应当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建立在教师课前必须有充分的、全面的、完整认真的、丝毫不误的、娴熟的准备。只有如此，同学们才会感到学习是一种享受。这叫做，台下不难受，台上无享受。”

贾秉温在呼和浩特一中工作了四十多年，学校就是他的家。要说爱校如家，他是第一个。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大年初一，他都在学校。有谁能做到。

看见学校工作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他总要认真提改进意见。

他呕心沥血，搞出了字数以百万计的资料，其中，有我国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珍贵资料，有全世界七大洲、四大洋150个国家的资料。这些资料，贾秉温如数家珍，一律分门别类，井然有序，随手可取。

他成年累月，披星戴月地“泡”在学校的图书馆和教研组，不是研读报刊，就是摘抄资料；不是编改教案，就是对着地图凝思。

他的家呢？早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留人店”；早早离去，迟迟归来。每月工资，向老伴张凯健一交就从不问津，从不挑剔。一年四季，在家里他成了万事不管的“甩手掌柜”。

1978年，一次上课时，贾秉温脚踏错了位置，跌落在水泥地面上。他挣扎地爬起来，顿觉左膝疼痛难忍，他咬了咬牙，手扶黑板，坚持讲完了课。

待他回家吃过午饭，左腿已肿得涨满了裤管，疼得迈不开步了。

就这样，他让老伴找了一根棍子拄着，一拐一拐地走上了通往学校的路。平常几分钟的路他走了一个小时。当他进到学校被大家扶进办公室时，牙床已经咬得发木了，腿也再站不住了。

他被同志们强行抬到医院，一检查，左膝关节胶囊和韧带摔伤，必须卧床治疗。

为了学校这个“家”，他献出的太多了。对于自己的家，他管得太少了。

## 十二

1989年春夏之交，贾秉温因病住院了。来势很猛，拉血，止不住。

贾秉温对孩子们说：

“不能对学校提任何特殊要求，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

贾秉温的几个子女女婿轮流看护，竭尽孝心，老人感到莫大的安慰。

贾秉温对前去探望的学校领导说：

“你们要沉住气，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要在学校好好上课，绝不能上街游行。”

老师们前去探望，每次他都要询问学校的情况，并且一再嘱咐：“一定要在学校好好教书，好好读书。文化大革命的苦头吃够了，再不能重演了。”

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仍然坚持如此。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老人到最后一刻也是不含糊的。

## 十三

大青山革命公墓。

贾秉温的骨灰和遗像放进了陈列室。他面带笑容，望着每一个前来悼念的人。他虽然走了，但他的高尚品德，崇高的情操，对教育事业无私奉献、无限忠诚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 民族幼儿教育家韩秀英

同 田

韩秀英，女，蒙古族，生于1925年。吉林省镇赉县少力古鲁屯人。幼年时，曾读蒙文私塾，以念蒙语为主，为期一年有余。后到赛力屯小学就读四年，继则往乌兰浩特上高小二年。1940年入乌兰浩特“兴安女高”，4年后毕业。此期主要学了一些日语和蒙语的初浅知识。

1945年乌兰浩特解放。1948年韩秀英满怀解放的喜悦，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工作。当年11月，入乌兰浩特小学教师师训班学习。由于工作需要，这期师训班未曾按六个月的计划培训，只三个月就提前结业了。毕业后，绝大部分都想当小学教师，而自愿做保育工作的人，可谓寥寥无几。在幼儿师资匮乏的情况下，有关领导做了她和另外一名同志的思想工作，决定她们到保育院去当幼儿教师。韩秀英对此非但毫无怨言，而且欣然服从了组织的分配。

她工作后，很快地就喜欢上了幼儿工作这一行。她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一起，内心充满了童趣和青春的活力。但要当一个合格的幼儿教师，又决不能只限于一个“保姆”或“阿姨”的水平。为了提高素质，1949年8、9月间，保育院院长李谨励带领她和张淑媛老师到北京参观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保育院，后又到沈阳参观了一些保育院。经过这次参观学习，她的视野开阔了，内心充实了。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幼儿工作是我国教育事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人才的奠基工程，它的发展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和整个教育的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这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事业。这次参观学习，不仅使她的思想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为她日后安心从事幼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秀英就职的保育院，当时规模很小，仅有三十几个孩子，连保教员、炊事员及搞行政工作的，总共不过十五六人，教职工中真正安心工作的又很少。有些人认为，搞幼儿工作地位不高，待遇也差，既没出息，又没意思。每天不是哄着一群孩子玩，就是吃喝拉撒这一套，纯粹是当“高级保姆”。所以，在职的，都想方设法往走调。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受环境的影响，更没有动摇继续搞幼儿工作的决心。

1950年，保育院随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迁址于张家口，更名为“内蒙古分局幼儿园”，韩秀英也随之来到张家口。是年5月，园里不惜代价，又派她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办的“妇干校”幼师班深造。在这历时一年又五个月的时间内，她较系统地学习了幼教理论，接受了政治、美术、体育、音乐、语言等各门学科的专业培训，并亲自聆听了苏联专家的讲学。

1951年9月，韩秀英从幼师班毕业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实习。这所幼儿园是北京市的一所重点幼儿园，设备精良，教员的素质颇高，有的竟能自编自谱歌曲，有的钢琴弹得很好。多才多艺者不乏其人。也正是在这为期短暂的实习中，韩秀英增长了见识，找到了自身的差距，看到了幼教事业的发展前途。

1951年10月，韩秀英由京返回。此时，内蒙古分局幼儿园规模渐趋扩大，不但从北师大家政系毕业的高凤英被分配前来任教，加强了师资力量，而且从张家口地区新招收了一些搞幼教工作的人员。班级也由原来的两个发展为五个，入托儿童也由过去的三十几名扩大为一百多名。

同年，上级委派高凤英只身前往呼和浩特市，筹建内蒙古第一幼儿园。1952年，内蒙古分局幼儿园随党委政府一同搬迁到呼市，更名为内蒙古第一幼儿园。园址在今麻花板，编制为七十多人。师资中又充实了一名广东师大的毕业生和一名天津师大的毕业生。高锐任保教主任，韩秀英搞生活管理。与此同时，韩秀英和高锐、高凤英三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内蒙古第一幼儿园作为内蒙古地区幼儿教育奠基时期的一所幼儿园，韩秀英可谓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元老之一了。

从1953年起，我区幼儿园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办园质量上，由于坚持向苏联学习，向国内先进地区学习，也有了较大的突破。多数幼儿园新建了标准的园舍，有宽敞的活动场地，光线充足的教室、卧室以及病儿隔离室。幼儿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为了便于蒙古族幼儿学习本民族语言，1953年，内蒙古第一幼儿园率先成立了3个蒙语幼儿班，韩秀英被指派专管这3个班的民族教育、教学工作。自此，在她的人生旅途上便开始了民族幼儿教育的生涯。

1955年，内蒙古教育厅决定建立一所蒙族幼儿园，委任韩秀英亲自做筹建工作。此时，韩秀英已是内蒙古第一幼儿园、内蒙古第二幼儿园和内蒙古第三幼儿园联合党支部的书记，她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责任感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面对当时经费不足等重重困难，她四处奔波，辗转筹措，并得到了内蒙古教育厅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因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一座全区唯一的蒙族幼儿园——内蒙古直属机关第四幼儿园便竣工告成了。

这是一所在当时建造比较标准的幼儿园。房屋设计较合理，幼儿教室也比较宽敞明亮，幼儿寝室舒适干净，并设有厨房、医务室，配有有益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设施和玩教具。

内蒙古第四幼儿园于1956年1月正式开学。面向蒙古族招生，

共成立了6个班，每班50多人，并配备两名保育员。同时，从乌兰浩特师范学校接收了4名毕业生充实了幼教队伍。当时，在“四幼”任教的大多数人蒙汉兼通，但也有只懂蒙语不会汉话的。为了办好这所民族幼儿园，提高自身的蒙语水平，1957年，韩秀英又到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翻译班学习了一年。

如何才能办好城市中的民族幼儿园？这对韩秀英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课题。她首先意识到培养一支合格而稳定的民族幼儿教师队伍的重要性。在当时，“四幼”现有的幼儿教师文化程度都偏低，有的从未受过专业训练，有的根本不懂教育学、心理学和卫生保健知识，技能技巧更差，有的无法组织孩子上课和活动，处于只看不教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韩秀英就一方面利用多种形式，譬如：脱产学习、短期集训、组织参观、加强实习等，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坚持在实践中学。她不仅组建了音乐、舞蹈、美工、语言、计算、体育等教研组，而且还发动群众搜集、翻译、编写蒙文教材，并研究这些材料的民族教学表达形式和方法。就这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逐步地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民族特点和幼儿年龄特点的教育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教学方法，从而，提高了民族幼儿教师的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同时，韩秀英还注意把握城市蒙族幼儿的特点，紧抓幼儿教育这个基本环节，以达到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扩大幼儿视野，开拓他们的思路，激发其求知欲望的目的。园内要想坚持用蒙语授课，就要面对有相当一批城市蒙族儿童不懂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如若脱离了这个实际，生硬地强迫这些儿童来接受他们感到陌生的语言，未必能有好的效果，甚至使之产生逆反心理，致使教学适得其反。对此，韩秀英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从单词、单句到会话、作业，把一整套语言教学方法都寓于日常生活和民族娱乐活动上，力求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逐步地让儿童



潜移默化地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教学实践，这所幼儿园的蒙古族儿童由浅入深地接受了本民族的语言和优良传统，熟悉了民族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教学效果甚为显著。

1960年，韩秀英到呼伦贝尔盟教育局初教科工作，兼任呼盟幼儿园园长。这一地区从农村到牧区，从城市到乡镇、旗县的幼教事业很不发达。不少儿童闲散在家，既不能解决家长从事工作、劳动的后顾之忧，也不能使儿童受到学前的启蒙教育。在此情况下，韩秀英在当地政府、妇联等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和当地妇联合作，一道深入到基层，从解放妇女劳动力的角度出发，动员组织了一批妇女由家庭里走了出来，干起了保育员的工作，并在旗县里先后办起了各种形式的幼儿园。为普及和发展该地区的幼儿园及幼教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61年，韩秀英又回到内蒙古第四幼儿园，继续担任园长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她把精力放在了培养和提拔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干部方面。当时，幼教战线的人才奇缺，几乎找不到现成的有教学和管理经验的民族幼儿干部。韩秀英首先从热爱党的民族幼儿教育事业的思想教育入手，把一些新进入幼教行业的年轻同志团结在组织的周围。这些同志在当时文化程度都不高，工作经验也比较少，有的才从初师毕业，刚出茅庐，涉世不深，根本不具备当领导的素质。韩秀英认为，在建立干部队伍中，决不能按照“等、靠、要”的思想行事。于是，她先做自己身边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从思想上提高对幼教工作的认识，让他们安心于幼教工作，热爱幼教工作。然后，在实践中有意识地、逐步地、有选择地给他们压担子，并给他们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提供锻炼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验，一些能胜任幼教工作的领导骨干便脱颖而出了。就这样，韩秀英在“四幼”期间即先后向组织推荐了9名幼儿园园长，1名托儿所所长。走上幼儿工

作领导岗位的这些同志在自治区民族幼教工作中都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

十年动乱时期，内蒙古自治区的幼儿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破坏，仅就呼和浩特教育部门办的7所幼儿园，即被砍掉3所。作为全区仅有的1所蒙古族幼儿园——第四幼儿园，也被取缔，同第二幼儿园合并。原有的6名师范毕业的骨干幼儿教师也陆续被调离和改行。原“四幼”园址也被有关部门强行挤占。韩秀英本人也经受了一场浩劫。但她始终认为，自己一生投身于党的民族幼教事业是正确的。她非但没有动摇了这个信念，反而更加增强了斗争的勇气。面对当时“四幼”的这种情状，韩秀英大胆地站出来，经过不停地交涉，硬性在“四幼”原来的教室里放了两个班，坚持教学活动，这才致使“四幼”园址未被完全并吞。

1970年，韩秀英到第二幼儿园（即与“四幼”合并后的“二幼”）当园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区幼儿教育事业经过调整、整顿得到了恢复和空前的发展，民族幼儿教育事业亦呈现了一派蓬勃生机。1979年，韩秀英不顾年老体衰，又主动出来为筹建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幼儿园四方劳碌，奔走求援。这座占地18亩、投资一百几十万元的幼儿园，经过韩秀英所做的大量具体而艰苦的工作，终于矗立起来了。

这是一座新型而标准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幼儿园，拥有一栋建筑面积4242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场地宽敞，设备配套。户外有多种体育活动玩具，室内有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幻灯机、钢琴和手风琴等娱乐和教学设施。全园有11个班，284名幼儿。其设施的先进，规模的庞大，配备的合理，都是呼市其他幼儿园所无可比拟的。

它的成立，得到了内蒙古、呼市两级领导的重视。在1982年6月举行的开园典礼上，布赫、王铎、王再天等领导人都前去祝辞，这又为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韩秀英同志从事民族幼教工作已经经历了40个寒暑春秋了。40年来，她一直坚守在党的幼教战线的前沿，曾以欣慰的心情享受过成功的果实，也以痛苦的目光凝视过事业的艰辛和挫折。在40年的工作实践中，她积累了一整套丰富而宝贵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为我区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并影响和带动了曾不安心于幼教工作的一茬又一茬的民族幼儿教师，使她们能够热爱本行，忠于职守。由于她在我区民族幼教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博得全区幼教战线上广大幼教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党和政府曾多次授予她荣誉并对她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1979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奖章一枚。

1980年12月，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发给她“在教育战线上勤奋工作30年”的光荣证书。

1983年5月28日，被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少年工作委员会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获得表彰证书。

1985年1月，被内蒙古教育厅、内蒙古民委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获得奖状。

1985年9月10日，被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授予从事教育工作30年以上，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光荣教育工作者”称号，并发给“30年教龄教育工作者荣誉纪念章”。

1988年10月21日，被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1989年1月30日，被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民族幼儿教育家”，获得荣誉证书，上写“辛勤从事幼教工作40余年，德高望重，成绩卓著”。与此同时，《呼和浩特晚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韩秀英同志现任呼市蒙古族幼儿园名誉园长，内蒙古幼教协会名誉会长、顾问。她虽年近古稀，功成名就，但仍旧精神矍铄，宝刀不老，还积极从事一些社会活动，继续在民族幼教工作中发挥着余热。

# 满族教育家舒乐知生平事记

富景华

舒乐知（1890——1958），字天民，笔名舍予。祖籍吉林省长白山，生于世宦家庭，属绥远城满洲八旗镶白头甲人。自幼习字读书，聪颖好学。十七岁就读绥远汉文高等专斋，因大考名列前茅，曾受贻葛大帅奖励。民国后开始教育生涯，尝任过绥远城和归绥县等地的几所小学的教员兼校长、归绥县教育局的督学员、伊盟札萨克旗王府秘书、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的训育主任及教员。1953年，出任过新城区分管教育的第三副区长。1955年，任内蒙古第一届政协委员和呼和浩特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他学识渊博，满腹经纶，知书达理，从清末到解放后，可称得上是绥远城的著名文人之一，也是一位德高望重、享誉全城的满族教育家。

## 一

舒氏的远祖因隶属旗籍，故从军后自康熙年间就从关东移居山西右玉。清嘉庆时，舒乐知的高祖又由右玉升任绥远城镶白旗骁骑校（系旗制六品武职官）。自此，舒氏家族落户绥远城满洲镶白旗头甲。

舒乐知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阴历五月十五日。是时，其祖父出任满洲镶黄旗头甲防御（系旗官五品），舒乐知即出生在该官署。翌年，其祖又升任该旗佐领（系旗制正四品武职官），他即随往佐领衙署居住。这一时期，其祖虽然官至四品，但享受年俸不上三百两，家中生计不甚宽裕，所幸年丰物贱，

尚可支持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舒乐知4岁时，就由其父教方块字，以识字为读书的起点，旋即念《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小儿语》等歌诀书和《四书》。7岁始，又拜在一位姓文名绪字绍亭的清代举人的门下。其间，只念了《千家诗》和《诗经》，后因故没有继续就读。回到家后，又跟着一位档案房（佐领办公处）的档案人临时念读。这一段，他又学了《论语》。

舒乐知10岁以后，家庭处于多事之秋。祖父、祖母相继去世，母亲犯了精神呆怔症，大姐又出阁。衙署内，两世三人，形影孤单，家境开始萧条冷落，他也就中断了念书。接着，新官上任，令舒家腾出所居的衙署，他们只得赁两间东厢房，暂且安身。没住一月，其母谢世。由于家道中落，学业也随之荒废。

到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父亲又娶了继室，家中也有人照管了。于是，他被送到表兄音秩斋先生所教的书房念书，还有一位吉兰吉先生任教，继续念《诗经》，并学对对联。其间，只念了几个月，就由于二位先生不合而辞职，造成了生徒的解散。书房关了门，他又回到家中。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举人合色贲先生组织一处私学房，他又被父亲送去受教。不久，合先生生病。由录事明秀先生代理教书。这期间，他每日背诵习字，念了《书经》和三本《幼学琼林》。是年，绥远城办起了军事教育，由绥远将军奏明皇帝，创设了一所武备学堂，调选八旗读过书的聪颖子弟入堂肄业。但由于他当时年纪尚小，不能扛枪，故未入选。

1904年（光绪三十年），其父又送他从回民曹先生读书。曹先生在教法上是全凭学生自己上进，他就每日自念生书，将《书经》念完后，又念《易经》、《孟子》，并旁听了先生给岁数大的学生讲解的《左传》、《东莱博议》。

1905（光绪三十一年），绥远城将军贻谷奏设绥远中学，亲自

挑选学生，舒乐知被选。自此，开始读满文兼读汉文，坚持了一年。在暑假考试上，他的汉文考取了第一名，并与满文脱离了关系。这个学堂还开设了蒙文、法文及德国操。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该学堂由山西省城聘请新学教员，照中央学制办起了新式教育。他又进了新成立的汉文高等专斋。当时，到专斋读书的都是被选上的高才生。舒乐知比其他同学岁数小，但却被指派为班长。在汉文高等专斋期间，他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知道了学问之博，宇宙之大，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举凡经史、词章、算术、性理，都经先生循循善诱，朝夕讲诵。在暑假大考时，他又名列前位，为貽藹帅所器重，给他奖励旗缺前锋，并戴上了六品蓝翎的顶戴。闾城之人没有不啧啧称羨的。在汉文高等专斋求学期间，他不但在功课上、学业上大有长进，而且，从师长身上的为人处事、品端学粹、轻财爱友诸方面，接受了熏陶化育。这为他一生如何做人奠定了基础。

## 二

1912年（民国元年），舒乐知自汉文高等专斋毕业后，就在绥远高等小学当校长兼教员，这是他教育生涯之始。

1915年（民国四年），在归绥县立第五国民学校任校长兼教员。

1916年（民国五年），任绥远城马队营街（新城元贞永街）高等小学校长兼教员。

1919年（民国八年），当归绥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正教员继充校长。

1925年（民国十四年），在归绥县教育局任视学（督学员），负责督察归绥县所属各小学的教学工作。

1927年（民国十六年）春季，教育厅委任庠耆隽为绥远区立职业学校（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前身，即今天的内蒙古农业

学校)校长期间,舒乐知被聘为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

1928年(民国十七年),由于当时大部分学生离校,库校长也辞职到了南京。舒乐知本人因性情孤耿,不事奔营,亦又来到绥远省立第二小学任国文、公民和书法教员,兼任六年级级任。这所小学是当时有名的模范小学,座落在新城东落凤街。该校成立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而舒乐知在该校历仅三年时,就来到这所学校任教,可谓是这所有着60多年校史的教师中的元老之一。在舒乐知任教时,正是张懿这名堪称办教育的老手出任校长,所以,老师们治教十分严谨,舒乐知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学识渊博、工作勤恳、诲人不倦的风范,深深地影响着学生。故,这个学校所开设的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成绩都很优异。

1937年,日寇入侵,绥远沦陷,国难当头。舒乐知因上有老母,下有子女,举家五口,难以为生。在这种情况下,又到归绥市第二小学任教员。

1942年,当农业中学教员。当时,因课程没有中国历史,舒乐知在每上国文及修身之时,乃乘机暗授历史知识,又令学生自修历史,以为国文之助。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领了绥远。同年10月,绥远省教育厅长潘秀仁决定恢复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任命杜尚礼先生担任该校校长。所以,舒乐知正是在此时被聘用的,他仍担任国文教员。

1946年,当忠恕小学教员。

1947年,又辗转到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直干至1953年。

### 三

舒乐知在备课时,始终都一丝不苟地写教案。教案一律用毛笔正楷书写。仅从他1953年3月遗存至今的一本教案来看,就足以说

明他治教的严谨态度。这本语文教案，随着时间的流逝，纸已泛黄，但其隽秀、工整的字迹，仍具吸引力，使人无不感到字如其人。它的内容十分详尽，不仅记录了所教的班级、时间、教学预备、教学题目、教学目的、教学过程、分析的篇目、段落重点、结构方法，还写下了问题讨论、所留课题。因而，迄今看来，这样的教案仍有价值。

他讲语文，在传导知识时，一如既往，从不打埋伏，对每一节课没有不倾囊相授的。尤其在古文方面，他的造诣颇深。他对《十三经》的精通谙熟，尤其对《易经》这部被近代中国视为天书的经典有研究，在师生中是备受钦羨和推崇的。他一讲起古文来，简直到了剖析入里、力透纸背的程度。吟诵时，更是音调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当时的学生，在舒乐知的教授下，对古文这门深奥难解，甚至感到枯燥乏味的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达到了听来忘倦的境地。凡聆听过他讲授的学生，有的至今还对舒先生的音容神态历历在目，对他分析过的古文记忆犹新。

舒乐知曾编写过油印的《古文选析》，在学生中辗转流传。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未能付梓，可惜文稿已经散佚。

他在为人师表方面，堪称楷模。因为他自幼熟读圣贤之书，深受儒家尚德重道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严格遵循“既读孔贤之书，必达周公之礼”的先哲条训；加之家庭礼仪的约束，所以，在言行举止上，特别循规蹈矩，正人正身。他不慕高官，不取非义之财，廉洁清白，为人方正，不饰穿着，生活十分俭朴。那时，学校的校址在南门外大台什村，距新城有八里路之遥，师生们全住校。舒乐知在每个星期往返时，都是步行。他在宿舍的行李虽然简单、朴素，但十分干净、整洁，这也对学生产生过良好的影响。由于渊博的知识和文士的气质使他有一种非凡的风度，但其中威严、庄重的部分，总是被微笑所冲淡。他待人十分诚挚、谦虚，平易近人，从不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人，



又不矜高自傲，所以，学校的教师、职员、学生以至炊事员、工友等，都对他十分敬重。但他又不是谄于世故的圆滑之人，是非曲直甚为分明。他总是鼓舞学生不断进取，而对有些行为偏轨、顽皮浮躁的学生，又常常利用授业解惑之时，潜移默化地规劝和诱导，从不姑息迁就。或在早晚自习上，主动到位，接触学生，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情况。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渗透着“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的理念，所以，他在学生中，又以严师而著称。

他还注意对青年教师言传身教，经常在业务上尽心竭力辅导他们，使他们得以较快的提高。

他除任教师外，还专门给报纸专栏拟号，编对子，写挽联。平民百姓中，凡遇起名，或逢年节及喜庆时需要办这类事时，都求到他的门下，舒乐知一贯有求必应，从无拒之。他对对联颇有研究。12岁时，他开始从师学习对联时，先生头一次出的对联题目为“水面蜻蜓舞”，他就能对出“江心蝴蝶飞”，显露出了一定的才华。加之他以后的广读博览，在对对联上，功底甚为深厚。

他还是一个诗人，擅长写作诗歌，聊以自娱。在他的《敝帚自珍集里》，收藏着他用毛笔书写的一些古体诗和打油诗，至今读来，仍具兴味和一定的欣赏价值。譬如，他的七言诗《秋思》：“书香日少案情多，奔走食衣可奈何！俗物俗人同嚼蜡，世间哪有自由歌。”写出了一个人读书人对当时社会的不平和所过的奔波劳碌生活的感慨。又如，他的一组打油诗也是愤世嫉俗之作。在“打油诗并序”中写道：“社会现象，驰骛不宁。究其根源，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名利牵人，有如羁绊。是非由此丛生，人群由此多故。因见街头纷纭扰攘之状，用作打油诗，以寄其慨。”在《洋车夫》中云：“祁寒盛暑侵皮肤，博得金钱济有无。愧煞世间纨绔辈，辛勤苦力洋车夫。”在《小杂货摊》中云：“糖果

零星小贩多，四方食品费搜罗。蝇头必较锱铢利，生计迫人可奈何？”在《苦力》中云：“手足胼胝作苦工，下层阶级多哀鸿。太仓安得千种粟？博济群黎焚溺中。”类似这样的诗，还有《卖菜佣》、《屠家》、《公务员》、《泥水匠》、《木匠》、《画匠》、《铁匠》、《钉鞋匠》、《钉盘匠》、《钉锅》、《修蒸笼》、《磨剪刀》、《挑水夫》、《抬粪夫》、《理发馆》、《成衣局》、《澡堂》、《女招待》、《妓馆》、《饭店》等。这些诗，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将眼光移向了社会底层。他为市井中从事形形色色行业的平民百姓画了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笔调诙谐，遣词恰切，寄予了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有的打油诗还是亲历即兴之作。譬如在《运动会漫兴》一组中有《跳绳》云：“翩翩姿态若飞鸿，手舞相兼足蹈功；旋绕一绳关技巧，聪明伶俐小学生。”还有《盲哑竞走》、《三足驰》、《夫妇竞走》等，都反映出了当时在学生中开展的各项运动的特点。至于其他的一些诗，如《戒子得一联》、《座右铭》、《冬夜不寐》、《穷不怕歌》、《送穷鬼文》等，都足以看出作者当时的生活足迹。他是用诗歌的形式反映现实，阐述人生，表白心迹，抒发情感。可惜，这些诗歌也都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未曾问世。

他的文章还有檄文、书信、代人拟函等。

在绥远城，舒乐知也以不入任何反动党团会道门而为人称道。尤其是一贯道这个旧中国的封建迷信会道门，在被反动派统治阶级利用后，曾在绥远进行过猖狂的反动活动，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编造谎言，诱骗人们入道。所以，当时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入了道，误入了圈套。就在人们纷纷举家入道的时候，舒乐知不受规劝利诱，坚决抵制加入一贯道，因之，还得罪了同族的亲友。

解放后，舒乐知先生将对新中国热爱的感情倾注在教学工作中。他在讲课时，结合所学课文对同学进行爱党、爱国的教育。使学生学习后，增强了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的感情，鼓励大家

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出力。他在讲授每一篇课文时，都确定了明确的教学目的，寓思想教育于分析文章中，使同学们获得了知识，也懂得了做人。

由于他在当时的知名度达到了绥远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作为本族，出于文人相敬，北京的满族作家老舍先生来呼和浩特时曾登门造访。

五十年代，当选为人民代表，并任新城区副区长等职。

1958年，舒乐知先生因患半身不遂，久治不愈而不幸谢世，享年68岁。

舒乐知先生一生读书从教，呕心沥血，可以称得上是绥远教育界的前贤。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直接接受他的教育和影响而成才的著名学者、画家、科学家、教育家、国家高级干部等，简直不乏其人。例如：关和璋（内蒙著名国画家）、孙英年（内蒙民革副主委）、佟树藩（科学工作者）、富象乾（内蒙古农牧学院教授）、马多善、齐寿康、白光远等。至于获得农艺师、畜牧师、兽医师、工程师等中级技术职称的同志更是数见不鲜。由此看来，舒乐知先生对绥远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 我区民族文献馆藏的奠基者

## ——王庆先生

娜 仁 杜 焯

当你迈进内蒙古图书馆蒙文部古籍书库的时候，首先跃入你眼帘的是那一排排整洁的书架和黄脆古香、风貌别致的古老民族图书。这些具有珍贵价值的稀有图书能整洁的树立在图书馆书架上，凝结着一位年过八旬高龄老人的心血和汗水，他就是内蒙古图书馆蒙文部退休副研究馆员王庆同志。王老现今 87 岁，是 1956 年由呼市政府调入内蒙古图书馆的，一直到 1987 年 8 月退休，在图书事业上整整工作了 31 个春秋。在长期的工作中，王老从来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为丰富内蒙古图书馆民族地方文献馆藏，为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老 1903 年出生于乌盟凉城县小召公社，8 岁时父母就把他送到七甲庙当喇嘛，让他学习藏文。王老从小爱学习，细心钻研，藏文的学习成绩非常好。18 岁时去镶红旗五苏木巴总管家又学习了满、蒙两种文字，蒙、满、藏文字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1929 年来到呼和浩特拜迎禧大喇嘛为师，并且担任了格斯贵职务（相当于秘书），同时兼任管各寺喇嘛印务处大格斯贵（相当秘书长职务）。在此期间，拜荣祥先生为师，学习古汉语。经过几年的苦学，王老的蒙、满、藏、汉四种文字达到很高的水平。王老于 1931 年开始参加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绥远通志馆蒙旗采访组翻译员、土默特旗高级国民学校校长，解放后曾担任过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蒙文秘书等职务。

## 不畏艰辛搜集民族文献

王老没有学过图书馆学，但他对图书馆事业无限地热爱。他曾说过：“图书馆是个知识的宝库，是向社会传播知识的源泉，是我增长知识的好大学。”所以王老来馆之后，对业务处处细心钻研，边学边用逐步提高业务能力。1956年王老根据内蒙古图书馆的实际需要，担任了搜集民族文化遗产的任务。当时王老53岁，每年春末下乡年底回来，足迹踏遍了七盟二市（当时的行政区划）的各个公社、牧区及寺庙。那时候的困难，现在人是难以想象的。如今已白发苍苍的王老忆起当年不胜感慨：“要说苦，也真苦，没有汽车、毛驴、骆驼，自己的两条腿，就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盛夏顶烈日，严冬抵寒风，还要御防野地里潜行的狼……”更令人感动的是，王老在古稀之年仍然不远万里，到青海省的塔尔寺去搜集藏文资料。经过王老等的艰辛劳动和努力，使内蒙古图书馆古旧蒙文图书资料由原来的100余册，增添到5000多册。还增添了3000多册满文古旧图书，1000多册经卷，其中有不少珍本、孤本。这些满、藏、蒙文古旧图书内容非常广泛，有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医药卫生、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天文地理、军事等等。

1956年9月开始，王老在哲盟奈曼等四个旗，搜集到的资料有《元史》、《清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唐朝故事》，蒙译小说有《麒麟送子会》、《全家福》，还有《西游记》、《薛丁山征西》各种翻译作品及参考资料、古训言、格言等，均装成木箱运回。12月王老又到了老家凉城县，把他过去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镶蓝旗总管阿凌阿，一位是镶红旗总管巴勒贡扎布）家里的藏书和其他几家熟人家里的古旧满蒙文书籍也都拿来了。这批书中清朝文献最多，其中有《资治通鉴纲目》、《大清律》、《清文汇书》、《东周列国》、《西汉书》、《西厢

记》、《金瓶梅》和其它满蒙汉三种文字的翻译参考资料。

1957年上半年因为搞“反右”斗争没有下乡，10月上旬王老和席立同志到阿拉善旗定远营，从那里骑骆驼下牧区走了一个多月。当中因路途生疏，在沙漠里度了一夜。后来他们几经周折到了额济纳旗。这次下乡收获虽然不如东部那么火，但《布谷鸟的故事》、《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以及《印度和西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文艺等方面的东西还是在东部地区找不到的。还有藏文语文学家丹德尔的全部著作二卷，更是难得。

1958年“五一”劳动节一过，王老就单人独马下乡搞搜集资料工作。在察右后旗的土木儿台、乌兰哈达、华庙子、伊和塔拉公社、阿贵庙、白音察干等地搜集到的资料有《满洲实录》、《明清历代皇帝在位年代表》、《满蒙文各省名称及历史简要》、《三国志》、《西游记》，藏文《天文学》等。以后到了巧尔齐庙（原属察右前旗，解放后属兴和县）。这个召是察哈尔右翼四旗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召庙，据说原来是察哈尔八旗的会盟所在地。这个召上的喇嘛人数到过八千人以上，原来有好几位活佛，现在都不在了，但藏经楼里的藏文资料完整无损，应有尽有。王老从其中选择了好多资料，雇了一头毛驴驮回集宁。后又到前旗的可可乌素庙（又名芦子庙）找到一些藏文珍贵资料，有藏文历史、语文学、医学等方面的书，运往集宁后连同以前搜集来的书一同运回内蒙古图书馆。

同年6月，王老又到四子王旗旧王府察干布拉格公社、乌兰哈达、什拉木利召等地找到藏文《罗桑苏臣全著》十卷。著者就是察哈尔正镶白旗察干乌拉庙的活佛，又名察哈尔格卜希。又到原四子王旗东西官府家里找到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理藩则例》、《蒙藏月刊》、《蒙藏旬刊》、《蒙藏周报》，以及其它翻译参考资料，如《英烈春秋》等小说好多种。又到什拉木利召（大庙）。因为这个召上的活佛和他的讲经师，王老原来就认

识，所以把他们的藏经楼打开，从其中也选择了好多珍贵资料，临走驮了一毛驴，最后经过乌兰花运回内蒙古图书馆。

7月回馆后王老又到达茂联合旗走了10多天，从贝勒庙等地搜集回来的资料有：《蒙古源流》、《蒙古秘史》、《蒙古贵族归属满清记略》、《水晶鉴》等。8月到了巴盟磴口（三胜公）、五原、临河、塔尔胡镇，从拉生庙找到一部分藏文资料后返回包头。把资料寄回图书馆，再坐汽车经过固阳县到中后联合旗所在地海流图准备下牧区。当时交通工具非常缺乏，王老向当地的新华书店借来拉车的骡子骑上，往返200里，到全金公社公安分局把过去的王爷林沁僧格的藏书全部拿到手，装了两麻袋带回海流图，装箱运了回来。这批资料大部分是手抄本，内容有《清史演义》、《还生录》、《升仙传》、《王公表传》，还有祝词、训言、格言等。

9月份回馆过了国庆节，又到了伊盟、郡王旗、扎萨克旗、乌审旗，最后到了杭锦旗。这次收获虽然不大，但是有些资料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如乌审旗格希克巴图老先生写的《古今宝史纲》，公呢召活佛写的《劝世诗集》，藏文《蒙古史》。医学方面的有木得格力希拉（珍珠首饰）、珠如古勒章（珊瑚项链）等，还有成吉思汗青史、黄史、白史和民间谚语，各种颂赞词、箴言、格言等珍贵资料。这次下乡，有两次王老只在早晨吃过半碗炒米饭就上路了，整天饿着肚子骑马赶路。

1959年上半年王老打听到呼伦贝尔盟扎赉特旗庆达牟呢庙有一部蒙文《丹珠经》225卷。《丹珠经》是佛教经典里的百科全书，内容非常丰富，内蒙古图书馆虽有两部，但全是藏文的，懂得人少，不如蒙文的适用，错过这个机会是不易再搞到了。于是，在6月份王老就直奔扎赉特旗的庆达牟呢庙。到了之后，王老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喇嘛们才同意把这部经送给内蒙古图书馆保存。当王老返回旗里正准备去取经之际，据旗领导同志和王老

说最近接到庙上的喇嘛来信，意思好像有点动摇。于是王老又去庙上给喇嘛们做思想工作，就这样往返二百余里跑了四五次，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最后才说妥。王老把早已准备好的30多个特制木箱用3辆马车拉至庙上，按照喇嘛们的意愿举行了送经仪式，才把经卷装入木箱运到旗里，后又包了一辆汽车运到泰来车站，再用火车运回图书馆里。这次搞这部经没有什么其它代价。喇嘛们提出要举行送经仪式，当时正在困难时期，供品灯油以及糖茶之类物品很缺。王老设法请求旗里商业部门给予特殊照顾解决了一部分，花钱不过100元，深得喇嘛们欢迎。这次请经所用包装费、运输费和王老的旅差费加在一起花销不过1000多元而已。

1960年5月，王老再次深入乌盟兴和县的巧尔齐庙，从活佛的藏书里又选择了一些有用的资料。返回集宁把资料寄回图书馆后，再骑马到察右前旗的白乃庙搜集到慈国师法语(章嘉佛)著作两卷，是蒙文的。还有其它蒙文资料。以后王老又骑马到原镶红旗政府所在地四苏木，从一位过去保管文史档案的同志家里找到了《察哈尔镶红旗地图》和该旗于庚子年给外国人赔款的帐簿等很有价值的资料。另外还有唐朝小说《薛礼征东》等和其它翻译参考资料。6月份返馆后又到卓资县境内的红召。这个召也是有名的大庙，原属四子王旗，解放后划归卓资县。因为打听到这个召上有东西，所以王老在旗下营下车后再坐马车到这个召上。这个召原来是个规模很大而且又很富足的召庙，现在衰败了，只有两个老喇嘛在看门，但藏经楼里的资料还是完整的。于是从其中选择一些有用的带回了图书馆。7月，王老又到集宁市郊区乌兰滩取回了一部藏文《甘珠经》，108卷，是明朝年间的刻本，是比较古老的版本。这部经原来是正红旗十苏木察干庙的经卷，因该庙已衰败不堪，所以这部经在一家老人家里保存。老人怕保存不好，愿意送给内蒙古图书馆保存。取经时依照当地老乡们的意愿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经仪式，同时给了三百元钱作为保管报酬。王老把



这部经运回图书馆后又到土默特旗二十四顷地天主堂张神父家取了一部分汉文资料。其中有一部四书是用丝制纸印的，还有其它古书约数十种。王老把书运回图书馆后，特制了一面锦旗给张神父寄去作为感谢，花钱不过十多元而已。

同年8月，王老又到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召找回来几种藏文手抄本，是比较珍贵的。其中有《佛教传入中国史》、《蒙古史》以及《佛教盛兴于西藏史》等。路过喇嘛洞召时，王老又从过去的活佛藏经库里取回很多珍贵资料，其中有《释尊圣传》、《西藏古代宗教上层名人传记》、《藏文歌集》、《青海志》、《五台山志》、《西宁塔尔寺志》、《佛教史》、《四大部洲史》、《南瞻部洲史》、《莲花僧法传》（一至五种）、《第七世达赖喇嘛传》等，最后由该召庙喇嘛用毛驴驮至毕克齐车站运回来，花钱不过三、四十元。

9月份王老和同事到了哲盟开鲁县，后又到奈曼旗，找到的资料有满蒙汉合璧《五经》、《四书》等古书，《胜禅会》（济公传）、《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集》等小说。以后又到了昭盟巴林左右旗，于10月下旬回馆。

1961年5月，王老和同事到巴盟中后联合旗海流图的席力哈达庙上取回一些藏文资料。

1962年4月，王老又到老家凉城县把那里小召荟安寺的一部藏文《甘珠经》108卷（北京版的珠字精装本）请来。给了三百元保管报酬费。

5月份，王老又和同事下到赤峰市喀拉沁旗、宁城县、巴林左右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地搜集资料各有收获，于7月份回馆。

10月份，内蒙古图书馆蒙文部正式成立了，当时的代主任是都格尔扎布同志，以下有胡格吉勒图同志、娜仁同志和王庆老师等四人。除了接待读者借阅图书等日常工作以外，还搞一些补修旧书籍和复制一些缺藏书籍工作，例如《水浒传》，图书馆原来没

有，于是从内蒙大学图书馆借来，上半部手抄下来，下半部是从内蒙语文研究所借来手抄下来的。最后还是缺一回，王老又辛苦地从汉文本翻译下来补齐了。又如《王公表传》全书120章，中缺第5章，都格尔扎布同志从满文翻译下来补上了。还补抄了《金史》、《辽史》、《世界名人传记》、《大唐万层楼》和其它历史小说之类书籍。还有1957年土默特旗政府西迁以前，把四书木刻版（满蒙汉）连装版的十几个大木箱全部赠送给内蒙古图书馆。现在在蒙文部大经架后边保存着。另有好几套四书也都赠送给图书馆。同年又从乌素图召法禧寺把《松巴堪布》全著一至八卷、《医学大全》一卷各复制三套收藏到图书馆。

1963年6月，王老经过锡盟贝子庙到正镶白旗察干散拉庙，把该庙活佛罗桑苏臣（察哈尔格卜希）全部著作的木刻版进行了整理。这部著作的木刻版因为平素管理不善都已散乱成堆，王老是应锡盟政协的请求去整理的。他同当地的几位老喇嘛在一起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把零散的几千块木刻版全部整理完毕，各归各号，打包上架，还为图书馆复制了该庙活佛自传一至七章约五六百页。

短短的八年工作，在交通条件颇差，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王老去了大大小小50多个地方，共搜集到珍贵的经卷、资料近百余种，这一切都体现了王老对图书馆事业赤诚执著的爱。1963年搜集资料工作告一段落，王老开始坐下来，带领蒙文部的同志，把一些搜集回来的书和资料进行修补、整理、编目、上架。使内蒙古图书馆的民族地方文献的馆藏面貌焕然一新，摘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这些文献至今都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许多国外专家学者来内蒙古图书馆进行考察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当我们捧起那一本本金色古香的古老民族图书时，都在追溯着王老为之而撒下的心血汗水和王老对它们的深切感情。这种品格和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年轻一代为民族振兴和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 年逾古稀 干劲不衰

图书馆的咨询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是为各种类型的读者提供方便解释问答的一项业务。搞这项工作不但要熟悉馆藏，而且还要具有渊博的有关书的知识。因为到馆内查找资料的人，有的能明确地提出他所需要的图书；有的只知资料名称和他所需要的内容，却不知在什么资料里；有的资料上找不到的人名、地点还要向工作人员提出询问，这些都是咨询工作范围内的事。被读者称为“活字典”的王庆老师，对蒙、满、藏文藏书情况了如指掌，有问必答。正象王老所说的那样：“图书馆工作人员不仅做好藏书建设，更重要的是掌握好图书内容和馆藏资料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同时也发挥出图书资料所起的作用。”1959年，以王老为首编制出第一部蒙文古籍馆藏目录，为揭示和利用馆藏，提供了依据，为读者提供了方便。1977年王老作为《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顾问，积极地参与了该项工作，使其得以顺利进行。不仅如此，王老还在1976年协助内蒙古科技局搞天文学普查工作，同有关单位的同志一起到五当召及北京、沈阳、大连等地区普查天文方面的资料，同时把图书馆蒙文天文学《三才图绘》和《步天歌》译成汉文。1980年冬季，王老又到土左旗协助整理满蒙文古旧档案，把蒙文《阿勒腾汉传》译成汉文。

光阴似箭催人老，这时的王老已经年过古稀了。再加上“文革”中身体又受到了摧残，有时对工作力不从心。馆里决定在工作上要求他量力而行，边休息边工作。可是，年迈的王老，还是像以前一样按时上下班，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决不迟到早退，严格要求自己。1984年王老患了阑尾炎进行了手术，由于年事已高，手术以后不能骑车上班了，王老不得不在家中休息，但是在休息的时间

里也没有忘记图书馆的工作，身体好一些就来为蒙文部的同志们解决一些业务上的难题，辅导一些业务知识等。蒙文部的同志也非常愿意接近王老，因为这位老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帮助同志耐心细致。对业务上的疑难问题认真讲解，一丝不苟。他积极热情地为区内外读者服务，经常把一些有求于他的热心读者邀到家中做耐心细致的解答，使读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王老在辅导业务知识的同时还经常向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表达自己热爱共产党的赤诚之心，教育和引导青年一代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做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王老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第四、五届委员。在每次政协召开会议的时候，王老都主动到图书馆问馆里有没有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好通过他在政协会议上呼吁、解决。这都体现了这位老人热爱图书馆事业的赤诚心情。王老没有忘记图书馆，虽然现在离职休息，但心还在图书事业上。王老的创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光辉业绩在内蒙古图书馆的历史上永远闪光。

# 回忆我的父亲——王裕民

王 丽 云

1990年6月5日，呼市有关方面在呼和浩特市展览馆为我父亲隆重举办了《王裕民先生遗墨展》。自治区及呼市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原自治区领导王再天、呼市副市长高延青、市文化局局长云才小为展览剪了彩。参观展览的群众络绎不绝，都对父亲的遗作赞不绝口，也为他的过早离去感叹惋惜。作为女儿的我，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无法抑制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下来。父亲已去世13年，至今还没被他的领导、朋友、学生和世人忘怀。父亲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十几年来，回想起父亲的为人谦逊、忠厚、诚挚、和善；回想起他风里来雨里去，风尘扑扑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工作的情景；回想起他对书法事业执著的追求；我心潮起伏，不能平静，随手写下这篇短文。

—

1916年，父亲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北高昌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家里祖祖辈辈靠种田扛活来维持生活。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很讨家人喜欢。为了满足父亲的求知欲望，爷爷想尽办法谋得在本村的一所学校里当校役，父亲才有机会求学。到父亲12岁那年，爷爷被学校辞掉校役差事，父亲也随之失学。这样，父亲只勉强读了四年书。由于生活所迫，以后父亲就到一家杂货铺当学徒。

“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了猖狂的侵华战争，父亲的家乡同样遭到了铁蹄的践踏。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杀人如割草，这时，父亲先后失去了母亲、伯父、堂兄、表哥等数位亲人。亲人的被害，使父亲稚嫩的心灵埋下了对敌人深深的仇恨。

父亲16岁那年，家里已无法生活下去，于是他背井离乡，独身一人来到了塞外的归绥城（即呼和浩特），经人介绍，在“济仁堂”药店当学徒。他学徒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工余特别偏爱书法、绘画。在学徒期间，白天干一天活，晚上带着满身的疲倦，提起笔来一练就是大半夜。在当时，这种学习是要犯铺规的，店老板发现了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钱买来的笔、书，就无情地投入火炉，还打他、骂他。倔强的父亲并不气馁，他把眼泪往肚里咽，咬紧牙关，重新开始攒钱买书。老板不让学，他将灯遮起来，到了深夜干脆把灯放进被窝里看书。他不管白天有多累，每天坚持写一百个大字，画三幅画，读十页书。他平时粗茶淡饭，节衣缩食，一支笔用得没了尖还要用，一张纸正面写完反面写。他终于攒钱买下了梦寐以求的《辞源》，爱不释手地把它包上书皮，小心翼翼地放起来，偷偷地查看，生怕店老板发现后付之一炬。父亲为了艺术的追求，忍受着心灵上的污辱，精神上的蹂躏和肉体上的痛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始终没有动摇他学书画的信念。

“岁月不负有心人，铁棒定能磨成针”。二十几岁的父亲在归绥已经小有名气，各商号请父亲写门牌、匾额的也越来越多，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这使父亲比什么都感到宽慰。这时的药店老板，看到父亲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也有助于店铺的声誉，便答应父亲在铺里当了司帐（记帐员）。

从此，父亲看书、学画，不用再躲躲藏藏了。他如鱼得水，惜时如金，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刻苦自学，既练书法，又练国画，虚心求教，博览群书，苦读春秋。虽然父亲那时在归绥已经

颇有名气，但他没有忘记：归绥还没有解放，千千万万的受苦大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积极靠近进步人士，1949年2月加入了归绥我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以经商做掩护，出生入死秘密往返于归绥市与解放区之间，为绥远省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绥远省解放后，父亲一方面有公开职业，一方面继续从事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交给的特殊工作，在“剿匪肃特”斗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前父亲就结识了不少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一起研究如何为解放事业做贡献的同时，共同探讨、切磋艺术技能，这使父亲在书法、绘画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到五十年代，他已经是呼市地区颇有威望、受人尊敬的书法家了。六十年代初，父亲的书法真、草、隶、篆已趋成熟，运用自如流畅。

书法是我国的传统艺术，我国历代书法家如众星闪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书法遗产。父亲在学习和继承这一遗产方面下了不少苦功，而且也花掉了不少的钱。记得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答应领到工资后给我们兄妹每人买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我们各自都经过细心的琢磨后将自己心爱的东西告诉了父亲，然后，天天盼，真可说是“盼星星盼月亮”了。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我们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可父亲书架上的书一个月比一个月多。我们很扫兴，但我们都很懂事，从来没有追问过这件事。我们心里明白，父亲是疼爱我们的，他答应我们的事是不会忘记的；只是他太爱书了，他对知识的追求胜过一切。后来，父亲亲手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小礼物，我们当时都很高兴。为了开阔眼界，博采众长，他一有钱就先去书店，看到好书、好帖便倾囊将它买了回来。他搜集购买了历代名人碑帖和众多名家精品，到“文革”前他的藏书已有几百册（套），特别是字帖，更是无以计数。他与这些书、帖朝夕相处，废寝忘食。他把苏东坡、黄山谷、褚遂良以及董其昌、郑板桥等著名书法家的佳作置于案头，细心

揣摩，临习不辍，然后融会诸体，自成一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称为“王体”。

1965年，应日本书法界的邀请，父亲的书法作品去日本展出。他的字端庄秀雅，娴熟自然，飘逸多姿，得到了国内外的的好评。呼市的各重要场所，各大影剧院都留下了父亲的墨迹。他所写的有关论述书法的文章多次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至今我还收藏着父亲未完成的《什么叫书法》、《试论书法中的“势”》等手稿。

父亲在旧社会饱尝了人间寒苦，对新中国充满了爱。他经常教诲我们，是共产党解救了我们一家，使我们这个穷得家徒四壁的家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鼓励我们要珍惜这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做贡献。父亲严格要求我们，同时，也为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他用自己的辛勤笔耕，描绘着呼市的文化艺术前景。1958年10月父亲和几位文化界的朋友商量，决定筹建“呼市美术公司”。经上级的批准和多方的努力，公司终于在1959年1月正式成立了，我父亲任主任。“呼市美术公司”的创建，在当时可以说是文化事业上的一个创举。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各自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为繁荣呼市的文化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9年，是我们的祖国建国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父亲同几位同志一起受上级委派，在当年正式建立了“呼市展览馆”，并任副馆长。由于筹办《建国十周年成就展览》时间紧迫，父亲和其他同志一起从早到晚，中午不休息，埋头苦干，经常通宵加班。那时我还不到9岁，每天盼着父亲能早一点回来同我们共吃晚饭，可一觉醒来，父亲的被窝仍是空空的。不知什么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脸上被轻轻一吻，我马上认定是父亲回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好多天没有和父亲一块吃饭，直到展览开幕。

父亲不为名，不为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再苦再累从来没



有半点怨言，他总是精力充沛，笑容满面，谈笑风生。

## 二

父亲虚心好学，能团结书画界的同道，一起切磋、探索，共同为振兴祖国传统艺术而努力。早在解放前，他就结识了郭笠农、冯中斋二位先生。郭老写一手好颜体，冯老的隶书很出色，他们二位的篆刻水平也很高，都是上追秦汉，下及明清诸家的，享名于归化城。到五十年代，和父亲交往的朋友就更多了。1957年，在市文化馆馆长周树钧和父亲的倡议与组织下，成立了呼市书法篆刻研究会，每周星期日下午在旧城北门的文化馆聚会。当时有郭笠农、冯中斋、杨鲁安、刘金铎、程子英、王力行等十几位同好参加。后来我听父亲说，大家都很谦虚，不逞能，不争席位，畅所欲言，共同欣赏古人名帖，品评书法篆刻作品，学习佳作，指出弊端，自得其乐。我记得五十年代后期，每到星期天下午，父亲总是很晚才回来，家人们等着他吃晚饭，饭菜热了又热，才把他盼回来。他曾对我讲，杨鲁安叔叔收藏碑帖善本很多，常拿到会上供大家鉴赏。杨叔叔曾得过天津名书家的传授，知识面很广，篆书、隶书都写得好。还有刘金铎叔叔，写颜体，骨力很强，受钱南园、华世奎影响很大。程子英叔叔，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又会画画、治印，是个多面手。王力行叔叔写的草书很漂亮，在内蒙电台工作，他为人正派，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分令人惋惜。五十年代后期，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市举办过两次“全市书法篆刻作品展览”。父亲的作品主要以行书为主，有时也写楷书，在展览大厅里，人们总是在父亲的作品前流连忘返。

## 三

父亲的学生很多，从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老人，只要有人向他求教，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从没有推辞过，也没有敷衍。

衍过。总是耐心地给予指点，怎么起笔，怎么收笔，如何掌握字的结构……对于他的学生，父亲不仅教他们学书，同时，也教他们如何做人。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父亲特别喜欢人才，一经发现，不惜任何代价，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扶持他们。杨耿、康新民、康庄、李瑞民等几位，都向父亲请教过，而受益最多的学生，要数“二康”。

康新民这位大师兄，父亲对他的关怀与厚爱是无微不至的。1971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呼市，经人介绍来向我父亲求教，父亲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他便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几乎天天来家一趟，与父亲有说不完的话。父亲耐心地教他写字，给他写好帖，研好墨。新民兄在书法理论和技巧上确实得到父亲的真传，学到的东西最多。父亲对他的疼爱胜过我们，犹如亲生儿子一般。记得有一年的秋天，父亲托人从巴盟买来河套甜瓜，正好那些天新民兄出差不在家，父亲将瓜拿出一半留了起来，谁也不让动，一直等了好长时间。等新民回来一进门，父亲就把瓜拿来给他吃，可因时间太长，瓜已经朽得不像样子了。新民兄看着这些朽瓜激动地说：“老师对我的恩爱，胜过父亲，瓜再朽也是老师的一片心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吃掉。”最使他感动是，那时他在呼市没家，他的战友在呼市工作的很多，父亲为了使他高兴，逢年过节让他把战友们请到我们家来，热闹一番。他的战友们看到父亲那样和善，拘束的心理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都像围着自己父亲一样，又说又笑，又吃又喝，简直高兴极了。父亲慈父般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他的品德与书风被世人尊为“一代宗师”。

再说康庄，他原是呼市水泥预制厂的木工。父亲发现他有天赋，肯用功，是个人才，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将他调到展览馆，后来又把他的妻子从集宁托人调回呼市。那时，我在兵团还没有调回。可父亲先想的是能为青城书坛延揽人才，而不是自己

孩子。康庄自己深有感触，他经常对人讲，在我的书法生涯中，蕴藏着王老师的许多心血，如果没有王老师，我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虽出身在书法世家，但在这远离家乡的青城，还是老师给了我学书有成的机会，是老师给我创造了学习的条件。

#### 四

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令人颤栗的十年。这场政治风暴给国家以及我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的父亲和所有老前辈一样没有躲过这场灾难。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满脸的愁容回到家。他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吃，什么也不说，没有了往日的热情，没有了往日的欢笑。我爬在父亲的身上望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不知说什么好。“爸爸，您怎么啦？不舒服？”父亲用他发热的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嘴唇抽搐了两下没有说话。这一夜父亲和母亲悄悄嘀咕着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见，只听见父亲不停的叹息声。第二天我来到学校，一进校门大吃一惊，校园里贴满了辱骂老师和校长的大字报，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不久，父亲被罢了职，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我也随之成了“黑七类”的子女。一天同学们告诉我，大街上贴着画你父亲的漫画。我听了后头“嗡”的一声，一口气跑到街上，看着那醒目的大字：“大特务、资本家、走资派、臭老九王裕民”。面对这一幅丑化父亲的漫画，心里真是难受万分。我怎会相信一生忠恳老实、为人和善的父亲，会是特务……这怎么可能？这决不是真的，我相信自己的父亲，也更了解自己的父亲！我真想一把将这些诬陷父亲的漫画撕下来，我越来越不能理解，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突然想到父亲还不知怎么样，便跑回了家，看到父亲平安的呆在家里，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放了下来。我猛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我只当无事一样，和姐姐们一起围着父

亲，逗他笑，让他开心。父亲一生受人尊敬，生性好强，如果知道了如此的诬蔑，会承受不住的。我天天往漫画那跑，盼着有一天能把它盖住。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对这些早已清楚，只是怕妻子和孩子为他担心，为他难过而不提罢了。我们大家都默默地、心甘情愿地自己承受着，承受着这些足以使一个强者垮倒的打击。街上所有父亲写的字都无情地被刮了下来，我家也被抄了，把父亲多年来积攒的最心爱的笔、墨、书、帖一扫而光。父亲一生把文房书籍视为生命，这些财富都是他几十年的心血，亲眼看着被人踩在脚下，一车一车拉走、毁掉，可想父亲当时的心情！他心痛地彻夜不眠，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下痛心的泪。就这，父亲为了不连累我们，还要我们与他划清界线，并让我们带着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用以表示子女造自己父亲的反。我理解父亲的心情，我相信父亲是好人，决不能在他流着血的心上再扎一刀。决不能！我甘心忍受一切冷落，一切诬蔑，决不做对不住他的事。

父亲的性格很内向，心里苦闷不爱向人吐露。从这以后，他更加郁郁寡欢，有时强打起精神来给我们开个玩笑，那极其勉强的笑容，看后更叫人心酸。

写字、画画对父亲来说比什么都痛快，都高兴。自他从事这一专业起，每天从上班写到下班，回了家吃完饭后，又伏身案头，沉醉在他自己的书画世界中。“文革”剥夺了他的这一权利，使他失去了那么宝贵的时间，也断送了他本来已经成就了的事业。从此只能在晚上才能拿起他心爱的笔。

父亲被揪出以后，每天必须去单位接受“改造”，任务就是干馆里的杂活：扫院子，拉排子车等。一次，父亲说是去拉木头，很晚了还没有回来，我们全家人都坐卧不安，我站在大门口默默地等着，等着我心爱的父亲，盼望他早早回来。父亲终于回来了，他是被人送回来的，原来父亲被滚下的圆木砸伤了脚，看着父亲满是鲜血的脚，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背着父亲偷偷掉下

了眼泪。这一夜，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们已经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太多太多的忍耐，似乎忍耐能使我们消除百灾，我们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什么？我也不知道。

几年之后，父亲恢复了部分工作，在展览馆库房当保管。工作中似乎没有什么可干的，然而，父亲一天忙个不停。他把几年来对工作的渴望和满身的热情都投入了进去，几个月下来，把库房翻个底朝天，对各种物品进行归类，各种颜料、笔、墨、纸都写上标签。他保管的财物从不浪费，从未发现广告色干了，不能用的现象。什么时候该进什么货，都有记载。进库、出库帐目清清楚楚，整个库房管理得井井有条。父亲一生朴素廉洁，他自己用的一个破旧卷柜，裱了又裱，上面用他那清秀的字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给人看去不显破旧，倒显漂亮。库里的东西应有尽有，可父亲从不往家带半点东西。库里的木料成方堆着，可我们家的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旧家具。最使人不能相信的是，在父亲去世后，他的学生竟然在家里找不出一张为他写挽联的宣纸来！了解自己的父亲，他追求的不是名利，盼望的也不是什么职务的恢复，他追求的是事业，盼望的是工作，只要能够工作，父亲就心满意足了。1971年父亲接受了一项筹备展览的工作。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逢人就说：“这次展览的文字说明都由我一人书写，我太高兴了，我终于能够写字了！”回到家里他嘴也合不拢，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讲这讲那，我们也同他一起欢笑，一起激动得掉泪。从此，我们这个沉默了几年的家，又开始充溢出欢快的笑声。写文字说明，这是展览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自己动手刷底色，然后再往裁好的纸条上写字。按理说，一个小说明条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只要字迹工整、清楚就行了，尤其像父亲这样一个书法家写个说明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他却不那么想，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不让一条说明里有败字。有的一条说明要写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从那以后，他白天在馆里写，晚上

拿回家写，每时每刻都在写。父亲拿着笔的手似乎永远不想再停下，恨不得把失去的光阴全补回来。父亲这种认真的态度，人人皆知。他不光对工作，对同志也是一样，他谦虚、勤学，从不以一个“书法家”自居。他虚心向人请教，甘当每一个人的学生。平时找上门让父亲写字的人很多，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脱。他从不惜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把每个字一笔一画地写好，稍有不妥，马上重写，写好每幅作品都是看了又看，反复推敲。他不光自己看，而且找来他的学生、朋友，将作品一张张摆在地上，同他们共同探讨，请他们评头品足，最后将他最满意的作品送给人家。

父亲这一生中写了多少字，用过多少笔、墨、纸，谁也无法估量。我也记不得，只记得从我懂事起，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字画的世界，满墙挂的是字和画，满地摆的还是字和画，这样的世界陪伴我度过近三个春秋。

和父亲交往的人都知道，父亲心胸开阔，平易近人，与事无争，与人无争。“文革”中有一些人不明真相，曾揪斗过父亲，他们也骂过、污辱过父亲，但父亲从不计较，更无报复之心。父亲恢复工作后，他们有的来家向父亲要墨迹，我见了他们心里很不高兴，真想将他们撵走，再给他一句：“我爸爸写的是‘黑字’，你不怕染黑了？”可父亲却是满面的笑容，和蔼的口气，不由分说，拿起笔来，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起来。父亲这种宽厚待人的风度，使他们深感内疚，连声道谢，不住赔礼，父亲那一面真诚的微笑原谅了他们的一切。过后，父亲还批评了我。人讲“心底无私天地宽”，看来确实如此。父亲以博大的胸怀，诚挚朴实的感情，结下了那么多的朋友，得到了数不清的友谊。

## 五

1976年，父亲参加了《建国三十周年成就展览》的筹备工

作。当时他已经有病在身，但不听医嘱，带病坚持工作。看到他一天天消瘦下来，我们一家人都为他担心。同志们曾多次劝他要多休息，少工作，但他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事，呆着也是呆着，我要加倍工作，以我这点能力，在有生之年多为党做贡献。”可病情不以父亲的意志所转移，父亲患的是癌症。不久父亲倒下了，在病榻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开始的病状是右胳膊剧烈疼痛，以后发展到下肢瘫痪。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以后能继续写字、画画，一直忍着痛坚持锻炼右臂，有时痛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心痛欲裂，由不住地劝他说：“爸爸，不要再锻炼了，您一定会好的。”但他一直不听劝阻，坚持锻炼直到去世前一天。记的父亲在手术前曾对大夫说：“大夫，你可断我三肢，只要能保住我的右臂就行了。”言语中留露出了他是多么渴望能重返工作岗位，再挥笔书坛。可世间对父亲太刻薄了，父亲没能如愿以偿，终因病情逐日恶化，于1977年11月29日凌晨不幸去世。

父亲远去已经十几年了，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我慈爱的父亲。我不知该用什么方法告诉他：“亲爱的爸爸，您瞑目吧，您为之努力奋斗的青城书画事业，正以您想象不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着。您的学生都已成材，成名，成家。现在有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有的是内蒙古书协副主席，有的是呼市书协主席。他们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区、全国以及国际的展出，赢得了荣誉。他们也象您在世一样，撒下了遍地的种子，相信这种子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结出丰硕的果实，青城书坛，后继有人，前景辉煌。爸爸，您安息吧！”

# 小记王静卿

图强

王静卿（1925—1988）艺名金艳楼，晋剧名小生。从艺五十余年，足迹遍布内蒙古西部地区 and 山西、张家口一带。她一生广结各地各剧种之名伶，相互切磋技艺。她精湛的表演艺术至今在广大的观众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广大观众，特别是呼市地区观众所喜爱的晋剧坤伶。

“哇……哇……”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山西省大同市阁老山村五羊馆家的破旧东房的烂窗户中传了出来，这一天是1925年8月11日，一个女婴降临到了苦难的人间。

五羊馆姓张，排行五，以放羊为生，人们称之为五羊馆。

一个原本就快要揭不开锅的人家，又增添了一个女婴，生活该怎么过呢？全家人的脸上都布满了愁云。女婴似乎知道自己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到张家，所以生下不多时，就睁开了她的那双小眼，望着她的家，她的亲人，不哭也不闹。母亲看着这个“懂事”的女婴，情不自禁地把她紧紧抱在怀中，把没有奶水的干瘪的奶头塞进女婴的嘴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一滴、一滴地落到女婴的脸上。

母亲是在哭自己的贫穷无能呢，还是在痛惜这个“懂事”的女儿呢？全家人都弄不清楚。不过，当母亲的泪眼和父亲的愁眼相对时，他们心里就已经决定下来：既然女儿降到人世，就一定要把她养大。

转眼之间，女婴4岁了。她脸上那永远浮现的笑容，给这个穷



困的家庭带来过不少欢乐，全家人都疼爱她。

也就是在这一年，大同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荒旱，地里颗粒不收，为了充饥，树皮和野蕒都被人吃光了。为了让全家人都疼爱的女儿能得到一条活命，父母亲忍着悲痛，把她“卖”给了她的远方姑母，从此，女儿改姓王，姑母家为她起了个名字——王静卿。

当时，姑母家的生活也并非富裕，全家人都依靠唱河北梆子的二姑娘王艳枝的戏份子维持生活，“买”王静卿，无非是让她有条活命的路。

旧社会的戏班有句名言：处处无家处处家。姑母全家跟随着二姐王艳枝所搭的班子到处流浪，此时，戏班正在归绥一带演出。

王艳枝所搭的戏班汇集了不少名家，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李桂云、筱香玲、白牡丹等都在一台演出。王静卿随着二姐常在戏台后玩耍，从小就受到这些名家的熏陶，和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常言说，“没娘的孩天照应”。虽然姑母全家对王静卿都很好，可她似乎已经知道寄人篱下应该怎么样生活，她的嘴很甜，在后台，整天姨姨、叔叔叫个不停，众人也非常疼爱这个懂事的小丫头。

二姐王艳枝最亲这个“妹妹”，同时，也是对她管的最严的人。闲下无事时，二姐常给她练功，压腿、踢腿、下腰、拿大顶……；有时二姐也叫她在戏中扮演一些娃娃生，象《明公断》中的春哥，《三娘教子》的英哥等等。小小年纪的王静卿在台上从不害怕，动作自如，因此，她更受到班里艺人的喜爱。

归绥一带的人不喜欢看河北梆子，河北人在此地做生意的并不多，王艳枝所在戏班因为观众稀少，已陷入困境，加之一些名伶都回到了河北，戏班更无法维持。为了生活，王艳枝只好改唱山西梆子，同时，把已经6岁的王静卿也带进了戏班。二姐王艳枝亲自教王静卿练功。在练功时，对她很是严厉。王静卿弄不懂

为什么疼爱她的二姐一上练功的地方竟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使她害怕的煞星。每天练功，小静卿都得哭几次，可二姐毫不理会。在练功之余，二姐口传手授地教了她几出小戏，如《小放牛》、《赐环》、《杀狗》等，每出戏的生、旦都让她学。几个月后，这些戏连词带动作以及唱腔、家伙点儿她一字不错的全能背演下来。

一年过去了，决定王静卿今后出路的一场演出即将开始了。二姐亲自为她化妆，穿行头，同时，悄悄地嘱咐她：不要心慌。话虽说出去，可二姐的心里却安定不下来，有谁能不担心呢？一个7岁的孩子就要登台演出《小放牛》，成败在此一举。

奇怪的是，观众竟然比往日多，几乎要满场了。当然，他们不是为唱戏《小放牛》而来，但这种气氛对小静卿来说，必将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呀。

锣鼓敲响了。二姐站在侧幕旁，手里攥着一把汗，心中蹦蹦直跳。王静卿终于出场了，小小牧童那俊俏的扮相，甜润的嗓音，清晰的吐字，迷人的韵调，加之那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奇迹般地抓住了观众，嘈杂的声音没有了，偌大的戏园子一下子静了下来，无数双眼睛直直地盯在戏台上的牧童身上……

成功了！当王静卿回到后台时，二姐扑上去紧紧地搂抱住她，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泪水，口中呐呐地说：“妹妹，你天生是一块唱戏的料呀。”

紧接着，她又连续演出了《赐环》、《杀狗》等折子戏，每次演出都得到了观众的赞扬。

二姐看着活泼的小静卿，心醉了。她觉得自己的眼力不差，辛苦也没有白下，小静卿登台的成功不就是对她最大的回报吗！为了把王静卿培养成一个优秀的演员，二姐省吃俭用，决定为她请师父。当王静卿10岁时，二姐先后为她请了“十二红”、“金铃红”、赵三伯（花脸）等，没有一位师父不被小静卿那聪颖、好学的精神所感动。他们尽其所能，精心地一招一式、一字一腔

地教。不上一年，她学会了《杀庙》、《杀府》、《空城计》、《桑园会》、《南阳关》、《五雷阵》、《斩十王》、《审人头》、《取成都》、《天水关》等十二三出戏。

王静卿12岁了，二姐亲自给她起了个艺名“金艳楼”，暗寓“金银要长有，艳丽永照人，艺上一层楼”之意。以须生的行当住进田文的戏班，进行锻炼。二姐要让她尽快地熟悉艺人的生活，决定让她离开自己，独立去闯一闯。这番苦心，小静卿当时怎会知道。她以为自己定做错了事，所以二姐不要她跟在身边。好在二姐说，在田文戏班认认真真地演几年戏，到时候再叫你回来，王静卿含着眼泪离开了二姐。

在田文的戏班里，她主演的《桑园会》、《斩郑文》、《取成都》等戏成了经常上演的剧目。当时的大红海报上，几乎张张都有“金艳楼”的名字，观众的掌声对这个12岁的坤伶给予了肯定。

不久，王静卿又住进了亢二等人的戏班，仍以须生为主，兼演旦行。经过两年半之久的锻炼，最后，王静卿又回到了二姐的身边，住进了以二姐为核心的家族班。在这期间，王静卿有幸先后结识了著名的晋剧艺人三女红（宋玉芬）、筱玉凤、露水珠、水上漂（王玉山）、卜花女等。

王静卿原本十分好学，碰上这些名家，等于上苍平白给了她一个学艺的机会。她那幼小的心灵在默默地祈祷：千万别叫这难得的机会轻易错过。因此，她每天除了练功、演出外，没事的时候，形影不离这些名家的身边，倒水沏茶，挥扇端饭，跑腿买烟。心诚则灵，这些高傲的名家终于被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诚意感动了，对她总算作到了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时甚至主动看她演戏，给她指点，亲自给她教戏、教唱。特别是当时已经名扬京津、晋绥的王玉山（水上漂）先生，除了经常指点传教外，还指名要这个小坤伶给他配戏，如《血手印》中的丫环，《王婆骂鸡》中的小旦等，这种无私提携后辈的精神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

常难得的。通过这些名家的教诲，王静卿不论从艺术，还是戏德都进一步的提高，技艺有了明显的长进，这为她日后走上晋剧名家之路奠定了基础。

1941年到1943年间，王静卿随二姐在大同、丰镇、归绥、包头一带演出，先后与任翠凤、冀素梅、筱金玺、苏玉兰、金小霞、王治安（凤凰旦）、丁跃辰、金铃黑等人同台合作演出。

在和上述名家同台演出时，为了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王静卿几乎是什么行当都上，须生、青衣、小旦、小生，甚至还演三花脸。不论她演什么行当，让人都觉得非常称职。无怪同行们说：

“梨园行中，金艳楼除了花脸外，是行行精通，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

日月如梭，王静卿已经18岁了。旧社会女艺员通常的遭遇也没有让她逃脱，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看上了她，要娶她作侧室。

王静卿是多么不愿意啊。她怕那个人，她更舍不得离开舞台，离开二姐，离开她的同行姐妹。可是，在那种社会里，又有什么人能伸出有力的手去援救她呢？她是一个弱女子，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唱戏的；她无力抗争，只有挥泪告别了舞台。

终于盼到了解放，王静卿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离开了那个人，她身上的枷锁终于被解脱了。

1952年，她应邀参加了包头市寒风剧团，满怀喜悦地又登上了她告别了7年之久的舞台。她与孔月琴、崔吉先、范巧珍、刘武华、陈贵等同台演出，依然不减当年风采。

1953年，王静卿受忻县贾桂林（艺名小电灯）剧团的重金聘请，前往忻县。当她路经呼市看望她二姐时，康翠玲同志邀她在呼市与自己搭档演出。在康翠玲同志的真诚挽留下，王静卿婉言谢绝了忻县的邀请，在呼市留了下来，与康翠玲合作。从此，她再没有离开呼市。

王静卿体态修长，姿色俊美，扮出戏来更是艳若桃李，貌比

天仙。多年来，她与康翠玲搭档演出的生旦戏，倍受同行、观众的赞赏。她与康翠玲被人们称作是呼市晋剧舞台上的两颗迷人的名星。她与康翠玲合作演出的《西厢记》、《春香传》二剧，更是脍炙人口。

由于她功底扎实，体貌俱佳，故扮演的张珙、李梦龙显得飘逸潇洒，稳准规范。她那风流、儒雅、痴情专一的表演，倾倒了广大观众。据说当时有一女青年，在看了王静卿扮演的小生戏后，爱慕得神魂颠倒，大有非君不嫁之意。但此事又无法说出口，便久思成疾，卧病在床。王静卿得知此事后，亲自到这女青年家说明真相，可女青年不相信舞台的小生是眼前的女人。王静卿无奈，只好请她与母亲到剧场看戏。开戏前把她母女邀到后台，王静卿已穿戴整齐，面对女青年又脱去服装，抖露出秀发，这才使女青年大梦醒来。由此可见，王静卿扮演的生角是多么有魅力。

王静卿嗓音虽不宏亮，却非常柔丽，唱起来有一种“清云遮月的阴柔之美。她吐字清晰，行腔婉转，腔出落拓细微，逼真传神”（摘邓孝明《王静卿传》）。在演出中，她和扮演莺莺、春香的康翠玲配合默契，天衣无缝，真可谓是“珠联璧合”。

从和康翠玲同志搭档演出的那天起，多少年来，王静卿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报酬。在演出中，每遇演员短缺，她便主动请缨救驾。正如康翠玲同志在怀念王静卿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团内，几乎没有她没有演出过的行当，因此，她被全团尊称为‘大救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自治区戏曲汇演。各观摩团的同行对呼市代表团演出《小宴》一剧中扮演家院的演员颇感兴趣，小家院那俊美的扮相，认真、讲究的演出，使代表们赞不绝口。但是，当他们得知扮演小家院的这位演员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小生、名扬区内外的张珙、李梦龙的扮演者王静卿时，都惊呆了。代表们从心里佩服这位戏德高尚的演员。评委们一致认为，象王静卿这样在全区文艺汇演中获过奖的名演员，能放下架子甘与人

配戏演小角色，实属难得，为此，一致评她为演员奖。

在呼市地区多年来，她与康翠玲配戏，前后演出过近百出新、老剧目：《西施》、《西厢记》、《春香传》、《孟姜女》、《白玉楼》、《百花台》、《陈三两》等传统剧目及现代戏《夺印》、《箭杆河边》、《巴林怒火》、《红霞》、《江姐》、《红色的种子》等。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她都精雕细琢，以演出人物性格为乐事，因此演出后不同凡响，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繁荣呼市地区晋剧艺术，付出了全部艺术才华。她的名字被列入呼市晋剧界十大演员之中。

党和政府对她在艺术上的奉献给予了肯定，从1958年起，她先后被选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十年浩劫，王静卿身体致残，使得她不得不在七十年代初就退出戏曲舞台。1986年，呼市文化局筹建了局属艺术顾问委员会，她又被聘为艺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受聘后，虽然身体不好，但每逢例会，风雨无阻。为呼市文艺的发展、壮大，她无私地献计献策。她打算把自己年轻时的看门戏《俞伯牙抚琴》整理出来，供青年演员学习。可惜的是，当这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时，1988年秋，死神夺走了她的生命。

纵观王静卿的一生，坎坷的生活常随其左右，但从未动摇过她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可以说她把毕生的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晋剧事业。

1988年11月1日，呼市文化局为她召开了追悼会，文化局局长云才小同志在悼词中念到：“……王静卿同志的突然病逝，使我们呼市失去了一位戏德纯正的晋剧名老艺人，我们的心情是沉痛的。坎坷多难的王静卿为呼市晋剧所做出的业绩，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盖棺定论”，王静卿带着人民给予她的公正评价永远离开了我们。

## 梨园全才“小梅梅”

——记晋剧著名演员亢金锐

巴·敖特根

1986年，金秋时节的塞外青城。

在自治区首府大型剧场——乌兰恰特，此刻正在举行由呼市文化局主办的“呼和浩特地区首届《昭君杯》戏剧、歌舞大奖赛”发奖仪式。

在雷鸣般地掌声中，本届大赛的导演桂冠摘取者款款地走上了领奖台。她接过获奖证书，转过身，向座无虚席的剧场大厅深深地鞠了一躬。这里有她的前辈，有支持、帮助过她的新、老领导，有和她同龄的姐妹兄弟，也有她的学生。她此刻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掌声停了下来，人们带着钦佩、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她，整个剧场静极了。

“我……我谢谢大家。”当这几个字从这位刚毅女性的口中轻轻地吐出来后，“轰”的一声，掌声又响了起来。这个受人尊敬的女性就是著名的晋剧表演艺术家亢金锐同志。

说起“亢金锐”这三个字，有些人是不大了解的，但提起亢金锐的另一个名字——“小梅梅”，在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及张家口、山西一带，她的同龄人以及那些晋剧爱好者是无人不晓的。

此时此刻，她在年过半百、离开舞台多年、又是病残身体的

状况下，竟然摘取了“导演”的桂冠，人们又怎么能对她不肃然起敬呢……

—

1935年初春的一天，在绥远省土默特旗察素齐镇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降生了一个女婴。“添丁增福”，这原本是件喜事。可是，在这个子女众多的贫寒之家，她却成了负担。父母亲实在无力再承受一个婴儿的压力，所以，在女婴出生尚未满月，他们就忍痛把这个女婴送给了当时在梨园界已享有盛名的北路梆子须生演员宋玉芬（艺名三女红）。从此，她就生活在一个梨园世家里，从而也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养母宋玉芬，幼时饱尝贫苦生活的滋味。她成名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补回她童年从未得到过的幸福。现在，她有了女儿，她要把她所有想要实现的愿望，真实地体现在自己养女身上。

养父李松山，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须生演员，艺名叫“十八红”。他为人性格和善，行事仗义，在戏班里很有人缘。他非常同情宋玉芬的身世，自愿当了宋玉芬的招女婿，和岳母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也很喜爱这个女婴，闲暇无事时，他总是抱着这个女婴。

作为隔辈人的外婆，更是喜欢她。自从有了这个外孙女，外婆脸上永远浮现着慈祥的微笑。

在这个家里，同时还生活着宋玉芬的妹妹宋翠凤和妹夫“鱼儿生”。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梨园之家。全家人整天忙于演出、“倒台”。这个女婴的出现，给他们全家带来了欢乐，小女婴生活在这个“爱”的环境里，真可说是她的福气。

小女婴的“牙牙学语”和“蹒跚迈步”，都是在戏班的“后台”开始的。常言道，“近朱者赤”，在戏班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也必然会对戏班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个小女婴当然也



不例外，从她懂事儿的时候起，她就喜欢后台的一切：化妆的神秘、穿行头的匆忙、赶场的紧张……甚至后台的吵闹在她看来都是一种享受。每当她哭闹不停时，能够让她安静下来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养父、养母或姨姨、姨夫哼上几句“乱弹”，女婴只要听到这声音，便立即安静下来。慢慢地除了睡觉、吃饭外，余时她便后台嬉闹，耳濡目染，有时竟然也情不自禁地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哼上几句“乱弹”，或者做上几个“身段”。看到这个样儿，无人不说她是一块学戏的“料”。

女儿如此眷恋戏班，养母宋玉芬不高兴了。她不愿意自己喜爱的养女步她的后尘，坠入梨园。因为养母从自身的经历深深感到，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女伶走的路该是多么地艰难，除了受世俗偏见的压力，更有的横加在她们身上的凌辱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决不能叫养女学戏，应该叫她走另一条路……养母已打定了主意。

养女不足7岁，宋玉芬就把她送进了私塾坊。让女孩子上学，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何况，她还是一个“戏子”的女儿。先生满足了宋玉芬的要求，破例收下了这个女学生，并且给她起了个学名：宋林梅。

林梅年纪虽小，但她知道一个女孩子进私塾坊是多么不容易。所以，她念书非常刻苦，她的聪明和这股犟劲已深深得到了先生的欢心。不长的时间，她便能流利地背诵《百家姓》、《千字文》了。

由于林梅对戏剧有一种偏爱，所以在读书之余，仍然悄悄地跑到后台，看化妆，看演出。宋玉芬虽然不想让她和戏班沾边，可她疼爱女儿，舍不得说她一句硬话，见她跑到后台玩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去管她。其他艺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就大胆起来，当着宋玉芬的面给她说戏玩；有时，趁宋玉芬不上台的机会，也给小林梅化上妆，让她上台演一些小角色，如《明公断》

剧中的冬哥、春妹等。

宋玉芬常年随戏班四出唱戏，把女儿留在家中一来舍不得，二来也不放心，又看到她对戏剧特别喜爱，加之她具备了学戏的各种条件，作为名伶的宋玉芬，心里不是不清楚的。养母只能暗暗地叹息：这孩子是戏班中的人，这是命哪！

小林梅上学未满两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便辍学跟戏班四处飘荡了。这样一来，她无形中便成了戏班里的一员。养母上台时，她紧紧地跟随在身后，每当养母想喝水时，一回头，小林梅总是把水端了过来。养母下妆时，她帮忙给脱靴子、包靴包，看着她那熟练的劲儿，真不亚于一个“货真价实”的“跟包”。

养母见小林梅如此爱唱戏，便一改初衷，让她正式学了戏。

## 二

在旧社会，人们流传着“打戏”一说。“打戏”，也就是指学戏的小孩子是在棍棒抽打下才能学成的意思。既然小林梅已正式学了戏，那么她也脱不了“打”这一关的。

学戏开头的几天，小林梅惊奇地发现，养母那慈祥的面孔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则是整天扳着脸，好象在跟谁生气似的。

早上，天还未亮，养母便把她从热被窝里叫起来，亲自督促她喊嗓、练功。踢腿，一踢就是几百下。接着是扳腿，小林梅躺在地上，养母扳起她的一条腿，硬是把脚尖往她脸上扳。拿大顶，一开始养母念5个数，接着10个、20个数，一直到拿一柱香。每一项功，养母对她都没有丝毫地放松。到了这时，小林梅才知道，学戏原来是这么苦。每天早上练功时，腰、腿疼得她都要哭几次，她多么希望自己的泪水能把养母的心哭软，好使扳腿时轻一点，拿顶时耗的时间短一些……可谁知，她越哭，养母对她越严厉，甚至藤条也上了身。小林梅看见哭并不能替她减轻一些疼痛，干脆不哭了。练功时，尽管浑身疼得是汗，可她紧紧咬住嘴

唇，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就是不落下来。看到小林梅的这股倔强劲儿，养母满意了。是呀，“不受苦中苦，怎为人上人？”不这样严厉地要求她练功，日后又怎么能让她在舞台上站住脚呢？

转眼之间，几个月过去了，小林梅的腰、腿也不疼了。养母在给她练功之余，又亲自给她说戏。开门戏挑的是《韩琪杀庙》，这是《明公断》戏里的一折，养母叫她学韩琪。《杀庙》虽只是一折，但它是须生行当的功底儿戏，因为剧中的韩琪，唱、念、做功都很重。养母挑这出戏，目的是以戏带功，所以在说戏时，韩琪的每一句唱腔，每一句道白，每一个身段都要林梅几遍、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地练。山膀一拉就是半小时，朝天蹬一扳就是一柱香……戏终于说完了，小林梅学得非常踏实，几乎没有走样。《韩琪杀庙》上演了，每当演到韩琪自刎时，小林梅把那一连串的动作做得干净利索。撩髯、拔刀、抬腿把腰刀在靴底儿上磨几下，然后将刀横在颈部，猛一转身“硬僵尸”倒地。行家们看完后都说，这个小丫头演的韩琪得了“三女红”的真传。

《韩琪杀庙》演出后，养母又为她选教了《游龙戏凤》。这也是一出须生戏，林梅学演正德皇上。这出戏和《杀庙》不同，《杀庙》的韩琪是寄人府中的一介武夫，受人恩惠，为人侠义，在不能报恩，也不能妄杀无辜的情况下，只能拔刀自刎了事。而《游龙戏凤》里的正德皇上，却是一言九鼎，风流飘逸的一国之主。演正德的演员既要演出正德皇上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主子身份，又要演出他贪婪女色的不光彩的一面，界限是不大好把握的。小林梅虽然对《游龙戏凤》的内容不太了解，但她能维妙维肖地学养母教的那种神态，把个正德皇上给演活了。从宋玉芬给林梅选教的这两出戏就不难看出她的苦心：要么不让她学戏，要学戏就一定要让她学得比别人好。

身为挂牌演员的养母，演出的担子是非常重的。她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身体都不允许长期教女儿练功。为了更好地培养爱女，

再三筛选，重礼为小林梅聘请了师傅，并正式举行了拜师大礼。师傅叫王殿奎，本行是个唱二花脸的艺人。王老师在每天的教功中，严厉劲儿超过了宋玉芬，一个早上下来，小林梅总要出七八身汗。经过养母那几个月的练功，林梅已习惯了这种严厉的练功方法。

根据林梅的嗓音条件、扮相、功底儿，王老师一招一式地给她说了《小放牛》，并在该剧中给她安排了各种基本功：三起三落朝天蹬、元宝顶、前后跷、矮子步等等。一出《小放牛》，等于她练一遍基本功，各种动作她做得都非常自如。在说戏过程中，哪怕是一个小动作，她都要儿遍、几十遍地去琢磨。她的这股劲儿引起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玉山先生（艺名水上漂）的注意，他破例亲自给小林梅说戏，不厌其烦地给她做示范，并且叫自己的女儿王巧云和她一起排练。《小放牛》演出时，把场的人就有三个：王老师、王玉山先生、养母宋玉芬。观众无不被牧童那俊美的扮相，娴熟的基本功，优雅动听的嗓音所倾倒。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林梅在学戏过程中的“福气”是不小的，小小的女孩竟然受过不少名家的指点。老花女子为她排练了《布换花》、《游花园》，并且让她和自己的女儿合排合演。在林梅学戏的过程中，养母宋玉芬有意识地让她什么都学，生、旦、末、丑，没有一行她没有学过，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她博采众长，使戏路子宽。最后，养母在众多的行当中为爱女选中了一个——花旦。

小林梅定了行当后，养母先请了“金斗旦”给她说青衣戏，如《永寿庵》、《贺后骂殿》、《断桥》等，接着又请了“顾老旦”给她说《卖人鱼》、《蝴蝶杯》等小旦戏。老师们喜爱这个女弟子，教得都很认真。女弟子天性聪慧，边学边琢磨，这就使得小林梅的技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提高。

为了叫自己的女儿在艺术上有更大的收益，宋玉芬最后为林

梅聘请了名丑孟长荣做师傅。孟长荣从不教女弟子，可这次在宋玉芬的恳求下，看了林梅演的《杀庙》、《小放牛》，接着又看了林梅练功，终于破例爽快地收下了这个女弟子。孟长荣先生早年毕业于张家口黄德胜科班，其人品刚直，技艺超群，很受同行的敬仰。孟先生虽功于丑行，但生、旦、净、末也无一不精。受此名师指点，小林梅可谓缘分不浅。

此时的林梅虽然已经登台演出，并博得一些好评，可孟先生对此却不买帐，他要林梅一切从头开始。每天清晨，孟先生手提藤条坐在椅子上，监督林梅调嗓、拿顶、下腰、踢腿、扳腿、起霸、趟马、圆场、前后跷等等。练完后也就到中午了。练功时，林梅稍一偷懒或做得不合先生的意，先生手上的藤条便挥动起来。经过3个多月的严酷训练，孟先生便开始教戏，先传授了小旦的开门戏《喜荣归》，随后又教了刀马旦戏《辛安驿》、《铁弓缘》、《破洪州》等。这儿出戏下来，使林梅的技艺更趋成熟，基本功也更加扎实、正规，为她后来的成名打下了基础。

### 三

小林梅随养母不管走哪个戏班，都受到前台管事的喜爱。用行家的话来说，她是戏班的“忙来用”。在演出时，临时缺了角色，不管是青衣、刀马、小旦，还是小生、须生，甚至是丑行，小林梅都能立即顶补上去。而且，她不论演什么角色，什么行当，都象是在演她的本行。

她年龄虽小，但与大人们配戏，甚至与名家配戏，从不怯场，无论和谁配戏，都配合得非常默契。说到这儿，老戏迷们恐怕还记得她小时候和养母宋玉芬合演的一出戏《坐楼杀院》。在这出戏里，养母宋玉芬扮演及时雨宋公明，而她，则扮演阎婆惜之母——老鸨儿。这个角色是由彩旦扮演的，每当演到老鸨儿生气时，剧中要求扮演老鸨儿的演员有一个动作：就是双腿往高一蹦，双

手抱膝盘腿坐到椅子上。她由于年纪小，身材矮得和椅子高低差不多，很难蹦上椅子。演到这时，有人站到幕条后面双手抱住她的腰往上提一下，她便借力往椅子上蹦坐，双腿一盘，两手抱膝，小嘴一撇，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活生生现出一副刁钻老鸨儿生气的模样。每当这时，观众无不鼓掌称快。

她演《游龙戏凤》、《赐环》的正德皇上和王允时，一字一腔，把养母的韵调学得分毫不差，如果观众闭上眼睛去听她的“乱弹”，无不以为是“三女红”在唱，每唱到高潮时也必得掌声。演出的时间一长，观众知道了她是“三女红”的闺女小林梅，便都亲切地称她为“小梅梅”。以后，“小梅梅”这三个字，作为她的艺名一直流传在晋绥一带。

1949年初，小林梅随父亲到了包头，住进了刘玉文领的戏班。在这个戏班里，她和金玺、武彩凤、郭全福、筱桂莲等同台配戏演出了《日月图》、《打金枝》、《坐楼杀院》等。她的名字也和这些演员一起上了大红海报。也就是在这个戏班里，她第一次和康翠玲见面，并一块配戏。从这儿起，她便和比她大几岁的康翠玲结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

在包头呆了仅几个月，养母不幸患病，她只好同养母再次回到归绥（呼市）。回归绥后，为了生计，她又和王云楼（须生）、郭秀云（青衣，艺名筱金玺）、筱桂兰等联合演出。演出的剧目有：《万花船》、《王花买父》、《双头驴》等。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她随养母参加了由艺人们共同组合的“共和班”，和康翠玲正式合作。转眼四十年过去，她二人从未分离过。

她虽然比康翠玲小几岁，但她们志趣相同，行当一样，所以她们说话很投机，遂成莫逆。由于她年轻气盛，在和康翠玲配戏同台演出时，两人互不相让，在舞台上争奇斗艳。这种在艺术上的竞争无疑给她们的技艺提高起了促进作用，更使她得益非

浅。

之后，她又接了康翠玲主演的一些剧目。在这些剧目的演出中，她与康翠玲各有特色，从而也就形成了她们二人“在舞台上 是竞争对手，在舞台下情同姐妹”。这种情感，她们一直保持至今。

戏剧团体历来都是以主要演员为核心的。小林梅和康翠玲都是十大几岁的年轻人，极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当然在艺术上她们也不会是保守的。在康翠玲和她的带动下，共和班在1950年大量上演了一些从解放区传过来的新剧目和由陶然先生改编、创作的新的传统剧目，如《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孟姜女》、《相思树》等。在上述剧目中，她和康翠玲有时同台配戏演出，有时则前后扮演同一个角色。无论在演出中还是在生活中，康翠玲总是象一位大姐姐似的关照她；而她，也非常尊敬这位大姐姐。

#### 四

1951年，新绥剧社到包头巡回演出，此时的亢金锐，已经名列该剧社的台柱之中，由她主演的剧目有《嫦娥奔月》、《白兔记》、《荷珠配》等。她善于按照自己的特点去进行表演，不论是演正剧、悲剧，还是演喜剧，她都成功地演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时，她才16岁。

1954年，山西省在太原市举办了首届全省戏剧汇演，剧社安排了她前往太原观摩。这是一次使她大开眼界的机会。太原之行，她第一次领略了晋剧大王丁果仙，以及牛桂英、狮子黑、程玉英、冀美莲、郭凤英等名家的精湛技艺。通过这次观摩，使她在艺术、思想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当她从太原返回呼市时，恰逢内蒙戏改组进入剧社，开展“改制、改人、改戏”的三改工作。同年，戏改工作组为剧社排

练了新编传统戏《西厢记》。因为这出戏是作为“三改”工作的试点戏，所以演员安排十分慎重。该剧由康翠玲扮演崔莺莺，她扮演红娘，王静卿扮演张珙，金玉玺扮演老夫人，演员阵容十分可观。在戏改组的帮助下，亢金锐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该剧上演后，深得行家和观众的好评。

此后，她和康翠玲同台演出了《刘海戏金蟾》、《新牛郎织女》，和王静卿配合演出了《西施》、《百花台》等。

1957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的全区戏剧汇演中，她以《小宴》一剧中的貂蝉，荣获全区汇演演员一等奖。在演出中，亢金锐运用了自己的功力和必要的技巧，把一个美丽聪慧、忧国忧民的古代侠女演得入情入理，使同行们赞不绝口。

随后，除了演一些新编传统戏外，她还积极推动排练了不少现代戏，如《红色的种子》、《红霞》、《草原烽火》、《漳河湾》等。和演传统戏一样，在现代戏中，她也是不分行当，不分角色，需要什么便演什么。不管是主要角色还是一般角色，都能演得恰到好处，为整个戏增添了不少光彩，成了观众越来越喜爱的演员。

她已经功成名就了，鲜花、掌声、荣誉在簇拥着她。可是，她还是原来的她。每日清晨，依然是灯笼裤、板带，和学生们一起练功，依然是一练就是几身汗水。她既是学生的老师，又是他们的“大姐姐”。她理解学生，关心学生，同时也尊重学生。所以学生不管有什么事情，都愿找她商量，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在梨园界是罕见的。

两年私塾坊，给她打下了文化的底子，现在成名了，可对学问的追求也就更迫切了。她的书包里、床边堆放着书本、字典，闲暇无事时，她的手里总是捧着书。她的丈夫，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对她的进取精神非常赞赏，并且尽全力去支持、帮助她。家庭的有力支持，对她在思想、文化、技艺各方面的提高都起了



一定的作用。

1959年，原呼市晋剧一、二团合并，组建了呼和浩特市晋剧总团。该团汇集了呼市地区的主要艺术人才，并形成呼市晋剧界的十大名伶，亢金锐的名字列在其中。同时，她还担任了这个新组建剧团的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同年，呼市晋剧总团赴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巡回演出。演出期间，康翠玲同志参加全国文代会，所留剧目完全由亢金锐接演，如《七堂会审》、《巴林怒火》、《嘎达梅林》、《打渔杀家》、《草原烽火》等。剧团在西安演出时，她的表演得到了西安“易俗社”、“三义社”等秦腔名家的赞扬，并且主动地组织艺术交流会。亢金锐同志代表内蒙古地区艺人和他们进行了座谈，并就晋剧、秦腔的艺术程式、格局进行了探讨。她放弃休息时间，到“易俗社”和秦腔名家学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秦腔保留剧目《断桥》，同时，她自己的拿手戏《辛安驿》留给了“易俗社”。

在繁忙的演出空隙里，她专程向川剧艺人学习了《放裴》、《打神告庙》。把川剧的水袖功、软梢子功和她原有的基本功相揉和，形成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剧团结束巡回演出后回到呼市，她专场向有关领导、专家进行了汇报，得到了领导、专家、同行的高度评价。

就是在这一年，她的愿望实现了。由康翠玲同志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五

亢金锐同志在解放初期就以一个年轻人的热情，参加了不少现代戏的演出，如《镇压一贯道》、《兄妹开荒》等。她愿意接受新思想，不满足于传统的演技，有一股敢向传统抗争的劲头。当她从太原观摩回来后，更是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凡是她演出的

角色，都有独到的地方。这种勇于在艺术上探索和改革的意愿，终于得到了一个能充分展示的机会。

1960年，内蒙党委宣传部根据当时总的形势，决定在呼市晋剧界进行《内蒙梆子》新剧种的试验。在市文化局牵头下，她担任了“剧种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亲自参与并领导了这次试验。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排练出了新剧种的第一个剧目《望娘滩》，该剧汇报演出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这项新剧种改革的试验虽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继续搞下去，但亢金锐那种勇于改革的精神却为同行、领导、专家们所肯定。

亢金锐在幼时学戏时，行当学得很全，戏路子也很广，加之她在艺术领域不断地进行探索，并努力学习各剧种、流派之长及艺术理论，使她除了演出外，也涉足于戏剧导演的行列。她先后导演了《红霞》、《红色的种子》、《江姐》等戏。

1964年，呼市青年晋剧团建立。为了让亢金锐在艺术、行政管理上都有一个新的锻炼，市文化局党委把她调到青年晋剧团任副团长。由于当时晋剧团演出任务很重，她未能赴任，直到1965年冬才到青年晋剧团。正当她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番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亢金锐被作为“三名三高”、“乌兰夫黑线人物”打入另册。无休止的批斗，终于使她的身体致残。更为可悲、可愤的是，竟然要叫这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艺术家退出舞台，改行去卖菜。只是由于她的坚决抵制，才被留在团内，但是上台演出的权利已被剥夺了。

粉碎“四人帮”后，直到1979年，亢金锐才恢复了晋剧团副团长职务，她带着病残之身投入了新的战斗。

当时晋剧团分为两个演出队，亢金锐带领演出二队。这个队仅有19名正式演职员，其中还包括几名几乎没有演过戏的青年。但就是这个队，以一出《樊梨花斩子》到巴盟、宁夏等地演出达三个多月。该剧的后半部分是晋剧传统剧目《芦花河》，根据当

时演出的具体情况，由武强创作了前半部《薛应龙招亲》，前后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剧本。剧本脱稿后，由亢金锐导演。她发挥出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动用了丰富的传统程式，把该剧排得风趣、诙谐。当薛应龙和白小姐阵前相遇时，亢金锐为演员设计了改动较大的“枪架子”。特别是白小姐对薛应龙一见钟情，亢金锐为她设计了以下动作：白小姐爱怜地一手抓住薛应龙的枪杆儿，半翻身式的转身，托住薛应龙打来的右手，娇嗔地一哼，亮相，一句介板后，白小姐俏皮地把手中枪杆推开，出其不意地在薛应龙脸上拧了一把，然后羞涩地一笑，大翻身亮相。这几个连续动作把白小姐大胆爱慕薛应龙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每逢演到这儿，必然得到观众的掌声。

在二队巡回演出时，由武强改编的《白玉楼》脱稿。在这出戏里，亢金锐除了担任导演外，还不顾病残之身，粉墨登场，扮演剧中人张彦。演出时，她那俊美的扮相，潇洒的风度，细腻的表演，扎实的功底儿，使人赞叹不止。观众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舞台上那洒脱的小生竟是一个离开舞台多年的病残之人。

1979年，呼市举办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艺汇演。亢金锐克服种种困难，以主演《陈三两爬堂》一剧参加了演出。该剧中，陈三两在公堂上一跪就是半个多小时，亢金锐被致残的部位正是腰部，每次演出她都要忍受巨大的疼痛，一场戏下来，她早已是虚汗淋漓，即使这样，她在舞台上的表演竟丝毫未受影响。大会一致评议，将优秀表演奖授予了她。

在此期间，她还执导了《百花赠剑》、《香罗帕》。她排戏非常耐心，有时一个动作她要反复示范几次，甚至十几次，直到演员理解、学会为止。

1981年，亢金锐离开剧团的领导岗位。这期间，她经历了疾病折磨，丧子之痛，人们担心她经受不了这种打击，但事实证明了亢金锐的刚毅，她没有倒下去，而是顽强地生活着。

1986年，呼市文化局举办了首届《昭君杯》戏剧、歌舞大奖赛。为了以好的成绩参加这次大赛，托县文化局副局长云计锁同志亲自登门，代表县委、政府诚恳邀请亢金锐同志赴托县为县晋剧团排练参赛剧目。在爱人的鼓励下，亢金锐带病和武强、邓孝明一起前往托县。

一下车，她就为托县的领导、晋剧团的同志们们的热情所感动。特别是看到托县晋剧团的同志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用在排练上，亢金锐几乎落下了眼泪。托县晋剧团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剧团，为了在艺术上有一个锻炼的机会，他们拿出剧团的积累，并动员全团人员动手制作道具，晚上排练不要夜餐费。这一切都使亢金锐感动不已。她忍着病体的疼痛，连续近三个月一天三上班。在她的这种精神带动下，经过全团人员的努力，戏终于排练出来。托县剧团以《大汗骄子》一剧捧走了本届大赛编剧一等奖、导演一等奖、演出一等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众多的获奖证书，不正是亢金锐等用汗水所换取的吗？

今天，她站在领奖台上，回顾以往，怎么能不让她无比感慨呢？

亢金锐，这位刚毅的女性，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梨园全才。

## 老树逢春绽新葩

### ——记内蒙古文史馆员刘映元先生

张尔杰

用追求、奉献，来概括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映元先生的治学精神，我以为较为恰当。刘先生年逾古稀，解放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建国后致力于地方史志方面的研究。他学识渊博，勤于笔耕，几十年来所写的文史资料有数百万字。特别是近年来，各地编修地方史志，有不少编志人员登门求教。他的记忆力很强，谈起内蒙古西部近现代史真是如数家珍一般，人们称他为内蒙古西部历史的活字典。这话似乎夸张，你若有机会和他交谈，会觉得并不过分。

刘先生出生于山西省左云县城的一个旅蒙商人的家庭。他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学历，建国前十几年大多在绥远新闻界工作。因为幼年时前辈常说起塞外边疆事，于是就产生了对蒙古地方的兴趣。学生时代又喜好写作，研究内蒙古地区历史的理想时时鼓舞着他，所以他随时随地利用一切机会对这一地区的社会进行调查研究。1957年，刘映元先生被聘为呼市政协委员。1959年各级政协开展了文史资料的采集整理，史志部门需要他，他便全力投入这一工作。

强烈的追求，往往结出丰硕的果实。从1959年到1966年的6年中，经他搜集整理的近现代史资料就有200余万字。这些资料都来自亲历、亲闻、亲见历史的老人口中，范围较广层次较多。

特别是内外蒙之间的商贸来往和土地开发的史料，被本地区近现代史研究者视作珍品。

几百万字史料的搜集整理，自有一番不简单的经历，这些经历体现着刘先生的治学精神，下边我要谈的就是这个内容。

### 一、广泛接触社会，深入基层调查

刘先生在15岁时进入归化城（呼和浩特市）农科职业学校读书。这里距家乡左云城320华里，4年中的每个寒暑假，他都是徒步往返于学校与家乡之间。艰苦的行程，锻炼出两条硬腿，给他以后的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抗战时从包头撤退，他凭着这两条腿在两昼夜里走到了五原。抗日战争的8年中，还是凭这两条腿经常活动于河套地区6个县的城镇农村，搜集新闻，宣传抗日。步行大大方便了他接触群众的机会，无形中养成了一种深入基层的特有作风。工、农、兵、学、商、王公、贵族、喇嘛、神甫、牧师、帮会会长徒众，直到戏班班主演员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层次都有他访问过的熟人。高自将军、主席，低到花子、轿夫都喜欢和他促膝谈话。因此在他的笔下既有将军传略，也有乞丐生活。全国文史资料第38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包头底层流氓社会的梁山》，这篇文章记述的“梁山”，位于包头市区内正北坡上的“死人沟”。“死人沟”是落魄的穷苦大众葬身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花子轿夫的组织。刘先生还是在四十年代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就深入到这个阴森恐怖的角落里，象朋友一样和那些花子们坐在一盘炕上交谈，了解他们的一切。文章与读者见面后，引起了不少历史学、社会学的专家学者的重视。

内蒙古西部在建国前的一百多年中，土匪猖獗，民不得安，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彻底肃清。这一历史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刘先生认为完成这个题目有很重要的意义。为搜集本题资料，他曾多次越过黄河，钻入当年号称“土匪窝”的达拉特旗研究当地

历史、风土。他访问过杨家土匪、郭家土匪、金家土匪、李家土匪。还在“神枪郭板定”家与他同吃同住几昼夜，听他绘声绘影地叙述当年的绿林生活。因为刘先生已经熟悉当地情况，且操有当地方言和一些土匪黑话，被访的老土匪郭板定越谈越觉亲切，不仅忘记他是文士，甚至把他看作同流，谈话中间竟问他：“你也刮擦过？”（本地话意为当土匪）许多传奇式的土匪生活，就是经过这样的访查，在这位文士的脑子里形成活的图象。

广泛接触社会除具有以上的社会知识与群众作风外，还须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否则就不会赢得采访的主动权。刘先生曾说，万万不能当爱伦堡嘲弄的“蹩足记者”，拿着本本当记录人。访问的艺术是如何引起采访对象的谈话兴趣并能引导他顺着你提示的线索谈出你要求的内容。比如访问李守信，这个伪蒙古军总司令，他的一生历史联系着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访问必须熟悉中国近现代史，同时要了解他活动过的地方的地方史，否则对方无法和你对话、合作。近现代史对于刘映元先生自然胸有成竹，但李守信活动过的热河一带刘先生则非常陌生。所以他在访问之前认真读了“承德府志”、“朝阳县志”、“蒙疆年鉴”等有关志书。最初，李守信很看不起这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的山药旦记者，心说：“我李守信倒霉了，政协竟派来这么一位来写我！”开始谈话勉强敷衍，当刘先生把第一篇写好的稿子念给他听后，他吃惊地对刘说：“你好象钻到我的肚子里边，我又见到年轻时的我了。”最初见面时的疑虑打消了，李守信象对乡亲挚友一样细细回忆当年，甚至连较隐密的事也不加遮掩地道出来。当李守信的历史资料发表于“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后，内蒙古参事室主任博彦满都曾对内蒙古文史馆副馆长郭灵墅说，“李守信谈得好，刘映元也写得好，把个李守信写活了。”

1987年内蒙古政协出版《李守信自述》专辑，全书28万字，

出版后，不少人争相购买，据我所知此书已流传到海外。

当然，访问中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特别是左倾路线干扰时，有些老人生怕惹祸，嘴封得牢牢的。五路村有个叫梁双马的老汉，他15岁时就在当时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家旅蒙商号里当小伙计，1928年给英商“和记”（洋行）当“领房子”的总把头，在外蒙古的洋商贸易中是极为活跃的人物。他在外蒙古的48个合少（旗）中坐着汽车指挥生意，装着一肚子资料，可是你无论用什么“钥匙”也打不开他嘴上的“锁子”，眼巴巴望着他带进坟墓。类似的钉子刘先生碰了不知多少。

## 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刘先生完全遵循这一治学法则而行。他认为要研究内蒙古，必须了解与内蒙古有血缘关系的外蒙古，更不能忽视与之毗邻的陕、甘、宁、晋、冀、察等地。为此远在五十年代，他就深入到晋冀陕甘等沿边地区，熟悉其风物人情，一直达到太行山的襄垣、沁州、武强。东起居庸关，西至贺兰山，可以说这一区域中的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无不留有他的脚印。至于西部内蒙古，除额济纳旗未去过外，其他各盟旗都亲身做过调查，特别是乌、伊、巴三盟不止一次地深入。那里的王府、帐幕、教堂、草场、字号，都有过他的身影。他在鄂尔多斯祭过成陵，在五原战场吊过忠魂。总之，内蒙古西部三盟的村村舍舍，都在他的脑子里早已形成一幅幅的历史地理图。至于通往外蒙古、新疆的两条丝茶驼路，他则从许多旅蒙商人的经历见闻中获得材料。他究竟走过多少路，访过多少人很难计数。人们惊异他的行程速度和耐力，他风趣地说：“我的11号车（双腿）灵活方便永无故障。”

刘先生知识渊博，到底读过多少书？连他自己也不好统计。内蒙古图书馆、文史馆都知道他最亲密的朋友莫过于书。新华书店



文史部不把他当作顾客而是以朋友接待，他们常向他透露新书讯息。八十年代初，他从乡下回到城里，挤在一间大杂院的小雨房里写作。呼市政协委员、乌素图召的当家喇嘛宝音达赖，在召里单辟两间禅房给他提供写作方便。这个山光水色的创作环境谁不欢乐呢，只因眷恋内蒙古图书馆，他终于谢绝人家的好意。

追求产生干劲，追求产生智慧，追求更会产生勇气。“文革”中，不知有多少次刘先生扮作送菜探亲的朋友，偷偷摸摸去内蒙古图书馆，主管参考研究室的张万仁同志冒着斗批风险借书给他。当时他在离城50华里的五路村劳动，骑自行车往返，当天必须早早赶回乡下。他多么渴望自己有一个小型图书室呀！八十年代，他有了稿费收入，咬着牙关，紧着肚子，把钱送到书店，终于在短短几年中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郊区的什拉门更村建起了有两千册书的研究环境。他望着好不容易配成全套的24史，脸笑开了花。过去藏在纸烟箱子里的资料、参考书搬上架时，他喃喃自语说，“你可上架了，你可上架了！”短短五个字喷放出这位文士深藏的痛苦和无尽的欢乐。现在他已73岁，除必要的休息外，仍然手不释卷。他读的书紧紧围绕蒙古地区，古今中外，只要能找到的，哪怕是一章、一节都不放过。他的五个书架里除《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辞源、专业辞典等工具书外，都是有关蒙古问题的书刊。

### 三、奉献，再奉献

八十年代初，区内外一些戏曲志编修者，期望刘先生较详细地写一篇边塞戏曲史话，山西戏研所顾问王易风同志为此亲临拜访。那时，他白天在内蒙古图书馆校勘《绥远通志稿》，晚间还为伊盟史志办撰写伊盟史志资料，同时受全国政协委托撰写《傅作义主政绥远二十年》的有关史料，实在分不开身。只因王君一片盛情，大家又瞩目殷切，硬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写出了长达五万七

千字的《西口菊部旧闻》。王易风同志在见到本文初稿的复信中说，“大作对于我们犹如及时雨”。载有本文的《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二辑问世后，呼市、包头、太原、大同、张家口、北京等地的一些戏曲研究者、爱好者都纷纷来信来人索要这本书。1985年，自治区文化厅召开有文化部专家参加的《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编纂工作会议，特邀请刘先生作学术报告。大会纪要说：“会议特邀请内蒙古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刘映元先生作了学术报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个报告资料翔实，论述清晰，为内蒙古戏曲志提供了可贵的借鉴。”1986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资料汇编》第一辑上，作为头题发表了这个报告。同书转载了刘先生的《西口菊部旧闻》之后，特聘先生为该卷编审人员。

党和政府对刘先生的奉献给予肯定。1985、1986两年，他先后出席了呼市、自治区两级政协召开的“为四化做贡献表彰大会”，荣获了奖章、奖状和纪念品。

#### 四、十年动乱，一部村史

1966年“文革”开始了，刘先生被赶到呼市太平庄乡五路村劳动。他在社员眼中一直是“大念书人”，在这场“浩劫”中他本属“阶级敌人”在劫难逃，可是一个不敢相信的奇迹出现了：10年中，他好象居住在外桃园，平安地完成了一部著作——《五路台吉板申村史》，这是五路村的村民保护了他。

五路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50华里处的黑河中上游，土肥、民厚，不少人家以“温、良、恭、俭、让”给子弟命名，他们安于本分。“文革”中，刘先生在村里也被抄过家，弯过腰，按过头，只是走走形式，老人们从来不许年轻人有过火行动。有胆有识的村民们还主动为刘先生收藏资料。生产队长分派劳动，总是量力而为，不是让他放牛，就是看田。以后村里时兴起一种倒尿积肥的

工作，这工作量不大，工分高，队长也配给他做。每天清早推着一辆载有大汽油桶的排子车，沿门逐户高喊“倒尿——倒尿——”，几十户人家的一条街，有两个钟头就可完成任务，剩下的时间全归他自己支配。

他早有宿愿要把五路村当作土默川的典型做一详细解剖。这时，他决定不失时机写出一部村史，奉献于内蒙古近现代史。愿望得到村党支部书记的支持。他抓紧访问老者，利用田头、地畔、灶前、炕边拉家常、忆往事，经过几年调查把这个九百八十户人家的村庄的每户家史都搞得清清楚楚。他把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五路村是土默川开发较早的村子，是土默川八大板申之一，从明嘉靖到现在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刘先生又查阅了不少文献，包括中国、俄国、日本等国专家的有关著作，十年中有七个年头投入了这个文字工程中。

1978年《五路台吉板申村史》初稿完成。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各地地志工作陆续铺开，他又投入了史志搜集、研究、整理工作。

## 五、老树逢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回大地，刘先生被正式聘为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员，党给他创造了发挥专长的条件。这时，他已年过花甲。但老树逢春，意气风发。他以超人的精力迎接来自各方的咨询、约稿。这期间他校勘了《绥远通志稿》，撰写了约四百余万字的史料，分别供给山东、山西、河北以及自治区所属巴盟、伊盟、乌盟、包头、呼和浩特等各级文史资料研究机构。几百万字的历史资料，每一个字都闪耀着刘先生在内蒙古地区苦心经营的熠熠光彩，也渗透着刘先生的滴滴脑汁。

超负荷的工作终于把这位曾经凭“11号”纵横沙漠，驰骋草原的文士压弯了腰，他的右肢瘫痪了，再也提不起笔。朋友们见

到他惋惜之余，深表遗憾，最遗憾的是几部著作没有完成。其中《察绥兵匪志》、《内蒙古西部的土地变迁史》、《两条丝茶驼路》、《鸦片流毒在内蒙古西部》、《边塞文化发展史》等题目积有大量资料，只待整理。幸好刘先生仍目明耳聪，记忆清晰。今年春季他给我的来信中说，正由妻子帮他整理《边塞文化史》等著作。近日我由土左旗来呼市看望他，见他精神状态很好，恰逢在呼市召开的中国戏曲志华北五省审稿会接他前往发表意见。我把他送上车，独自返回他的小宅。这个小小院落，鲜花盛开，正面四间北房明窗净几。最引人的是东边那间24平米的书斋。里边五个高大的书架，架上琳琅满目全是书籍。空下的墙壁都挂满地图，窗台和字台上零零乱乱不规则地放着书刊、资料，有的打开着，有的打开又反扣着，正告诉人们这位老人仍在辛勤耕耘。静静的小院花丛中蜂蝶飞舞，屋檐下蚂蚱喳喳弹琴，多么幽静的环境啊！

我和他年龄相仿，大半生都是从战乱中过来，看了这一切，思绪万千，百感交集。猛抬头，一条横幅映入眼帘：“夕阳无限好，加鞭赶一程”。这不就是晚年刘映元先生的生活小照吗？

# 张 万 仁 传 略

武冀勃

张师万仁，字一民，曾用名张占惠，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玫瑰营乡圣家营村人。1909年6月10日（清宣统元年五月十三日）生于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小地主家庭。自幼受良好教育，7至24岁期间，先后在私塾、本村国民小学、察哈尔崇礼县西湾子修道院、张北县第四高小（即南壕堑天主教学校）、察哈尔私立养正中学（教会办，地址南壕堑）、绥远省集宁县玫瑰营天主堂文化学院、归绥市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处读书，其间还在家乡担任过两年小学教师。家庭的熏陶和教会的培育并没有使他走上父母所期望的做神职人员的道路，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性格倔强的他，敌视帝国主义的侵略，厌恶教会及其学校的专制制度，更不甘心为教会所束缚，多次参加了闹风潮反对洋人的活动。所以先后被西湾子修道院、察哈尔私立养正中学、集宁玫瑰营天主堂文化学院开除。1930年又因擅自考入教外学校——绥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而被迫断绝与父母的经济关系，从此便走上了艰辛坎坷的道路。1933年夏，因参加绥远全省学生驱逐教育厅长潘秀仁的风潮被第一师范学校开除后，他转赴太原，入私立成成中学读书。在这里他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并当选为本校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不久，因从事写标语、撒传单等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搜捕而被迫离校。1936年9月，他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律系20班，在日寇紧逼，国难深重的形势下，他积极从事

抗日革命活动，先后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还被选为山西省全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后，受党组织的委派，在晋西南赵城、介休两县工作，任过科长、区长、军粮代购所所长等职。还曾在延安学习，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1940年以后奉命到绥远西部后套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并打入国民党内部，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助理干事，集宁县游击县长，集宁、丰镇、凉城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绥远省教育厅视察员、学田专员等职。

解放伊始，他被怀疑为变节分子，多次被审查。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在劫难逃，饱受摧残。他始终是内蒙古图书馆的一名普通职工，直到1987年评定职称，才被评为副研究馆员。他潜心于业务工作，与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默默无闻但却实实在在的平凡工作中，为内蒙古的科研和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8年春，内蒙古图书馆正式成立参考研究室，委派张师专门负责，以开展内蒙古民族地方文献工作和加强古旧图书的建设与服务。参考研究室成立后，里里外外仅张师一人，既要选购图书、登记、分类、编目和开展阅览、解答读者疑难，又要多方搜集民族地方文献，以丰富馆藏。他每日工作量惊人，但从未抱怨；相反，正是这平凡而忙碌的工作使他充实，使他如醉如痴。整整28年，他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整理了近二十万册古籍，购买回大量重要地方书刊，接待过无数莘莘学子和科研人员，常常忘记下班和休息，甚至休假日亦常到馆里工作。在家亦手不释卷，勤做笔记，为参考咨询和搜访文献积累必要的知识与资料。

参考研究室成立之初，藏书较少，民族地方文献更属寥寥，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大力充实藏书便自然成为张师的首要工作。从1958年到1979的21年间，他不仅接收并整理了兄弟图

书馆调拨的大量图书，还利用一切外出机会寻访、购买或复制民族地方文献。并查阅大量书刊，编制了《内蒙古图书馆地方文献待访目录》（汉、日文各一部），为深入持久地搜集资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凡同他出过差的同事都知道他嗜书如命，只要时间允许，他定要逐家光顾当地图书馆与古旧书店，很少观光游览。

1958年秋，张师建议并获准到我区西部各天主教堂搜集图书，他不辞辛苦奔波数月，从集宁玫瑰营，巴盟陕坝、三盛公（磴口），宁夏银川等地教堂无偿收回数千册古旧书刊，极大地丰富了内蒙古图书馆的收藏。仅在三盛公教堂就收得图书60余小箱，多系西文，其中以《黄河流域十年考察记》图册和《中华全国教务统计》（16册）等较为珍贵。在银川天主堂，张师通过旧相识康锦东神父，要回约千余册书刊。其中仅1900年以前出版的西文古籍就多达数百册，最早为17世纪的印本。还有民国年间罗马教廷颁给主教王守礼的羊皮纸委任状。这些罕见的善本珍藏曾使来内蒙古图书馆购买多余复本的中国书店大为眼红，更使1988年来参观的英国皇家图书馆馆员凯利先生惊叹不已。

1959年张师赴北京领取中国佛教协会赠送内蒙古图书馆的日本影印本藏文《大藏经》，公余他出入于琉璃厂诸书肆寻访并购买书籍。在来熏阁古籍书店，他不顾书上厚厚的尘土，一连几天蹬着梯子上上下下，硬是把库房书架全部搜览一遍，买到不少有价值的书籍。其中一套乾隆原刻本《口北三厅志》的第一册已被卖给中央民族学院补配残书（但尚未付款），经他再三说服，方从中央民族学院要回。他的勤苦、认真与执著使来熏阁的店员大为钦佩，说：“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的买书人。”当听说中国书店受首都图书馆的委托，出售多余的《华裔学志》等珍贵外文书刊时，他又立刻找首都图书馆负责人刘德元会商，最后无偿地要回《华裔学志》一套。他还多方打听，找到在中央文物局工作的傅忠谟先生，要回其父傅增湘总纂《绥远通志》时的草

稿78册。就在这一年，张师还通过友人范雨霖，使原存于内蒙古教育厅资料室的《绥远通志》残稿本65册，残抄本36册以及民国《绥远省政府公报》、《绥远教育公报》等数百册珍贵旧书刊成为内蒙古图书馆的珍藏。其中不仅《绥远通志》诸残本是内蒙古图书馆的独家收藏，就是《绥远省政府公报》、《绥远教育公报》的若干期亦是海内孤本，极为珍贵。当呼市师范学校准备处理所藏日伪时期遗留的旧书时，张师又闻风而至，以300元的新书为代价，换回一千二百余册线装书，内中约有50余种方志和清内府刊刻的一些方略等罕见书籍。其中顺治版《太平三书》、康熙版《朝邑县志》、乾隆版《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邵阳县全志》、《醴泉县志》、《韩城县志》、《凤翔县志》、《临潼县志》等都是善本古籍。他还从内蒙古农牧学院图书馆遗弃的残书中拣回数期三十年代绥远进步刊物《火炕》和一部万有文库本《佩文韵府》。

1964年，张师在北京明清档案馆查阅资料，发现一部罕见的史籍《平定察哈尔方略》。因防止墨渍污损图书，档案馆禁止抄录。于是张师从街上买回铅笔，与同去的冀森同志一道奋笔疾书，硬是用一天时间将全本抄录，使我区蒙古学研究人员得以早日利用。

1973年，张师得山西省图书馆的允许，从其残本古籍中挑取所需。凭着多年积累的版本学知识和经验，张师挑选的约四百余种（册）残书（多为佛经）中，竟有宋版两种，元版一种，其余亦多为明版。

多年来张师四处奔波查访，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宫、南京大学、南京地理研究所、北京、上海、南京、湖南、湖北、广东、甘肃、陕西、山西、旅大诸图书馆和一些古旧书店抄录复制或购买回大量罕见的内蒙古民族地方文献，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黑契丹纪事本末》、《塞外纪程》、《蒙园纪闻》、《宝昌杂录》、《河套图志》、《科尔沁十旗调查报告



书》、《元朝典故编年考》、《元史补传》、《蒙古通鉴长编》、《元主始末记》、《成吉思汗》、《塞北路程考》、《塞外见闻录》、《漠北纪游》、《边务采辑报告书》、《呼伦贝尔问题》、《蒙旗志》(下)、《元史考订》、《徐仙芝出塞诗》、《绥远奏议》、《归化城厅志》、《陕绥画界纪要》、《林西县志》、《呼伦贝尔概况》、《伊克昭盟概况》、《蒙古沿革志》、《西蒙阿拉善旗社会调查》、《九边图说》、《总督宣大山两军门奏议》、《皇明北虏考》(明版)、《皇明四夷考》(明版)、《河套新编》、《秦边略纪》、《归绥道志》、《归绥识略》、《蒙盐纪要》、《鄂托克富源调查记》、《清水河厅志》、《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等。报纸有：《晋绥日报》、《察哈尔日报》、《晋察冀日报》、《绥远日报》、《绥远民国日报》、《绥远社会日报》、《朝报》、《奋斗日报》、《包头日报》、《群众日报》、《牧农报》、《内蒙自治报》等。西文图书有：霍沃尔特《蒙古史》、《蒙文大辞典》、田清波《鄂尔多斯方言词典》、《鄂尔多斯民间传说》等。

张师的视线并不限于各公立藏书机构，他还努力搜集私人收藏。1961年他从呼和浩特市清康熙四公主后裔祁多寿处抄录了《公主府志》，1964年通过刘映元先生抄录了郊区某农民收藏的清代孤本小说《刘大人私访归化城》。此外还收购回《西蒙会议始末记》、《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等许多罕见文献。凭着自己的影响和私交，张师还从友人荣祥、金启综、刘映元、郭笠农、倪金声诸先生手中无偿搜集回宋刻《大方广佛化经》残叶、《甲寅》杂志(20余册)、《归绥中学校同学录》、《黑水琐拾录》、《荣府家乘》、《民国时期的伊克昭盟》、《抗战时期的伊克昭盟》、《天主教在内蒙古西南地区》、《绥远教区一瞥》、《治印丛谈》、《巴彦塔拉盟分县

图》等罕见书籍与稿本。1983年深秋，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年已74岁的张师听说住在大青山公墓的某人有旧书出售，便不顾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利用休假日率徒弟忒莫勒蹬车前往。此行虽未有获，但足以见其苦求珍籍的赤诚。更令人感动的是，就在这一年，他还把自己在“文革”中收集并保存多年的呼市地方“文革”小报77种约570余期无偿地捐献给馆里。

张师的努力不仅丰富了内蒙古图书馆的收藏，更重要的是许多珍贵文献全赖张师的努力才得以存留至今。1958年底他赴各教堂收书时，玫瑰营和陕坝天主堂的部分藏书已卖了废纸，呼市天主堂的藏书也已被熏肉铺买去包肉，而银川天主堂的藏书最后全毁于文化大革命。1959年从北京和内蒙古教育厅资料室收回的《绥远通志》残稿以及呼市师范学校拟处理的古籍亦因成为内蒙古图书馆的收藏而幸存于今。1962年张师从呼市天主堂抄录的常非神父手稿《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因原稿损失于“文革”，而成为唯一的传世本。

在重视古旧历史文献的同时，张师还非常重视现实地方文献的搜集。在他看来，这些因不起眼或水平较低而被人忽略的资料都是地方现实的反映，将来都是难得的历史文献。因此无论是到外单位办事，或是接待读者，他总是主动了解各机关部门出刊的内部资料，并记在本上，日后积极搜访，甚至连乌兰牧骑的演出节目单都不放过，以致同事们善意地说他是：“敬惜字纸”。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张师不懈的努力，内蒙古图书馆参考研究室以其丰富而独到的民族地方文献收藏成为吸引我区科研工作者甚至外国学者（如：日本蒙古学者中见立夫、洼田新一等）的资料宝库，近年来，更为全区地方志的编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师极重视阅览工作，不论手头工作多么繁忙，他总是尽量为读者服务，百拿不厌，百问不厌。为提高服务质量，他利用一切闲暇熟悉馆藏，还学习并掌握了多种中文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使每个读者常能获得超出期望的收获。张师非常器重勤奋好学的青年和踏实执著的专家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希望他们有新的进步。多年来，有不少青年在张师的关怀和帮助下学有所成。现今工作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李天赐先生原系内蒙古大学化学系学生，因爱好天文历算，课余常到参考研究室查阅有关资料。张师倾馆藏所有，竭力提供方便，使他获益非浅，最后终于走上从事天文历算研究的道路。1979年他完成了《公元干支纪日速查盘》的发明，被《人民日报》誉为青年发明家。成功之日，他将自己的发明寄赠张师，以表达内心的感激。呼市饲料厂的王瑞萌（女）多年在参考研究室 阅美术资料，深得张师的帮助，曾在《苗苗》、《内蒙古日报》上多次发表作品与画论文章。呼市第二十五中学美术教师任庆新原系红旗工艺美术厂工人，酷爱美术，最终自学成才，其作品不仅在内蒙古文物商店出售，还在本市举办过个人画展。1986年呼市电视台为他拍摄专题节目时，应他的一再要求，节目中再现了当年张师帮助他成长的情景。在诸般服务中张师最注重为科研服务，尤其是关于蒙古学和内蒙古地方史方面的科研。早在1959年春他就致函并登门拜访了著名蒙古史学家余元龠先生，请他主持编纂蒙古学图书目录，以方便图书馆搜集和学术界利用。余先生对此建议甚感兴趣，但因时患腿疾不能行走而未能实现。1963年4月23日正在二次修订《中国地方志综录》（以下简称《综录》）的著名方志目录学家朱士嘉先生致函内蒙古图书馆，请求就内蒙古旧志给予协助。在数次复函中，张师逐一核对了馆藏与《综录》的著录，还酌加注语，另纸开列了《综录》未收的志书类书籍20余种和散佚方志存目。6月19日朱士嘉先生感激地回信说：“地方志目录稿和贵馆入藏方志书，散佚方志存目等都已收到。贵馆所加按语，极有参考价值，当据以补正“综录”之所未备。……贵馆的热忱支援，不但给嘉以学习的机会，也给嘉以极大的鼓舞力量。本人对此应再

致以恳切的谢意。”至于全区各研究单位如：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金融研究所、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科研人员，多年来不仅得益于张师搜集的珍贵文献，更直接得到张师本人的大力帮助。尤其是科学史专家李迪教授、蒙古学翻译家潘世宪教授、女真文专家金启宗教授以及孛儿只斤、纳古单夫、卫月望、张郁、陆思贤、盖山林副教授等获益尤多。孛儿只斤副教授曾告诉笔者，张师曾无私地将自己多年查阅文献的笔记提供给他使用，不仅对他本人的科研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单位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亦有很大的帮助。多年的辛勤工作与努力钻研，使张师成为知识渊博、熟悉馆藏的内蒙古民族地方文献专家，受到学术界及有关人士的敬重，被誉为“活字典”、“内蒙西部老人”和“资料篓子”。

张师虽知识渊博，对民族地方文献颇有心得，但因多年来忙于工作，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无私地奉献给图书馆事业与读者，故未能从事深入研究与著述。何况他一贯谦虚谨慎，绝不轻易动笔。所以，至今仅发表过《内蒙古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五十年未能问世的一部珍藏——〈绥远通志稿〉》和《昙花一现的“西北实业促进社”》等文章。但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的《中国丛书综录》（1959—1962年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1983—1987年出版）和尚未面世的《中国古籍善本联合目录》等大型目录与资料集都凝聚有张师的心血。我区最大的旧志《绥远通志》得以校订出版（正在排印中），亦得益以张师的努力。

张师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大概因自己生平坎坷，尤其同情和乐于帮助无辜落难者。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他曾多次利用雇人抄书或整理旧籍之便，使一些被剥夺工作的“右派”或受歧视的知识分子得以挣钱糊口。这在举国大搞“阶级斗争”的当时，具有何等的胆识与勇气！

## “吹塌天”和“拉塌地”

——记著名二人台乐师张埃宾、周治家

温 万

在二人台艺术界，不仅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就连山西、陕西、河北等地，一说起归绥城（呼和浩特市）的“吹塌天”和“拉塌地”，几乎无人不晓。这就是著名乐师张埃宾和周治家先生。张埃宾先生擅长吹枚（即笛子），吹艺极高，人送美号——吹塌天；周治家先生擅长拉四胡，拉技精湛，人送美号——拉塌地。

“吹塌天”和“拉塌地”的器乐演奏技艺，博得广大听众及艺术同行的赞赏和钦佩。他们的艺术成就，为二人台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一、“吹塌天”——张埃宾

张埃宾，内蒙古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人，汉族，生于1914年。因家境十分贫苦，从小给人扛长工打短工。民国17年，父亲为了谋生，四处投亲靠友。一天，在回家的途中，他的父亲连饿带累死在大路上，他和母亲只买了一张草席便把父亲埋葬了。出于生活所逼，12岁的小埃宾就开始边给人家放牛，边学艺。他将葵花杆儿挖了几个孔眼，当枚吹。从此，学吹枚就是他最大的乐趣，枚就成为他形影不离的伙伴。

伊盟达拉特旗，是二人台艺术的摇篮和市场，张埃宾从小就

生长在鄂尔多斯歌海之乡。环境促成他对民间音乐发生了极大的爱好和兴趣，他对二人台有着深厚的感情。张埃宾21岁时，就跟随当地艺人侯付秃（旦角演员）、赵兵（丑角演员，会拉四胡）、李顺林（会打扬琴）等人，搭成小班儿，四处漂流演唱二人台。他们不畏严寒酷暑，风里来雨里去，走街串巷，走村串户，先后在伊盟、包头、后山、呼和浩特市、巴盟等地流浪卖艺十几年。他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曾和侯天才（土右旗人，会打扬琴）、王广东（托县大二道河人，丑角演员）等人投艺学习。由于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投师学艺不耻下问，使他的吹枚技艺提高得很快。

解放后翻了身，人民当家做主人。他的一手吹枚技术更有了用武之地，对二人台艺术也更加热爱。1952年春天，张埃宾参加了黄河岸边打沿河坝的劳动，他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操起枚来为民工们吹奏二人台曲调。他那高亢、明亮、委婉、动听的枚声，吸引着成群结队的民工。人们被他的枚声所陶醉，围观的群众不住地喝采，举起大拇指亲切地赠送他为“吹塌天”。此后，“吹塌天”埃宾子就名扬四方。

1953年经武川民歌手张二银虎介绍，张埃宾便参加了内蒙古前进实验剧团（后改为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一团），一直在乐队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涯。同年，绥远省文教厅选派他和周治家、刘银威、刘全、高金栓、大来应、任万保等人，由姚士英领队，参加了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的演出。

1955年和1957年两次内蒙古音乐舞蹈戏曲汇演中，他都获得演奏二等奖。并和赵四、周治家等同志合奏由中国唱片社灌制了《走西口》、《打金钱》、《尼姑思凡》等二人台小戏和牌子曲《西江月》、《推碌碡》、《八板》等唱片。1958年，张埃宾随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团首次进北京，为首都人民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进行了演出。1959年，领导选派他和刘银威、刘全、温

万、石凤梧、李秀莲，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组织的赴甘肃、青海慰问团，把二人台送到青藏高原，深受军民欢迎和好评。1964年，应上海音乐学院邀请，他和周治家一同赴该院进行讲学传艺，并和该院的丁喜方先生、鞠秀芳等名人，共同切磋教授二人台音乐近一年半时间。他在剧团期间，对来自区内外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或业余爱好者，都给予了热情接待和认真的辅导。为了使他们尽快掌握吹奏技巧，他经常是不厌其烦地为他们反复示范演奏，甚至和他们一块儿练习。

张埃宾吹枚的技艺特点是气功扎实，筒音饱满，音色高亢浑厚，旋律优美流畅，韵味醇正。他不论吹奏哪个曲调，一听就是内蒙古西部地区（俗称西大路）正统风味。他是左面持枚。演奏时姿势大方潇洒，情绪饱满，力度变化、强弱对比掌握得很好。因受文化所限，过去艺人们常用口传心授的方法学艺。他学记音乐较为迟慢，但经他用功背会，一般就不会忘掉，再用枚吹奏起来就得心应手了。由于他的演奏独特，自成一派，继“神枚”赵四之后，在四、五十年代，是内蒙古、山西、河北、陕西等地二人台艺术界吹枚同行中，人们公认的佼佼者。同行们一提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吹塌天”张埃宾师傅，个个都很敬佩赞赏。1959年，他开始在呼和浩特市艺校任教。

“文革”中，艺校“下马”解散，他被调去烧锅炉，看传达室。1978年，内蒙古文化局、内蒙广播电台等单位，为了抢救挖掘二人台遗产，请他和周治家等著名艺人录制了许多二人台资料。其中有二人台小戏、唱段和二人台牌子曲等。在这些录音中，张埃宾吹奏了绝大部分曲目。这些珍贵录音资料，其中有许多现在也经常播放。

1979年，呼和浩特市再次成立内蒙古艺校呼和浩特市戏曲班（也称呼和浩特市艺校），张埃宾被调去任教二年多，在歌剧班教授二人台音乐和吹枚技艺。因年老体弱，于1982年6月光荣退

休。退休后他虽然不能再吹枚了，但他还经常和一些二人台爱好者一块打坐腔玩音乐，尽自己的余热对他们进行指导。他走到哪里都很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戴。1988年12月1日，张埃宾先生因患脑溢血病故于呼市，享年74岁。

噩耗传来，文艺界同行和他的学生、好友纷纷去家探望，安慰他的老伴。在他临葬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学生们自发去他家，在他遗像前吹吹打打红火了一晚上。他们说：“张老师搞了一辈子二人台，教给我们不少东西，我们再给他老人家演奏一番，让老人在音乐声中，含笑九泉。”追悼会上，原剧团团长、市文联副主席吕烈为他题写了“一曲江月荡气回肠成绝响，两袖清风鞠躬尽瘁遗风声”的挽联。人们还专门把他一生喜爱吹的竹枚，和遗像放在一块留影永存。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张埃宾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内蒙分会会员，呼和浩特市音舞协会会员，呼和浩特市文化局艺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埃宾先生一生为人忠厚老实，生活勤俭朴素，工作任劳任怨，对党的文艺事业兢兢业业。为继承和传播祖国的民族民间艺术，为活跃城乡人民文化生活，为培养新生力量，他鞠躬尽瘁贡献出一生全部力量。

## 二、“拉场地”——周治家

周治家，汉族，原籍山西河曲县人，后迁居于准格尔旗十里长滩以及达拉特旗刘三圪旦居住。生于1917年。

解放前，他的家境十分贫穷。从小给人放牛，还学过一年口袋匠。因其父是二人台民间艺人，擅长吹枚（笛子）。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启蒙下，加之他的天赋，周治家从7岁就开始一边放牛，一边随父学艺。不久便跟随艺人越明、孙银鱼、王连儿、侯天才、林铁、潘玉兰等人的二人台玩艺儿班，学拉四胡和打扬琴。开始在本乡活动，后来到山西神池、八角、利民、朔县等地



流浪卖艺糊口。

民国18年，山西遭年馑。生活所逼，十几岁的周治家只好又随父亲进入内蒙古后大套临河、陕坝等地和林铁、孙银鱼、秦五毛眼等艺人，搭成小班儿唱二人台。1932年从五原返回山西河曲。1933年到1937年在河曲一带唱二人台。1938年随父和郭二仁、郝大嘴等先在河曲，后又与侯天才、刘文生等到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一带唱二人台。1946年前这段岁月，周治家先生大部分活动于晋北地区以及准格尔旗一带。1947年秋天，离开准旗又跟随叔伯哥周三秃（周三）到达拉特旗、萨县（土右旗），和巴图尔淖等名艺人搭班儿唱二人台。1949春，他和周三秃、巴图尔淖、张埃宾等艺人，又回到伊盟达拉特旗卖艺，直到1950年土改。

全国解放后，过去被视为“下九流”的卖艺人，一下声誉大振，成为国家的财富。为了宣传党的土改政策，1951年周治家被接收为达拉特旗第九区文艺宣传队队员。1953年，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艺术特长，选送他到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参加了绥远省民间艺人学习会。进行学习、培训，并整理、改革二人台民间艺术。同时参加了绥远省文教厅创建的内蒙第一个二人台职业国营剧团——内蒙古前进实验剧团（后改为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一团），一直在乐队工作。同年，参加了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的演出，把二人台这朵瑰丽鲜花，献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他们演出的《打金钱》、《打秋千》、《牧牛》和二人台牌曲等节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声誉名扬中外。

1955年和1957年两次在内蒙古音乐舞蹈戏曲汇演中，他分别获得演奏一、二等奖。并和赵四、张埃宾等同志伴奏、合奏，由中国唱片社灌制了二人台小戏和牌子曲唱片。这是解放后第一批二人台唱片，全国播出后影响很大。1958年周治家随呼市民间歌剧团，

首次进北京，为首都人民及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进行演出，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64年应上海音乐学院邀请，他和张埃宾一起赴上海音乐学院进行讲学传授技艺。并和该院的丁喜方先生、鞠秀芳等名人，共同研究探讨二人台音乐近一年半时间。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慧芬等人，当时正在本院学习，曾和周治家专门请教学习二人台音乐和演奏技巧。当时学院想调他们长期任教，但因呼和浩特市剧团更需要他们，未能去成。

周治家在剧团期间，有不少区内外的文艺团体前来学习求教，他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耐心的辅导。使他们学到了东西，满意而归。

周治家演奏的二人台四胡，与众不同，风格独特。凡听过他演奏的人们，无不敬佩赞赏。同行们公认他是一名好“把式”。他的演奏特点是旋律流畅，指法灵活多变，倒把准确而利落，在旋律进行中，垫字加花灵巧活泼。他演奏的四胡蒙汉味道较浓，旋律既丰满而又泼辣，音色甜美而醇正。时而感情奔放犹如万马奔腾，山崩地裂；时而细腻娓娓钻云入地妙不可言。他在演奏中所运用的分弓、连弓、快弓（艺人们俗称为勤、懒、花弓子），既灵活多变，又整顿潇洒。他的“即兴演奏”技艺很高，使许多文艺界人听后无不倾倒连连叫绝。不愧当年群众及同行们称赞他为“拉塌地”。

周治家演奏扬琴也是一名高手。曾多次和丁喜方先生等一块切磋技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他在扬琴演奏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他生来有一双天赋的好耳朵，听音灵敏，定弦准而快。演奏起来节奏稳准，不拖不抢。键法娴熟，左右手配合默契。他演奏的扬琴在乐队中是挑梁柱子的，起到了乐队有声指挥的作用。在剧团乐队期间，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就以定弦来说，不论老同志或小青年，只要他们掌握的乐器定弦或演奏稍有

不准，他那双灵敏的耳朵就放不过去，立即指出来让你把音校准再演奏。我记得就因为定弦音准的高低，或为了一个过门儿及乐句的长短，他和一些老艺人经常是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一次我们在内蒙电台录音棚里录制节目，他发现有的弦不准，停下录音让马上把弦定准再录音。在老艺人中，周治家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良师。他为培养青年接班人，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汗水。他曾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绝大部分在内蒙古及外地各专业文艺团体，现已成为文艺战线的一支中年业务骨干力量。民间艺术二人台如没有这些老一辈艺人的传帮带，没有他们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和兴旺。

“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摧残，周治家先生一度在剧团烧锅炉，后调到呼市电子设备厂当搬运工，看传达室。1978年内蒙古文化局、内蒙古广播电台等单位，为了抢救挖掘二人台音乐，请他和张埃宾、常来彪、任万保、张春溪、刘银威、樊六、高金柱、张二银虎等老艺人，集中起来抢救录制了许多二人台小戏、唱段及器乐牌子曲。为内蒙古的戏曲艺术宝库，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在这部分录音节目中，周治家演奏扬琴。这些珍贵的录音资料，现已存入内蒙古电台汉文艺部，有的选段现在仍经常播放。

1979年呼和浩特市再次组建内蒙艺校呼和浩特市戏曲班（也称呼和浩特市艺校），周治家先生调去任教一年。1980年，因年老体弱，光荣退休。由于旧社会长年颠波流离的卖艺生活，严重地损害了周先生的身体健康，在家卧床养病四年，于1984年12月与世长辞，享年66岁。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其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烈士公墓。

周治家先生生前是内蒙古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呼和浩特市音舞协会会员。

## 以翎子功梢子功见长的十七生陈宝山

赵 梁

公元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以后，在呼和浩特、包头一带的戏剧舞台上，有一位以翎子功和梢子功见长的山西梆子演员，他就是艺名“十七生”的陈宝山。在《双合印》一剧的《下水牢》折子戏中，他扮演董洪。水牢内上有利刃，下又水漫过胸，既不能站，又不能坐。在这样的特定环境里，“十七生”采用骑马蹲裆的架式，以甩发（即梢子功）的技巧表演出剧中人的困境。只见他是左推水、右甩发；右推水、左甩发；正面推水，左右甩十字花。这段表演长达十五分钟左右，深受戏迷的赏识。

陈宝山1916年出生在山西灵丘，家中兄弟六个，他排行老五，取名瑞祥，字宝山。9岁丧母，为了糊口，父亲将他送到灵丘的山西梆子戏班打了戏。他的老师是阜平人（今河北省阜平县）孙穆林（艺名盖天红），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须生演员。由于陈宝山学艺刻苦，很受老师的器重，11岁便随老师登台演出，饰娃娃生。在《狸猫换太子》一剧中，他扮演陈琳。由于棍花儿及甩发表演认真，受到师长和观众的好评。

1931年，他随戏班到山西五台演出。这时，当地的戏班也在演出，两班儿唱开了对台戏。他被朔州人魏林（艺名鱼儿生）的精彩演技所吸引，很想拜师学艺。“鱼儿生”对陈宝山小小年纪认真的表演也很喜爱，答应陈宝山，在九月（农历）码戏（停止演出）后拜师。十月，陈宝山由他二哥陪着，步行到浑源由他二哥作保人拜“鱼儿生”为师，学徒期四年。双方签了吃喝穿戴由

老师管，生病栽崖跳井与老师无关的文契。由于陈宝山已向“盖天红”学艺六年，打下了基础，所以，向“鱼儿生”学艺主攻“翎子功”和“梢子功”。凡是有月亮的夜晚，他就对着身影，琢磨着老师的一招一式，练习“翎子功”和“梢子功”。有时，散夜戏后也插上老师的翎子或带上梢子在屋里练习。除了自己苦学，也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基本掌握了“鱼儿生”表演翎子和梢子的绝招。

1935年正月，陈宝山随老师和师娘“二女子”宋翠芬（“三女红”宋玉芬姐姐）来到归绥（呼和浩特），驻进徐家沙梁“四寡妇戏班”。天气热的时候，戏班到城东上四村（美岱、黑沙兔、太平庄、新庄子）、下三村（五路、添密儿、讨号板申）以及其它农村巡回演出；天冷后，便到旧城大召前玉泉井南边财神庙“席片戏园”演出。七月（农历），戏班在“三空村”演出时，“鱼儿生”和“二女子”被城里大西街同和园（园主姓陈）以增加工钱（“鱼儿生”从每天2元增到2元5角，“二女子”从每天1元9角增到2元）从“四寡妇戏班”撬走。这时，“鱼儿生”和陈宝山的师徒合同还未满四年，班主要陈宝山顶起生角戏来，陈不敢自作主张，让班主问“鱼儿生”，经“鱼儿生”同意陈宝山提前出徒留在“四寡妇戏班”。陈宝山出徒，“鱼儿生”给了他翎子一副，靴子一双，马鞭一根，长枪一杆，被褥一套。到九月，“四寡妇戏班”在旗下营码戏散了班。陈宝山返回归绥，住在大召前往南史家巷“四狗子”开的“和文店”（此人也是演员，艺名“半杆旗”，是男角青衣）。这时，陈宝山的三哥、弟弟（都会演戏）和父亲都来到归绥。陈宝山和三哥、弟弟参加了由亢二（亢喜成，巧报村人）、祁姓（称七班主）、蔚姓（称玉班主）三人合办的“茂盛戏班”，在财神庙戏园演出。陈宝山以“十七生”的艺名演出的第一个折子戏是《辕门射戟》，他饰吕布，受到戏迷好评，每日工钱定为三角七分。从此开始，陈宝山在“茂盛戏班”

一驻就是十年。除在财神庙戏园演出外，还到山西大同、托克托县、准格尔旗、武川、萨拉齐等地演出。

1942年，由京剧四小名旦之一李世芳的父亲“满庆”李子健拉引，亢二从“茂盛戏班”挑出“花女子”李桂林、“三女红”宋玉芬、筱玉芬、“三娃黑”白云、“十七生”陈宝山以及文武场等近二十人和中路梆子名净“狮子黑”张玉玺带领的“一千红”、彦章黑、高福海、“牛头黑”、“十二红”（女）、王正魁（晋剧电影《打金枝》中郭子仪扮演者）等一同赴北京“华北戏院”演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花女子”和“三女红”合演了《鞭打芦花》、《走雪山》、《二堂舍子》；筱玉芬、“三女红”、“三娃黑”、“十七生”合演了《玉堂春》；李子健表演了《王婆骂鸡》、《拾玉镯》、《武洪图》；“狮子黑”表演了《上首剑》、《杀江》、《炮烙柱》、《卖人鱼》。京剧名角儿马连良表演了《借东风》；金少山表演了《牧虎关》；叶盛章表演了《黄一刀》。演出时，剧场除互相观摩留下的座位外，其余的票都出售给观众。“十七生”告诉笔者，这次进京不仅学到晋剧名家的技艺，更学到兄弟剧种名家的高超技艺，真是大开眼界。

1945年，“茂盛戏班”在萨拉齐沙尔沁村散了班。“十七生”参加了包头固阳“刘君秀戏班”。1948年回到归绥，“十七生”和演花脸的崔吉仙组织起一个叫作“打破锣”的戏班，在财神庙戏园演出。这年的中秋节，“十七生”参加了杨再山、金玉玺（先唱河北梆子后改唱山西梆子）的戏班，在大观园演出，演员有康翠玲、武彩凤、“自来丑”赵申酉、郭全福、李凤仙、丁祥、李贵等。1949年，经戏班群众选举，“十七生”、杨再山、郭玉林负责组成共和班。不久，人民政府要求废除“戏班”体制，成立剧社。市文教局派来了工作组，帮助成立了“新绥剧社”。剧社成立后，金玉玺任团长，郭跃斗任副团长。1952年，“十七生”去了阳泉。1954年，康翠玲和白银成打去电报，请“十七生”回到呼

市，这时“新绥剧社”已改为“实验剧团”。团长金玉玺，副团长康翠玲、“三女红”、“十七生”。1956年成立“市晋剧二团”，团长金玉玺，副团长白银成、康翠玲、“三女红”、“十七生”。

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陈宝山表演认真并虚心向同行学习。如向“满庆”李子健、孟长云学习刀、枪、剑、戟的表演功夫。在演出中，“十七生”运用翎子、梢子的技巧，表达剧中人物的情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小宴》折子戏中，“十七生”扮演吕布。他在翎子功的表演中，采用了转、正、侧、点、掏、抖、甩、弹、站、弯、直、缓、急的十三字动作，把吕布这个人物表演得维妙维肖。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戏曲汇演时，“十七生”扮演吕布，获得表演奖。

1957年10月，“十七生”被调到内蒙古艺术学校任教，1980年退休。1985年9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向“十七生”颁发荣誉证书对他的艺术、教育生涯给予很高的评价。荣誉证书上写道：“陈宝山同志，鉴于你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已辛勤耕耘二十余年，硕果累累，并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关心学生，为多出、快出、出好人才努力不懈，成绩显著，特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 子材先生在起义过程中

音 阳

呼和浩特市政协前副主席梁子材先生，解放前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绥远籍监察委员，是1949年“九一九”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签字人之一；同时他还担任绥远《奋斗日报》社社长。这里记的是在“九一九”绥远军政人员起义过程中，子材先生的几件事。

### 一

1949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随着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向南江进军。这时，国民党政府和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一些军政要员都在作逃跑的准备；而在国民党政府中充当监察委员的绥远籍的梁子材等人，也不得不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正如他本人所说：“觉得自己和南京反动派素无关系，犯不上跟上他们走死亡的道路。到穷途末路时，只能被他们抛在一边，陷于绝地。倒不如回绥远去，绥远也要解放，宁愿回去和家人团聚，听候命运安排，也比跟南京政府反动派好。”（《内蒙文史资料》第八辑梁子材文）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实际，返回绥远更是他明智的选择。

1949年的4月，子材先生和别人一起相偕由南京回到绥远，但是时移势迁，当时的绥远却远非一年前他离开时的那种情况。省会归绥（现呼和浩特）城东50里就是解放区，国民党绥远省政府



所统辖的地方只有归绥以西的“半壁河山”。这年3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绥远方式”，当时绥远正呈现不战不和的相持局面。子材先生目睹当时绥远的情势，加上他在南京看到的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惨败的种种现象，感到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垮台，已经无可挽回。他联系到自己，半辈子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先依附阎锡山，后投靠傅作义，虽然处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能洁身自好，但半生奔波无非是为统治者帮闲，甚至帮忙。面对着时局的重大转变，使他对即将来临的新形势顾虑重重。在这里应该补叙一笔的是，他在未赴南京就任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以前，一直担任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他赴南京就任监察委员期间，他的《奋斗日报》社长职务并未被免除，按说他于1949年4月由南京返绥后，应该仍回报社任他的社长，但由于他对形势认识上的模糊，表现为情绪低沉，思想消极，每日在家深居简出，用他的话说就是“听凭命运安排”。

1949年的春季，绥远的政治形势犹如自然气候，由寒冷逐渐变得暖和起来，归绥以东的战事已经彻底停止，虽然火车尚未通行，但一些行人商贩基本上可以自由往来。种种迹象表明，和平解放绥远的计划，正在高层中积极进行。

这时，报社人员曾不只一次劝说子材先生回报社工作。起初他执意不回，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逐渐有所动摇。在这期间，他经过反复考虑，认为绥远和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与其坐等解放，哪如起身去迎接解放，何况作为舆论工具的报纸来说，正可以利用它来为和平解放绥远的事业尽一点绵薄的力量。于是，他终于改变了初衷，毅然走出家门，重新回到报社担负起社长的职责。

子材先生在担任社长期间，工作上比较放手，除了重要的稿件由他决定取舍外，他强调每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一般情况下，

对编辑和采访业务不加干预。他的主要任务是撰写社论。

“九一九”以前，在绥远军政人员中，思想情况比较复杂，对形势有较清醒的认识，拥护绥远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固然有不少人；但也有一些人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头脑中存在着糊涂想法。他们认为战既不能胜，而讲和又非所愿，最好采取拖的办法，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未来的美苏战争中寻求自己的出路。再加上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和煽动，使相当多的人存在有这样的幻想。很显然，这将给和平解放绥远的事业造成极为不利的因素。子材先生回到报社以后，针对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上述想法，以他对国际问题素有研究的条件，撰写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对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反复阐述第三次大战不可能爆发，美苏两大集团挑起战争只是一种幻想，是完全不可恃的。这时他一改过去撰写文章时那种欲言又止瞻前顾后的情况，没有任何顾虑，放笔直书，文如泉涌，每篇文章几乎不加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他的这些文章，通过报纸传播，对广大读者认识形势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 二

1949年元旦过后不久，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绥远，不少人在想：北平既然解放，绥远还能守得住吗？于是人人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前途。由于长期以来被反动宣传所毒害，使不少人思想上产生重重顾虑。这时，那些死硬派和那些手中稍有积蓄的人，也在收拾细软做西逃的准备。他们远的逃往宁夏、兰州，近的停留在河套观望形势，如果形势一旦有变，再拔腿向西。由于这些人的行动，再加上一些谣言流传，把一个省会归绥搅得人心惶惶。正是这个时候，子材先生等一行由南京回到绥远。他一下飞机，看到绥远这种情况，心中感到无限怅惘。随即，他见了主席董其武，董其武听完了他的汇报，没有任何表示。事后，命秘书给他

送去一百元现洋，作为他西去的路费。他对着这白花花的一百元现洋，心中踌躇起来了，他想：如要西走，我又何必由南京返回绥远呢？现在人人都向西逃，难道兰州、宁夏就是安全地方吗？想到这里他想还是不走为好；但他继而又想，如果不走，形势一旦有变，岂不要当俘虏？要不然暂到兰州躲避一时，待绥远局势平定再作归计……正当他反复思虑无所适从的时候，他得知董其武主席正和北平傅作义先生取得联系，共同筹划和平解放绥远的事业。这一下他心里亮堂了，他决定打消西走的念头，将董其武主席赠与的一百元川资如数退回，坚决地跟随董其武主席走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

决定不走，退还旅费，这在子材先生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因他一向以廉洁自持，非分之财分文不沾，但是我们如果联系到时间是解放前，特别是政局混乱的时候，退还上级的馈赠，这恐怕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 三

1949年春季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奋斗日报》为了向人们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通过收听到的延安广播，摘登了一些新华社的电讯。开始时曾引起一些人的大惊小怪，他们说什么报纸竟然替共产党宣传。后来随着形势发展，报纸采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电讯逐渐减少，而登载外国广播及新华社播发的电讯逐渐增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报纸销量大增，说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少数人对报纸横加指责。他们先是殴打报贩，后来通过匿名电话恐吓辱骂编辑人员，还在子材先生住家门口贴上辱骂和恐吓的标语。子材先生对此不予理会。为了扩大影响，消除人们思想上对和平解放的种种顾虑，他以报社的名义召开读者座谈会，邀请具有代表性的读者座谈绥远的前途。在省政府召开的包括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子材先生不

顾持反对和平起义人士的围攻，与他们展开辩论，反复强调绥远只有和平解放才是唯一可走之路。与此同时，报纸不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同时传播全国各方面讯息，读者也络绎不绝到报社探听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情况以及绥远何时解放等等。这种情况，使坚持反动立场的少数当权者大为恐慌，他们指使暴徒于7月11日晚，趁中共联络代表进驻归绥之时，一举将报社炸毁。

报社被炸后，编辑部被迫改组，除子材先生保留社长一职外，编辑人员大部分被逐出报社，数日后，改组后的报纸继续发行。这时，子材先生声明与改组后的报纸断绝一切关系，从此再不到报社工作。尽管他脱离了报社，但为了促使绥远和平解放，他在地方上层人士中继续进行串联，直到9月19日，和别人一起在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拍发的起义通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解放前，我与子材先生曾在一起共事，他是我的领导和上级，在同他相处的日子里，目睹他待人接物以及那谦虚谨慎的作风，给予我很深的印象。他学识渊博、好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对我国西北地理特别是“丝绸之路”，有较深的研究。每当他和友人谈论，总是滔滔不绝阐述自己的见解，使听者为之折服。遗憾的是他的这些精辟的学术论点，在他生前未能形诸文字被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总之，子材先生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他和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着旧时代留在他身上的烙印，但当他一旦认识到真理之所在，却是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走去。在“九一九”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过程中，子材先生的表现，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 回忆我走过的路

韩燕如

我出生在土默特右旗双龙农村，听祖父说，他原是山西太原武宿村人。他16岁领着两个弟弟来到内蒙古土右旗定居，以兽医为业。弟兄三人熟读“马经书”，医术较好，远近求医者不少。他三人为人厚道耿直，医德高尚。一次有个病马没有救过来，畜主认为牲畜病死是常事，丝毫没有埋怨，但我三祖父却憋在心上，每天闷闷不乐，为此得了不治之症，24岁离开人间。后来我祖父和二祖父逐渐转向农业，兽医就变为副业了。直到解放后，“马经书”和捣药的碾子还在，可是人已先后去世了。

父亲是个稍通“五经四书”的人，为人可靠实在，勤俭持家是他的宗旨，到了80多岁到树林里去转游，回来还要拣点树枝烧火。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当我在一中读书时，因宣传抗日被捉进监狱后，在每半个月的探监时刻，老人家就一次不误背上吃的用的从土右旗来呼市探监。我在狱中得了斑疹伤寒，高烧不省人事，他和继母又到呼市把我从狱中保外就医，经过精心护理才使我痊愈。他的为人，教育了我办事要认真并以诚待人。

我母亲是个聪明能干的蒙古女子，名字叫密拉。可惜在医学不发达的旧社会，因生孩子胎盘未下，被接生婆把长发吊在房梁上去掏胎盘掏死了，当时只有35岁。她临终时还嘱咐我父亲好好照顾我，不要叫受难为。我10岁就失去了最疼爱我的母亲。

我7岁进私塾就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五经四书”，似懂非懂地读了三年。当时在农村流传着爬山调，

男女老少都爱唱，他们心上的酸、甜、苦、辣都凝聚在歌里。尤其到了晚上，豆腐房的小油灯，隐隐约约地照着牛倌儿、羊倌儿、长工、短工、娃娃、后生。这民间的山曲儿唱起来，此起彼伏，一唱就是大半夜。我晚上也挤在他们中间，趴在炕沿上听他们唱各自不同的遭遇。当时我对歌的内容虽然不全明白，但我真喜欢他们那无拘束的自然形态和优美的曲调，后来也在小本本上记下一些歌词。

我10岁去萨拉齐（现土右旗旗所在地）大东街小学上学，15岁高小毕业，考入绥远省第一中学。上高中时，课余时间读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

1933年我作为反帝大同盟盟员，代表绥远省反帝大同盟参加了河北省第二次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会址在北京。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三天会期换了六个地方。会后回来时，组织上交给我一包社会科学书，在这包书的掩护下带回了大会机密文件，顺利完成了地下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同年我因在课余向学校附近的人力车场工人宣传抗日，被便衣特务告密捉进牢房。3年狱中生活，最幸运的是得到同监革命先辈王若飞同志的亲切教诲，从而坚定地树立了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人生观。我初步想用笔杆子贡献点儿力量，曾在1939年写出“杀回三岛去”、“架起太平洋的肉桥”、“谁说我们是一钱不值的工匠”三首短诗，先后发表在《绥远日报》的“察北诗草”上。诗歌是时代进军的号角，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爱好诗歌。

1937年2月，由绥远省地下党组织层层介绍，我到山西省太原国师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同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分配到雁北地区右玉抗日前线任特派员。

在枪林弹雨的日子里，没空专心去从事文学，只不过是在宣传、动员群众抗日和办报中发挥些作用。在那戎马生涯中，经常是马上战斗，马下办报，雁北《洪涛报》和《战斗生活报》就是

当时的油印小报。回忆起来在那八年抗战中，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华侨女烈士李林同志壮烈牺牲时才24岁。有一位苗族小战士，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苗子，在一次战斗中，敌人逼进村子，我们在突围中小苗子说：“我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孤身一人没有牵挂，我掩护你们撤离！”说罢爬上房，趴在烟筒旁扫射，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他用十多岁的宝贵生命换来了不少战友的安全转移。那一桩桩壮烈牺牲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在那频繁的战斗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可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激励着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雄儿女。

抗战胜利后，我从抗战前线转到地方教育部门工作。1949年初我曾在集宁二中办过训练班，给冒着生命危险投奔革命的青年讲政治理论和社会发展史。这个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干部，为解放绥远充实了干部力量。

1949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组织分配我入城到包头工作，在包头市文教局担任副局长。随着生活工作逐渐走向正轨，我爱好民间文学的念头又在滋长。在假日或业余时间，我经常到黄河渡口二里半向船夫们搜集些民歌。记得有一次回来的晚，城门关了，我就从排水道钻进城去。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我把采集来的民歌整理一番，寄到中国民研会，得到贾芝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希望我继续采集大量的民歌，包头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也很支持我这一工作。

1953年春天，我从包头调到内蒙古文联，这时有条件专注搞民间文学的采风工作。那年我首先深入到巴盟，下去一看，遍地是宝，我好象一个潜水员潜到深海一样，发现深海的宝藏是无尽的，它的魅力真使我陶醉。这浩如烟海的“爬山歌”，内容极其丰富，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美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民俗学等各个方面。这民歌出自劳动人民心窝

里，情真意切，绝不是随心所欲能编造出来的。

五十年代，我像大雁一样春出秋归历时8年进行采风，从大青山到乌拉山，从珊瑚河到乌加河，从准格尔到达拉特，在交通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跋山涉水全靠两腿、两脚踏遍长满红柳、白刺、菅草、芨芨的村村舍舍，走百里路，吃百家饭，采百家歌。和乡亲们越来越惯熟了，他们主动告诉我晚上碰到狼怎么办，独木桥怎么过的生活知识。他们有了头疼脑热的小病，就来我这里找药吃，因我自己买的小保健箱里，治普通病的药买的很全。他们有时逗笑说：“我们见过收猪毛羊毛的，没见过收山曲儿的，你这是头一个。”

我在这8年中，共采集到近三万首原始山曲儿，经过反复筛选，精选出五千首分为三个集子，于1953年、1956年、1958年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可是在十年动乱中这三集的版本都散失了。

我在1959年创作的短诗集《山歌有余韵》和1960年到兰旗创作的“兰旗组诗”都是用民歌体裁写成的。“兰旗组诗”被选在全国“诗刊”选编第三本上，并在1981年荣获内蒙古文学作品创作一等奖。其它诗作大部分发表在内蒙古《草原》月刊上。

1978年，我从农村返回工作岗位后，又重新把原来出版的三本《爬山歌选》中同类型的歌合并在一起，分上下两册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时间是1983年底。这本《爬山歌选》把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载入了书本，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我和郭超同志合写的《爬山歌论稿》一书，也于1983年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86年全国民研会在延安召开的“黄河歌会”上，《爬山歌论稿》中的一篇《爬山歌的夸张、想象、含蓄艺术手法简论》，被评为一等奖，并在1989年全国民间艺术节上，获得民间文学最高荣誉奖。

1985年一位巴盟的同志对我说，巴盟有两大食粮，我问他



什么？他说：“物质食粮是小麦，精神食粮是爬山调。不管是在地里劳动或家里干活，一哼上爬山调就忘了累、忘了愁。”实际情况也真是这样，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家八口人分了六个地方，下乡的下乡、下放的下放。在一个除夕夜，我没有一点儿睡意，千头万绪涌上心来，这时爬山歌伴随我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

我酷爱“爬山歌”，因为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出书过程中，我丝毫没有掺进自己的东西，尊重他们的原本原样。在十年浩劫中，有人说《爬山歌选》是“黑书”，我心中很坦然，我想总有一天会有正确结论的。

“爬山歌”是劳动人民在对自然和社会斗争中用汗水和血泪浇灌出来的散发着奇香的花朵。它和青海的“花儿”，陕北的“信天游”是姊妹花，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都有论述。

直到如今，一提起“爬山歌”，我就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好象又回到五十年代，有忆不尽说不完的情景，一组歌也就是一出戏。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信任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49年我担任包头市文教局副局长。1953年调绥远省文联，不久与内蒙古文联合并，即担任副主席。1958年内蒙古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又兼任民研会主席。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被选为中国民研会理事。1961年至1965年在内蒙古大学第一届文学艺术研究班学习，毕业后成为内蒙古第一批文学研究生。十年浩劫劳动下放，于1978年又恢复原来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职务。1982年被选为内蒙古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委员。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

## 著名中医邓子厚

春 甫

邓子厚先生是我市颇有名气的一位老中医。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祖国医学，尤其对妇科、儿科及疑难杂病的治疗，具有独到之处，人称“妇儿专家”。

### 一

邓子厚，又名邓纯，1913年10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坡街的一户穷人家。父亲邓生华，是一位小商贩，全家六口人，邓子厚在孩子中排行居长。其父为将来摆脱贫困，凭自己小本经营赚得几个铜币，供养邓子厚读书。他读完小学不久，就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当时大同市内准提巷有位道长，名叫实修，人们传说他身怀绝技，医术高超。邓子厚曾多次向父亲请求，想拜道长为师学习医道。在那时有种旧习惯，即拜师学艺要拿出一定银两，老师才肯接收。其父为此十分为难，便四处求情。道长得知邓子厚求医心情急迫的消息后，分文酬金不取，收他为徒。

1928年，邓子厚的理想终于变为现实，拜师于道长实修名下，开始学习医理。起初老师让他读医学《三字经》，并要求他在二个月内背熟。邓子厚不愧小学苦用功，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知识功底，结果一本书只花费了十几天的时间，就背诵得很熟练。如此非凡的记忆感动了实修，接着就让他读《药性四百味》、《汤头歌诀》等基础书籍。他把这些书的内容完全掌握了以后，老师又指导他学习《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

论》、《傅青主女科》等临床著作。他一边学习，一边随师行医。邓子厚聪明又勤恳，得到老师的器重，师徒朝夕相处，情若父子。跟师侍诊的第四年，实修有意地将临床经验传授给他，并指导他给患者诊治疾病。

1933年秋，有位小儿患者，其母抱来求实修道长诊治，实修就囑邓子厚给以检查，实修在旁边观看。这对初次上阵的邓子厚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他认真细心地检查完毕，并开了处方。实修问他：“你诊断是什么病？”邓子厚好象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顿咳病（相似于西医百日咳）。”实修满意地点点头，告诉患儿母亲，把这药服下去病就好了。邓子厚为了验证自己诊治的结果，第七天又专程去病人家追访，病儿已近痊愈，又服了三天药而愈。

之后，每当有求救于实修的病人，实修就让邓子厚来诊治，他在旁边指导。经过二年的临床实践，邓子厚基本掌握了实修的医疗经验，医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在他临出徒的前半年，实修将自己的全部验方、秘方及治病绝招传授给邓子厚。

## 二

1935年，是邓子厚学徒的第七个年头。一天，实修找他谈话说：“你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足够用了，自己开业去吧！”临行时，老师又送了他几册手抄本的妇儿医书，就这样，离开实修老师，走上了独立行医的路子。

同年，邓子厚在其父的大力支持下开办了一个小药店。他是坐堂医生，一边卖药，一边行医。要当一名堂堂正正的医生，名正言顺的医生，必须领取行医执照才行。否则，就是行黑医。于是，他在当地申请参加考试，经考试，以优秀的成绩取得行医证书。这时，他心里很高兴，请人给药店做了一个牌匾，取名“广生堂”，挂在药店门顶之上。门的左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坐堂大夫邓子厚”几个大字，十分醒目。门右边的一块牌子上写了一句吉祥语。挂牌的那天，“广生堂”很热闹，许多人前去祝贺。之后，邓子厚挂牌行医的消息在大同市内传开了。

正式开诊的翌日，有一小儿患腹泻病，一日泻十余次，泻下物清如水，时作惊厥，神志不清。其母哭哭涕涕求邓大夫救治。邓大夫检查之后，开了三味药，即滑石、甘草、朱砂。嘱患儿母亲把这三味药碾成细面，过箩，分成6包，用白糖水一碗加二包药粉溶化，频频饮服。服药当天患儿腹泻次数减少，神清，三天而愈。病家感激万分，逢人便说邓大夫是救命恩人。

1935年，邓大夫行医小有名气，参加了大同医师公会。

1938年，秋冬之交，农村患者刘某，女，40岁，筋骨无力，不能行走，慕名来大同求诊。邓大夫诊断为“痿证”，由肝肾亏虚所致。将虎潜丸改成汤剂服用一月而愈。

1939年，邓子厚医名渐起之时，日本人乘邓大夫到农村出诊之际，霸占了他的药堂，砸了牌匾。他回来就被抓到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军，严刑拷打，灌煤油辣椒水，逼供让他承认。就在坐狱期间，大同市内与郊区附近的患者们，接二连三地到宪兵队为邓大夫求情，证明他无罪。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了解，终于释放了邓大夫。出狱后他又患了伤寒病，经过治疗而愈。

邓大夫愈后，本想重建药店，再次开诊。可是，由于家庭破产，药店毁于日本人之手，实在无能为力。1940年他和马子昭、常辑五好友合伙做起了卷烟生意。他一边做生意，一边行医，走上了游医游民之路。

邓大夫做生意本来是家传，可是，他却偏偏没有这种能力，生意不到半年就倒闭了。行医治病才是他的本行。1941年，他游医到了阳高地区，恰逢一女性脱发患者，头部光净，仅枕骨粗隆处有三二根黑发，邓大夫仔细检查，诊断为肺虚脱发病，开了一个补肺气的中药方，服药两周，头部长满了小毛发，病人喜出望

外，又服几剂，满头乌发均匀致密。

1943年，邓子厚经过几年的医疗活动，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医疗水平还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渴望，尤其是给患者解答问题时，感到理论欠佳，就去天津国医学校深造一年。经过一年的学习，丰富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充实了自己的医疗技术。学习期满，在行医过程中感到得心应手。笔者从邓大夫的遗稿中找到这样一份病例：杨某，男，42岁，患遗精几十年。邓大夫见病人身瘦、牙松、盗汗、阳痿，脉虚大等，认为是脾肾亏损所致。尤其是肾阴亏，多为房事过度所导致。病人听罢邓大夫言语，羞涩地微微一笑，表示赞同。嘱他在治疗期间禁忌房事，医患合作，服药十余天病就好了。

1946年冬，邓大夫行医来到绥远省，在归绥车站“天亨粮栈”住了下来。翌年，又在车站“仁育堂”（现锡林菜市场附近）后院租了一间房，行医度日。

### 三

1949年，五星红旗升上天，邓大夫和所有中医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爱护。他返回大同，把妻室儿女接到归绥。后来仁育堂掌柜去逝，其妻无力支撑药店，将药铺转让给邓大夫、刘甫臣、姚效岐三个人合伙经营，并改名为“镒和圣”药铺。姚担任经理，邓大夫坐堂看病。邓大夫由于来呼已有几年，加之医术高，求他诊治的人很多。

1951年，卫生局办了一期中医进修班，他参加学习，经考试取得良好成绩，给他颁发了中医师证书，并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开业执照。邓大夫每天在车站“镒和圣”药铺坐堂应诊，日城大北街“万寿堂”药铺掌柜孟惠亭，听说邓大夫医技高超，再三请他坐堂，无奈之下，邓大夫答应每天下午前去应诊。就这样，上午在“镒和圣”，下午在“万寿堂”，整日奔忙。

1953年，有一女患者，31岁，怀孕5个月，突然出血3天不止，伴腰痛腹痛，求他诊治。邓大夫追溯病史，旧时曾流产三胎，多为五个月左右。后诊断为“滑胎”（习惯性流产），随处方胶艾四物汤加焦杜仲10克、川断10克，水煎服二剂血止痛减，再服二剂而愈。当孩子呱呱落地后，还给了邓大夫一张照片，以为留念并答谢。

1954年，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黄惠卿等中医，共同协商，成立了东顺城街联合诊疗所，黄任医务主任，邓大夫担任车站分诊所所长。

1956年，邓大夫的车站分诊所改为呼市医院车站门诊部。同年8月，他和呼市地区的许多中医，如黄惠卿、纪世卿、刘继明、郝明德、邓占元等都被请到了呼市医院，组建了中医科，并积极倡导成立了中医病房。群英汇聚，各显身手。

十年动乱期间，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邓大夫把上山下乡当作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的好时机，便积极报名，送医送药到农村。他先后赴郊区榆林公社、黄合少公社、土左旗哈素公社、凉城县程家营公社等地巡回医疗。在这期间，为许多患者解除了疾病，治愈许多疑难怪病。土左旗哈素公社有一患者叫白二毛，男，51岁，正在田间劳动时，突然觉得头晕眼花，两目发胀，耳鸣持续不断，不久耳聋失聪。听说邓大夫是从市里来的医生，而且是名医，就请他诊治。邓大夫检查后诊断为“耳聋”。认为此病是由烦劳过度，气虚不能上升所致。随即处方，益气聪明汤略出入，服药二剂，病除大半。患者复诊时说：“到底是城里的医生技术好，真是名不虚传呀！”

1968年，凉城县程家营有一农民李三小，38岁，一月前劳动出汗，又感受湿气，高烧不退，寒颤不已，自服“安乃近”烧已退，但日后头晕，全身沉重如负千金，食欲不振，面色、眼球发黄，大便黄，尿也黄，当地人称之为“发黄病”，且认为有死

亡的危险。由于医疗条件差，只用了一些民间方法治疗，效果不佳。适逢邓大夫前去巡回医疗，便请到他家诊治。邓大夫诊断为“黄疸”病，属于中医的阴黄。处方：茵陈蒿30克，大黄15克，枝子15克，枳实10克，木通10克，茯苓10克，黄柏10克，竹叶8克，服药八剂，黄疸如手取之，又服了几剂，身体康复。后来，患者专程到市里找见邓大夫，送了一块镜子，上面用红笔写了“妙手回春”几个字赠给邓大夫，做为答谢。

粉碎“四人帮”后，邓大夫心里很高兴，更加发奋地工作。组织上为了总结他的医疗经验，先后派了邓凤玲（现市传染病医院大夫）、高惠生（现市妇幼保健院大夫）、宋国祯（现市职业病研究所中医科主任）等作为邓老的助手。此外，还有次女邓凤兰（主治医，现回民区医院妇产科）、长子邓耀光（主治医，现回民区医院中医科主任）随时侍诊于其父身边，以继承他的医术。

#### 四

邓大夫医术高明，经验丰富。善长治疗儿科、妇科疾病。对消化系统的疾病有独到的研究。

儿科，民间称之为哑科。邓大夫认为小儿疾病虽然起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根本原因是外感六淫，食热之积较多。所以治疗时他最喜欢用一些消导除积药物，如枳实、焦三仙、炒莱菔子、槟榔片等。尤其患儿发热时，他常常在方中加槟榔片。他认为加槟榔可以使邪气从粪便排出，有利于疾病的消除。1980年有一小儿得了肺炎，在医院输液、打针、吃西药效果不佳，经人介绍来找邓大夫治疗。邓大夫给小儿开了一个中药方，其母是西医，也稍懂得些中药，她一看处方就问邓大夫：“为什么要在麻杏石甘汤里加一味槟榔？孩子又没有蛔虫病……。”邓大夫细心地给她讲其中道理：槟榔不仅有驱蛔虫的作用，还有驱除胃肠积滞的功能，孩子虽然是肺炎，是由于肺热肠滞所致。其母听罢赞

叹不已。小儿服药二剂，病除一半，又服几剂痊愈。

小儿腹泻是常见病、多发病。1980年，邓大夫对此进行了认真地研究，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总结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疗方药。药物用滑石、朱砂、甘草三味加糖冲服，治愈了无数例小儿泄泻病。邓大夫著有《小儿泄泻的诊断和治疗》论文，于1981年参加了在包头召开的首届内蒙古西部地区中医学术交流会，该论文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

癫痫病是小儿难治病之一。邓大夫独创一方，以呼市中药厂生产的“一捻金”20包，加胆南星、天竺黄、全虫、白姜蚕、朱砂各6克，研为细面，加入红、白糖蒸膏服，经他治疗数百人，屡屡见效。其子邓耀光曾用此方试治，亦取得满意效果。

邓大夫治疗妇科病有经验，他常对徒弟们和随他实习的学生说：“妇女之疾，以调气血为主，但勿忘疏肝。”他认为妇女情绪易动，对气血影响极大，故治疗注重调理气血。1975年，郊区西巴栅村农民云二女，妊娠七个月，胎儿跳动不安，常常自觉从腹部上冲胸中，胸憋胀满，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恶心呕吐。邓大夫接诊，切脉滑数，诊断为“子悬”，主要由于肝郁气逆所致。他以四物汤和血，苏梗、腹皮顺气，服药二剂而愈。

邓大夫不但治疗妇、儿科疾病有方，对溃疡病也有绝招。1981年，有一患者叫杨占元，40岁，患溃疡病10余年，体质虚弱，不能参加工作。邓大夫采用中药黄芪建中丸加了海螵蛸、贝母，治疗半年，溃疡完全康复，恢复了工作。

## 五

邓大夫行医治病，非常注重医德。他常对学生、徒弟、子女们说：“医者各有所长，万万不可自吹自擂。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学好医道。”曾和他一道工作过的呼市中医都对他敬佩不已。呼市医院中医科主任郝耀泽同志说：“现在的医生如果



都有邓大夫的医德医风，搞好工作根本不用发愁。”

1973年的一天，郊区黄合少公社五十家村的李玉民来求邓大夫出诊。正值中午，邓大夫放弃午休时间与他一起赶路。说来也巧，那天正遇洪水冲了下来，大黑河水深过膝，哗哗地流个不停。他淌水过河，及时赶到患者家中，为李玉民之妻诊治疾病。

邓大夫和农村患者结下了友谊，每当他到了村里，人们就纷纷找他诊治疾病。他曾治愈的患者也纷纷来请他到家里吃上一顿庄稼人的饭，以为感谢。有的患者专程来到邓大夫家里求治，甚至吃住在他家。

邓大夫解救了很多人的病痛，而他自己却患了癌症。他手术的前一天，哈素公社纪奎奎领着儿子，找到邓大夫的病床前，求他给儿子治疗癫痫病。邓大夫口述药方，让床前的女儿写下来交给患者。手术后，身体略有好转，他就忍着痛苦继续为患者诊治疾病。在他生命垂危之时，榆林村王三女，专程来求他治疗不孕症，邓大夫仍不拒绝，口述药方，让儿子邓耀光代写，这是他一生中开出的最后一个药方。

## 六

邓大夫为振兴中医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成绩显著。1963年当选为新城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74年至1977年，连续四次被评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1977年又聘为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委员。1978年市工会授予他“二级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同年，他又当选为呼市中蒙医学会理事。1982年11月26日与世长辞，终年69岁。然而，他的高明医术，高尚医德，纯洁人品，却永远为人们所称道。

## 著名助产士白本蓉

王希舜

在呼和浩特市城乡，提起助产士白本蓉、白大夫，上年纪的人都知道，都称赞！

白本蓉老人生于1903年农历十月初八，1991年2月27日逝世，终年88岁。她出生在原绥远省萨拉齐县城内（现土默特右旗）一家姓尤的贫农家庭。姐弟4人，她排行老三。由于家境贫寒，再加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她一出生，就被送到县城内耶稣教堂办的育婴院抚养。7岁那年，开始就读于教会学校，16岁高小毕业。因在学业上成绩突出，为人又忠厚老实，性格温和贤慧，被保送到山西省平定县友爱妇婴院助产班学习，毕业后由教会分配到归绥（现呼和浩特市）通顺街耶稣堂随瑞典籍女传教士瑞德逊实习助产兼学妇科医术。在她33岁时，也就是从1936年开始，独立诊治妇科病兼助产。同年在归绥市公安局附设的“平民医院”任妇产科主任（主要给妓院妓女治病与城乡孕妇接产）。

1937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归绥。白大夫不愿为敌人效力，辞去了“平民医院”妇产科主任职务，回家私人挂牌接产度日。在外出接产过程中，经常进出当时日伪几个设卡的路口，亲眼看到守卡站岗的日军及伪警察对过往的中国行人，百般刁难勒索，动不动就拳打足踢。这些野蛮行为激发了她为国雪耻，为中国人报仇，决不当亡国奴的志愿。她为揭露敌人，常利用接产走家串户的机会，到处诉说她亲眼看到和听到的日伪罪恶和暴行。1939年初她见到了在九龙湾巷居住的、当时在伪厚和市电灯公司

当司炉工人的杨森（系中国共产党归绥工委领导的“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总部的通信员）。杨森觉得白大夫在妇女知识界很有名气，有一定的号召力，是一个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抗救会”）很好的发展对象。从此杨森便有意识地接近她，经过短时间的考查后，就介绍她参加了“抗救会”。从此以后白大夫在地下党统一布置下，利用各种接触各族各界群众的机会，有计划有目的开展了抗日鼓动和宣传活动，传播党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打击敌伪军的胜利消息。在中国西北地区日伪统治中心的绥远城，“抗救会”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搅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敌人调集了大批军、警、宪、特昼夜巡逻，这样不但牵制了日寇大量的兵力，还瓦解了敌伪军政人员的军心。由于白大夫对“抗救会”分配给的任务完成得好，“抗救会”的主要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贾恭同志，曾多次当面给予表扬和鼓励。但就在广大“抗救会”员在地下党指挥下，在搜集敌人情报、策动敌伪军反正、组织宣传抗日群众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刻，1940年初却因叛徒告密和“抗救会”内部不坚定分子的变节，“抗救会”遭到敌人的破坏。白大夫和其他190余名“抗救会”员，于1940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前后被日本侵略者逮捕，被关押在东顺城街的厚和市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内。在审讯白大夫时，敌人严刑逼供，但毫无所获。敌人把她拉到正在对其他“抗救会”员吊打、灌凉水、压杠子、插竹签、狼狗咬等几十种惨无人道行刑场所，让白大夫看，逼她供出有关“抗救会”活动情况和逃跑了的“抗救会”员的下落时，白大夫只是说：“我是信奉耶稣教的，财神庙（‘抗救会’总部所在地）道教会和我们隔教，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哪里知道谁是什么‘抗救会’员。”经过近一年多的关押、审讯、拷问，挫败了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后，在1941年5月前后和其他几十名“抗救会”员一起假释出来。出狱后敌人派特务继续监视她的行动，但她仍然利用工作之便，更加隐蔽地宣传抗日，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特别是太平洋

战争开始以后，她及时向接触的群众，宣传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和中国国土上连吃败仗的消息。她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9年9月19日，归绥市和平解放后，白本蓉积极参加街道和市卫生局举办的时事、政治及党的医疗卫生学习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保护下，白大夫的阶级觉悟、爱党爱国思想有了很大提高。1952年7月，她积极报名参加了当时庆凯区小北街联合妇幼保健站，被推选为该站站长。1969年“文革”时期，呼和浩特市实行军事管制，玉泉区大北街、通顺街、小召前街、小北街、西五十家街保健站合并一起，成为玉泉区范围内唯一的集体所有制妇幼保健机构，白大夫被任命为负责人。同年，划归玉泉区人民防治院妇产科，地址在大西街，群众称为“大西街产院”，仍由白大夫负责。

1981年6月1日，玉泉区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妇幼工作会议精神，在小东街10号组建起玉泉区妇幼保健院，成为国家防治结合的卫生事业单位。该院以保健为中心，并开展门诊，又开展住院业务，对危害妇女儿童健康的多发病、常见病进行防治。从此妇幼保健院的工作，充分发挥了白大夫防病治病的高超技术才能。她78岁时退休，办理退休手续后仍坚持上班工作。

白本蓉大夫从事妇科、接产工作近70年。据她本人回忆，她双手接到人世的新生儿粗略统计有3万余人，有的现已年过花甲，整整有三代人了。白大夫在呼和浩特市城乡，特别是老年人当中很有名气，直至在她双目半失明、耳聋以后还有一些老年人，领着怀孕的儿媳或孙子媳妇、孙女等亲人上门请白大夫检查胎位。这种信赖是白大夫高超的医术换来的。

白大夫的一生，遇到过不少的怪胎和难产妇。如1952年在县府前街有一户姓李的农民，他的爱人难产，请来一位接生婆以后，产妇已经昏迷。接生婆不敢动手，急得其丈夫烧香磕头求菩萨保。

佑。在产妇、胎儿就要发生生命危险的关键时刻，亲友们请来自大夫，经检查是多胎，难产。产妇还在昏迷不醒，第一个胎儿已经露头，送大医院已来不及。白大夫冒着很大的风险，不慌不忙，用她高超的医技，先把孕妇苏醒过来，接着接出一双男婴，时间不大，又一个婴儿露头，这时在场围观的老太婆们就闲言乱语说是“生下怪物”。新生儿的父亲也听信胡言，也认为是生下三个“妨主”娃子，坚决不要。白大夫又用科学的道理劝说其丈夫。在新生儿父亲决不依从的情况下，白大夫果断地暂时把三个婴儿安排至西菜园农户家中，第二天上班后即向市政府、市妇联主要领导做了反映。在阮慕韩市长和市妇联负责人亲自关怀下，拨给专款把三个孩子培养成人。现兄弟三人都已成家立业，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白大夫热爱助产工作，积极推广新法接生。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号召推广新法接生，以保护妇女、婴儿的身体健康。她积极响应，以她亲身经历，生动的事例，开展了宣传工作。她经常对人们说，当收生婆，看起来血呀、尿呀很不卫生，但它是一门“济世活人”的工作。我这大半辈子生长在旧社会，亲眼看到在那漫长的民不聊生岁月里，孕妇临产，由左邻右舍，请上一位生过孩子或上些年纪的妇女给接产，根本不请，也请不到、请不起助产士，甚至连一个“收生婆”也请不起。接产所用的工具，只是一把没有消过毒的家庭裁剪衣服用的剪刀，把脐带剪断了事。遇到胎儿已露头，婴儿迟久不下时，就用指甲切破会阴，促使胎儿出生。胎盘下不来时，就把产妇的头发用绳子吊起来，拿草纸点着用烟在产妇鼻子底下熏。呛得产妇出不上气来，咳嗽不止，有时昏了过去。这不知断送了多少产妇的生命。白大夫继续说，解放初期，她在玉泉区西口外（即现在的公义店街）给一位产妇接产时，产妇对她说：“您老给我这次接产是我第十八胎，以前因为出‘四六风’（即破伤风或脐带风）就死了十二个

孩子，连这个孩子只活下六个。”她也经常遇到有不少城乡人，受几千年封建迷信思想影响，遇到难产，求神拜佛，烧香叩头，口念什么“催生娘娘催呀，送子娘娘送呀”，这样胡乱折腾，不知造成了多少新生儿的死亡。白大夫下决心在她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改变这种状况。

她看到许多家庭的婴儿出麻疹，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请医治疗，而是“门头挂红”（即用红布挂在屋内和家门头上），整个门户紧闭，禁止外人来往，家人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说，说是怕得罪了“送子娘娘”给大人、娃娃降灾。还有小儿高烧惊厥，群众俗称“惊吓着了”，要给患儿采取“叫魂”的办法医治。白大夫目睹这种“求神呀”、“叫魂呀”的办法为患儿治病十分痛心，也促使她决心不但要学好助产技术，还要学好婴儿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技术。但西医治疗，不是打针就是服西药。这些药品在20世纪初期是很昂贵的，穷苦的老百姓是用不起的。于是她又请教当时的名中医芦子裔、田秉树等，终于找到了易行省钱而疗效又好的办法。如婴儿出麻疹，一方面要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另一方面再服用少量叫“索索葡萄”的中草药，这样花钱少，见效也快。白大夫在她一生中用这种办法治好患儿是无法计算的。

饱尝了旧社会艰难的白本蓉大夫，对于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穷苦老百姓，抱有深切的同情。她从不嫌贫爱富，遇有穷苦人来请她接产，总是分外热情，不管有钱没钱，都认真接产。她常说，请我的人，都是穷人，当官的有钱人，都去“公教医院”（当时的一家教会办的医院）、“厚和医院”（日伪时期伪蒙疆政府办的一所医院）住了妇产科。“穷汉子多”，一年一胎，二年三胎，哪有那么多住院费。白大夫在接产时不怕脏，不怕累，不摆名大夫的架子。如婴儿窒息、假死，这是接产中经常发生的事情。遇有这种情况，白大夫总是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一累一头大

汗，直到把婴儿救活为止。由于她这种平易近人的医疗作风，所以人们都愿意请她接产。她的已故丈夫李诚隆大夫说：“我那老伴（指白大夫）每到接产旺季，十天半月，我们全家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不在家，上门来找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特别是夜间，每夜敲门求医的少则三、四次，多则六、七次。她总是说，归化城用新法接生的助产士不多，给穷苦老百姓安全接一次产，就会救一条小命儿。”李诚隆老大夫还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那是在解放前几年，大南街头道巷一家姓李的，和小东街一家姓孙的，大厅巷一家姓陈的，前后不到几分钟，相继来到白大夫的住处请她。三家为能请到她接产，互不相让。白大夫说：“你们三家住得都不远，我先到大厅巷打点一下再到头道巷，返回来再到小东街。我一看产妇，就能安排好谁先谁后，有吵的工夫早办了事了。”这才把这一场小风波解决了。

解放40年来，她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接产、妇幼保健技术，还先后培养了宁玉文、芦淑惠等131名徒弟。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孕妇，她还特意带了一名蒙古族徒弟——王秀珍。

白本蓉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着贡献。人民尊敬她，党和政府信任她，她先后光荣地被选为玉泉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区级先进工作者。白大夫在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接产、治病，人民将永远怀念她。

# 著名蒙医教授白清云

刘 春

白清云是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著名蒙医教授，主任医师。几十年来，他为我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培养出大批人才。同时，也为许多病人解除了疾苦，使无数危难患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从而博得了内蒙古地区以及全国医药卫生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敬佩。

## 一、生平与事迹

白清云，原名云丹扎木苏，蒙古族。1913年9月5日出生于辽宁阜新县十三区十二台村（西日拉台屯）一户世代为医的家庭。全家四口人，他排行老二。其父是医生，凭自己一技之长，维持生活。白清云8岁那年，被父亲送进西日拉台庙当了小喇嘛。幼小的白清云聪明勤恳，老喇嘛很器重他，有意地培养他学文化知识。由于他记忆力好，反应敏捷，经常受到表扬。

他经过6年的喇嘛生活，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卫生常识。在其父的影响下，他立志学蒙医，将来成为名医。1926年1月，其父指导他读《四部医典》第1卷。他埋头苦读5个月，掌握了第1卷的基本内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理论功底。之后，又开始攻读第2卷、第3卷、第4卷等医学书籍。

到1928年3月，他花费了2年的时间读完了《四部医典》。同年4月，随父行医到了突泉县铁桩子屯，在那里安营扎寨。从此，帮助父亲采药、配药、制剂，整日忙于医疗工作。随父临床实践



2年多，学到了许多本领，基本掌握了其父的医疗经验与用药特点。有时在其父的指导下也给患者处理一些小伤小病。

1931年2月，本屯有位医生叫王格尔，治疗胃肠疾病有绝招，尤其治疗各种泻泄病，药到病除。白清云为了学到这一高招，拜王格尔为师，王格尔大夫也了解白清云，认为他勤学好问，特别懂礼，就收他为徒。经过1年半的学习，王格尔毫无保留地将这一医术传授给他。说来也巧，本屯患者高锁，腹泻数日不愈，又无钱治疗，白清云得知这一消息，带上自己配的药去给他治疗，服药一天，腹泻停止。从此，高锁与白清云成了好朋友。

1933年春，白清云提出要走向社会为人治病，其父很赞同，把外面行医的大儿子叫回来，全家商量这件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件好事。从此，白清云走上了独立行医的路子。

20岁的白清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行医到达西科中旗图来毛都白音乌兰屯，为这里的人们诊治疾病。可是，有的患者一看他如此年轻，有病也就不治疗了，他们担心病治不好，又被骗了钱。适逢一患者，名叫阿玛，得痢疾两日，便下赤白脓血，一日数十次，里急后重，腹痛难忍，无奈之下，找他试治。白清云给病人配药治疗，病人服药仅两天，病如手捏去一般。他在这个屯治疗的第一例病成功了，随后就是第二例、第三例……直至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半，为不少患者解除了痛苦，有了点名气时才离开这个村庄。

1935年至1939年，白家四口人，其中三口人是蒙医，除白清云是初出茅庐之外，他父亲与他哥哥都是医术较高的医生。白家医名多为人知，求诊的患者很多。他父亲考虑到采药、制剂、医疗等方面的工作，决定将俩个儿子联合在一起，力求使其成龙配套。这样一来，白家医疗力量就更加雄厚了。他们先后在内蒙古东北地区科右中旗、突泉县，以及吉林省白城、洮南一代巡回医疗，深受患者的欢迎。

正当白家医名大振之时，不幸父母先后去世，这对血气方刚的白清云是莫大地打击，真是痛不欲生。经哥哥开导，才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与哥哥一道行医，并下决心，不成名医，誓不罢休。

1942年，白清云经过十年的医疗实践，完全继承、掌握了白家的医疗经验及蒙医特点。在铁桩子村乌兰屯居住期间，他的医术远近闻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幸哥嫂相继去世。白清云化悲痛为力量，勇敢地承担起白家的重担，将俩个侄儿与一个侄女收养起来。

1943年至1944年，他以行医为业，靠微薄的收入养活着侄儿女们，生活十分贫困。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临投降逃跑时，在东北地区施放了残无人道的细菌武器。通辽地区鼠疫萌芽，白清云日日夜夜出入在患者家中，为病人解除痛苦。

1946年，离乌兰屯不远的的一个村有位女患者，名叫白淑贞，年仅21岁，患腹泻病日久不愈，面黄肌瘦，身体虚弱，慕名求白清云诊治。白清云认真检查，严格配方，细心制药，满有把握地对她说：“你这病能治好。”病人充满了信心，服药仅一周，病情大减，又服一周而愈。白淑贞是有钱人家之闺秀，病好后重金酬谢白大夫，他婉言谢绝，只收了药物的成本费。白淑贞父母认定他是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就将女儿白淑贞许配给他，以此报答救命之恩。次年，俩人结婚，村里的许多人前去为他们祝贺。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了。医术高超的白清云，被乌兰浩特市喇嘛医学学校附属诊疗所聘任为坐堂大夫。从此，他在这里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医术，赢得了患者的信赖，求诊的人熙熙攘攘，接踵而来。

这一年，乌兰浩特地区发生了鼠疫，新婚不久的白清云大夫主动提出要参加这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经人民政府批准，准予参加。他高兴地回去和新娘子商量，新婚妻子不愿让他前去，他反

复解释，这项工作是救人性命的事，我做为医生就不能考虑个人得失，直至把妻子说服为止。临走那天，妻子高兴地为他送行。就这样，白大夫冒着自己被传染的危险，哪里有病人他就到哪里去，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当地鼠疫被彻底消灭。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他以高明的医术，辛勤地劳动救活了无数患者，博得患者的高度赞扬与好评。在工作总结时，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感到无限荣幸，把奖励他的一双白色筒袜赠给了妻子，并把功劳与荣誉归属于爱妻的支持。笔者采访其妻时，提到这件事，她露出微笑，喜在心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和广大医生一样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他认为兢兢业业地工作，全心全意地为农牧民服务，为各族人民服务，这是对党和政府的最佳报答。这年，有一蒙古族小儿，患腹泻病日久，多方医治无效，某日求救于白大夫，白大夫细心诊查，见小儿食指脉络已近入命关，惊风不止，认定此病危重，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粒小药丸，取四分之一给小儿灌下，一会儿惊风停止，第二天腹泻次数减少一半，服药四天病愈。

1950年5月，白大夫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联合敖连和（原内蒙古医院蒙医科主任）等七名医生，组织成立了乌兰浩特市第一家蒙医联合诊疗所，白大夫任所长。

白大夫任所长以来，深感责任重大，号召全所工作人员要为蒙医事业狠下一番功夫。他自己首先带头，认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全所职工的敬佩。1953年，大家一致推荐他为蒙医先进个人。同年，他出席了上级部门的表彰大会。

1954年，他考虑到诊所人员力量不足，主动向当地人民政府提出，自愿动员全市蒙医联合在一起，受到政府的高度赞扬，并批复采纳他的意见。他开始工作时，阻力非常大，有的蒙医破口大骂，态度极为不好，他忍辱受骂，披星戴月到各家做思想工作。

作，直至把全市的蒙医说服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工作，白大夫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了。1955年，乌兰浩特蒙医联合诊疗所成立，由原来的十几名职工扩大到几十名，他仍被大家推选为所长，挑起重担，为发展蒙医事业而奋斗。

1954年，他以突出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政府的好评，被聘为乌兰浩特市政协委员。他有生以来，首次享受着这样的政治荣誉，参政议政，共商国家大事，心里很高兴。以后又当了呼盟政协委员。

1955年5月，由于他在蒙医事业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做为蒙医先进代表，出席了呼盟地区中蒙医代表大会，受到了表彰。

1956年2月，他被调入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工作的消息传开时，联合诊所的全体人员恋恋不舍。白大夫临行前夕，全体人员对他作了如下鉴定：“性质忠厚，思想纯洁，生活朴素，态度和蔼，作风端正，经验丰富，技术良好。特别是对患者非常热心……”

1956年他被正式调入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任蒙医科主任。在工作期间，他向卫生厅领导推荐敖连和与辽宁阜新县“瑞英寺”主持喇嘛古那俩位蒙医，卫生厅经过审核，将这俩人调入呼和浩特市，并让他们三位蒙医筹建内蒙古蒙医进修学校。学校建成之后，他们又留在该校任教。那时来校进修的学生都是内蒙古各地医生。白大夫讲临床部分，古那讲理论部分。他们边教边学，又向来学习的各地蒙医学到了许多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治病绝招，丰富了自己。

1956年，白大夫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

1957年被评为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先进工作者。

1958年，他被调入内蒙古医学院这座高等学府，任中蒙医系蒙医妇儿科主任。年底，被评为先进个人，中蒙医系给以表彰。后又被推选为内蒙古中蒙医学会副理事长。

白大夫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常常在教学中穿插一些典型病例进行分析。如讲昏迷这一病症，他结合病例教学：某小儿昏迷十余天，大医院检查诊断不明，蒙医见其儿高热，体温

40.5℃，时有抽搐，追溯病史，素有惊风，见指纹色青，综合分析，应属蒙医热症。临床检验，服青木香四味汤一付而愈，只花费了四分钱。这一病例，学生们有口皆传，声称老师教学有方。

1960年至1963年，在这个非常时期，他坚信党的领导，刻苦工作，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院系两级一致评价他：“对三年连续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能正确认识，不叫苦。热爱蒙医事业，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对蒙医事业有一定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白大夫坚持工作，边教学边诊治疾病。1966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戈根塔那之子特木齐，患肾病综合症久治不愈，慕名去求白大夫治疗。白大夫以调节的方法，取豆蔻七味丸、黄柏四味汤等治疗一个月，病情明显好转。服药四个月，病愈。

1968年，中医系都格尔蒙医有一亲戚，男，21岁，患结核性肠痿，脓液常从腹部向外流溢，身体极度消瘦，内蒙古几所医院都一致认为难以手术，难以治愈。经白大夫诊治，内服巴布七味丸，外用甘布珠尔等，病情很快好转，后完全收口而愈，并毫无后遗症，这在蒙医中被传为神奇的疗法。

1974年，他担任内蒙古医学院党委委员。

1976年，海拉尔有一尿毒症患者，男，30岁，木匠，家里人用担架把患者抬来，慕名找白大夫治疗。并说此患者在沈阳医科大学诊治，医院已下无法救治结论，求白大夫救命。白大夫诊见患者全身脱皮屑，恶心欲吐，无尿，化验报告：尿蛋白（+++），红细胞（++），尿素氮54.5毫克%，二氧化碳结合力90.8体积%。诊毕随书方姜黄四味汤等，服药一个月，患者从旅馆骑自行车来复诊，病情明显好转，后又用药而愈。这一消息传开后，区内外慕名来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与原内蒙古党委书记尤太忠相识，并为

他治病，取得较好效果。

同年，内蒙古医学院召开科学先进代表大会，他被评为先进教师参加了这次大会，受到表彰。

1979年5月25日，内蒙古医学院给他晋升为蒙医教授。白大夫第一个夺得全国蒙医教授的桂冠。

1980年，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出席了这次大会。

1981年，我区组织的蒙医药参观团，以白教授为团长，苏荣扎布（蒙医医学院院长）为副团长一行九人，前往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参观学习。他领导全团同志认真学习外省区经验，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走到哪里，就为那里的患者诊治疾病，为几千名患者解除了病痛，在外省区影响很大。

同年，他又晋升为主任医师。

198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白教授被评为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者，受到奖励，并获得荣誉证书。

1985年2月3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推选他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2月28日，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聘他为学术委员会顾问，10月30日又聘他为蒙医学术顾问。

同年6月20日，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聘他为该会理事。

10月，白大夫去北京参加全国民族医药工作座谈会时，和武绍新（内蒙古中蒙医院蒙医研究室主任）、孔庆宏（原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副所长）联名向卫生部提议要注重民族医药学的教育等，受到崔月梨与胡熙明部长的重视，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后来，这俩位部长与白教授还交上了朋友。

1986年，白教授由于在民族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贡献较

人，内蒙古民委与教育厅授予他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1986年11月，白教授被《中医杂志》社聘为第二届编委会委员，参与评审全国蒙医论文。

1987年6月30日，《内蒙古蒙医杂志》编辑部聘他为编委会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为他在任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期间做出的贡献，特予表彰。

同年他当选为新城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年，自治区开始卫生系列技术职称评审工作时，他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白教授已是75岁之古稀老人，虽然离休，仍在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做贡献。12月20日，内蒙古老干部局发出了党老干字〔1988〕64号文件同意白教授享受厅局级待遇。

1989年8月，白教授应苏联布里亚特共和国卫生部的邀请，到那里访问，交流经验。沿途路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等城市时，在火车上为蒙古人民诊治疾病，受到蒙古人民的赞扬。9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他离休后继续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新贡献，成绩显著，颁发了奖状，评为先进离休干部。9月20日，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古巴大使馆一等秘书贺什格先生患陈旧性脑梗塞，以个人名义邀请白教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他治疗脑病。邀请书递交到内蒙古时，不幸白教授已离开了人间。最后由白教授的徒弟杭盖巴特尔代替老师前去为贺什格治疗40余天，病情好转归国。

## 二、学术成就与贡献

1958年，锡盟苏尼特左旗发生布氏杆菌病。他在防治布氏杆菌病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布病寻找出有效的治疗方药。他撰写了《布氏杆菌病的研究》的文章，油印成册，在同行

中交流，受到好评。他在这次防治疾病过程中，由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政府给他颁发了两面锦旗，予以表彰。

同年，以白清云同志为主翻译的《四部医典》著作问世，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四部医典》是藏医著作之译名，藏名叫《居悉》，全书分四卷，第一卷是基础理论，第二卷是较深的理论与药性，第三卷是临床部分，第四卷是疗法、诊断、器械等，这部著作是蒙医之经典。

1959年，他为了教学，编写了蒙医内科教材，供学生使用。

1976年，他对蒙医白脉病的治疗体会颇多，撰写了一篇《关于白脉病的治疗》论文，发表在《内医学报》(蒙文版)第一期。

1978年，他又撰写了一篇论文《关于结核性腹膜炎合并肠痿的治疗体会》，在《蒙医药杂志》第四期发表。后来，他又编写了蒙医妇科、儿科等教材，供本科生使用。

1979年5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聘请他担任蒙医分卷主编，他以科学方法，严谨治学之态度，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著作于1987年由内蒙古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

白教授对肾病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肾病的要害是“由热引起，热可生毒，热毒伤于肾则害”，这一新观点受到蒙医界的高度重视。用药时他主张在豆蔻十味丸的基础上加寒性药，如山枝子、姜黄、黄柏皮等。中国蒙医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段胜利（现阿盟蒙医研究所所长）是白教授亲手培养出来的，他对白教授的这一观点很赞成，根据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观点，为老师整理了一篇论文《关于肾病的论述》，于1980年在通辽召开的蒙医学术会上宣读，受到与会同行的好评。后来，此文被收入赤峰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蒙医论文集》。

尿毒症是难治病之一，白教授多年苦心研究，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即尿毒症关键点是寒热不平所致。治疗的主线在于平衡寒热，据时间寒热、年龄寒热、体质寒热等独特的蒙医理论，调整



寒热，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使区内外数十例患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的徒弟巴特尔已为白教授整理一书，暂名为《白清云治疗肾脏疾病经验》（待出版）。

1988年，<sup>①</sup>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蒙医副教授斯琴其木格为白教授整理一书《白清云医案》，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教授治病善用药引子，而且有一定规律可循。肾热病用姜黄四味汤，痰梨三味汤；胶原病用文冠四味汤；心脏病用檀香三味汤；肠道病用连翘四味汤；晚期疾病用汤秦25味丸。

白教授治疗小儿病不直接给小儿服药，而是给母亲服药，每多获效。

白教授有生以来，对蒙医学贡献很大，他曾发表过《脑血管意外的治疗》、《小儿麻痹症的研究》、《克山病的探讨》、《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体会》等重要论文20余篇。

白教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有一定研究，曾为区内外五十余例患者治疗过，据完整病例统计，治愈率达90%以上。如乌盟察右中旗运输公司会计李建荣，女，25岁，患红斑狼疮1年余，久治无效，慕名来诊。白教授一看化验单：末稍血象不足，血沉加快，抗“O”增高，类风湿性因子试验阳性，血中可见红斑狼疮细胞。白教授凭自己多年治病经验，先后用察格都尔丸、巴字尔丸、文冠木四味汤、桑拉帕等，仅仅治疗3个月，症状消失，化验转为阴性。他的徒弟杭盖巴特尔至今还保存着这些珍贵的资料。其疗效确实的方药，大部分是白教授自己配制的药。据杭盖巴特尔介绍说：“白教授这些方药疗效可靠，我们准备利用他的经验申报科研项目。”他本人准备将白教授治疗红斑狼疮的经验与50余病例案整理成册，留于后人。

1989年，杭盖巴特尔为白教授写了一篇“名医传”，约一千字，发表在《中国医药学报》上。

### 三、医德与人品

旧社会，白清云虽系医生，但没有社会地位。他生活很艰苦，非常同情苦命人。据原内蒙古中医院院长包文雅介绍说，有一人家里很穷，得了重病，请了几个大夫都没有去给诊治，原因是怕给不了几个钱。最后去请白大夫，白大夫没说二话，立即起程前去诊治。白大夫一看病情危重，精心救治而愈。后来，病人要卖房卖家产给他报酬，白大夫再三不让，并说服他们。老乡心里过意不去，就到白大夫家帮助干了几天活儿，作为答谢。类似的情况很多，他从来没有半点介意之心。

1954年，白清云在乌兰浩特市工作时，口头向党支部负责人吴德树、郭振英同志申请要求入党。随后常到爱国街街道党支部听党课。他要求入党心情急迫，先后用蒙汉文写过5份入党申请书，共14页，约五千多字，并写入党决心书一份。后经党组织的培养，于1958年7月15日正式入党。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忠心耿耿为祖国、为人民献出我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到底”。

1958年，锡盟发生布氏杆菌病，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派医疗队时，组织上考虑到白清云同志和妻儿正在患病，不准备让他去参加医疗队。当他知道这一消息后，向组织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己的困难可以克服；但，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拖病前往。他任工作组组长，带领医疗队深入各家各户为牧民诊治布病。对重病人他每日总要察看二至三次，病情平稳时才放心。苏尼特左旗布氏杆菌病指挥部主任巴吐敖其尔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并与白大夫成了好友。在工作结束后，巴吐敖其尔高度地评价白大夫，认为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对病人耐心细致，对业务刻苦钻研。

1963年，他患肺结核病，院领导关心照顾他，在工作中，控

制他的挂号数量，他却对领导说，“病人来求医，不能让患者失望”，并亲自说服挂号室的工作人员继续挂号，每天把所有等他看病的患者一一诊治完才回家。在他的先进材料里记载有这样一件事：住院患者索德那木，夜晚病情恶化，危急时刻，白大夫一夜守护抢救，第二天，领导让他补休，他婉言谢绝，继续照常工作。

1965年，内蒙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委员会组织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白大夫来到巴旗达来东公社行医6个月，为208户五百多人治过病，给牧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档案材料里巴旗工作组为他做了这样的鉴定：该同志任劳任怨为贫苦牧民服务，风来雨去，半夜有请他出诊的，他骑马就去。骑马累得腰腿痛，下了马不能走路，老大夫没有被困难吓倒，始终坚持巡回医疗。他很关心牧民的财产，有一天，突然大火冲天，火势燃烧的如八级台风。白大夫不顾个人安危，和牧民们一起救人灭火。他虽然年纪大一些，但经常为牧民拉水、捡牛粪等。并且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常常讲课到深夜。他不分昼夜，不辞劳苦，耐心诊治，有求必应，是牧民的好医生。

白清云教授医德高尚，人品高洁。他从医几十年，从不利用职业之便谋取私利。经他医疗的病人，有的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生命的人。

1976年9月16日，是内蒙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老干部乌兰格日勒终生难忘的一天。她含着眼泪对笔者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她患系统性红斑狼疮卧床不起一年多，全身浮肿，神志似清非清，想用手帕擦嘴却擦到耳朵上，红斑遍体，说话无声，肌体消瘦，病情危重，各种化验均为阳性，家里人已为准备后事。就在这生命垂危之时，白教授这天来了，诊毕就说：“你不要怕，我治过不少比你病重的都好了，一定能叫你站起来，走着路去上班……”经白教授精心治疗，半年她就站起来了。之后，白教授每星期日利用休息时间到乌兰格日勒家治疗、送药。有的贵重药如麝香、牛

黄当时医药公司买不到，白教授把自己珍藏的送给她，为她配药。如此昂贵的药材，白教授却分文不取。就这样，不分春夏秋冬，不惧严寒酷暑，整整义务治疗3年，从不间断，终于把她从死亡线上救过来了。1982年2月，她正式上班工作。同志们和领导见乌兰格日勒又上班了，无不赞美白教授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笔者采访乌兰格日勒之后，她担心笔者不能把这事实写出来，又亲自写了一篇《白教授救了我一条命》的回忆录，约二千字，作为补充。从材料看，她对白教授的医德与人品评价很高。最后写了这样几句话：“可恨的是我水平太低，写不出来。一句话，我和我的全家能有今天，全靠白教授救了我一命，千言万语表达不完感激之情。我含泪写的这份材料，泪水流的控制不住，实在写不下去了。”

白教授对有求救于他的病人，不问贵贱贫富，皆一视同仁。从国家领导到普通农牧民，他一样热情接待。

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巴拉吉尔其母病重，全身衰竭，白教授闻讯即去诊治。巴盟五原县白音刀亥乡农民李秀英，患红斑狼疮慕名求他诊治，他为初来呼市、又不熟道路的患者买药、配药、送药。然而，这些都是义务服务。吉林省白城市有一患者感激地说：“白教授心地慈善犹如观音菩萨，对我们穷人真好！”

1987年，国家领导人乌兰夫患冠心病，请白教授治疗。他先后共去3次，吃住在乌老家里约3个月，精心为乌老治疗。同时又给乌老之妻云丽文治疗半身不遂。他曾先后给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王铎、廷懋、塔拉、张曙光、巴图巴根、赵志宏、黄风岐、云署碧、石光华、呼格吉勒等都治过病。

白教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重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治学态度严谨，呕心沥血培养青年医生，为使青年医生成才，他甘做人梯。几十年来，桃李满天下，有不少弟子已成为我区医药界的骨干。如阿盟中蒙医研究所所长段胜利，蒙医学院副教授齐格

齐图；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副教授斯琴齐木格、讲师其木格、斯琴、斯日古楞；中蒙医院蒙医研究室杭盖巴特尔；铁路医院崔英、吴登等。

1988年，白教授因年事已高，组织决定让他离职休息。他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的心却没有一刻离开过医疗事业。他仍关心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关心学院的各项工作，奉献着自己的余热。他潜心整理自己的医案，把经验留给后人。他继续在牧民招待所、铁路医院蒙医科、内蒙中蒙医院等地出门诊，坚持为农牧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只要有病人找他，不分时间、地点，随找随看。在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过安逸，有的是繁忙的治病救人的活动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由于他离休后依然做出贡献，被内蒙古自治区离退休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聘为第一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白教授德高望重、医术精湛。求他看病的人来自内蒙古各族各界，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每当他出门诊时，患者络绎不绝，没有一次是按正常时间下班的。就是回到家里休息，也几乎很难找出一个没有病人登门求治的晚上。就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仍有不少患者求他诊治。他关心病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他临终的前一天，乌兰浩特市有一患者求他治疗，他仍然尽力诊治，晚上还亲自往病人住地打电话询问病人服药情况及病情如何……他就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心里只有病人，夜以继日地为病人服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89年10月13日晨7时20分白教授病逝 终年76岁。

追悼会上，医学院党委书记斯琴在悼词中说：“白清云同志的全部精力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医学教育和医疗科研，为培养蒙医人才和发展蒙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名好党员、好干部，使教育界、医学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蒙医教授。他的逝世，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特别是对蒙医事业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 朱静川大夫生平

朱国忠

朱静川，别名朱沛，因排行第四，所以乳名叫“四子”。山西省大同市人。1896年2月8日出生于城市小业主家庭，6岁父母双亡，由哥嫂养育，7岁上私塾习旧学5年。由于家庭财产破落，经济困难，弟兄4人分家自谋生路。出于生活所迫，他由大同来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就业谋生。经托人介绍在原旧城久瑞绸缎庄学徒，年仅12岁。学徒工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一天的劳动很是繁重，从早6点起床一直要干到晚上11点以后才能上床休息。什么杂乱活都要干，连店主家的尿盆也要他去给人家倒，有时还要遭店主和太太的打骂。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锻炼了他克服困难的坚强性格，激励了他以后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的意志。他决心利用工余时间继续努力学习文化，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知识的有用人才。经过三年勤学苦读，文化知识有了较大提高。资本家看他有恒心，能吃苦，人还比较老实，对自己发展经营商业有用，学徒期满后，定为正式店员。两年后叫他上街进货、收账，工资待遇每月1块银元。

十年店员工作，使他尝尽了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滋味。特别是有些老店员，为资本家劳动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人老体衰时，因没有钱入股而遭受冷遇，使人实在寒心。这些情景使他产生了厌恶商界工作，脱离商界，另谋生路的念头。由于他生性老实，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又有勤奋学习的优良习惯，被苏老先生（当年老中医，后为他的岳父）看中，将自己的独生女

儿苏瑞祥许配于他。婚后，仅靠他一个人每月1—2元钱微薄的收入维持其全家的生活。这时，他提出想跟随岳父学医。这一想法首先遭到哥嫂们的批评指责。他们说：“放着每月2元收入的、好好的生意人不做，非要学大夫真是胡闹。”好心的亲友也为他担忧，提出能否坚持到底、能不能学成、生活来源怎办等一系列问题。但他生性耿直，认定的事情执意不肯改变。他分析了自己的家庭状况，听取亲友们的有益意见，决心在不离开现在职业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他说：“我的决心是用3年至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攻下医务初步理论知识，取得行医执照。”苏老见他决心如此之大，平时也了解他刻苦学习的品格，也就同意传授指导。他就这样开始跟苏老学起医来。他说到做到，白天上工出差，晚上阅读医书，遇有理解不了、看不懂的内容就记下来请教苏老。在学习中医理论书籍的基础上，一有机会他就抓住岳父看病之机接触患者，了解实际情况，消化学过的理论。为了能把苏老多年来积累的医疗经验全部学过来，他经常晚上给老人烧茶、打大烟泡，和苏老交谈行医技术等。第二天天一亮他就起床背诵中医汤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医学知识在他刻苦勤奋学习下，在岳父老大人精心指导培养下，不断充实和提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26岁那年，红十字医学会和当时官府开考医务人员，他报名应考，一举考取，得到了行医执照。

一开始行医没有名气，医疗经验不足，看病的人不多，收入也少。这时，岳父在经济上给予他支持，帮助全家度过了难关。为了提高他的临床经验，苏老又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同行好友武成恩老大夫为徒。在武老师傅临床指导下，他的临床经验逐渐充实提高。开始他在市内行医。为了能看到更多的病人，丰富自己的经验，提高自己的医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他经常下乡深入呼市郊区为农民医疗治病。在农村行医时，

他调查农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搜集民间偏方，总结治疗经验，提高治疗效果，收益不浅，深受广大农民欢迎。他对贫苦农民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病求他，都尽心尽力地治疗，有时不但不收医疗费，还为病人无偿提供随身携带的药品。他联系了广大群众，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当时有的农民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提议叫他在本村买一些土地，由他们全年负责给出劳力耕种收割。他不忍心给农民增加负担，都一一以礼谢绝了。农村看病，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有病尽管看，看了不收钱，由农民自愿付酬。有钱给钱，没钱给粮食、农副产品都行。当时拿不出，等秋收下来再给也行，甚至看完病就在老乡家吃上一顿饭也就算了。他与广大贫苦农民交上了知心朋友。每年到秋收以后，忠厚的贫苦农民，把全村人要送的礼物，收集在一起利用进城参加集市贸易的时机，送到朱大夫家中。当然朱大夫家也就成了一些贫苦农民进城休息、睡觉、吃饭的地方了。随着自己的医术逐渐走向成熟，在社会上也有了声誉，为了有个较固定的行医地点，他就在当时的春林药房作了坐堂医生数年，后又改移到永春堂作坐堂医生。在当坐堂医生期间，他并没有忘记乡下的农民朋友，除为市内求医者服务外，有空就下到郊区，为贫苦农民医疗。由于他的勤劳和对患者热诚负责，向他求医的人越来越多。例如：有一年，大年初一，全家人正准备接“神”，突然有人前来请他去看病，他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香火，随来人一起去抢救病人了。当回来时天已大亮，别人家早已把“神”接完。他却说：“患者才是我们要接的真正的神。”正因为他这样对病人热心服务，又有一定的医疗技术水平，赢得了病人的信赖，上门求医的人逐年增多。这时，人们都建议他向所在坐堂药房投资股份，取得盈利赚得更多的钱。经过考虑，他没有这样去做。他说：“我要靠自己的亲手劳动和技艺来赚钱养家，不指望通过别的途径发财，这样生活我心安理得。”在这种思想观念指导下，他赚了一辈子



钱，都没买下一间房、一亩地，没投过一分钱去作买卖，但自己吃亏和被别人占便宜的事却经历了不少。例如，有人冒名顶替去抢他的病人，他不在乎；有人借钱不还，还要赖，他可以不要。朱大夫的心，全在患者身上。遇到疑难病人，久治不愈时他心里很烦恼。凡遇到这种情景时，家人都要忍耐着性子，对他说话都要倍加小心，防止他烦躁情绪发作。每当疑难病症得以解决，病人治好时，他回家来表现都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有时还要全家改善一次生活，吃上一顿饺子来祝贺。

1937年10月，日寇侵占了归绥市以后，朱大夫的心情十分沉重，决心不用中华民族的医学技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但是为了生存又不能不开业行医。所以每当日本人前来求诊时，他以医学水平低、没法治愈为借口应付了事。有一次，一个日本鬼子军官的老婆生病，闻知老人治病有术，前来求诊，让去他府上出诊。老人推说对妇女病治疗无方，几次推脱，激怒了鬼子，他们把老人毒打了一顿，但老人还是没有去给侵略者治病。八年抗战，他没有给日本人看过一个病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大规模内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压榨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人民哪有条件看病呢？看病的人数，越来越少。朱大夫家的子女多，生活发生了困难。他为了全家五口人的吃穿日夜奔波，也仅能维持全家低水平的生活。直到1949年呼市解放，全家的生活才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刚解放的这几天，老人就带上红十字的袖标为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解放军战士行医治病了。他的医疗工作又兴旺了起来。五十年代，党和政府号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与黄惠卿大夫积极组建了呼市第一个联合诊疗所。联合诊所组建后，他的工作热情倍增，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1956年，上级决定把他们的联合诊所划归呼市市立医院，联合诊所人员转为国家正式医务工作人员。后根据工作需要，他调到回民区医院工作，任小儿科主任。来到

回民区医院后，由于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大干了起来。年近60的老人，每天要诊断治疗临床病人几十位，最多达到近100多名患者。据患者回忆，<sup>⑤</sup>当时要挂朱大夫的号，必须早三点钟起来就去排队。老人经常从早上八点上班一直忙到下午6点下班，看病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连续不断，有时下班了还要延长工作时间。在那时，有不少外地病人如包头和其他盟市患者专程来呼市找他看病。有的患者花了不少钱到大城市去治疗未愈，却被老人治好了，他们非常感激。为了培养接班人，继承祖国医学事业，他在百忙中又亲自培养了四位徒弟，这样老人白天照常看病，晚上又为徒弟们讲课到深夜。他以言传身教、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既培养徒弟们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又使他们尽快掌握医疗技术。他培养的几名徒弟现在都是呼市医务战线上的主治医师。另外老人经常被邀请去会诊，处理呼市地区各大医院出现的疑难病症。如军区253医院就多次请他去参加会诊。由于他为人民忘我的劳动，成绩显著，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并晋为当时医务七级。朱大夫还是呼市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在开展的向祖国献宝活动中，他把根据自己多年医疗经验研究的小儿健脾丸等制作配方贡献出来，充实了中华医药宝库。他还向小儿患者家长传授抚育儿童注意的事项。他说：“要想小儿安，多受饥和寒。”以启发过度疼爱子女的青年夫妇。本来他很想抽出时间坐下来总结他行医五十年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文字材料留给后人借鉴。只因当时医务工作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一愿望。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给他贴出了大字报，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斗争。年近七旬的老人经不起长时间的批斗和打击，病倒在家，卧床不起，老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就是在家养病期间，他也没放弃一个医生为患者服务的

人道主义精神。凡来家求医的病人只要他精神好的情况下，他都给治疗，并且分文不取。“文革”后期老人被迫退休，离开了医务卫生队伍。这件事情，使老人身心又受到一次打击。正当他身体有所恢复、情绪趋向安定之际，不幸的事情又降临到老人头上，和自己相依为命的老伴，因高血压病复发，离他而去。这一沉重打击，使他身心上遭受的创伤久久不能恢复。从此，身体一天天的衰败了下去，导致肾脏炎复发，长期卧床不起，于1976年去世，终年79岁。老人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50多年来忠心耿耿为祖国医学事业献身和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人道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 归绥“共和医院”院长何秉如

希 望

当人们茶余饭后，顺着大召前街的柏油马路向南漫步溜达的时候，在该街的南端路东，接连有两个青砖砌成的门楼，上方有引人注目的几个大字“共和医院”。这是整修大召前街的设计者们，根据史料和“归化城”的老人们的介绍，为纪念这个医院的创始人和为原绥远省乃至祖国西北地区的医疗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何秉如大夫而保留下来的。

何秉如老先生，别名何清杰，祖籍天津市，生于1888年，早年毕业于北平军医学校第三期，先后在山东省地方部队、陆军第五师任军医长。后又在山西省旧军队中任军医。民国六年（1917年），辞去旧军队军医职务，来到归化城（呼和浩特市）住在友人周保久所开设的西医诊疗所，谋求职业。在此期间，他亲眼看到这座塞北古城，由于历届政府置人民卫生与健康于不顾，致使疾病流行。再加上当地农牧民，贫穷落后和封建思想的毒害，流行着“得病求神不求医”的习惯，因而夭亡者时有发生。此情此景，唤起了何大夫立志改变边疆地区缺医少药现状的理想，但苦于缺乏资金。就在这个时刻，归化城号称“三大号”的旅蒙商“大盛魁”的总会计因故自杀未遂，伤势严重，在生命垂危之际，经何秉如大夫手术抢救，很快痊愈。从此他认识了该号经理段履庄。在一个时期的交往之后，段经理对何大夫高超的医术和力图改变归化城及祖国西北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抱负十分称赞和赏识，为实现何大夫的愿望，就资助了一万多元的资金。

有了资金，何大夫就选择在归化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大召前街，动工修建占地约1000平米、洋式门面、内有37间房屋的“共和医院”。这是继洋人在大教场修建的“公教医院”之后，在归化城修建的规模最大、设备较好、技术力量较高的第一家私立医院。

医院开业后，为培养医疗技术人才，1920年，何秉如先生在“共和医院”后院内办起了“私立归绥医学传习所”，他自任所长。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节衣缩食，从医院收入中挤出一些钱来做为办学资金，购置了教学用的桌凳，编印了当时国内较为先进的医学课本。西医讲习班办了三期，每期三年，吸收了120余名具有初级医学知识与热爱医疗卫生工作的青年参加学习。课程有内外科、妇科、小儿科等，学员都是免收学费。师资除何大夫亲自授课外，还聘请了当时在归绥（呼和浩特市）的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生杨文治、李绍泉等轮流授课。与此同时，他还办了一期有30多名学员的助产班。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前夕，何秉如大夫准备撤退到抗日后方兰州，打算参加军队，为抗日将士救死扶伤。途经包头市时，他心脏病发作，住在好友陈继遵大夫开设的西北医院。康复后，返回已被日军占领的归绥市继续艰难地经营他所创立的共和医院。

1948年春，因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0岁。

据归绥耆老们介绍，何秉如大夫把自己创办的医院叫“共和医院”是有其时代意义的。那时候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复帝派与“共和”派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他毅然决定把他所办的医院命名为“共和医院”，借以抒发他拥护“共和”的意愿。

据年过八十的陈继遵和归绥耆老们说：“何大夫抱负远大，济世活人，医技高超，医德高尚，是医务界的楷模。”这充分概括了何大夫的一生。

# 从事中医多半生的回顾

黄忠卿

## 昔今梗概

我于1916年生于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黄官城村。幼年读书，青年继承舅父中医之术，迄今已五十多个春秋。旧社会，国民党政府曾对中医下令取缔，加上军阀混战，身心不安。日寇侵华，险丧生命。无奈来到归绥（呼和浩特市）投亲，从医为生。新社会，党和政府对中医非常重视，我内心特别高兴，决心在才华丰盛之年努力奉献。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突然袭来，我深受其害，心情特别悲观。“四人帮”垮台，雨过天晴，重见光明，我精神焕发，继续为祖国医药学和科研努力奋取，从而获得许多荣誉。而今我年逾古稀，亲眼看到我市和全国一样，巨大发展，万分高兴。我愿意发挥余热，继续为人民健康贡献毕生力量。

## 一、继承中医前后

1924年，我8岁。入本村塾学后转到离村1华里的沟里村高等学校学习，毕业后务农。因舅父是当地闻名的中医，我深受影响。一日我问舅父：“我能学会中医吗？”答曰：“人非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也。只要专心学习，不仅能学会，而且还可精益求精。”此言鼓舞了我继承中医的信心。我于1932年（16岁）便随舅父学习《四部医典》及历代医家名著，并不断随诊见习，由

于舅父的亲教口授，5年后自己可以诊治一般常见疾病，从而出师。

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中医不科学，曾于1929年下令取缔中医。当时引起全国中医的反抗，北平、上海等许多城市的200余名中医联合起来去南京政府请愿，以理据争，才迫其不得不撤消禁令。以后又以“自生自灭”的政策对待广大中医，以致中华医学无力振兴。当时国内军阀混战，以后又日寇侵华，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伪时期，因我村在铁路旁，被划为“爱护村”，日寇时常抓农民当劳工受苦。1938年春节，日寇因抓工一事，将离我村一华里的沟里村、沿家佐村全部烧光，并枪杀了1000多人。许多青年被迫逃往他乡谋生。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逃往“口外”的。

我们10余人于1940年3月来到归绥，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来到归绥后，我在新城北门乡兄黄五辈家中居住。他知我是新学会的中医，说住一个时期可以给病人治病。这年9月，日伪警察署卫生股布告招考社会无证中医，乡兄动员我前去报考。参加考试的共9人，考准3人：王凤岐第一，我第二，任梦林第三。均发给《中医证书》，准许个人行医。

## 二、初来归绥从医情况

取得《中医证书》准许行医后，我的心里压力很大，自己认为由农村初来城市，医技浅薄，经验不足；又听说归绥市新旧城有中医80多人，其中有名的也不少。如新城冯尽忱（号称冯医官）、旧城芦子裔、芦耀华、张品三、宿华庭等。而我年仅20多岁，这怎能吃得开呢？因而顾虑重重。复经再三思考决定：一是认真复习医典，以中医理论联系临床实践探索；二是对病人诊治细心，和蔼如亲，有钱的可收“脉礼”（诊费），无钱的不要；三是实事求是，知者为知，不知者为不知，慢慢地来；四是同老

中医加强联系，虚心学习他人之长。

就这样，在本地乡亲的协助下，开始了中医生涯。一日，我乡兄说：“有一位好友，是新城酱铺的曹掌柜，两年来患病卧床不起，明天我让人领你去给看看。”第二天，有人领我前往。

曹掌柜，男，57岁。经“四诊”：望其面白颧红，鼻色暗黄如土；闻之呼吸表浅；问其言声微低；诊其脉浮而无力。据此，系久病阴气不能内守，阳气外浮反照之凶象，属危候命绝之兆。诊毕后，同家人安慰未开药方，便回家。乡兄问：“曹掌柜病怎样？”我说：“据诊病情，甚危。最多活不了半月！”兄听后惊说：“我得快去再看看。”他看后回来向我说：“你走后，人家又请旧城某中医看，给了方药，说没关系。你可不要随便讲，你年轻又刚到此地……”之后，果于第13天逝世。兄得知后和我说：“你能知他活不长了……”赞叹不已。

不久，旧城某绸缎庄的一位太太陈某求医，她34岁，经问诊：半年来患阴道出血，时多时少，血色紫黑有条块，下腹时而隐痛胀坠，久治不愈。“四诊”以后，我诊断为“崩漏”。病因是宫寒血瘀所致，瘀血不去新血不能生之故，谓之“通而不通”的病症。治法当宜温经化瘀，使瘀血去，其新血则生，才能痊愈。遂拟一方内服药2付。

两天后，同乡前去看她，问药后怎样？她说：“那药未吃，因我病已经几位老先生看过都无效，这位年轻中医怎能治好呢？”同乡说：“您没吃这药怎么知道？不妨试试嘛！”她听后便服了这两剂，果然肚痛消失，子宫出血亦减少了。随后又派人请我复诊，病情确属好转。不更方，再3付药后痊愈了。

然而，在诊治病人中，有的患者治而不愈。某日一男，43岁，两月来小便不利，小腹满坠欲尿不出，甚感痛苦。曾经几位中医诊治，以利尿方药无效后，邀我医疗。我认为属“隆闭症”以利小便为主诊治，但亦不愈。患者又请芦子裔老夫来看，4



剂药显效，又4付则愈。为了学习他人之长，我便去向芦老夫夫请教。他说：“这位病人属于肾水亏竭，无尿可利，焉能治愈。必须以大剂补水，使水液充足，其尿自利才好！”听后深受教益，进一步提高了辨证施治的水平。之后，从乡兄家迁至新城鼓楼东侧32号，每日上午在此门诊，下午便到旧城北门外福昌和药铺坐堂应诊。但由于旧社会多数人民生活贫穷，许多人患病无钱治疗，我除对穷人不收诊费外，有时还给无钱买药的人付药费。如一位拉三轮车的赵某，他老母病重无力治疗，我给她诊后给了1元钱去买药，病愈后他非常感谢。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倒也是不少的。

### 三、解放后的中医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中医十分重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便对全国中医甄审，我报核合格发给《中医师证书》。同年，呼市卫生局举办中医进修班，一年期满，发给《毕业证书》。1953年，呼市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西医李信三当选主任，我当选副主任，领导全市个体开业医师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在学习了“组织起来”这篇文章后，大家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一致同意于当年8月成立了呼市东顺城街第一联合诊所。此乃是我让出自己的住房与大家集资办起来的。大家共同选我任所务主任，郎永和任所长。开诊后不仅常见病很多，疑难患者也不少。于是不久中医邓占元、邓子厚、冯尽忱三人亦志愿参加，并将邓占元选任副所长，将邓子厚、冯尽忱二人派往火车站成立了分诊所。我们这个联合诊所的全体医务人员，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受到患者的好评，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并带动了全市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继而也不断地联合起来了。

1954年我当选呼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府委员（连任二届），并被选为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大代表（连任三

届)。同年参加呼市组织的人大代表团参加“国庆”典礼，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在观礼台见到毛主席。我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

我记得，就在这一年（1954年），党中央毛主席，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解决我国各医院没有中医的局面，制定了“党的中医政策”。《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请中医进入医院大门”等文章，各省市报刊也发表提倡中医工作的文章，中医界也随之振兴起来。

#### 四、中医进入医院大门

1956年，呼市党政和市卫生局领导，将我们东顺城街联合诊所的全体人员和财物纳入了呼市医院，成立了中医科与针灸室，任我为中医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市医院除设中医门诊外，还成立了中医病房，病床由35张很快发展到70余张。当时全国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呼市医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抽调内科主治医师沙仁图亚、齐保英二位同志到中医病房学习，并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工作，以及中医给各科实行会诊。从而，我到外科，在希拉太主任的协助下，开展“阑尾炎”不开刀以中药治疗，有300多例收到良好效果。还在妇科以中药治疗“宫外孕”亦获得成功。

于是，我除定期门诊外，主要在病房开展对肝病、胃病、肾病、肺病、关节病、妇女杂病等科研医疗。并作了完整的病历总结论文，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5周年在《内蒙中医论文汇编》中发表了8篇。同时还开展“中药避孕动物实验”研究和研制了“针灸仪”、治疗烫伤的“蛋发膏”等。在兼任呼市地区中医学学会副理事长时，在学术会议上多次作经验交流，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奉献。

但是，我正当年富力强，在中医技术不断提高之际，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一片“打倒”声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新内人党”等大帽子，关进“牛棚”，而时加谎言批斗，致使身心受到严重的折磨，同时左下肢致残。更可恨的是，将我多年积累的中医资料和许多古医书籍查抄一空。1971年又被下放到农村，我凭着一心为人民做点好事的热情，带着身残为农民看病，为社队培养了赤脚医生。

1976年10月，科学的春天终于降临祖国大地。林彪、“四人帮”打倒了，强加在我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给予平反后，我又回到市医院中医科，并恢复科副主任职。

### 五、调市中蒙医研究所

“文革”后，呼市卫生局根据我市的具体情况，成立了中蒙医专门研究机构，以便发展中蒙医事业。遂派在呼市医院中医科工作的刘润平同志和我二人去负责筹备工作。很快筹备就绪，于1979年1月在呼市大南街成立了呼市中蒙医研究所。并将我和针灸中医师杨九成、著名老蒙医沙拉布朋斯格等人调来。不久任命我为该所副所长，并晋升副主任中医师、主任中医师，同时兼任呼市中蒙医学会理事长。以后我被选为内蒙古中医学学会常务理事，呼市政协第五、六届常务委员。这时，我一面门诊为患者服务，一面抓紧整理临床经验和总结中医药研究工作。

由于多年来除对中医各科杂病诊治外，对妇女疾病诊治为多，所以探索了一些经验。我认为妇女疾病在“辨证”中主要抓一个“血”字，因妇女“生理以血为主，其血属阴，畏寒喜温”。妇女多因寒以致血瘀发生各种月经病。所以，在“论治”方面，常在月经期给予“温经化瘀”之剂内服，疗效甚佳。对其妇女平常所发生的疾病，在“辨证”中还要抓一个“气”字，因妇女情志善郁（爱生气），而其气为血之帅，气滞则肝郁，肝郁不舒易

伤脾，就时常发生各种病症。所以，在“论治”方面，惯以舒肝解郁，使气调达，其诸症则速愈。同时，不论气滞或血瘀日久而致“虚”者，亦不采用“补”法治疗，而是常以舒、调、益、和之法，灵活化裁方剂施治，才能获得“治病求本”的效果。因而我逐渐形成了一门中医妇科诊治常见病和疑难疾病的学术思想。

我认为：医者之术，理应传于后人，莫过于撰著成书。但必是亲治其症、实践获效者，方可传于后人。而对治之无效或有失误者，亦应例举，以便后人治验再补。绝不以妙语成重或揣度立方及抄袭古今医家之言去贻误后人。

于是我在1981年完成《妇科证治验录》一书，198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后，受到中医界的好评。如浙江中医药研究所竹剑平教授在《内蒙古中医药》杂志1986年第三期发表书评说，《妇科证治验录》一书的特色是：一、编排新颖，别具一格；二、化繁从简，突出重点；三、注重临床，不囿旧说；四、强调腹诊，颇有启发。同时我还收到许多地区中医的来信，一致说这一妇科专著的论述毫无抄袭之嫌，实为个人临床实践经验之谈……这本书获得呼市科协的评奖证书。我于1986年12月1日参加在福州市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三次中医妇科学术会议，在会上，我介绍了诊治妇科的经验和学习了各地中医专家治疗妇女疾病的特长。随之撰著了《诸病医悟要言》一书（待版）。我先后写各种论文30余篇，多在省级、国家级杂志上刊载。

在培养后继人才方面，自到医院从事中医工作以来，除任中医教学外，先后带中医徒弟20余名，其中包括自己的3名子女。他（她）们不仅已经成为各医疗单位的骨干，而且有的在中医药科研中已有新的发展。例如黄海波，从学习继承中医经验后，在呼市中蒙医研究所临床工作中，刻苦钻研，在诊治妇女月经病所致的“不孕症”中，发现了男性精子异常甚至无精子等。因而他断言曰：“妇女不孕乃经病，经调无子者，男性之故也。”于是研

究中药组方，制成各型号的“增精丸”。经实践验证于1984年获得良好效果。从而推翻了有史以来男女婚后无子都归咎于女性的说法，而且为计划生育、男性不育的治疗开辟了前景。黄海波在《大众医学》上发表了这一新兴学科的论文，1985年1月美国《中报》获悉予以刊载。随之《内蒙古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健康报》等省市报刊亦予转载。从而全国各地的“男性不育”的患者不断的前来就诊。1987年5月，黄海波在首届全国中医男性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增精丸治疗男性不育症376例临床观察》报告，被评为优秀论文。他被接纳为中华全国男性学科学会成员，并由日本男性病研究会吸收为会员。还参加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的《中医男科临床治疗学》一书的编写，此书1991年1月出版，他还发表了论文多篇。

中医师黄海超和我，根据中医“外治法”理论，结合临床实践，研制出黄氏保健系列品，经呼市科委鉴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批准，由呼市中药厂、呼市福黄中医药保健制品厂生产。并由新加坡达远进出口有限公司为亚洲总代理销售到许多国家，深受欢迎。

鉴于此，我被呼市卫生局和单位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同时《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报》几次采访，以不同的标题、图片等予以报导。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等部门联合发给我“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1985年呼市政协召开“政协委员为四化做贡献”表彰大会，授予我《荣誉证书》与纪念品。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前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才科学研究所等部门在编写《内蒙古优秀科技人物及成果》一书中将我列入这一史册。1987年，中国《瞭望》周刊31期外文版以“一个各有建树的塞外中医世家”为题报导了我及我的子女。1990年7月，《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将我选入这一史册的第一卷。

## 六、离位志不休

我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多个春秋以来，饱尝旧社会之苦，深得新社会的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会有后半生的工作成就和生活的幸福。

我于1988年退休，除兼任中蒙医学会名誉理事长和内蒙中医学学会名誉常务理事以及呼市政协老委员联谊会委员外，仍于每周二、四、六上午去单位门诊，热情地为患者服务。吾今虽然年逾古稀，仍要象一棵不老松那样，每逢春风之时生发新的枝叶，迎夏季番秀，废秋令容平，保冬气闭藏，年复一年，永为我国四化建设、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为广解民间疾苦做出应有的贡献！

# 人民医生的楷模

## ——记舒兆勋医生

晓理

舒兆勋，满族，北京市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选择了大夫这个职业，他在这个岗位上辛勤工作了三十年。经他的手治疗和抢救过的病人数以万计。他用自己高超的医术和模范的医德换来了呼市地区人民对他永久的怀念。在搜集舒兆勋生平事迹的过程中，许多患者回忆起他当年为自己治病情况时还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每当谈到“十年动乱”中亲眼看着他遭受迫害的情形，又忍不住痛哭失声。在市医院党委组织的舒兆勋史料征集座谈会上，舒兆勋的同事和学生们都说道：“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舒老，没有忘记他对呼市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贡献。”内蒙古政协副主席陈炳宇同志也指出：“老舒的事早该写一写了，这是教育青年人的好材料。”

### 一、艰难的求学道路

1910年10月9日，舒兆勋出生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中。其父舒星阶先在私塾馆任教，后做家庭教师。他相信“忠厚传家久，书香继世长”的人生信条，所以对自己的孩子提出的要求只有四个字：知书达理。受父亲的影响，舒兆勋从小就喜欢读书习字，但因父亲收入微薄，母亲体弱多病，弟妹年幼需要照顾，迫使舒兆勋从小就分担家务，无法早日入学读

书。1918年，8岁的舒兆勋入北京西郊第一小学学习。这所小学当时就在万寿山前的二龙闸，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可是他在上学下学路上从来不敢贪玩，一怕耽误了学习，愧对父母；二来惦念着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想早点回去照顾。四年级时，母亲病逝，父亲又常年在外教书，兄妹三人只好暂时寄养在姨母家中。家境的艰难，使舒兆勋很早就懂事了。他知道，只有学习好，才是对父亲的唯一安慰。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五年级时，他以全优的成绩提前考入位于西郊的北京温泉中学。这是一所新式的学校，校内开设法文课，法文教师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这也使舒兆勋在中学时代就打下良好的法文基础。1927年，舒兆勋中学毕业，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年代，父亲的收入毫无保障。为了分担父亲的重担，舒兆勋忍痛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愿望，四处托人找工作。然而，面对着日益萧条的社会经济，找碗饭吃谈何容易。奔波一年，终无结果。

1928年，17岁的舒兆勋只身离开北京，到上海投亲。他原想托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姑父齐麟阁找个工作，可谁知到了上海，才发现上海也到处是沿街乞讨的穷人，想找工作比北京更难。齐麟阁经济收入尚可，膝下又无子女，他见内侄天资聪慧，便生了供舒兆勋继续上学的念头。舒兆勋喜出望外。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1928年暑假后，他考上了上海震旦大学预科。

震旦大学是一所9年制的大学，预科三年，本科六年，学校全部用法语授课。由于舒兆勋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在同学中渐露头角。预科毕业后，他升入本科部专攻医学，选择了治病救人为自己将来的职业。就在他努力编织理想的花环时，又生了变故。他的姑父突然病故，经济来源又告中断。舒兆勋太热爱自己的专业了，他不愿中途放弃。他见上海《申报》上有“自我职业介绍”栏目，便刊登了广告，想搞半工半读。正巧，上海华侨银行新招的六名职员想补习国语（汉语）。协商之后，舒兆勋每天



晚上七点到九点到华侨银行宿舍给他们上课，用每月30余元的收入来缴纳学费和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说少年时期丧母的沉重打击没有使他在学习的道路上止步，青年时期的艰苦生活就更加锻炼了他的性格。白天，他除了和别人一样听课，做实验，完成作业外，还得抽空为晚上的教学内容备课；晚上教完国语回到亭子间里，一边啃着冰凉的馒头，还得一边学习外文。由于生活的拮据，别的大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他只有一件出门时才能换上的长衫。为了节约一些钱来买书，他每天去当家庭教师时，十几里的路程总是步行往返。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1938年，舒兆勋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医科博士学位。

震旦大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有钱有势的学生毕业后或者私人开业，或者留在大城市中的教会医院工作。舒兆勋年轻气盛，又没有高亲贵友，在找工作上自然属于受排挤之列。特别是当时正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全面武装侵略，社会动荡，许多医院关门。尽管此时的舒兆勋已经有了医学博士的学衔，但是多方奔走数月，仍然无人录用。好在因为他学习出众，在学校内小有名气，校长胡文跃对他的才华十分赏识。当舒兆勋走投无路的时候，胡文跃校长私人出面介绍他到张家口崇礼县西湾村的教堂诊疗所当医生。从此，他告别了大城市，开始了乡村医生的生涯。

## 二、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

西湾子教堂的诊疗所，设备简陋，药品缺乏，只有两个护士在工作。舒兆勋到这个诊疗所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他千方百计委托同学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买药，或者自己动手用动物油脂代替凡士林油膏来配制外用消炎药品。对来找他看病的人，他总是给予细致的诊断和耐心的讲解；对于那些难产、摔伤、昏迷、无法行动的危重病人，他不论雨雪风霜，不分白天黑

夜，总是骑着马只身出诊。对于慢性病患者，他经常抽空赶到家中观察记录病情的变化和用药的效果；对遇到的疑难病症，他也要通过反复查书或写信向老师请教而最终确诊并给予治疗。在一次出诊途中，听说附近山沟里有一位以烧瓦盆为生的老人，天天都犯头疼病，痛苦不堪又无钱医治。舒兆勋连家也没有回，主动前去探视。检查后发现老人患的是脑囊虫病。这种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医治的。舒兆勋望着老人那痛苦的表情和期待的目光，安慰他说：“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治病。”从那以后，舒兆勋反复摸索，大胆尝试，三天两头送药进山，最后竟使这位老人奇迹般的痊愈。这件事很快传开，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感到舒大夫不光对人和气，而且本事也不一般，有了病都愿意去找他。

舒兆勋在农村行医整整七年，为当地四千多户人家中的绝大多数人看过病。病人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贫苦的农民。为了早日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不但经常免费诊断，而且慷慨解囊为病人代买药品。有的病人述说，自己病倒后全家人衣食没有着落。他一听说，就立刻写条，支取一部分个人薪金交给病人带走。由于他对病人负责，当地人民同他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孩子、乞丐也认识他，盲人都熟悉他的声音。7年的乡村医生的生活，使舒兆勋的医疗技术得到实际锻炼，也使他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有了清楚的认识。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还不懂得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但他已经通过亲身的经历，体会到那些贫苦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医生。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标准：“当大夫的就应该一切为了病人”。

1945年春天，舒兆勋离开了西湾子村的诊疗所，应归绥公教医院的邀请，来该院担任住院医师。这所医院是由比利时天主教会于1923年创办的，当时已有130张病床。是北京以西，长城以北的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中设备齐全，医疗技术先进，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医院。这样大的医院，原来根本轮不

到舒兆勋来工作，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才使他离开西湾子村。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法、比、荷等国相继对日宣战，日本侵略者为了独占内蒙古地区的利益，就在1943年把绥远地区所有的外国人全部拘押到山东潍县。原来由外国人管理的归绥公教医院改由中国神甫王学明代理院长，医生中也只剩下震旦医科博士王聘臣和袁锡康二位。由于人手不足，王、袁二人向院长推荐他们的同学舒兆勋，并写信相邀。但舒兆勋对绥远一点也不了解，再说他在西湾子地区已经有了较高的声望，当地人民不愿他离开，所以对同学的邀请婉言谢绝。1944年，袁锡康大夫辞职离开医院，公教医院又从上海广慈医院请来蔡福祥博士工作了一年。到1945年，公教医院因缺少医生，几乎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王学明再次写信，王聘臣持信到西湾子请舒兆勋。盛情难却，舒兆勋答应先来试试，遂与公教医院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从此，公教医院挂出两块医生的名牌：王聘臣博士、舒兆勋博士。由舒兆勋负责内科、儿科，王聘臣负责外科，两人配合做手术，同时又都兼任该院护士学校的教员。

初到归绥，当地群众对他不熟悉，找他看病的人不多。舒兆勋一度感到自己离开西湾子来归绥公教医院这一步路走错了。然而，没过多久，情况就有所变化。一次，一位西湾子地区的农民身患重病又身无分文，他报着一线希望，千里迢迢赶到归绥找舒大夫看病。病情是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病人哪儿有钱住院啊！尽管当时公教医院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在看病时收费较低，有人甚至可以免费——那需要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从中介绍才行。舒兆勋刚到归绥，人微言轻，还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就把这位农民接到自己家中吃住，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给他以治疗。病人康复后，对舒兆勋感激不尽，逢人就讲这件事的经过和舒兆勋在西湾子的为人。舒大夫的名字在归绥地区的人民中逐渐

传开，上门求医者日益增多。

舒兆勋亲身经历过贫寒的生活，所以在行医中对贫苦的劳动人民格外同情。呼市地区的老工人中流传着许多他的事迹。解放前夕，三轮车工人李洪魁得了肺结核。治这种病一要好药，二要营养，三要休息。李洪魁不能去蹬车，只靠妻子给别人纳鞋底，连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都养活不起，哪能有钱求医问药。一次，为了换回几斤莜面，李洪魁带病出车，晚上回来就口吐鲜血，人事不省。工友们一合计，拉上李洪魁敲开了舒大夫的家门。听了工友们的介绍和李洪魁妻子的哭诉，舒兆勋安慰大家：“你们放心，穷日子我过过，李洪魁的事我管。”说完，拿了些钱交给李的妻子，用来安排孩子们的生活。接着又出面作保，经院长同意后减免了李洪魁的大部分医疗费。李洪魁住院四个多月，经过舒兆勋精心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这位老工人在1983年去世，生前每当谈到这件事，总要说：“要不是碰上舒大夫，我这条命早就完了。”老工人李瑞林，做了肺切除手术。在他住院期间，他的不到两周岁的儿子又得了急性肺炎。老李的妻子除了要照顾两个病人外，身边还带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儿子。该怎么办才好？她一时没了主意。经工友们介绍，她找到舒大夫。舒兆勋检查了病孩，发现孩子脸色发青，呼吸急促，生命危险。他决定立刻收病孩住院。当他了解到做母亲的所面临的处境时，舒兆勋出面联系腾空一间病房，收住患肺炎的女孩，同时在房内增加一张大床，供老李的妻子带着吃奶的孩子陪床时使用。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李瑞林的女儿病好了，刚出生的儿子也吃胖了。李瑞林出院时，经舒兆勋联系又减掉了医疗费用。一家人摆脱了生离死别的境地，得以重新团聚，李氏夫妇不知怎么感谢舒大夫才好。

舒兆勋给穷人治病尽心竭力，他的医术和医德广为传颂。老工人刘海文回忆说：“我们都知道舒大夫没有架子，知道他关心咱们穷人，所以当我们拉着那些生病的穷人时，总是要送到舒大

夫的前面。我们还悄悄告诉他，你们就找舒大夫，他一定会替你们想办法。”工友们的话没说错，舒兆勋心中确实想着穷人。

一次，一个青年农民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兵，挥动菜刀砍断了自己的右手食指。东躲西藏几天之后，伤口感染化脓，右臂青肿。他找到舒兆勋悄悄述说了事情的原委，舒兆勋二话没说，立即替他办好住院手续，并开出了这样的诊断书：“该患者因侧草不慎，造成右手食指断离，终生残废。”伪村长拿着它回去交了兵差。住院30天，这位农民不但治好了伤口，而且还躲过了一场兵灾。临出院时，他满含热泪说：“大夫，您救的不光是我一个，救的是我妻儿老母一家人！”再如，工人老杨的儿子杨中林患肺结核又转为积水性胸膜炎，一连数日昏迷不醒，高烧近42度。公教医院的外籍医生认为已经没希望了，拒绝接收住院。老杨夫妇找到舒兆勋，求他救救孩子。舒兆勋认真检查了病情，发现情况确实严重，随时可能出危险，但是病人还活着，就不能看着不管。他带着老杨夫妇找院长说情，比利时籍的院长满脸不悦，认为他多此一举。因为收下这样的病人，一旦治不好就会影响医院的声誉。而舒兆勋坚持要再试一试，他向院长表示：自己负责给孩子治病，能否治好，责任完全由自己承担。院长同意了。杨中林住院两、三个月，他的诊断、用药、抽积水等工作全都是由舒兆勋亲自动手。靠着他对病人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杨中林摆脱了险境。

舒兆勋每治好一个病人，病人全家总是对他千恩万谢。他们感到自己笨嘴拙舌的说几句感谢话，往往难表心意，送点礼物吧，舒大夫又有一贯拒绝受礼的美名。于是只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报答舒兆勋。一次，舒兆勋带病出诊，返回时已近深夜。剧烈的咳嗽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人们熟悉他的声音，都围拢过来扶持。几个正要收车回家的三轮车工人闻讯后，立刻掉转车

子，争着送舒大夫回家而不收一文。杨中林的母亲悄悄量好了舒大夫的孩子们的脚的尺码，和李瑞林妻子等人一齐动手，做了八双绣着小老虎头的布鞋送到舒大夫家中。鞋已做好，又是按孩子们的脚做的，这次舒兆勋破例了。他收下了这份情谊，又让自己的夫人买了几丈青布回赠。这一件件的小事，使舒兆勋深深感到群众对他的信任。他感慨地说：“病人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

解放以后，舒兆勋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他从亲眼看到的社会变化中得出了结论：“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是为穷苦老百姓谋福利的。”他向组织表示：“今后的医院是人民的了，我更应该用我的技术来为解除人民群众的病痛而全力工作了。”他在工作中实践了自己的诺言。1952年，回族青年吴喜根被送进医院，他患肺病多年，因无钱医治，致使这次发病时情况严重，每次吐血半盆。舒兆勋接收病人后，首先设法止住吐血，又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治疗计划，并仔细给他做了分析，使病人建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吴喜根住院期间，舒兆勋每日数次到他床前观察、治疗，直到吴喜根完全康复为止。就在吴喜根出院不久，医疗费尚未结清时，他的妻子又因难产大出血住院。这对年轻人家中已经一贫如洗了，就连春天换季的衣服也没有。舒兆勋对她不但没有嫌弃，反而热情地安排她住院，选择最好的药给她服用。小吴夫妇心中忐忑不安，他们担心花了这么多钱，到哪去找，病还没好就要出院。舒兆勋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坚持要她安心养病，同时又积极奔走，向各级组织反映情况，终于使吴喜根夫妇的医疗费用全部免去。小吴夫妇对舒兆勋表示感谢，他连忙拦住说：“千万别谢我，要谢就应该感谢人民政府，是共产党让我这样做的。”1956年，呼市发电厂的干部王志厚病危入院，经舒兆勋准确的诊断和几个月的精心治疗，他终于摆脱了病魔，重返工作岗位。他感谢舒大夫救命之恩，在赠送给舒兆勋的锦旗上绣了最能表达自己心

匾的十五个大字：“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一次，舒兆勋在查房时发现一位叫张秀荣的产妇无人护理，经过仔细询问，得知这是一位解放军干部的妻子，丈夫因工作忙没能赶回，自己在呼市又举目无亲。舒兆勋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这样的病人，他叮嘱护士们对她要格外精心护理，又让爱人腾出自己家中的一间房子，安排好床铺，等张秀荣一出院就接回自己家中。同时，还给她的爱人写信，报告“母子平安”，嘱咐他安心工作。一个多月后，张秀荣的丈夫赶来接妻子时，握着舒大夫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再如，1964年，呼市警备区的干部郭志孝3岁的女儿身患急病，值班的大夫认为已经无法挽救了。就在抱着女儿回家的路上，满面泪痕的郭志孝夫妇遇到了舒兆勋。舒兆勋爱孩子，也最能体会做父母的在自己的孩子生病时是什么心情。他把孩子抱回了医院，按照他的意见，医院接收了这个危重的病孩。舒兆勋又亲自动手诊治，终于使这个幼小的生命摆脱了死神的威胁。

舒兆勋为了治病救人，不怕承担责任。1950年6月初，丰镇县新华书店的干部张云在呼市开会期间，发烧数日不退。经舒兆勋检查和化验，确诊为肠伤寒，立即收他住了院。为了加强护理和防止传染，患者被安排在单人病房。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治疗伤寒的抗生素类药物，张云的病情没有得到控制，6月21日死亡。事情过去之后，许多朋友都劝舒兆勋：“以后遇到没有希望的病人就不要再接收住院了。”而舒兆勋却固执地说：“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做医生的就不能不管！”没过多久，他又冒风险了：那是1952年春节前后，正是全国的“三反”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市政府派出的接管小组领导着医院的“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秦政庭，在一天晚上查账回来，突然感觉肚子疼痛。门诊大夫不敢确诊，在半夜里打电话找到舒兆勋。十多分钟后，舒兆勋赶到急诊室，很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动手

术。按医院的规定，病人在手术前一定要有亲属的签字，而秦政庭的亲属都在郊区，根本无法通知他们。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推迟手术时间，等患者亲属签字后再上手术台，这样做对大夫有利，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交待过去。但对病人没利，再拖延几个小时，发炎的阑尾就会穿孔、化脓，影响刀口的愈合。另一种选择是立即开刀，抢在穿孔之前割掉发炎的阑尾。在这样的时刻，舒兆勋选择了后者。他不顾同事们的劝告，代替病人家属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又亲自上手术台和王聘臣大夫配合给患者割掉了阑尾。手术很成功，不到十天，秦政庭出院了。事后一个朋友对舒兆勋说：“你的胆子可真大，我们都在为你担心。现在正在‘三反’的风头上，你自己签字，又自己动手给接管小组的领导做手术，一旦出了意外，你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舒兆勋坦然一笑：“我只想到病人不能再耽误，至于别的，我没想那么多。”

舒兆勋一心为了病人，他的为人，当地群众是了解的。凭着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医院也解决了许多不好解决的难题。据王德育大夫回忆：1953年，呼市地区猩红热病流行。一天，续吴山和王德育大夫接收了一位患猩红热的回族患者。入院几天后，因病情恶化，很快死去了。患者的家属和亲友们闻讯后，聚起近百人包围了医院，吵吵嚷嚷地要拉着大夫去打官司。王、续二位劝说无效，只好找到舒兆勋。舒兆勋一到场，嘈杂的人群立刻平静下来。他和大家做了十几分钟的交谈，患者家属和亲友们就都安静地散去。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医护人员都说：“处理这件事，全靠舒主任了。他平时对病人好，大家都相信他。”从那以后，市内其它医院发生类似的死亡现象之后，市卫生局、内蒙卫生厅总是请他出面主持死亡讨论会，以做最后的裁决。

舒兆勋一生医治过多少病人，抢救过多少生命，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然而，群众却不会忘记他那亲切的面容。当他走在街



上，每隔十步、二十步，就总会有人向他打招呼问候或者与他握手谈话。医院的青年医生张浦曾经好奇地问过：“舒院长怎么认识这么多人？”舒兆勋回答说：“他们都说我曾经给他们看好过病，都说认识我，可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真不好意思。”舒兆勋在呼市地区群众当中有很高的威望，从这些小事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 三、青年医护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办好一个医院，不仅需要设备、药品和经验丰富的医生，还需要大批的优秀的护理人员。舒兆勋从一到归绥公教医院起，就被聘为“归绥仁和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兼职教师。这是公教医院的附设学校，学制三年。他在校内先后讲授内科总论、传染病学、药理学、拉丁文等课程。这所学校先后培养过八个班共200多学生，解放以后，他们都成为内蒙古地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骨干力量。其中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如李景明曾任呼市医院副院长；李茂曾任呼市铁路中心医院副院长；李信三、薛继英曾任呼市玉泉区医院副院长；王秉仁任呼市郊区卫生局局长……他们一提起自己的老师舒兆勋，无不由衷敬佩。

解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没钱看病的人也能到医院看病了。病人增加，使市医院医护人员不足的现象显得更加突出，每个护士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1952年底的院务工作会议上，舒兆勋提出：“靠延长工作时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医院应该自己动手，办训练班，培养护理人员。”他的建议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从1953年5月起，市医院又办起了高级护士训练班。由舒兆勋、崔寿山等人担任专业课教员。针对学生基础较差，水平不齐的特点，舒兆勋等人采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如

讲解剖学，不仅要求学生了解书本知识，而且要求学生熟悉模型和骨骼，有条件时还要参观手术。采用这种办法学生记忆深刻，到期考时，60个学员中，只有4个人不及格。象这样的护训班一届连一届地办下去，一直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为了提高现有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舒兆勋还担任了呼市中医进修班诊断学教授，呼市伤寒病研讨班教授，市卫生技术学校药理教员，内蒙古卫生防疫科学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工作，为内蒙古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郊区卫生局长王秉仁在回忆自己的老师时说：“我在护校上学时，最感到吃力的是外文。是舒老师每天一字一句地教我。有一次我考试不及格，一个人躲在病房悄悄落泪。是舒老师给了我鼓励，我至今都能记住他的话。他说，‘哭是最没出息的人干的事，要做人就得下决心，就得不耻下问。你将来要当医生给别人看病，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从现在起就一点也不能马虎’。他给我做了辅导，并在教学方法上启发我，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今天我能在卫生战线上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离不开当年老师的培养。我体会最深的是：舒老师不仅教会了我怎样学习，而且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张餐英、李茂如、宋德峰、冯雅琴、王德育、安军山、邢风云等人，都是五十年代的青年人。他们有的毕业于护士学校，有的从南方分配到内蒙古，有的从部队转业走上了卫生战线。他们共同的感觉是，舒兆勋不仅在医疗技术上是他们的老师，在医德和医风上也永远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在他们的记忆里，舒老师每天的工作不是以8小时计算的，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电话打到家中，他总是随叫随到。最忙的时候，除了看门诊、查病房、做手术、搞教学之外，连透视、照像都得亲自动手，所以五十年代被称做医院的两大支柱之一。一次，青年医生李茂如对舒老师在星期天还来查病房感到奇怪，舒兆勋告诉他：“你应该理解病人的心，他们天天都在盼着大夫。

当大夫的就应该天天来查房，你做为医生，你的一生就在医院，就在病房。”

在他们的记忆里，舒老师没有技术权威的架子，平易近人。他担任着医院的领导工作，同时还兼任内蒙古和呼市领导同志如哈丰阿、孙兰峰、阮慕韩、刁建华、陈炳宇等人的保健医，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对于普通群众的要求，从来就没有推辞过。打字员小崔，初到医院工作时只有十六、七岁，母亲卧床多年。她想请舒大夫去给看看又不敢启齿。舒兆勋听说后，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带着护士到小崔家中探望。和舒兆勋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巴根院长因公出差，他的3岁的儿子骨折。从诊断、固定，到最后拆除石膏，都是舒兆勋亲手负责。孩子的母亲对此表示感谢，舒兆勋只是说：“老巴不在家，我有这个责任。”解放初，市医院的病房分做三等，这是旧制度的沿续。三等病房中，声音嘈杂，空气浑浊，一般人都不愿意多呆一会儿。可舒兆勋只要有空就准在三等病房中。当他发现有的病人手术后需要增加营养，就让自己的爱人送来可口的饭菜；有的病人因无钱买药而请他改动处方时，他又常常掏出自己的钱补上。当时医院有间病房称做“小50号”，是专门安置传染病人的，青年护士都不想在这里工作。每次收住了传染病人，他总是头一个上前接触，用自己的行动解除护士们的顾虑。

在医护人员的记忆里，舒老师对青年人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一次，医生小李在值班时自己没有接触病人就委托护士代填了查房记录。这可瞒不过熟悉病人状况的舒老师的眼睛。他一看记录就提出疑问：“病人双眼通红，高烧一夜，为什么记录本上却写着体温正常？”当他知道记录是由别人代写的时候，发了脾气。在全院大会上，他点名批评了这位青年医生：“病人找你看病，是把命都托付给你了，你怎么能这样辜负人家的信任！”这是严厉的批评，是诚恳的告诫，也是他当医生多年的指导思想。

想。这些话，在青年医护人员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青年人们都敬重自己的老师，但又都不害怕自己的老师，因为他们知道，舒老师最能理解他们的心理。有一次，正是八月十五的晚上，有个病人需要做手术，舒老师带着几个青年医生工作了一夜，天亮前才下了手术台。当几个青年人因没有回家过节而悄悄议论的时候，没想到舒老师用自己的钱买来水果和月饼，让大家带回家去和亲人团聚，而他自己却继续留在病房替他们值班。又如，护士小冯，从部队转业来到医院时只有16岁，整天零食不离口。舒兆勋发现后，劝她说：“青年人有钱了可不能成天吃瓜籽，应该买书，学点外文。你将来可能会成为医生，从现在起每天学一点，等到用的时候就不少了。钱不够，我可以帮助你；看不懂，我可以教你。”小冯心里热烘烘的，她感到舒主任不光是自己的领导和老师，更象自己老父亲。舒兆勋利用上班前的一个小时，给小冯、刘恒明、王德育等青年人补习功课，讲解操作要领，介绍诊断方法，对大家提高很大。

在医护人员的记忆里，舒老师重视卫生工作的科普宣传，也重视对新人的培养。他自己是内蒙古科普协会常任理事，除了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卫生常识外，还要指导各科室的科普宣传工作。他和青年同志一道，在患者候诊时进行科普宣传。什么“砂眼的防治”、“肠道传染病的预防”、“孕妇应知”、“小儿营养常识”等全是他们宣传的内容。当他发现刚刚分配到医院工作的青年医生张浦对科普工作很热心时，就积极向组织推荐张浦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科普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告诉张浦：“不要以为这只是组织上给你的荣誉，它同时也是交给你重要的任务。今后的科普工作，还得靠你们青年人下大力气。”张浦大夫体会到了这话的分量，至今仍在科普园地上努力耕耘。

崔寿山大夫是市医院的妇科主任，是一位老医生。他听了青年同志们对舒兆勋的回忆，深有同感。他说：“每当我在工作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要找舒院长商量。他医术高超，而且从不保守。每次和他讨论完问题，总是感觉到对自己有很大启发。”

舒兆勋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了一大批人。他们都在按照老师的教导，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呼市的医疗卫生事业挥洒着汗水。

#### 四、医院正规化、科学化管理的奠基人

人民政府接收公教医院以后，面临着如何搞好管理的问题。当时曾有人预言：“共产党打仗、搞政治都是内行，可管医院不行，马列主义割不了阑尾炎。”这说明医院搞得好与坏，不仅仅关系到能否解除病人痛苦，更重要的，它也是对党和人民政府能力的一种考验。党了解舒兆勋，在接管医院之前就派出张兆生、王有万、戴升阳等同志多次到他家中了解医院情况，商议接收和接收后的工作。舒兆勋积极配合，出谋献策，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接着政府又让他担任医务部主任，领导内、外、儿、妇、眼、齿等科和x光透视室、药剂室、检验室、病历室等科室的工作。为了搞好医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参与制定了医院的规章制度。如门诊制度、住院制度、出院制度、值班制度、请假制度、学习制度、奖惩制度等。与此同时，他还主持制定了医务部的九项制度。如为了对病人负责并不断总结经验，在“死亡检讨制度”中规定：凡对死亡原因不明或对医疗有疑问者，应由医务部主任主持召开检查讨论会，由主治医师就医疗过程、病情变化及致死的原因等提出详细报告，会议进行分析讨论，结果存档并向上级汇报。又如为了加强医生护士的责任感，在“急诊制度”、“会诊制度”中有这样的规定：接到急诊通知后，医生应立即前来探视，不得延误；急诊室护士应记录病人到达时间、医生到达时间和离去时间，向领导汇报；对需要治疗、手术或住院的患者，应立即处理，不得等待其办完交款手续；接到

“紧急会诊通知”的医生，不论正在做什么工作，必须在15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应该说这些制度与现在相比还是比较粗糙的，但它们的制定和实施，对整顿医院秩序和建立起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医院的信心上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凝结着人民医生对病人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从字里行间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党对群众的关怀。

1954年，医院开始学习苏联的医学经验。舒兆勋作为医务部主任和全院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承担了宣传、讲解苏联医学理论的任务。由于舒兆勋毕业于法国人办的医科大学，又受雇于比利时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所以他对苏联的经验了解甚少。为了搞好工作，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重新学习上。凭着自己精通几国文字语言的能力和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他很快地掌握了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俄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巴甫洛夫的学说。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浅出地宣传这些理论，并以此为据改进医院的管理工作。这期间，他和医院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狠抓了三项新的制度建设。

其一，是建立起保护性医疗制度。巴甫洛夫认为，人与外界任何事物都会互相产生影响。对医院来说，一个好的休养环境对病人康复至关重要。为此，保护性医疗制度规定从三个方面下手改善病人休养环境。一是通过美化环境，消除对病人视觉的刺激；通过搞好病房卫生，消除对病人嗅觉的刺激；通过实行“四轻”，（说话轻、走路轻、开关门窗轻、移动物品轻）保持病房肃静，消除对病人的听觉刺激。二是利用“第二信号系统”即通过语言对病人进行精神治疗。如鼓励病人的信心，加强与患者家属的联系，不随便议论其他医护人员以免影响感情；手术前消除病人恐惧心理，避免使用刀子、剪子、流血等带刺激性的字眼。三是加强营养，改善伙食，促使病人尽快恢复健康。舒兆勋不但领导大家制定了这个制度，而且带头执行这个制度。他要求所有

的人在工作时间里一律穿软底鞋，不许高声说话，门窗点油，桌椅腿上加垫。对违反这些规定的人给予严厉的批评。从而使全院职工很快就养成了严格遵守制度的好习惯。

其二，实行计划治疗制度。过去收治病人，不分急性病，慢性病，医生心里没有治疗计划。既不利于加快床位的周转，又不利于检查治疗效果。实行了计划治疗，医生必须对患者提出常规的治疗计划，经科主任批准后实施。这样一来，对病人的治疗效果如何，很容易就看出来，从而减少了工作的盲目性。为了帮助每一位医生把治疗计划制定得更为合理，医务部又建立了一些辅助措施。如提倡各科室间会诊，以诊断疑难病症；各科每天开朝会，通报病人病情的变化；通过手术前准备会，集思广议，对手术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舒兆勋分别深入各科室，了解情况，培养典型，安排每周全院的病例讨论会和定期的业务报告会。实行了计划治疗制度，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大大增强，许多青年同志都感到对自己业务能力的提高帮助极大。

其三，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医院各科是以治疗不同类型的疾病来分别设置的，各科主任最初只是本科的技术负责人。其它工作如业务学习、人员调配、科学研究、预防宣传等大量的工作都集中在医务部。医务部负担极重，而各科又无法独立开展工作。这种状态说明科主任负责制势在必行。1953年4月，舒兆勋在院务会上代表院部提出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并对其职权范围做了详细说明。经过两个月的试点后，在全院贯彻下去，极大地发挥出了各科室的主动性。

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根据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舒兆勋经常提出新的建议，他在院务会上强调：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谁违反了这一条，都要算做一次重大事故。为了减少病人取药时等候的时间，他和其他同志研究后搞起了协定处方制度；各科室根据常见病集体研究

提出常用的药品、剂量、用法，经批准后，药房提前分别包装。这样既加快了发药速度，又减少了差错。他针对有的医生为了减少事故和提高治愈率而不愿意收治重病病人的情况和孔翔凤、郭翠英医生等呼吁加强门诊技术力量<sup>6</sup>的建议，在研究如何增加业务量的院务会上，概括成三条措施：一是加强我们的工作，为患者提供方便，扩大医院的影响；二是适当降低药品价格；三是自己抽时间承担一部分内科和儿科的门诊工作，以加强门诊技术力量。门诊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听说这一消息，十分振奋。为了改进服务质量，他提出以“三心四勤”（热心、耐心、细心、眼勤、口勤、手勤、腿勤）为医院的服务方针。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每一位同志的工作态度、工作效果和群众反映。对那些受到患者好评的、工作中有发明创造的、对改进医疗技术有重大贡献的和能以忘我精神抢救危重病病人的医护人员，给以大张旗鼓的表彰。由于上述措施得力，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年终总结大会上，舒兆勋总结了医务部的工作。他指出：与去年相比，医院业务量迅速增加，其中门诊增加80%，住院增加20%。虽然药品价格有所下降，但总收入增加了三亿余元（旧币）。

在平常检查各科的工作中，舒兆勋发现了一些事故苗子。有的医生开处方只写药名，不写剂量和用法。有的在患者的姓名栏内竟填上“小活络丹”。对这些事故苗子如不抓紧解决，可能会给病人造成更大的痛苦甚至发生危险。为了彻底消灭差错，他代表医务部和各科研究制定了“查对制度”，对不同的工作，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要求医生在诊断时做到“三要、三好、一详细”：对患者要有同情心、解释要耐心、检查诊断要细心，病情分析好、医患团结好、服务态度好，病历记载要详细。医生查房时做到“五查”：一查体温、脉搏、呼吸、大小便，二查情绪、饮食、睡眠，三查特殊化验结果，四查用药后病情变化，五查治疗计划执行情况。医生在处方签名前要做到“五对”：一对姓名、



性别、年龄，二对床号，三对药品用法剂量，四对手术及处置部位，五对时间。核对无误后再签字。要求护士实行“三级护理”制度，其中一级护理的患者，要由护士代做一切事情，包括喂饭、接便、更衣、擦背、换卧位等。护士发药时要做到“四对”，核实无误后方可发药，看着患者服药后方可离去。这样的查对制度和操作规程，看起来有些繁琐，但执行之后，大大降低了差错率。

1957年1月，舒兆勋担任了呼市医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医务行政工作。他懂得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也自觉地为党的工作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职务变了，需要考虑的工作也多了：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他要管；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需要他布置和检查；为了支援农业，他组织青壮年到郊区挖“抗旱丰产坑”；搞大炼钢铁，他也和大家一样日夜守候在土高炉旁。然而，在他的工作笔记本上记录着他考虑最多的事仍然是医务工作。

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肝炎病人增多。舒兆勋对此十分焦虑。他感到医院的工作应立即改进，否则有负党的重托。在内蒙古卫生厅召开的肝炎防治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自己的见解：对肝炎病应预防为主，治疗为辅；不能孤军作战，应由政府统一计划领导。他建议：一要派出医务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肝炎的流行范围；二要加强宣传，特别是应该把服务行业、饮食行业、学校、机关食堂、公共场所等列为重点；三要加强医院肝炎门诊的力量，增加床位，中西医合作，土洋并举，并对成功的经验及时总结推广。他的建议得到上级重视，邀请他参加了防治肝炎的领导小组。

舒兆勋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全国在上海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舒兆勋抓紧落实会议精神。他一方面抓宣传，用天津市花两年时间精减了10万城市人口，可是因生育无计划，一年后又新增13万城市人口的事例，教育大家提高对计划生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他抓节育技术的提高。他和有关科室

的医生一道研究，对节育工作的药物选择、器具使用、手术方法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他要求搞这项工作的医生护士贯彻“谨慎、细致、安全、有效”八字方针。他反复强调，计划生育手术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对术后可能出现的合并症要一包到底。这些做法，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医院科研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医疗技术水平的发挥。1957年1月，经院务会研究，成立了全院科研的领导机构——学术研究室。王聘臣和舒兆勋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没过多久，王聘臣调走，抓全院科研的工作主要由舒兆勋承担。他设法为图书馆增添了大量学术书籍，成立了动物实验室，帮助各科制定和落实科研计划，为医生们搞好科研创造各种条件。经过二年的努力，医院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科研成果。如：张光苓、何翔华医生合作的《内科临床观察与治疗》，杨墨敏医生的《肝炎病的诊断和治疗标准》，儿科的《小儿肺炎防治》，中医科和内科合作完成的《溃疡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中医科的《高血压病的中医治疗》等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一些还被选为全国中医学资料展览会的材料。外科对心血管系统的研究，在经过周密的理论准备之后，进入了动物实验阶段。仅1961年就进行了8次实验，其中6次获得成功。通过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科研工作的开展，一大批青年医务工作者成长起来，成为各科室的核心技术力量。

舒兆勋注重对祖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学习和推广。为了贯彻党的中医政策，1956年，他亲自深入群众中调查了解，并和呼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取得联系，把在当地声望较高的老中医刘济民、黄惠卿、邓子厚、邓占元、纪世卿等人调入市医院，组建了中医科。与此同时，还在医院组织了三个学习班：西医学中医班，中医学西医班、中医护理班。舒兆勋尊重中医，带头学习中医理论。他既担任中医学西医班的教师，同时又是西医学中医班的学员。在

他的带动下，医院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学习祖国传统医学的热潮。

抢救危重病人，是医院经常面临的一项工作。1962年，医院成立了抢救总指挥部，由党委书记巴根任总指挥，舒兆勋任副总指挥，各科都建立了抢救制度。一次，一位被雷电烧伤的牧民被送到医院。他全身烧伤面积达98%，其中三度烧伤占94%。对这样的危重病人，巴根和舒兆勋及时动员全院职工，组织技术力量积极抢救。由于方法得当，措施有力，使病人度过了休克关。为了保护患者身体表面，舒兆勋和医生们选用鸡皮和其他生物膜来代替皮肤，使这位牧民的生命维持了近两个月。这次抢救工作为医院在治疗烧伤方面积累了经验。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专家来会诊时对抢救小组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62年9月6日，土左旗有10名农民食物中毒，土左旗医院技术力量不足，需要转到呼市医院抢救。当巴根、舒兆勋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经是半夜了，而且医院没有空床位。他们没有把这10名患者推到其它医院，而是分头动员，组织内科护士临时增加床位，打扫布置。舒兆勋又亲自带着一部分医生护士在凌晨四五点钟赶到车站接病人。等病人接到医院时，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15分钟之后病人就得到治疗。由于抢救及时，除1名患者在入院第7天时因肝衰竭死亡外，其余9人经一段治疗之后全部康复出院。类似的抢救危重病人事例，仅1962年就有902例，占当年出院人数的21.3%。经过几年的不断总结完善，抢救制度至今仍在贯彻执行。

医院在一天天的发展，规模在不断扩大，如今的呼市医院远非昔日可比。但无论是老一代的医务工作者，还是刚走上医疗战线的新生力量，他们都知道，是五、六十年代的管理经验为医院今天的科学化、正规化管理打下了基础。

### 五、“听、跟、走”的典范

翻开舒兆勋的学习笔记，有三个醒目大字：听、跟、走。下

面写着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应该做到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舒兆勋为自己选定的政治行动的准则。

早在绥远“九一九”起义之前，他就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傅作义先生派出王克俊、李竭忠等干部从北平携带《绥远和平协议》来绥协助董其武工作。后为了推动绥远地区的和平起义，“华北人民政府”派出了以中共党员潘纪文、鲁志浩同志为首的联络处进驻了归绥市。当时在政治气候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舒兆勋却敢于和李竭忠、鲁志浩等人密切接触，公开发表他拥护和平起义，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由于他在知识界和当地群众中声望较高，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在绥远和平起义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政治上，舒兆勋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解放以后，他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在每次运动中，他都是坚定不移地按党的要求去做。现在看起来，当时那些运动有一些是由于“左”倾的错误指导所致，而舒兆勋总是认为自己与工农群众接触少，在思想改造上要比别人下更大的力气。他的笔记本上，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人的动力是思想，思想觉悟提高了，工作起来才能有积极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思想进步的绊脚石，是蜘蛛网，不摆脱它就无法前进。”“向个人主义斗争是痛苦的，应该有勇气、下决心，才能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经过党的几年帮助教育，舒兆勋向党表示了要求入党的愿望。由于当时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左”，他的要求未被批准。舒兆勋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真实思想：“一个人光荣不光荣决定于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及其贡献，而不是职位、名誉和工薪的多少。只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为人民服务都是光荣的。”有了这样思想做指导，凡是党的

工作需要的时候，他从来不讲价钱。五十年代末，为了活跃人民生活，政府希望市里有影响的人带头搞文艺宣传。舒兆勋登台演戏，在全市获奖。团市委要加强对团员的思想教育，舒兆勋就按组织的要求在“共和”、“同乐”等剧场多次做报告，用他亲身的体会教育广大青年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提出兴修水利，他不顾自己的高血压病，在乌素图水库和小伙子们一块抬大筐。面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他与郊区太平庄等5个公社卫生院建立了联系，帮他们培训技术人员并协助处理疑难病症。党号召加强工会工作，他作为市医院历届工会主席和市总工会执委，在会上谈了自己的认识：“工会工作必须服从党的中心工作。党抓什么，工会就应该抓什么。对每个人都应该负责到底，从生管到死，从食堂管到厕所；生孩子多的要管，不生孩子的也要管；闹级别闹待遇的要管，埋头工作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人也要管；生活困难的要管，生活上搞特殊的人同样要管。”他按这样的方法抓工会工作，群众对他十分信任，大事小事都愿对他讲。他关心解放军，关心伤病员。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为了保证志愿军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他每天都抽出半天的时间到呼市志愿军休养所工作。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期间，他又多次提出申请，说自己有精通法语和熟悉医疗的好条件，要求组织上批准他带医疗队上抗美援朝前线。

生活上，舒兆勋从不搞半点特殊。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他带着孩子一起冒着北风步行十几里去拉糖菜渣。党委书记王凤鸣见到后担心他的身体，劝他说：“老舒，还是让医院派汽车帮你跑一趟吧。”舒兆勋坚决不肯。他说：“现在国家遇到困难，群众也在看着我们。能不能和群众一道共渡难关，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长时间的营养不良，舒兆勋全身浮肿，血糖降低，胃病和高血压病相继发作，工作时多次出现晕眩。同志们把他送到保健科，王德育大夫几次要给自己的老师做葡萄糖静脉注射，舒兆勋

声称：“我没病，回家喝点糖水就好了。”还半开玩笑地说：“当大夫的把药都用了，病人来了看你怎么办。”

市委领导同志关心舒兆勋，多次给他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无论是在“联共党史”学习班，还是在内蒙古政治学校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他都抓紧一切时间，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他在学习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而在于自己过去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真正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必须用这三条来要求自己，即立场是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水平的提高，使舒兆勋的工作成绩也更加显著。党和人民肯定了他的能力和贡献，除了把市医院的领导工作交给他承担之外，还选他为呼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内蒙古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市总工会执委，市政协副主席，让他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当舒兆勋在业务上经验更加丰富，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党外走资派”、“特务集团头目”、“里通外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全都强加在舒兆勋头上。舒兆勋坚信，自己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他也深深知道，如果只是为了减轻皮肉之苦而随便就认“罪”的话，又不知道会有多少好同志跟着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这种态度，在当时就意味着将面临严酷的逼供和非人的待遇。1968年9月18日，被非法关押数月之久的舒兆勋，惨死在“牢房”中。年仅58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组织做出决定，推翻强加给舒兆勋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舒兆勋恢复名誉，彻底平反。1978年12月25日，市委、市政协在呼市革委会礼堂为舒兆勋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市委书记布赫、市委副书记苏和以及内蒙古党委、内蒙古政协、呼市市委各部、呼市政协的有关领导人出席

追悼会并送了花圈。市委副书记张耀致悼词，他指出：舒兆勋同志为呼市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不幸去世，是党的卫生事业的一大损失。张耀同志号召大家学习舒兆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学习他献身于人民卫生事业、救死扶伤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风貌。呼市地区各界群众7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会后，舒兆勋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公墓。

## 体育界老前辈——孔博泉

焦基梅

原呼和浩特市体育场场长，呼市体委竞训科科长，曾从教多年的孔博泉老师，是呼市地区较有名气的体育工作者。他生于晚清，经历了民国和新中国不同的时代。一生酷爱体育事业，倾心钻研体育技能，为人耿直，性格爽快。在育人的几十载中，数以万计的学生在其辛勤培养下成长起来，有的已成为比较出色的体育工作者。他为发展我市的体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受到体育界人士的赞扬和钦佩。

孔博泉老师一生耕耘体育圣地，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十年浩劫又使他的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致使现在仍瘫痪在床上。尽管如此，人们没有忘记这位体育界的老前辈，他的领导、同事、学生经常去探望他，关心他，渴望他早日康复。

—

孔博泉原名孔繁涛，字博泉，因人们经常以字唤之，便不用其名了。1905年他出生在河北省任邱县（现河北省大城县）魏各庄一个祖辈书香的富裕之家。只因祖母早年去世，继祖母对其父母百般虐待，使得他从小不愿在自家生活，一直跟随舅父居住。舅父家境宽裕，对他又倍加喜爱，1913年在他8岁时，便送到私塾就读，受了五六年不求理解，只会死记硬背的教育。1919年，当他14岁的时候，舅父又送他到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师范附小读书，1923年毕业后又考入保定育德中校。中学刚读半年，舅父



资助父亲经商，他便随父亲西来绥远，进入绥远省立第一中学继续读书。

孔博泉自幼喜爱体育运动，在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体育才能已经开始逐渐显露。他打篮球较出名，其它体育项目也都不错，特别是经过几次全省和华北地区的体育运动会，他的知名度更高了。1924年，以孔博泉、齐寿康、刘少堂、王典等人组成的归绥代表队首次参加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华北区田径预选赛，在百米和二百米预赛当中，孔博泉均获小组第一名。当时学校的教员、学生几乎都知道孔博泉这个名字。

学生时代的孔博泉不仅爱好体育，其它功课也成绩优异。他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向往进步，坚持正义的热血青年。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绥远地区也争相呼应，举行了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抵制、销毁日货等活动。孔博泉积极投身于这一爱国反帝行列，并在由共产党员陆作霖、吉雅泰组织成立的爱国会里兼任捐款干事。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摇旗呐喊，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血腥镇压；他参与抵制、销毁日货活动，和同学一起捣毁归绥县政府和英商盛记洋行；他还参加演讲宣传，与同学们演出了不少小型活报剧，以此揭露、讽刺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在学生中，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员。

孔博泉随父来到归绥，由于父亲经商，他只好寄居在二叔家中。二叔虽然身任高官，家庭生活条件又特别宽裕，但对孔博泉的吃穿却十分苛刻。二叔的孩子上学坐轿车，他只能跑步去学校，在政治上严禁他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当他和同学们捣毁归绥政府和英商盛记洋行后，不但在学校受到记过处分，回到家中又遭到打骂。孔博泉苦于未成年，又寄人篱下，不敢有任何反抗之举，一腔爱国热情由此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和打击。1927年，孔博

泉在绥远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在舅父的鼓励与支持下，他又赴北平考取了民国大学体育科，1930年毕业。

## 二

大学毕业后的孔博泉，毅然返回了他的第二故乡——绥远省归绥市。1930年至1937年期间，他先后应聘于绥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正风中学、绥远省立公共体育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担任体育教员和指导。孔博泉除了天生喜爱体育，悉心钻研体育技能外，他之所以能一如既往地从事体育事业的另一原因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绥远，官场派别严重，绥远本地派又一向排外，而孔博泉又系河北省人，当然属于被排挤对象。加之他性情倔强，为人耿直，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不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浪费在官场圈子里。他喜欢光明磊落，正正派派，实实在在地做人、搞事业。因此，他选择了体育教育事业。他常说，搞体育用不着去拍谁的马屁，也用不着去巴结任何人。依靠自己的本事搞专业，多培养些好运动员比什么都强。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现象极端地看不惯和憎恨，经常以骂大街的形式出口胸中的闷气。面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孔老师时常教诲他的学生们说：“你们是国家的栋梁，要好好求学，将来好改变这种现象。”

正当孔博泉一心要在体育教育上搞出一番事业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对中国的大举侵略进攻。绥远省也未能逃出劫难，大批日军开进归绥烧杀掠夺，并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孔博泉不忍目睹，更不愿意为这种教育卖力，只好弃教逃难。他到宁夏半年余，恰遇表外甥、原傅作义部下的军务处处长、游击军参谋长、“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李腾九路经宁夏，便相随返回绥西五原。在李腾九的介绍下他参加了绥远游击军，任电务处处长、少校秘书，具体工

作主要是负责往返于五原与宁夏之间领取军饷。孔博泉在游击军中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避难,有地方领取维持生活的薪水,而心目中始终未忘记苦苦追寻和酷爱的体育事业。

日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市后,归绥中学、师范学校等均陆续迁往绥西后套陕坝。1939年国立绥远中学在陕坝开学,在游击军司令部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孔博泉立即返校,继续他的体育教员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后套的学校陆续迁回归绥市,国立绥远中学也于1946年迁回。1939年至1949年,在国立绥远中学的十年,正值孔博泉34岁至44岁之间,这正是人生有一定经验,精力充沛,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在这十年中,他抛洒辛勤的汗水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为绥远中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运动员,使国立绥远中学的体育大振,在全省有了一定的名气。不论是小型的运动会,还是校与校之间的友谊比赛,名次拿得最多的、排列名次最前的几乎都是绥中。1947年秋,绥远省曾举行过一届绥远运动会。孔博泉担任这届运动会的总裁判。在这次运动会上,由孔博泉一手培养组建的国立绥远中学代表队几乎每个项目都拿到了名次和获得冠军。鉴于孔老师从教体育多年,成绩显著,早在1944年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曾发给他奖状并加薪一月以资鼓励。

孔博泉在体育教育上发展全面,又特别专长田径、篮球、足球等项目,成为绥远地区有名望的体育工作者之一。他除了在学校搞教学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一些有特点的由学生参加的运动项目,早起晚归义务担负训练指导。平时他喜欢与体育界同行共同组织生动活泼的校际体育友谊比赛,以此切磋技艺,提高运动水平,同时也使归绥地区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广泛普遍。他不但活跃于归绥体坛,还经常随同体育界同仁出省参加体育活动或比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最后一次外出活动是1948年,由苗时雨担任领队,他担任教练赴天津参加奥运会篮球

预选赛。1949年4月，绥远省解放前夕，孔博泉被学校任命为体育主任兼训导主任。

### 三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孔博泉衷心拥护。

孔博泉于1950年参加了由绥远省教育厅举办的第一次集中学习，之后便调到归绥女子师范学校任体育教员。从这时起至1957年，他先后从教于呼和浩特市第一师范学校和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一直担任体育教研组组长。

解放以来，孔博泉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通过党的教育和个人的努力学习，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及毛主席的英明。更加坚定了他跟共产党走，忠诚地为社会主义体育教育事业服务一辈子的决心。

孔博泉竭尽全力地投身于体育教学工作。凡是 他任教的学校，体育成绩都名列全市榜首，所在学校代表队也经常代表市或者自治区，参加自治区或全国的比赛。他在市女子师范学校时，校女子篮球队就曾代表归绥市，参加过全国比赛。他在一中时，呼市男、女篮球队均以市第一中学的篮球队员为主体而组成。

孔博泉不仅酷爱体育教学，争取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体育人才，而且还非常热衷于教职员工的体育活动。他经常组织本校教师们和其它学校的老师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比赛。1955年，他一手选拔、培训组成的呼市教工篮球队，由李森带队，他为教练，参加了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的全国“钟声”篮球赛。这次比赛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位居于全国中游，对于一个不算大的发展中城市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鼓舞。队员们兴致勃勃，准备再加一把劲儿争取下次打出好成绩。1956年，仍然是由李森领队，孔博泉任教练，带领着从全内蒙古各大、中专院校教师当中选拔出来的足球队员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钟声”足球赛。经过赛前两

个多月的训练和赛场上的艰苦角逐，内蒙古队取得了全国第七名的较好成绩。

孔博泉任教的27年中，除了教学外，还和各种比赛结下了不解之缘。哪里有比赛，哪里就有他的足迹；哪里有运动会，他就会在哪里以教练员或裁判的身份出现。1953年，他在师范学校任教时，华北地区运动会在绥远省归绥市举行。那是绥远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运动会。绥远省经过选拔成立了绥远代表队。孔博泉不仅任绥远省代表队的教练，还担任华北区运动会田径副裁判长。

孔博泉老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受到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肯定和奖励。1956年，呼市人民委员会奖励执教20年以上的老教师，他获得了奖状和奖金；1957年他被评为呼市工会积极分子，向他颁发了奖状和奖章；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呼市文教先进工作者群英会。

孔博泉育人27载。在他辛勤耕耘的体育绿地上，摸爬滚打、腾翻跳跃，经历了无数的酷暑严寒，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运动员，有的已成为现今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和领导者。比如：当年国立绥远中学的篮球运动员侯志超，毕业后考入天津体育专科学校，后为内蒙古工学院体育教员、体育副教授，冰上国家级裁判；篮、网球运动员姜亦强，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后为内蒙古医学院体育教授；田径运动员阎斯民，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现为北京教育学院体育教授。又如：解放后师范学校学生章顺山曾是学校田径运动员，现为内蒙古师大体育系主任、副教授，田径国家级裁判、全国田协会员；呼市第一中学运动员任富，现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同系体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诸如此类经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遍布各地，举不胜举。解放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在呼市地区各类学校任体育教师的，只要中学时代是在归绥度过的，大部分都是他

的学生。真可谓教学大半生，桃李满天下。

#### 四

孔博泉于1957年告别了体育教学生涯，调到呼和浩特市人民体育场任场长。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也就是孔博泉任场长的阶段，呼市体育场的使用效率最高，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最活跃。因为孔博泉有着明确的管场宗旨，即：体育场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群众，为体育竞赛训练和基层体育活动提供方便和服务。体育场全方位向体育爱好者开放，使用是无偿的。因此，使用场地的单位也特别多，几乎天天都有活动，周周都有比赛。体育场场地大，工作繁重，而工作人员只有十几名。对此，孔博泉没有向领导多要过一个人，没喊过一声苦，没说过一句怨言。为了搞好体育场的工作，他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吃住在单位，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体育场的管理上。

体育场不能只使用，它还必须得到及时的修缮。可那时的维修经费非常少，孔博泉只得精打细算，勤俭过日子，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这不仅为国家节省了经费开支，场地也维修得特别好。他管理的场地达到了场风正、场貌新、质量好的最佳水平，保证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得到了体育爱好者的的好评。现在体委的老同志回忆起当时情景都说，那时场地的维修和保养是历史上最好的。

在体育场工作的日子里，孔博泉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对于这个年龄的人能搞好繁重的体育场管理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还心甘情愿地义务承担起场地训练指导。前来体育场训练的人，大部分都得到过他的辅导、指点和亲自示范。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 and 掌握的技巧无私地传授给大家。他是在体育场上参加训练的体育爱好者的不挂名的教练。大

家尊敬他，爱戴他，把他看作是自己追求体育事业成功的良师和知己。

孔博泉在体育上技能全面，对比较熟悉的项目，无论比赛和裁判一向发挥很好。但是对不熟悉，甚至没有接触过的项目，只要领导交给他去完成，他也准能尽快学会掌握。例如，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赛马和马球竞赛在呼和浩特市赛马场举行。组织上让孔博泉担任赛马比赛的副裁判长。他对此项工作非常生疏。但他意识到，这是党和组织对自己的信任，而且责任重大，必须干好。于是，他细心钻研规则，经过紧张的学习，在较短的时间内终于掌握了技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大会的好评。

孔博泉对工作的勤恳与无私奉献，受到组织上的肯定，1958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呼市首届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58年至1966年，他先后被选为呼和浩特市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人民代表；1958年被聘为呼市政协第三届委员；1977年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委员；1985年国家体委授予他“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证书和证章。

孔博泉在1970年至1978年任呼市体委竞训科科长。“文革”中被关押批斗，精神和肉体遭到了极大的摧残，整个腰椎被打得错位逐渐变形。“文革”后，孔博泉身体虽然不如以前，但他除了工作外，还积极撰写自己一生从事体育工作的经验和解放前后呼市地区体育的历史。他写的论文和整理的资料只要有人向他索取，他就毫不保守地提供。

## 五

孔博泉的学生、现内蒙古大学教授段成梁、副教授张世恒等人说：“孔老师的为人可概括为八个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他的人生旅途的确证实了这一点。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什么

情况下，他从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他一贯看重的是事业，是对体育的执著追求。1937年孔博泉避难，在李腾九的介绍下投军于游击军司令部，他完全可以从此扶摇直上。可他图的不是名利。国立绥远中学一经开学，他马上返回学校。解放后，他在呼市第一师范学校和呼市一中时，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工学院都曾邀请他前去任教，可他舍不得打根基的初等教育，婉言谢绝，毅然留在各方面条件都远远不如高等学府的中学。对待职称的评定、职务的提升他更是不屑一顾。当年不如他的人都能评为国家级裁判，而他这位赫赫有名的体育多面手至今仍是国家一级裁判。因为他没有时间，也不曾为自己的事张罗过。对待长工资他也不在乎。1955年，全国统一调薪时，呼市一中的校领导要给他按三级教师晋级，可他却对校领导说：“我已经是四级教师，每月挣一百零一元钱，已经够高的了，还是让工资低的同志们上吧！”就这样，他把长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孔博泉教导过的学生和与他共同工作的同事都一致认为：“孔老师对待工作和生活是严肃认真的。”

孔博泉要求学生和下级非常严格。他不允许在工作和训练上出现马虎敷衍和不刻苦的现象。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无论在哪儿工作，他都吃住在单位，为的是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和训练。在学校任体育老师的那些年，每天早晨五点多钟就起床，召集带领学生进行早训练。他和学生一样跑，一样跳，一遍又一遍地给大家做示范。他还爱管“闲事”，份内的训练管，份外的事情也操心。他在体育场当场长的时候，经常给予来场地训练的运动员以指导，但对那些不认真训练，比较调皮的学生也经常给予训斥。有一次，他过去的学生、后任呼市八中的体育教师刘兆义带领学生在体育场训练，其中有几个学生不好好训练被孔博泉看见了，他非常生气，当即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批评了一通。他经常严肃地对学生们说：“没有平时的苦练就不会出现好成



绩，想要好成绩就得苦练，不要企图有捷径可走。”现在很多在不同院校和单位任教和从事体育工作的他的学生们都无限感慨地说：

“我们能有今天的工作成绩，都是孔老师当年严格要求的结果。”

孔博泉的严，不仅体现在训练上，还体现在人和物的管理上。在学校任体育教师时，他管理的体育器材既很少丢失，也很少损坏，为学校节省了很多的买器械的资金；在体育场，从场地保养到场地维修，从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到人品要求都很严格。他不许职工贪拿集体一点财物，首先自己不占公家一分一厘的便宜。为此他得罪过人，“文化大革命”时就有人因此要往死里折腾他。在生活上极为朴素节省，既不吸烟，也不喝酒，当时的教员和学生对此无不肃然起敬。这为学生们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熟悉孔博泉的大部分人都说：“孔老师的心眼好极了，不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同事，谁有困难他都肯帮忙。”

孔博泉在课堂、训练场和工作岗位上是一位一丝不苟的严师和领导，而在生活上却宛如学生慈祥的父亲和同事们的益友。在学校当教师时，他经常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运动员）购买运动鞋和运动衣裤。他不光关心运动员，对其他学生也常给以资助，有时为没钱继续读书的人支付学费。比如，他在国立绥远中学任班主任的时候，班里有位叫张雪吾的学生，家境贫寒，没有能力继续念书。孔老师爱惜他的良好天资，不忍心看他半途而废，便克服自家生活紧张的困难，帮助他解决了一年多的生活费用，保证了学业的顺利完成，并考入北京医学院。张雪吾现任山西省药品检验所技术主任，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他经常对人们说：“孔老师是我的恩师呀，没有他哪有我的今天！”又如，当年孔老师在归绥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成为呼市一中同事的刘兆义，家里孩子多，工资又低，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总是不够吃。孔博泉便多方帮助他，把自家节省下来的大

麦面送给他。“文化大革命”时，孔老师被批斗，靠边站，刘兆义照样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孔老师的老伴怕连累学生，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而刘兆义却说：“我不怕，我知道孔老师是好人。”

在呼市体育场当场长时，孔博泉对职工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不论谁生活上有了困难，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解决。比如，有位炊事员叫张全茂，年岁和孔博泉差不多。此人未成过家，花钱大手大脚，再加上爱喝酒，每月的工资都胡乱地花掉了。孔博泉认为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于是就义务承担起张全茂的工资管理工作，把他的钱存起来，需要时再按计划支取，生活管理得很有条理。孔博泉还时常把他请到家里就餐，共享家庭的欢乐，俩人成了好朋友。张全茂病危住院，他跑前跑后，送饭喂水。张死后，一切后事又是他一手张罗处理。体育场还有位年轻的职工叫杨万生。他勤劳肯吃苦，就是智商有些低，30多岁还没娶亲成家。孔博泉硬是想办法帮助他娶了媳妇安了家。后因国家政策规定，杨万生离开体育场到土右旗乡下落了户。那时他的生活很困难，孔博泉经常帮助他，把自家的旧衣服送给他。杨万生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解决。

孔博泉助人为乐的事举不胜举，有的好事却成了“文化大革命”挨批斗的罪过。五六十年代人们挣的钱比较少，急用时常常需要向别人借。孔博泉经常把钱借给别人，可有位曾经借过他钱的人在斗他的时候却说，孔博泉把钱往外借是为了拉拢干部。对此，他尽管很生气，但并没有影响和改变他热心助人的优秀品格，以至到了步履蹒跚的80岁，还要拄着拐杖去探望住院的50多岁的国立绥远中学时的学生崔翔凤。

## 六

孔博泉年逾古稀，十年浩劫给他肉体上留下的伤残导致了行动上的不方便。他很少出门参加活动，最后一次在社会上露面是

他八十高寿时的1984年。他的学生们为他隆重地庆祝八十寿辰。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济济一堂，在内蒙古农牧学院会议室举行了隆重的祝寿仪式。

当年20来岁的学生，现在都已年过半百。他们中有工程师、教授、人民解放军军官、医生、记者、书法家、体育工作者、党政干部。孔博泉老师看着这些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心情无比激动。此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欣慰和幸福。因为他看到自己栽培的小树终于长大成材，结出了丰满的果实。他要讲几句话。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笑盈盈颤巍巍地站起来。首先，他对心爱的学生们的盛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他希望他的学生们再接再厉，继续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做出更大的成绩。第三，他想念那些当年在国立绥远中学而现在远离大陆寄居台湾的学生们。他说：“假如他们能回到一别几十年的家乡，看看家乡的变化该多好哇！”他多么希望在台湾的学生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啊……

在采集和整理孔博泉老师的生平事迹时，内蒙古大学教授段成梁、副教授张世恒，呼市教育科研所刘兆义；呼市体育分会白夫、盖树元，呼市体工队阎又夫等同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 从放牛娃到全国冠军

——记蒙古族长跑运动员伊套特格的一生

张焕伦

伊套特格，蒙古族，1924年3月生于哲里木盟奈曼旗查干朝鲁村一个穷苦牧民家庭里。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1952年开始体育生涯。在一系列的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屡屡建功，多次打破全国纪录，获得全国冠军，并成为我国解放以后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名次的运动员，在我国田径运动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悲惨的童年

1924年3月，伊套特格出生在哲里木盟奈曼旗查干朝鲁村一个贫苦牧民家里。他的父亲为牧主干了一辈子活，过度的劳累使他经常吐血，身体十分虚弱，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为了一家人能够活下去，母亲生下他不到满月就给牧主的孙子当奶妈子，还要给牧主干家务活。小小的伊套特格由于吃不上奶水饿得不住地哭，姐姐只好用玉米面糊糊填满他的肚子。晚上，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才能喂喂他。看着瘦弱的伊套特格，母亲不住地掉下伤心的眼泪。伊套特格十几岁了还没有上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他只能羡慕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走进本村学堂。由于失去了早期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致使伊套特格一生

的文化学习受到严重的影响。每当谈起这件事，伊套特格就愤恨地说：“这都是万恶的旧社会给我造成的！”他十二、三岁时就开始给牧主放马，牧主却又不允许他骑马放牧，他只得东追西赶那些不听话的马儿，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晚上回到家里，有时来不及吃饭就一头倒下睡着了。一次，一匹马不见了，小小年纪的他足足跑了二十多里地也没找着。牧主知道后，一顿臭骂后就是一顿鞭子，把他抽得浑身青紫。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伊套特格穿着破烂的白茬子皮袄冻得发抖，脚也冻得麻木了，有时不得不把脚放进刚拉下的牛粪里，只有这一会儿才能感到热乎气。一年秋天，全家人正在给牧主干活，伊套特格的父亲一头栽倒了，从此再没有起来。以后一家人的日子更难过了，确实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共产党救了他们全家

正当伊套特格全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是共产党救了他们。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他的家乡，打倒了地（牧）主，穷人当家做了主人。他们家分得了土地，还分得4头牛，10只羊。从此，全家人再也不愁吃不饱饭了。伊套特格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候可真高兴，每天嘴都好象合不住了，总想笑。劲也好象使不完了。”这一年的11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在部队里，已经23岁的他开始学习文化。文化教员握住他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写字，他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部队领导经常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使他明白了许多东西，思想觉悟也渐渐提高了。他对人说：“我活了23年，心里还从来没有这样舒坦过，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我在战场上死了也心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学习军事技术。1951年，他在内蒙古骑兵二师六团三连的大练兵中获得模范机枪小组组长的称号，受到了嘉奖。

从小的放牧生活和大自然对他的熏陶，使伊套特格练就了一

付结实的身板，尤其是小时候放牧追马使他得到了耐力素质的锻炼。在部队里，他的长跑才能得到了发挥。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伊套特格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比赛，结果获得了5000米的冠军。他的运动才能得到了承认。组织上为了使他更好地成长，把他送到了“八一”体工大队进行深造。

### 辉煌的体育生涯

伊套特格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工大队田径队专攻中长跑。此时，他已经28岁了。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这个年龄毕竟太大了，而且仅仅是开始训练，他的全面身体训练基础很差，尤其速度慢是一个致命弱点。但是，伊套特格的毅力是惊人的。人们只能用“勤学苦练”来评价他的训练态度。50年代初，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是很低的，很多项目的训练方法是落后的，科学训练还摆不到日程上，许多人都是在摸索着干。伊套特格由于文化水平所限，看不懂资料，就虚心地听，认真地学，凭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53年夏天，他进入了令人羡慕的国家田径队，这使得他的运动生涯丰富多彩起来。1953年10月6日，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这是解放以后全国首次举行的大规模体育竞赛盛会。伊套特格在5000米比赛中以15分48秒创造了全国纪录，并获得了冠军。1954年8月5日至8日，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田径比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来自奥地利、英国、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黎巴嫩、荷兰、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运动员参加了比赛。男子5000米比赛前，当播音员介绍有一名中国运动员参加比赛时，看台上骚动起来，一时间观众议论纷纷，他们的脸上更多地呈现出好奇和怀疑，有的人甚至毫不隐瞒自己的看法：中国人能行吗？

是的，“东亚病夫”的形象一时很难从外国人的心目中抹掉。随着比赛的不断展开，观众们的表情从怀疑、嘲笑变成了吃惊。这个中国运动员以他轻松的步伐和优美的姿势甩掉了很多外国运动员，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近似疯狂的欢呼声中，第5个冲过了终点。记者们把摄影镜头一次次对准他，记下这动人的历史性时刻。观众们跳下看台友好地围拢着他，争先恐后地请他签名留念。这个中国运动员就是蒙古族长跑运动员伊套特格。他的奋力一冲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成为我国解放以后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奖牌的田径运动员。在归国途中，中国田径队又应邀到苏联访问，在基辅举行的全苏田径锦标赛上，伊套特格以15分21秒创造了新的5000米全国纪录。1955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田径比赛中，他做了参加中跑比赛的尝试，结果获得1500米和3000米两项亚军，以后又多次打破3000米全国纪录。1956年，我国运动员为了准备参加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0月在北京举行了选拔赛。在年轻好手如林的竞争中，伊套特格以他独有的冲刺风格取得第2名。这以后，他回到了内蒙古。在以后的两年比赛中，他一直名列前茅。上海、北京等地的田径爱好者十分熟悉他的动作，常常在看台上亲切地喊着“老伊套！老伊套！”为他鼓掌加油，他博得了无数观众的心，他们是那样尊敬他，喜爱他。1958年11月3日，我国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在那个年代，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人不多，很多人把它视为艰难的历程。伊套特格又一次加入挑战的行列，第一次参加了这种超长距离跑，途中可谓困难重重，两脚起了血泡，胃剧烈地疼痛，他以超人的意志顶了过去，跑完了全程，并且达到了运动健将标准。

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于1959年9月13日在北京开幕。已经35岁的伊套特格象出征的老战士一样，异常兴奋地参加了规模空前的比赛。实事求是地讲，摆在他面前的

困难太多了，出现在他面前的对手个个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没有一个超过30岁。但是，伊套特格在年轻人面前毫不示弱，并使他们望而生畏。在比赛中，他四次打破1500米和3000米全国纪录，最后取得3000米第2名和1500米第4名，两次登上了领奖台。第一届全运会之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冬季田径运动会于11月5日在武汉拉开战幕。伊套特格和参加“全运会”的全部好手又出现在汉口体育场。武汉的热情观众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伊套特格以他一往无前的精神和优美放松的技术以及独特的冲刺风格深深打动着观众。他过关斩将先后取得1500米和3000米两项全国冠军，使全运会1500米冠军河北李贺年等一大批名将都败在他的手下。更为可贵的是，伊套特格在夺得1500米冠军后没有做任何休息，便接受了武汉体育学院科研人员对他进行的生理、生化指标的测试，不到10分钟他又参加了5000米比赛，最后获得第6名。他这种不怕困难，乐意和别人配合的精神和连续比赛的能力使人们钦佩不已。武汉体院的科研人员说：“这位全国冠军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的做法使我们深受感动。”

在竞技场上，竞争的密度之大、强度之高常常使一些人退怯，尤其是无情的比赛结果也使人常常做出“见好就收”的选择，或者是脸上还呈现着胜利的微笑的时候就体面地退出竞争的舞台。伊套特格决不这样，他常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只要我能比赛就不当逃兵。”他象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一刻也不停息地耕耘着。只要能比赛，他从不放弃一次机会。1960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为了更好地向家乡父老汇报自己的训练成果，他顶住压力，一次次地接受了小伙子们的挑战。1500米他输了，只取得第2名。他及时总结教训，制定出3000米比赛的战术，结果登上3000米冠军领奖台。要知道，他在这项比赛中最后800米时就开始了冲刺，使那些年轻对手措手不及，只好望背兴叹。



1962年，伊套特格已经38岁了，这可是田径场上的“爷爷辈”了。他又令人吃惊地出现在上海市的田径场上。上海市的观众是熟悉他的，五十年代他那矫健的身影和优美的跑姿给上海市的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次在全国田径比赛上，他仍未使热爱他的上海观众失望，尽管他已是运动员中的“高龄”者，但仍然取得了10000米的第6名。1964年伊套特格已步入不惑之年，和他同期的运动员早已“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除了他都在看台上当观众了。唯有他，40岁了，又一次在唐山市参加了全国比赛。尽管他的体力已大不如前，但他顽强拼搏的精神却一次又一次地博得热情观众的喝采。

伊套特格热爱本职工作，他深深感到要当好一个运动员，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就必须刻苦训练。他常常在倾盆大雨中坚持训练，他感到这是训练意志品质的好机会。许多人评价他的训练态度是：一练起来就不要命了。1960年冬天，伊套特格在滑冰中不慎摔断颧骨，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连续几天昏迷不醒，鼻子里不停地流血。他只休息了一个多月，身体稍好一些就投入了训练。在春天的一次10公里越野比赛中他战胜了众多名将，获得了冠军。

1962年，伊套特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了。他除了自己训练外，还担任教练员工作。他的文化水平较低，为了把训练搞好，他常常虚心地求教于别人，为了提高文化修养，经常学习到深夜。他把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任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病了也不轻易耽误一堂课。伊套特格一生中的优点之一是艰苦朴素，始终保持部队的优良传统，从不铺张浪费，这一美德也深深感染着运动员。

伊套特格因患食道癌于1986年元月去世，使内蒙古的体育队伍里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但是，他在竞技场上一往无前的精神和优良的体育道德风貌以及良好的运动技术却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作为田径场上的功臣，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 体育之恋

## ——苗时雨传略

张新宇 穆 岚 花 玲

苗时雨，字润田，祖籍山西汶水县。1908年8月29日出生于原绥远省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姑子板村一个小皮货商家庭。1965年2月22日病逝。生前曾任内蒙古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内蒙古体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是全区和全国著名的运动员、裁判员、体育理论专家。为内蒙古和华北地区的体育运动、体育教育和群众体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英勇拼搏，为中华民族争光

1923年7月，苗时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归绥第一小学，并考入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开始迷上了体育。无论体育技能，还是篮球、足球、排球、田径等项目他都非常喜欢。由于他从小养成一股不怕吃苦的倔强劲儿加上刻苦训练，在绥远一中和归绥市的体育比赛中已初露锋芒。

1927年，苗时雨作为归绥队的主力队员参加了山西太原举行的第一届华北地区大中学生篮球比赛。在和北平育英中学队、天津辅轮队和通县潞河中学队等强队的比赛中，苗时雨英勇顽强、敢打敢拼，受到同行的好评。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由张学良将军倡议举办的沈阳“华北地区大中学生田径会”，并取得了100米短跑第二名的好成绩。通过这两次运动会，不仅使他的体育技术

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使他确定了献身体育事业的志向。1929年6月中学毕业后，他与同窗好友赵允迪一齐考入了著名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

北师大体育系是全国优秀体育人才的摇篮，该校的足球队、篮球队很有声望。苗时雨进入体育系后如鱼得水，受到了良好的培训；他自己也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会，学习很努力，各项成绩均达到优秀。赵允迪老先生回忆说：“时雨是有名的尖子，老师和同学都很器重他。”大学期间，篮球是他的主攻专业，在滑冰、体操、棒垒球等方面他也毫不偏废。当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练董守义先生应邀指导帅大篮球队，作为该队主力的苗时雨深受启迪。他与队友们多次参加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大、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五校篮球赛，北师大队每每所向无敌。1931年，北平师大队获北平市篮球赛冠军，使当时驻北平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英国、美国各球队都纷纷败下阵来。这对北平各界民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年，苗时雨随球队赴东北。打败东北大学、蓬云大学球队之后，在大连与不可一世的日本队交战。比赛时，数以万计的东北同胞前来为师大队呐喊助威。苗时雨和队友们被这群情激昂的场面所感动。他与队友们默契配合，奋力拼杀，经过一场恶战，终于战胜了骄横的日本队，很刹了他们的威风 and 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从此，北师大篮球队便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红极一时的最佳球队。教练们对担任后卫的苗时雨评价是：“判断准确，防卫能力强，技术过关。”称他是“师大五虎”之一。

### 献身教育，培养后备人才

1933年，苗时雨大学毕业，被分在天津南开中学执教，同时兼任南开大学体育指导。严谨的治学态度，高超的体育技巧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使他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工作

成绩很突出，为南开培养了一批具有良好体育素质和技能的学生。两年后，他又担任北平市立师范学院体育主任。这一时期，他实行了实验性的体育教学法，使学生的健康状况、运动技术水平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为此苗时雨受到了学校的嘉奖。不久，北京市立体育专科学校聘请苗时雨担任该校训导主任兼体操教授。苗时雨抓住这个能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欣然赴任。这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妻子金蕴璞和孩子都在北平市内，家距学校并不远，可为了工作方便，有更多的时间帮助指导学生，苗时雨在学校租了房子，长期在那里备课、教学。1936年，他带学生东渡日本，参观了远东运动会。回校后，便进行新的教学尝试，成绩斐然，得到校方多次表彰。国内很多著名的体育工作者都是苗先生培养出来的，如王士林、贾玉瑞、阎维仁、段炳诚、赵守成、高椿、常英、俞吉刚、马纪刚、王强、樊明玉、张炳、崔文忠等。可谓桃李满天下。

1937年，芦沟桥事变，华北很快沦陷。当时，苗时雨正在归绥探亲休假，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可也无能为力。北平沦陷后，他随着流亡队伍到了西安，担任了西北联合大学的体育教师。为接被困在北平的妻儿，他冒险回家。然而一到北平，便被汉奸监视，为生活所迫，他又回到北平体专任教。他觉得，“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教育中国人，这还是好的。”于是，他不但认真传授体育知识，还总结了自己的锻炼实践和教学经验，写出了《近代学校体操》、《棒垒球练习法》两本书（由北平神光出版社出版）。北平许多院校争相购买以做教材。

1948年5月，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任命苗时雨为中华临时中学校长。时值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社会秩序混乱，教育经费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临中”不得不与外校合并。苗时雨的校长生涯只维持了三个月便结束了。绥远和平解放后，苗时雨来到绥远省立第一中学（今呼和浩特市一中），担任体育教研

组组长。在这里，他对一中的体育教学工作及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开展“劳卫制”活动，使该校学生达到锻炼标准的人数为全省之冠。同时他培养出许多优秀运动员，为呼市、内蒙古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2年，绥远师专成立，苗时雨接到让他担任体育科主任的任命时，激动地流下了欢欣的热泪。他本着一定要办好家乡的体育教育事业，培养出合格的中学体育师资这样一个真诚的信念，为搞到体育器材而四处奔波。还请来了吴懋功等知名教师给学生上课。吴懋功老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苗老师太辛苦了，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在解决了教师和体育器材不足的困难后，遇到新的困难就是生源不足。他从1953年全国统考中得知，师专体育科不但生源少且质量差。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他提出直接从市内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学生的建议。经过上级领导批准，他多次到中学宣传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列举了大量的由于不重视体育教育而造成人民身体素质差，体育运动水平低的实例，并亲自登门拜访那些不同意有体育特长的子女报考体育科的家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有30名体育基础良好、文化水平也较高的学生踏进了绥远师专体育科的大门，开办了体育科第一班。苗时雨亲自担任班主任并讲授体操、篮球、棒球和滑冰等课。从此，绥远的体育教育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苗时雨每次上课，都穿着洗得发白却又十分整洁的运动服，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学生面前。这无言的身教，深深感染了学生们，使他们初步懂得了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教态和仪表。上篮球课时，他要求学生做抢篮球的动作必须符合标准。有名学生，身体素质很好，力气也大，就是因动作不协调而常常出差错。苗时雨就专门对他进行多次辅导，直到该生掌握了动作要领。上徒手体操课时，学生要练习两臂侧平举，当时学校没有体育馆，学生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一个个练得两臂酸疼，大汗淋漓，

心里不由地埋怨老师太“心狠”、“不体贴人”。当学生们发现自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时，当他们到苗老师家无拘无束地欢度春节时，他们才深深地体会到苗老师是既严厉而又慈祥的恩师。当年的学生，而今已是内蒙师大体育系副教授的郭普义说：“苗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最早当老师那会儿，总是想到苗老师是怎样说的、怎样做的，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54年，内蒙古师范学院由乌兰浩特迁到呼和浩特并与绥远师专和张家口师专合并。三个学校的体育专业合并后，苗时雨担任内蒙古师范学院体育科主任。为了搞好教学，他亲自外出购买体育器材，经常检查校园内的体育设施，清扫场地，反复告诫学生要爱护体育器材。不久，上级决定为内蒙师院建造一座体育馆，擅长设计的苗时雨勇敢地挑起图纸设计和施工指挥的重担。为了工作便利，他索性吃住在工地上。体育馆落成之时，他却因过度劳累而病倒了。1958年，苗时雨担任体育系主任。

1960年，内蒙古体工队与内蒙古师院体育系合并，成立了内蒙古体育学院。苗时雨担任副院长。他不但管教学，还管科研、后勤工作。1963年内蒙古体育学院撤消后，他又带领学生回到内蒙古师院。由于长期勤奋工作而积劳成疾的苗时雨不得不拖着久病之躯离开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了20年的体育教育事业。

建国以来短短的十年时间里，苗时雨培养出了一大批体育教学人才，他们大多数从事体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例如：宁玉英、王丽仙、郭普义、田润雨、任富、郝培基、蒋湖等等，他们活跃在自治区各地，成为体育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 热心服务 发展群体运动

在苗时雨把满腔热血倾注于祖国的体育教育事业的同时，他还积极投身于群众体育运动，并为此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几年，苗时雨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担

任了北平市立公共体育场场长。他希望能通过这项工作为祖国的群体工作做一点贡献。可是当权的官僚并不欣赏这些，他们想的只是争权夺利，沽名钓誉，办体育只不过是他们粉饰太平，为自己增加政绩的一种手段。偶尔办一次运动会，也只是做表面文章，敷衍了事。苗时雨的满腔热忱被这无情的现实压抑了。1947年7月，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发来的一纸调令，使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北平所受优厚待遇，返回家乡担任归绥市体育场场长。为振兴家乡的体育事业，他不辞辛苦，亲自选场、设计、组织施工，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荒草滩上建成了归绥市第一座体育场，就是今天呼和浩特市体育场的前身。

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后，苗时雨受聘担任了绥远省政府学委会康乐组主任。这期间，他把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搞得轰轰烈烈，丰富多彩，受到人们普遍好评。

1953年7月，华北局体委委托绥远省于8月7日在绥远省归绥市举办华北体育运动会。省政府立即组建了筹备委员会，孙兰峰任主任委员、阮慕韩为副主任委员、苗时雨任大会总裁判长。苗时雨和其他同志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条件下，仅用40天时间，就使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保证了运动会如期召开。运动会开幕后，他和副总裁判长赵允迪精心组织，使这次近千名运动员参加、历时五天的大型运动会各项比赛进行得井井有条，圆满地完成任务，受到了各界好评。这次大会以后，归绥市掀起了“体育热”，这对全市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8年，苗时雨荣获首批国家级田径裁判员证书。1959年，他以副团长身份率领内蒙古体育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会。他不断鼓励我区运动员一定要敢打敢拼。

苗时雨是一位经历了两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以亲身经历，深深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使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造福于人民。因此，他无限热爱社会主义新中

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他在临终前向家人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没能入党，这是我终生遗憾，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争取上进，积极靠近党团组织……”苗时雨同志为自治区的体育教育事业和群众体育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和荣誉。他曾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教育部也对他的事迹进行过表彰。这一切，对一个坚定的事业追求者来说，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安慰。

感谢赵允迪、吴懋功、郭普义、杨守义、金蕴璞、苗芳、田润雨等同志对本文作者的帮助。



## 编 后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八辑是呼和浩特地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人物专辑。经过一年多的征稿和编辑工作，在各界朋友们的支持、帮助下，现在终于面世了，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虽然地处边塞，但相对来说，文化事业较为发达。在开发和建设这一地区中，一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界的有识之士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该辑就是力图通过人物传记、人物生平史料的形式，以亲闻、亲历、亲见的史实，来展示他们勇于进取、刻苦钻研的精神风貌和在治学态度、学术造诣、职业道德、培养人才诸方面的突出事迹。倘若这些史料的发表，能为我市和自治区的史学研究、“两个文明”建设和教育后代尽一点微薄之力，从而达到资政育人的目的，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该辑撰写的人物，有的已经故去，有的仍然健在。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吴懋功、孔博泉两位先生也离我们而去。对于他们的不幸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该辑分为四个部分，即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每一部分的人物，是按照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的，特此予以说明。

在成书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有关单位和人士的热情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不高，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当之处，祈望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1年11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八辑·(教文工体人物专辑)

作者 =

页数 = 2 6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